

國家圖書館



001574348

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

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上)

專書第一號

張荳雲 呂玉瑕 王南昌 主編



中央研究院

社會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專書第一號

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

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上）

張荳雲·呂玉瑕·王甫昌 主編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敬 贈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台北南港

序

距離一九八九年出版的「變遷中的台灣社會，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分析」，這本書的出版竟有九年之長。本來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也沒有固定開研討會的規畫，不過看到這兩本間隔這麼久出版的書，一時也興起何不年年舉辦研討會的念頭。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到目前為止，已公開了十四個問卷調查資料，去年底又完成了兩個問卷調查，目前又有兩個調查正在進行。資料實在很豐富，雖然已有六篇博士論文、十餘篇碩士論文、百餘篇學術論文問世，但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發揮。

我們在出版這本論文集子時，承諾積極推動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之運用，包括比較密集地召開相關研討會、出版研究通訊、完成英文版的計畫執行報告等等，應該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這本書的出版，張苙雲教授貢獻至大。從一九九五年研討會的籌辦、論文送審和修訂、出版的規畫與完成都是在張教授主持下積極進行，這本書能呈現在讀者面前，是張教授努力才有的結果。當然，我們也感謝論文的作者，為研討會撰寫論文，為本書的出版修訂最後的版本。國科會對研討會的支助也使這個開會及出版計畫得以實現，我們謹在此致謝。

由於研討會舉辦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雖已成立，但社會學同仁仍在民族所任職，研討會計畫就依原規畫由民族學研究所行為組執行。在出版工作上，原還是計畫由民族所出版，但在時間配合上，最後民族所和社會所乃協調決定由社會所出版。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很感謝民族所的全力支持。在本書編輯過程中，編輯助理謝麗玲小姐主動積極從事，值得高度肯定，特此誌謝。

瞿海源於南港
一九九七年五月

國家圖書館



001574348

(608)7869

上冊目錄

序.....	瞿海源	(3)
導讀.....	張苙雲	1
台灣的階級結構變遷與社會流動(英文).....	蔡瑞明	15
台灣階級結構：流動表與網絡表的分析.....	孫清山·黃毅志	57
制度資本與文化資本的消長： 台灣社會階層化和社會流動的分析(英文).....	林南	103
✓台灣社會民衆對成就之歸因及 重分配政策之態度.....	關秉寅·黃毅志	147
✓社會階層、文化認同與音樂喜好.....	瞿海源	189
✓都市化、階層化與生活型態.....	章英華	229
✓台灣地區民衆消費行爲傾向之形成：傳媒使用、 自我認同狀況、與個人背景之影響.....	郭貞	265
✓夜間活動人口的型態與特質.....	傅仰止	311
作者簡介.....		359

Contents

(Part I)

Preface	Hei-Yuan Chiu	(3)
Introduction	Ly-Yun Chang	1
Leaving the Farmland: Class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aiwan	Ruey-Ming Tsay	15
Class Structure in Taiwan: Analysis of Mobility Tables and Network Tables	Ching-Shan Sun and Yih-Jyh Hwang	57
Persistence and Erosion of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apit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Taiwan	Nan Lin	103
Stratification Beliefs in Taiwan	Ping-Yin Kuan and Yih-Jyh Hwang	147
Social Stratificati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Music Preferences in Taiwan	Hei-Yuan Chiu	189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Status on Life Style	Ying-Hwa Chang	229
The Development of Consumer Orientations on Taiwan: The Impact of Media Use, Identity-formation Status, and Demographic Background	Cheng Kuo	265
The 'Night Owls'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Yang-Chih Fu	311
Contributors		359

導 讀

張荳雲*

社會變遷這個課題長久以來一直最爲社會科學界所關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現在，台灣的社會已經歷經了四十年以上的急速蛻變，主要生產方式由農業轉變爲工業和服務業，勞動市場也隨之出現結構性的轉型。大多數的人們都容身於各種不同的政府、工商企業組織之中，從事各式各樣的生產活動，以換取生活資源，滿足家庭成員的需要。伴隨著都市化的發展，無可避免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式從而有些變化。密集緊盯著台灣社會結構的發展軌跡，正是「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的首要目的。這個計劃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首度於1984年委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和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規劃進行，於1989年再度委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進行第二期計劃。目前由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成立，這個計劃於1994年起改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執行。

經過一年多的籌備，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於1994年6月召開了「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研討會」，參與籌備的研究人員先後有瞿海源、章英華、呂玉瑕、王甫昌、柯志明等教授，由張荳雲擔任召集人，呂玉瑕和王甫昌兩位教授擔任執行祕書。這個四天的會議，第一天安排

* 我特別要感謝章英華和呂玉瑕兩位教授對本文的建議，章教授在仔細閱讀本文後，於多處提出具體的修正意見，呂教授對本文的文字亦有些修飾。除此之外，本人要謝謝高美英和謝麗玲兩位女士在編務上的協助，沒有他們的鼎力相助，這本書還不知道要拖到什麼時候呢？

的是「大型社會調查研究經驗交流」，第二至第四天則為論文宣讀，後三天會議期間共宣讀了二十一篇論文。調查工作坊的論文交由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所出版的《調查研究》期刊刊出，其餘論文則經過三位評審匿名審查後結集成專書。

由於部份作者工作忙碌，無暇如期修改論文，故而收錄在本書中的只有十六篇。含蓋的主題包括階層與社會流動、日常生活方式、家庭價值與行為、家庭與工作、以及社會參與和制度信任等五大類。這十六篇論文雖然處理的是不同的議題，不同的社會變遷面貌，細續這些研究的發現，可以看見一些當前社會脈動下的底層機制，教育的影響是一個貫穿諸個研究的底層變項，教育的效應及於地位的取得、婦女勞動參與、音樂欣賞、消費型態、作息時間、異識性政治意識的形成、以及對個人、組織、和制度的信任程度等。在某些情況下，性別的作用似乎因教育程度而有所不同。社會階層者之間的差異，在某些意義上，多少也反映著教育程度的作用。除此之外，都市化程度也收錄於本書的研究中，是個獨立於階層效應的社會力。接下來分別說明這些論文所突顯出來的議題和它們之間的關連性。

階層與階級流動

急速的工業化之下，台灣社會的階層結構從而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嗎？出身和成就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蔡瑞明的研究指出工業化過程中的階級結構，可能不似許嘉猷（1989）的研究所稱那麼動態。以快速變動的台灣為例，和許的研究發現一致的是，勞動市場的結構性轉型，的確從而使台灣社會表現出快速的社會流動，這種結構性的轉型特別歸因於農村子弟的流動。勞動市場的結構轉型，給農村子弟提供許多向上流動的機會。然而，蔡瑞明的分析結果卻指出，的確台灣的社會流動主要是發生在農村人口這部份，大量的農村子弟離鄉進入到

各行各業，促使農業人口急速的消失，工人及服務業階級的興起。但是，即或是經歷了四十餘年變遷的台灣社會，出身與成就的關連並未大幅的降低。從交換性的流動上看來，父子兩代間的傳承，在這四十年來，並沒有劇烈的變動。整體社會層級看來，白領階級和藍領階級有明顯的區隔，而農人階級的位置顯得孤立而獨特。這樣的研究發現和陳紹馨先生的觀察是有所不同的。陳紹馨指出：「台灣所具有的邊緣性格，均使台灣無法形成固定的社會制度與社會階層」（1979:522）。

孫清山和黃毅志呼應蔡瑞明的基本結論，即由農往工大規模的職業流動，以及出身與成就的關聯，特別是控制了結構變遷之後，農林漁牧人員與勞動工人的向上社會流動仍清楚的顯示出相對弱勢。他們以職業流動以及個人的交友和婚姻網絡的階層性質，來探討台灣的階層結構。將台灣的就業者分成四大類，專技管理佐理人員（士）、買賣服務人員（商）、勞動工人（工）與農林漁牧人員（農），根據相互流動、交往和通婚等的流動表分析，同樣指出藍領（後二者）白領（前二者）之間，有著明顯的界線，特別是選定了初職之後，低階層的農工要往上跨越，相當困難。

另就這四類職業個別的分析，他們推論說：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的擴充吸引不少背景歧異者流入，不利於階級之形成，但一進入這種工作生涯，交友、婚姻與生活方式以同階層者為對象，這樣的封閉性與穩定性有助於士階級的形成。買賣服務人員代內和代間流動均高，向專技管理佐理人員流動的可能性高，網絡的異質性亦高，是最開放的階層，不利於「商」階級的形成。勞動工人，許多都出身於農家，又可能流向專技佐理、服務或買賣工作人員，背景的異質和向上流動的可能，使得勞動工人階級形成不易。農民則大都出身農家，世代為農，在工作生涯中又缺乏流動的機會，有利於階級的形成。

以上有關台灣社會流動與其階級意涵的探討，都明白指出，在職業結構上的巨大變遷，是大量社會上升流動現象的主要原因，當控制

了結構因素之後，職業的傳承以及藍白領的分界依然明顯。從這樣的結論，我們會推論說，當台灣的職業結構不再有相當的變化之後，社會流動的規模將逐漸減少，而職業的傳承會更加封閉，特別是農工階層，要流動到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與買賣服務人員，將益形困難。在我們逐步擴充與提升教育，期望機會更開放的社會之時，如上的推論是否形成，是值得關注的。

林南在「制度資本與文化資本的消長：台灣社會階層化和社會流動的分析」一文中進一步指出，社會流動的底層機制，除了個人的人力資本外，需同時考慮制度性機制的影響。他認為，哪些人能取得關鍵的文化資源和制度資源，從而將這些文化和制度資源轉換成個人的資本，配合人力資本，這個機制的釐清，應更有助於理解社會階層中的地位取得和報酬的方式。他指出，台灣社會四十年來主導的制度是國民黨黨國體制和省籍。他發現，雖然國民黨員身份和省籍對取得職權和報酬的影響，已經逐漸淡化消逝，從商和自雇取得管理權威，轉而成爲致富的途徑之一，並有取而代之的跡象。

林文在檢視黨員身份和省籍對地位取得的影響後，指出雖然近年來台灣經濟、社會、政治的巨變，進而導致女性在教育取得的劣勢消失，然而，女性教育機會的改善並沒有增加女性取得制度資本的機會，也沒有改善兩性在報酬上的不平等。他建議用強有力的社會行動，以改善女性在地位取得過程中所受到不平等的待遇。這樣的研究發現其實是相當呼應文獻中檢討工業化和婦女地位之間關係的研究結果。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說，首先，伊慶春和呂玉瑕（1994）回顧了相關文獻，就指出工業化的發展，以目前的研究結果來看，對提昇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並沒有明顯的幫助。對居住在都市地區，受過高等教育的職業婦女而言，婦女教育程度及就業機會的提高，的確使婦女重新認定其傳統的女性角色，也提昇了她們的地位。然而，對工廠女工的研究則發現女工的家庭地位並未隨著自身資源的增加而提高。在社會階層

較低的家庭中，家庭內的性別不平等十分明顯，女性的社會經濟資源和個人自主地位均較男性成員為低。

其次，雖然在勞動市場上，無論是男性，或是女性，教育程度都是取得個人社會經濟地位的關鍵因素，然而，兩性地位取得的過程的確還是有明顯差別。張苙雲（1988）對公務人員升遷模式的研究就直接指出，升遷的過程中，雖然教育程度在進入政府機構工作後，持續影響著公務人員的升遷，但是男性比女性更受益於附屬在組織機關（對應於林文的制度資本）的優勢，而女性則是單依靠個人的人力資本：教育訓練，以取得現在的職位。

雖然從經驗資料的分析中，我們的確發現到結構性變遷對社會流動的重要性，以及制度性力量對個人地位取得的助力和阻力，然而，一般民眾的主觀認知和實際的地位取得的機制是有距離的。絕大多數的台灣民眾認為能夠事業有成，個人因素具關鍵性的地位，例如「有心努力」、「本人才智」、和「努力」等。除此以外，教育亦有直接作用，而且教育的重要性，不只是自身，父母的教育亦是關鍵。雖然民眾並不特別強調出身的重要性（如出身在有錢人家不是那麼重要），但又肯定父母教育的份量，如果要談「出身」的話，可能意指教育的成份多些。相對而言，在結構因素部份，民眾似乎只肯定「貴人相助」（社會網絡資源）一項的重要性。簡言之，個人努力、教育、和貴人相助等三個事業有成的因素在民眾的心目中最具共識。從這些發現來看，關秉寅和黃毅志指出，大部份民眾並不瞭解結構性因素的力量，不瞭解在不利的結構性因素下，個人的教育取得、職業流動與財富的獲得都有其限制，一個人的努力，不一定和事業有成劃上等號。雖然許多人都抱著黑手變頭家的願望，但從集體資料分析來看，黑手變頭家的可能性是相當小的（孫清山，1994:119），向上流動有著跨越不過的鴻溝。

生活型態

九〇年代台灣民眾的生活型態，無論是日常作息、外出用餐、逛地攤、聽音樂等，都看出分屬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之間的差異。除此之外，其他如年齡、性別、都市化程度等社會因素也都與之出現不等程度的關連。本書收錄與生活型態有關的四篇研究論文中，瞿海源和章英華的分析比較著重在社會背景因素對生活型態的影響，郭貞則加了消費動機與資訊收集的環節，而傅仰止更界定一類特殊生活型態者：夜間活動人口，並討論他們特有的態度和價值。

以音樂喜好為例，瞿海源分析喜歡閩南流行歌曲、台灣民謠、日本歌曲、國語流行歌曲、中國民謠、和古典音樂等不同的音樂類別與社會階層、文化認同之間的關係。瞿發現一些社會階層和文化認同的變項，顯著地影響民眾對不同音樂的喜好程度。教育程度越高，就越不喜歡閩南歌曲。綜合而言，除了日本歌曲外，教育都是最有力的解釋變項，而且，除了閩南歌曲外，教育對其他音樂的喜好都呈正向的關係。認同本土文化者比較喜歡閩南流行歌曲和台灣民謠，認同中國文化者則比較喜歡國語流行歌曲、中國民謠和古典音樂。

然而，章英華在「都市化、階層化與生活形態」一文除了肯定社會階層的作用外，他特別強調都市程度對生活型態的影響。章分析民眾外出用餐場所、購衣場所以及喜好音樂的類別後，指出無論是低層級或是高層級的消費行為，都發現了都市效果。在所有與社會階層有關的變項中，只有教育年數一項具有穩定的影響效果。教育程度與在地攤購衣、路邊攤小吃、愛好地方戲曲等均成反向關係；相對而言，教育與在其他地方購衣、在餐廳用餐、和音樂喜好等有正向關係。教育和消費行為的關連，在控制社會階層變項後，部份都市化程度的效應雖然被取代，但仍有獨立的影響力。饒富玩味的是，一般都市的效

果比較容易被教育取代，但核心都市的效應則維持著。不僅如此，都市地區資源接觸的可能性，左右了民眾的生活型態，因此，就出現了核心都市的居民既去地攤，也去精品店；既吃路邊攤，也去大飯店用餐的現象。

這些消費行為的傾向，在郭貞的研究中，有了一些不同角度的分析。在研究購買行為、商品資訊收集、與消費動機之間的關係後，郭指出人們在搜尋商品資訊時，未必只是為了比價和省錢。搜尋的目的也可以是學習各種商品和品牌的社會意義，企圖積極善用各種商品的符號，來幫助表達自我的特色，以便成功地扮演各種社會角色。她發現衝動性的購買和商品資訊的搜尋之間出現正相關，其背後的原因是成人多掌理家人財政大權，是購買的主要決定者。因此也可能比較常搜集商品資訊，與他人交換購物心得，以便充份利用手中的資源。然而因為手握經濟大權，也比較容易出現衝動性的購買行為。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的富足，一般人在搜尋商品資訊時，可能就同時會兼顧功利實用性和符號表現性，逐漸出現符號式消費和商品的社會性表達的特質。她的研究發現相當呼應了前述章英華的研究結果。

傅仰止在「夜間活動人口的型態與特質」一文中歸納夜間活動人口的特點：他們非慣俗、反叛、沮喪。晚睡者和晚歸者，年輕、都市人、教育程度高。他們反對善惡報應的宿命觀、反對傳統家庭婚姻觀念。但是，夜貓族並不是同質性很高的一群人，晚睡者比晚歸者的非慣俗和反叛，更偏重形式。晚睡者是不論內容如何，幾乎一味的反叛。晚歸者又比晚睡者更重視善於交友的原則。然而，晚歸者和晚睡者又不同於夜間工作者，後者比前者重視尊敬長輩。

工作與家庭：現代社會的婦女

在現代社會中，女性就業的趨勢上升，似乎是無法避免的，但婦

女仍負擔著最重的家庭照顧責任。到底婦女的家庭角色對她們進入工作世界有何限制？而涉入工作世界對她們的家庭生活有何衝擊？都是令人相當關注的課題。本書中的三篇論文，就婦女就業、親屬互動、家庭照顧、幼兒養育心理健康等方面的討論，突顯了台灣社會中婦女所面對的一些困境。

台灣地區歷年來婦女的勞動率自 1954 年的 29%、1988 年的 45.6%，到 1994 年大致維持在 45.4% 的水準。其中固然未婚的婦女勞動參與率較高，但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增長的趨勢更為顯著。呂玉瑕過去的研究即指出這十多年婦女勞動力的增加，主要在於已婚婦女的大量湧進（且留在）勞動市場有關。婦女的勞動參與固然涉及勞動供給量的變動，相關的研究指出個人的教育程度、居住地區都市化的程度、工作經驗、和家庭相關的因素，如家庭收入、子女數、家庭生命發展的週期等都是影響婦女勞動參與的主要因素。同時，由於台灣地區勞動力普遍短缺，婦女退出勞動力市場後，有著再參與的現象（簡稱之為婦女勞動力再參與），而已婚婦女在小型家庭企業等非正式部門工作的現象也頗為普遍，這些課題都已有研究在進行中。

呂玉瑕的「助力與阻力之間：家庭互動關係與已婚婦女就業」一文即試圖澄清家庭結構型態和婦女就業之間的關係。她指出家人互動關係對婦女的就業行為是一個助力，也是一個阻力，視與哪一方的家人互動而定。妻方親屬互動關係顯著地有利於妻子的就業，相對而言，夫方親屬往來則對妻子的就業沒有影響。而家中有老小需要照護時，通常會對妻方的就業有不利的影響。然而，照護需求對婦女就業影響的方向或強度，還是依家庭收入多寡而定。收入較高的家庭，妻方在家庭的時間價值比在市場高，較可能離職，或者是改變就業型態，以便照顧家庭；而收入低的家庭，妻方的就業型態則不太受到是否家中有照護需求的影響。有兩個可能的解釋，其一為：妻方的收入對家庭而言頗為重要，縱使家中有照護的需求，也只好調整。其二為：收入

低的家庭，教育程度可能不高。而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所可能從事的工作也比較可以兼顧經濟需要和照顧角色的非正式就業市場，因此並未比教育程度高者更可能離職，或者是改變就業型態，以兼顧及家庭照顧的需求。

事實上，對「男主外、女主內」這種性別角色分工的研究看來，在急速社會變遷之下，台灣民眾的性別角色行為和態度，呈現的是相當衝突和矛盾，尤其是職業婦女，對家庭角色傾向傳統的態度，而對工作角色又表現出現代的態度。值得推敲的是，男性的性別角色態度要較女性更為傳統和保守。

從比較結構的觀點來看，性別角色的規範是依附整體社會經濟結構而存在。台灣經濟發展需要的是能夠服從，並且能夠接受低工資的勞動力，成長於傳統父權社會規範的個人，所帶有的社會價值，的確有助於產生這樣的勞動力，尤其是女性，即能服從又能接受較低的工資。在以家庭、國家、甚且國際市場的經濟利益的前提下，這樣的勞動市場的運作方式，不僅維繫了傳統的社會規範，也加強了婦女的從屬地位。由婦女外出工作是為了家庭整體利益和長遠福祉的發現來看，傳統的家庭意識的確規範了女性工作者的行為。

陸先恆與胡美珍的「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對台灣已婚婦女就業與收入之影響」一文就是在處理已婚婦女在最小的小孩六歲以後的就業情形。首先，陸與胡發現雖然仍然有超過六成的婦女在生兒育女的前後時間未能（或未選擇）連續全職，但是仍看得出來婦女出生世代的差異：1956年前後出生的婦女比起1941年前後出生的婦女，更能兼顧工作與幼兒養育。但總的來說，生育和幼兒養育顯著地影響著婦女的就業，對低教育程度的婦女尤然，進而影響她們往後的所得。他們的研究數字顯示，只有三分之一初中程度的婦女在最小的小孩六歲以後，再回到就業市場。據此，他們認為政策的重點應置於提升婦女教育程度、降低低所得和低教育程度的婦女養育幼兒的成本、以及加

強就業輔導，以促使婦女再回到就業市場。由於生育前後的婦女就業比例仍然持續上升，因而學齡前兒童托育的質與量，是個迫切的需求。

就女性的心理健康而言，女性通常比男性表現出較多的心理抑鬱，西方社會如此，台灣亦不例外。由孔祥明的研究得知，台灣地區的女性，無論她的婚姻狀況，她們的心理抑鬱程度都高於男性。其中，尤以離婚、分居或喪偶的女性，抑鬱程度最高，而以同樣婚姻狀態的男性抑鬱程度最低。婦女是否就業，並不影響上述的結果。就這點而言，是和西方社會類似研究所得的結果非常不同。西方社會的相關研究多指出，工作是治療心理抑鬱的良方 (Good 1992)。已婚婦女外出工作因為多了個滿足情緒的來源，而減低她的抑鬱程度。孔的研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與家庭成員同住，對個人心理健康是有所助益的，尤其是對離婚或喪偶者，幫助最大。

家庭價值與家庭行爲

家庭價值有什麼對應的變化？兩代之間的關係，如何表現在孝道觀念上？如何表現在子女的教養上？這些是蔡勇美和伊慶春、葉光輝、以及吳齊殷和高美英等的論文所處理的課題。蔡勇美和伊慶春檢視現代化對台灣人的婚姻和離婚觀與家庭觀有些什麼影響。蔡和伊的研究發現，雖然年輕人、教育程度高者、和都市人呈現出比較現代的家庭觀，但也僅限於與婚姻和離婚有關的議題，如婚姻對經濟安全的重要性、是否要有小孩、同性戀是否可以結婚，以及婚姻出了問題時應如何處理等，年輕人、高教育程度者、和都市人的看法是比較自由派些。然而，一旦進入家庭和親屬觀，如單親家庭、家庭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以及和親屬之間的往來等議題，則無論是年齡、教育程度、或是居住地區，都沒有顯示出有意義的差異。他們指出，縱使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現代化對民眾的家庭和親屬觀並不如預期般有明顯的影響。

對待父母之道在台灣社會近數十年的變遷後，親子間原有的威權和交換連結關係，明顯地減弱了，民眾心目中的「抑己順親」和「護親榮親」的孝道觀念，也受到衝擊。相對而言，由於親子間的感情連結和宗教觀念，民眾的心目中仍然存有「尊親懇親」和「奉養祭念」的孝道觀念。葉光輝的「台灣民眾之孝道觀念的變遷情形」一文指出，在和1987年楊國樞等的研究結果相比，1987到1994這七年間快速變遷的台灣社會，某些層面的孝道觀念是穩定不變的，而某些層面的孝道觀念則逐漸減弱。「親自奔喪」、「感念親恩」、「尊敬雙親」、「奉養雙親」等核心的孝道觀念並不太受到社會變遷的影響，而有所改變，變的是對威權的態度，如「傳宗接代」和「抑己順親」等受到台灣民眾重視的程度已經式微。高教育者、都市人比起其他人更不重視對威權的順從。介於中間的是「榮親」、「護親」、和「陪侍在側」等具體孝道內容。

吳齊殷和高美英以學習理論探討台灣地區民眾教養方式的代間傳承。從他們的研究看到，台灣民眾習慣於比較嚴厲的方式教養子女的，還不在少數。但是「嚴酷教養」的方式，正持續和緩中。第一代的祖父母比第二代的父母更常以嚴厲的方式，管教他們的子女。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變遷，兩位作者指出，主要是拜教育之所賜。教育發揮了潛移默化的功能，調和修正了個人之行為學習。這種由嚴厲到和緩的變化和西方的發展雷同。即或如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嚴酷教養的確出現代間傳承的現象。代間傳承的發現，似乎說明的是仿效的機制對於行為養成的重要性。行為或可越過態度養成的步驟而養成，而非一定需要依循「先形成規範性的理解，再養成行為」的發展途徑。由於家庭內教養過程對個人生命發展的影響機制，這樣的研究結果無疑地有助於瞭解個人行為發展的關鍵。

社會參與和制度信任

四〇年代以後的台灣，逐漸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快速的經濟發展伴隨著工業化和都市化之同時，從政府到民間，從生產、商業到教育、社會福利、和醫療服務，台灣社會的組織形式也漸以「科層體制」的組織形式為主要潮流，而逐漸呈現出「組織的社會」的特徵。此類結構性的特質如何影響個人的行為，以及組織與個人的關係，是社會學領域比較缺乏探討的。王甫昌從個人基本資料中讀出結構性特性，進而觀察這些結構性特質對民眾政黨參與的效應，張荳雲則從對個人的信任和對制度的信任兩個層次闡釋「組織的社會」社會結構的本質。

七〇年代後期開始越演越烈的反對運動，以至今日民眾表現出不同的政黨支持和異議性的政治意識。這個發展過程或許不是如過去所以為，是被壓抑的不滿釋放之後的結果。王甫昌在「結構限制、運動參與、與異議性意識：台灣民眾政黨支持的社會結構基礎初探」一文中提出相反的看法。他認為包括民主理念、省籍族群意識、及台獨意識等，其實是反對運動對於潛在支持者，經過長期動員、建立共識的結果，是民眾參與反對運動的活動，而逐漸產生的集體政治意識轉化之後的結果。果是如此，則運動參與的可能性就相當受到個人在社會結構中位置的影響。他的研究發現，那些比較沒有被日常工作或社會角色的義務和責任束縛住的人，比較可能調整自己的時間，去參加他們覺得有興趣的活動。與結構位置等同重要的教育程度和族群通婚，都對個人參與反對運動，有著獨立而顯著的影響。台灣民眾的異議性政治意識和參與反對活動有著密切的關係，也影響著本省籍民眾政黨的支持。

張荳雲在「當代台灣社會的信任與不信任」中回應學界傳統對人

際關係的一種看法。她提出以個人為對象的信任關係，僅是當代社會人際信任兩種機制之一。另一種機制是為不以個人為對象的信任，有些時候，表面上看來是附屬於個人的人際信任，然實為對營造個人屬性之組織和制度的認可，更有的是直接了當的對當代社會之各類組織制度所表達的評估。張將之稱為「非人際的制度信任」。她的分析清楚地呈現以個人為對象的信任，如一般人、鄰居、親友等，與以男性或老人等先天屬性的群體、以法人和制度為對象的信任，都表現出不同的變化走向。她認為，是為組織的社會的今日，民眾制度信任的變化趨勢，是當代社會變遷的重要指標，人際信任和制度信任兩者的變化走向以及相互交錯的運作介面，是當代社會所必需正視的課題。

綜合而言，收入本書的十六篇論文所處理的課題，呈現出至少三方面的特色，而有別於其他以大型調查資料分析為基礎的論文集。首先，結構性的機制在不同主題的研究中都被突顯出來。結構性機制不僅影響了個人的社會流動、婦女的勞動參與、和民眾的政黨參與，有些機制且透過代間傳承，不斷地複製。其次，多篇論文都觸及台灣社會民眾日常生活的脈動，包括對父母和養兒的態度、工作生活與家庭關係、音樂欣賞、消費行為、以及生活作息等。第三，組織層次的思考首次納入了社會變遷的研究。這些特殊的切入角度所累積的研究發現，加深了我們對台灣社會的瞭解，且由於這些新興課題，有如蘊含著豐厚的研究潛力的礦脈，值得進一步的開發與深化。

參考書目

許嘉猷

- 1989 〈台灣代間社會流動初探：流動表的分析〉。《台灣社會現象的分析》，伊慶春和朱瑞玲主編。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 25:517-549。

陳紹馨

- 1979 《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伊慶春和呂玉瑕

- 1996 〈台灣社會學研究中家庭和婦女研究之評介〉。蕭新煌與章英華主編，《兩岸三地社會學的發展與交流》，台北：台灣社會學社出版。

張苙雲

- 1988 〈行政組織內的個人事業生涯發展〉。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66:1-30。

Good, Mary-Jo D.

- 1992 Work as a Haven from Pain. Chapter 3 in Mary-Jo D. Good, Paul E. Brodwin, Byron J. Good and Arthur Kleinman (eds) *Pain as Human Experience: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eaving the Farmland: Class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aiwan*

Ruey-Ming Tsay**

Abstract

Most researchers of social mobility agree that occupational structure affects the proces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lass/status. However, the transformation or eruption of occupational structure does not affect the individual likelihood of uniform mobility, depending on when an individual's class mobility is taking place. This paper uses both Conditional Quasi-Symmetry models and association models to predict social mobility patterns in Taiwan. In contrast to predictions of liberal industrialism, the results provide no compelling evidence supporting a trend of increasing social fluidity after decades of full-scale industrialization.

Furthermor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markets has forced massive mobility of farmers' sons and daughters from their origins,

* The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are based on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which was fund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and conduct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I am grateful to Cheng-Tay Hsueh, Shu-Ling Tsai, Yeu-Sheng Hsieh, Hei-Yuan Chiu, Ronald Breiger, Michael Hout and Raymond Pomerleau for their helpful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Three anonymous reviewers also provided useful comments. Nevertheless I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any errors in the analysis and findings. The writing of this paper was supported in part by a grant from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unghai University.

bu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has not diminished substantially in the four cohor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strong effects on a person's social mobility. Structural mobil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individuals with lower-class origins. In Taiwa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labor markets has created upward mobility opportunities for farmers' sons and daughters to non-farm classes, including the high non-manual class. The overall picture of social mobility regime portray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non-manual and manual classes, with the farm class occupying distinct and isolated position.

台灣的階級結構變遷與社會流動

蔡瑞明

摘 要

大部分社會流動的研究者認為職業結構的影響，發揮在兩代間階級或地位的傳承。但是，職業結構的轉變與變動對個人社會流動的影響並非一致的，須視個人職業或階級流動的時段而定。本文主要是利用對數線性模型分析四個年齡層的兩代間社會地位傳承的型態與社會不平等的形成過程。其中特別是著重於台灣近幾十年來的經濟結構變遷所造成的「結構性流動」對個人社會流動所造成的影響。分析的結果並不支持自由工業化理論。台灣在經過數十年的工業化之後，兩代間的社會流動開放程度並沒有增加的趨勢。

台灣的結構變遷使得大量的農村子弟離鄉進入其他的行業，但出身與成就的關連並未大幅的降低。結構性的社會流動造成農業人口急速的消失，工人及服務業階級的興起。台灣經濟結構的變動帶來了快速的社會流動，特別是為來自農村的子弟，提供許多向上流動的機會。但是，從交換性的流動上來看，父子兩代間的傳承，在這四十年來，並沒有劇烈的變動。從整體社會層級看來，白領階級與藍領階級有明顯的區隔，而農人階級的位置顯得孤立而獨特。

Leaving the Farmland: Class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aiwan

Sociologists define a society as open or closed based on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for mobility in the occupational or class structure. A more open society poses fewer barriers to mobility. The issue of social mobility is often related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tatus or class positions within families. A pivotal criterion here is how often sons and daughters inherit their fathers' and mothers' status/class. A closed society has greater class or status inheritance, because of fewer channels for young job seekers to pursue positions beyond their parents' classes.

Social mobility is relational and transitional. There is no clear measurement for determining the openness and closure of a society. Therefore, sociologists often compare the social mobility of a society with that of other ones, and investigate temporal changes within a society. Recently sociologists have extended their research interest from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Asia's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o their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However, social mobility in Taiwan has not been fully investigated. Until recently,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on Taiwan had been plagued by the lack of data (e.g. Tsai 1986:318-319, 1988; Sheu 1989; Hsieh and Yu 1990:31). In the past, major national surveys did not include questions on parents' occupations and other related mobility data, thus blocking the progress of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on which this study is based, is perhaps the first major national survey project to collect the social mobility data,

allowing sophisticated analyses of mobility tables.¹

Most social mobility studies analyze single mobility tables. The mobility regime presented by a single mobility table is actually a combination of individual social mobility taking place during a long stretch of time, sometimes over a period of 30-40 years. The episodes contained in a mobility table can be imagined as lengthy sequence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generational status/class: starting typically with the earliest stage of a father's "transmission" of status to a 20-30 year-old son, and ending with a stage in which both father and son are in the end of their careers. Most researchers of social mobility agree that the effects of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perat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lass/status. *However, the transformation or eruption of occupational structure does not affect individual likelihood of mobility uniformly, depending on when the status or occupation is attained.* This is most significant when a society has experienced rapid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ne way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social mobility is to group the samples as homogeneously as possible by experience in the labor market. Because the "infinite" stage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tatus/class confound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a stage must be fixed for each comparative group. In most data sets, the fixed points available for each generational pair are the respondent's father's job, at a given respondent's age, and respondent's first job/class, presumably acquired between the ages of 15 and 20.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the main focus of this paper is to assess the changes of mobility patterns in a fast-developing economy—Taiwan. Taiwan provides a good case for

1 The First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1985), unfortunately, did not include parents' employment data, which, for example, led to Tsai's (1988)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without father's occupations. In comparison, the Second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has much more complete information of social mobility than the first one.

examining the changes because the country experienced drama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last four decades. Taiwan's occupational structure has changed fundamentally in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time its agricultural society was transformed into an industrialized socie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Since researchers of social mobility began to analyze mobility rates, the debate on how and why industrialization affects social mobility has existed. In spite of the debate, most agre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is a fundamental issue. Some theorists of industrialization predict that a trend of increased mo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at education becoming a more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sorting of individuals into occupations, and that patterns of social mobility in these areas should converge to thos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e.g. Kerr 1960 et al., Kerr 1983, Lipset and Bendix 1959, Treiman 1970). But recent studies show that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o support a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atterns of social mobility (Hazelrigg and Garnier 1976; Grusky and Hauser 1984; Goldthorpe 1980;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² Rather, Grusky and Hauser (1984) notice that there is a "take-off" period at the early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It impli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is not necessarily continuous and linear. Furthermore, many of the studies show that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ost cases, accompanies with drastic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occupational and class structure. However, although many of the above-mentioned studies employed

2 Many of these authors discussed a related topic, FJH (Featherman-Jones-Hauser) hypothesis (see Featherman, Jones, and Hauser 1975), which claims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variations in origin and destination distributions, relative mobility patterns will be quite the same for industrialized societies.

advanced log-linear models to analyze the patterns of social mobility, they did not incorporate measures of structural mobility in their models. In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studie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Goldthorpe (1985) calls for more empir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to this issue. He questions previous studies of their conceptualiz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In particular, social mobility seen as absolute mobility or relative mobility often produces rather different results. Furthe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uch as de-industrialization, usually brings with it a large amount of mobility from working class to service class. A related topic being debated is the process of proletarianization. Wright (1985; Wright and Singelmann 1982) argues that there is an expansion of working class positions in the economy. However, Goldthorpe (Goldthorpe and Payne 1986) rejects the thesis of proletarianization based on European data. Later, in their recent study using longer period of data, Wright and Martin (1987) conclude that the evidence of proletarianization is not supported.

Many authors have studied class mobility in Taiwan (e.g. Tsai 1986; Sheu 1990; Hsieh and Yu 1990). However,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schemes (with different data sets) render it difficult to compare with the results from these studies. Nevertheless, these researchers, especially, Hsieh and Yu (1990),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massive social mobility in Taiwan has been caus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occupational structure. These studies all call for a further analysis of structural mobility and circulation mobility of Taiwan's society.³ The present paper tries to address this issue. I examine the trends of change of associations between class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with emphasis of the effect of structural mobility

3 Sheu (1990:20-21) used a different statistical procedure to analyze structural mobility. Hsieh and Yu (1990) employed a series of latent class models to examine occupational mobility.

across cohorts. I hypothesize that a fast-growth economy increases the fluidity of social mobility, and that the changes i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affect the social mobility regime. This paper compares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associations, using the aforementioned fixed points, in four different cohorts, who wer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beginnings of their full-time careers.

The first part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s an aggregation of occupations into social classes and a comparison of the change of class composition in the four cohorts. A set of Conditional Quasi-Symmetry models are applied to the cohorts' mobility tables. If the Quasi-Symmetry model fits the tables, these models will allow the partition of social mobility into two components: mobility that is caused by structural shifts and mobility as a result of exchange movement. Then, to test the multi-dimensional aspect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origin and destination, this analysis uses a combination of log-linear and log-multiplicative models to fit four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tables. The models not only take into account the ordinal nature of class categories, but also fit general effects such as immobility, and row-column associations, which may be different in each cohort.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he data for this study are mainly taken from the Second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administer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in Taiwan.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for this project was Dr. Hei-Yuan Chiu. The project was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he survey was designed by social scientists from a consortium of institutions. A 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the sample. Then, 45 precincts (i.e. Shian in counties and Li in cities) were selected randomly as the primary selection unit. In those precincts, villages and city blocks were selected, proportionate to their sizes (PPS). Then governmental

residential registration records were used to draw random samples of the residents.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in the Spring of 1990. Most of the contacts and interviews were carried out by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winter vacation of 1990. In the field, each team of interviewers was supervised by a college graduate student or research assistant from Academia Sinica. Follow-ups and rechecking were done by researchers and their assistants (Chiu 1991). The quality of the collected data is considered to be good and reliable. At the time of the survey—January 1990—the respondents were aged 20 to 64. The surveyors interviewed a total of 4587 cases. However, some cases have to be excluded from this analysis either because of unemployment or missing data.

Adopting a Classification Scheme

The first step for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s to choose a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grouping hundreds of occupational titles into a few categories. This is not often a problem in status attainment analysis because a standardized classification scheme, such as prestige scores, can be applied without difficulty. However, in analyzing social mobility tables, to choose a theoretically feasible scheme is often to partially determine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Breiger 1981;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Nevertheless, the research tradition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U.S. often ignore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class itself. The number and content of social classes are often treated with passing interest. Authors tend either to follow the tradition of using Blau and Duncan's classification scheme or to set up their own schemes without convincing explanation. Breiger (1981) and Goodman (1981) are two exceptions.⁴ On the contrary, European

4 Blau and Duncan's full table contains 17 categories. On the one hand, the table was constructed for analyzing the American case, and, perhaps, for those Wester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On the other, this detailed classification proved unnecessary and inadequate because of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bases. Based on the notions of

researchers (e.g.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for CASMIN project, also see Hout 1989 for Irish case) have put emphasis on establishing an adequate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analysis.

The data in this research do not allow the use of Blau and Duncan's classification scheme. Taiwan's speci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do not fit into the classification scheme. Accordingly, perhaps the most serious problem with Blau and Duncan's scheme is that it almost prohibits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Previous comparative works by American researchers often use very limited classification schemes (e.g. Grusky and Hauser 1984).

In Blau and Duncan's scheme, parts of the classification are not meaningful. With fas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ome of the distinctions are not significant. For example, in that scheme, the group, Craftsmen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ub-classes: Manufacturing, Construction, and Other. The criteria for the division are not always present in other countries. With the kind of rapi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at is characteristic of Taiwan, some of the distinctions are not significant. Because of the above problems, another alternative is used to classify the occupations.

The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used in the survey is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ISCO)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1968, Treiman, 1977:Appendix A). I recoded the three-digit occupational codes into the Erikson-Goldthorpe-Portocarero (henceforth, the EGP scheme) categories (Erikson, Goldthorpe, and Portocarero 1979) using a standard re-

internal homogeneity on class attributes within each social class, Breiger (1981) identifies eight social classes. This implies that 9 of Blau and Duncan's 17 classes are empirically and theoretically redundant.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Breiger's (1981) model, the categories of Manufacturing Crafts, Manufacturing Operatives, and Manufacturing Laborers can be combined without significant loss of information, for mobility among these three categories is statistically homogeneous.

coding procedure (with some minor adjustments) developed by Ganzeboom, Luijkx, and Treiman (1989, see Ganzeboom and Treiman 1992 for new ISCO-88 codes). A computer program for re-coding is listed in Ganzeboom et al. (1989).⁵ The reasons for using the EGP scheme of classification are: (1) the categories have been extensively used in many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ies (e.g. the CASMIN project, see Erikson et al. 1989;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Hout and Hauser 1992), (2) Ganzeboom et al. have re-coded over one hundre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tables into EGP-categories based on ISCO codes, (3) This procedure is very flexible because it allows ISCO codes to approximate EGP-categories, even if some employment data were not collected, and (4) The usage of the EGP-categories will certainly facilitate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aiwanese social mobility and that of other nations which are analyzed using the EGP-categories.

Both of EGP scheme and Marxist scheme of classification have been used in Taiwan. Sheu (1990, 1994) used Wright's (1978, 1985) Marxist class categories to analyze social mobility, comparing the cases of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cently, researchers in Taiwan have begun to use the EGP scheme to analyze Taiwan's class structure and its composition (e.g. So and Hsiao 1994; Wu 1994). In addition, Wu (1994, see also So and Hsiao 1994) argues that Goldthorpe's Weberian class scheme proves more useful with greater validity than that of Wright.⁶ This study adopts the EGP scheme, because,

5 I am grateful to Professor Harry Ganzeboom for providing me an SPSS program for the re-coding procedure. Because of some mino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tandard ISCO scheme and the Taiwanese version of ISCO, I changed portion of Ganzeboom's program. A few occupations, e.g. Chinese herbalist, were promoted to higher classes because these occupations are considered relatively higher positions in Taiwan than in Western countries.

6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compare these two approaches, which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paper.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data from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do not allow complete operationalization of Marxist scheme of classification, due, for example, to the lack of the information about supervisory status.

unlike the Marxist approach, emphasis on class structure itself, Weberian scheme pays attention not only to class structure but also to class formation, especially, via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class boundary (Weber 1978; Goldthorpe 1987; Breiger 1981; Snipp 1985). Social mobility is the main focus of this paper.

The full version of the EGP scheme consists of 12 categories, based on four different occupational attributes: sector, employment, skill level and supervisory status (Ganzeboom et al. 1989). Because of the lack of supervisory status data in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I reduced the number of categories to six. Even though the six-category scheme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more detailed analysis, it is warranted by the increase of accuracy in classification. In comparative studies, six or fewer categories are often employed, because it reduces the number of cells in the mobility tables to a manageable level (see Goldthorpe 1987;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Ganzeboom et al. 1989). Based on the re-coding scheme, occupations are classified into these six classes: (1) Higher nonmanual workers; (2) Routine nonmanual workers; (3) Self-employed workers; (4) Skilled manual workers; (5) Unskilled manual workers; (6) Farm workers.

Research Methods

Social mobility can be measured directly by the margins of mobility tables as absolute mobility rates on the one hand; it can also be measured by relative patterns of mobility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margins, on the other. To measure absolute mobility, this study uses a series of mobility rates and index of dissimilarity. To analyze relative patterns of social mobility, log-linear and log-multiplicative models are employed (see Goodman 1979, 1984; Clogg 1982a, 1982b; Agresti 1990). These models not only control for changes in marginal distribution, but estimat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To estimate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social mobility, other relevant parameters are added to the log-linear and log-

multiplicative models. Similar models have been used in studies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status attainment (Hauser 1984; Smith and Garnier 1987; Wong 1990, 1992; Xie 1992). These hybrid models consist of log-linear parameters and log-multiplicative parameters. The models not only have the advantage of Goodman's association models, which take into account the ordinal nature of the categories, but also incorporate other nonvertical structural parameters, either *a posteriori*, by using external criteria (Hout 1984) or *a priori*, by using topological methods (Hauser 1979; Hout 1983). The hybrid model has the advantages of clearness and substantiality of interpretation when compared with Hauser's level model and Hope's diamond model. Hauser's original level model is often criticized for being too exploratory, while Hope's model too restrictive (Hope 1982; Yamaguchi 1987; Wong 1992).⁷

The above methods are often adapted for two-way cross-classification tables, but they can be generalized to analyze multiway tables. In this study, conditional association models are used to incorporate selected effects into the models, such as time (cohort) and sex. Based on the criteria of these effects (K), a single two-way mobility table (RxC) with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origins (rows) and destinations (columns) is extended to become a multiway table (KxRxC) (see Tsay 1995).

Four Cohorts of Fast Change

Any serious observer of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last four decades will notice a drastic change of its production

⁷ For basic concepts and calculations of log-linear models, readers are referred to Knoke and Burk (1980). For model specific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 of log-linear analysis, Hout (1983) provides a detailed and clear didactic demonstration. Bishop, Fienberg, and Holland (1975) offer a collection of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f related statistical topics in log-linear analysis. Agresti (1984, 1990) covers basic concepts as well as recent development.

structure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e fourth and oldest cohort (50-64 years old) grew up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control. The colony was an agrarian society with limited resources. Almost all production was related to agriculture and almost all the farmers were tenants. Although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 was available to the native Taiwanese in this period, higher education was difficult to obtain. The third cohort (40-49) experienced the dawn of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started with import-substitution policy. The required education was six years of elementary school. After successful land reform, most tenants became independent farmers. The people in the second cohort (30-39) were born between 1950 and 1959. In 1968, compulsory education was increased to 9 years. Almost half of this group were covered by the new education act. When they entered high school, Taiwan's development had switched to the phase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had entered the take-off period. Industrial production dominated the economy. With adequate education, individuals from this cohort entered the labor markets with sufficient credentials and skills. The first and youngest cohort is 20-29 years old. They were born during 1960-1969. Their Taiwan is a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y with an economy accelerating at a very fast pace (see Hsiao, Cheng, and Chan 1989).

Descriptive Assessment of Mobility Patterns

Table 1 presents the mobility tables of father's class by son's and daughter's first class by cohort. The class distributions of the four cohorts are reported in Table 2. Combining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 farm class in the four cohorts shows unequivocally a trend of decline in farming. While more than 60 percent of the fathers in the oldest cohort (Cohort 4) belong to the farm class, the percentage as shown in the children of the youngest cohort has plummeted to only 3.8%. Those who were born in farming class, in most cases, experience

upward mobility to routine nonmanual and manual classes. The reduction of farming is accompanied by the sharp expansion in non-farm classes, especially the manual classes. It is worthy to note that the number of self-employed workers is growing in Taiwan, a phenomenon not often see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Recent studies suggest that self-employment often acts as an avenue for upward mobility and personal gains in developing as well as developed nations (Carroll and Mosakowski 1987; Wong 1992). With all the drastic changes across cohorts, the stable capacity of higher nonmanual classes stands out, and this will be further discussed later in the paper. To asses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s of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in each cohort, the index of dissimilarity (Δ) is calculated for each cohort. Index of dissimilarity measures the percentage of cases must be moved for one distribution to be identical to the other distribution. These indices of dissimilarity suggest a trend of increasing diversity between the classes of the respondents and their fathers.

Total mobility is the percentage (or the rate) of respondents who change class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while immobility rate is the percentage of persons who move out of their parents' classes. Total immobility rates have decreased from 51.4% in cohort 4 to 20.7% in cohort 1, as shown in Table 3. The most dramatic change of immobility rates is in the farm class (Class VI), suggesting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 i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n the process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To show the mobility pattern in each cohort, Figure 1 displays the mobility rate for each cohort. The most striking pattern is the drastic change in the farm class during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The farm class has turned itself from the most immobile class into the most mobile one* during the last four decades. In the youngest cohort, more than 90% of individuals with a farm background have moved away from their class of origin. Figure 1 also shows that,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farm class, the five nonfarm classes cluster together

Table 1 Father's Class by First Class by Cohort: Taiwan, 1990

<i>Class Origin</i>		<i>Class Destination</i>						Total
		I	II	III	IV	V	VI	
<i>Cohort 1: Age 20-29</i>								
I	High Non-Manual	46	39	27	6	14	0	132
II	Routine Non-Manual	5	7	8	6	4	0	30
III	Self-Employed	18	44	37	28	31	2	160
IV	Skilled Manual	12	16	22	36	31	2	119
V	Unskilled Manual	18	23	18	21	33	1	114
VI	Farm	33	42	54	106	94	30	359
Total		132	171	166	203	207	35	914
<i>Cohort 2: Age 30-39</i>								
I	High Non-Manual	64	66	42	26	17	1	216
II	Routine Non-Manual	11	23	13	8	12	0	67
III	Self-Employed	40	58	52	30	30	4	214
IV	Skilled Manual	17	28	16	54	34	0	149
V	Unskilled Manual	19	21	19	22	33	0	114
VI	Farm	56	67	85	134	167	114	623
Total		207	263	227	274	293	119	1383
<i>Cohort 3: Age 40-49</i>								
I	High Non-Manual	47	26	12	6	9	2	102
II	Routine Non-Manual	5	7	3	2	5	0	22
III	Self-Employed	24	20	20	7	14	5	90
IV	Skilled Manual	2	8	9	16	7	6	48
V	Unskilled Manual	9	6	7	10	16	1	49
VI	Farm	19	29	41	51	67	151	358
Total		106	96	92	92	118	165	669
<i>Cohort 4: Age 50-64</i>								
I	High Non-Manual	26	7	12	12	10	6	73
II	Routine Non-Manual	2	3	3	2	1	0	11
III	Self-Employed	16	9	23	4	13	4	69
IV	Skilled Manual	4	3	7	18	10	5	47
V	Unskilled Manual	5	2	4	2	8	3	24
VI	Farm	27	13	19	29	52	225	365
Total		80	37	68	67	94	243	589

Note: Total N = 3555.

Table 2 Father's and Respondent's Class Distributions: 4 Cohorts, Taiwan, 1990

Class	Cohort 1		Cohort 2		Cohort 3		Cohort 4	
	Origin	Destination	Origin	Destination	Origin	Destination	Origin	Destination
Higher Nonmanual	14.4%	14.4%	15.6%	15.0%	15.2%	15.8%	12.4%	13.6%
Routine Nonmanual	3.3	18.7	4.8	19.0	3.3	14.3	1.9	6.3
Self-Employed	17.5	18.2	15.5	16.4	13.5	13.8	11.7	11.5
Skilled Manual	13.0	22.2	10.8	19.8	7.2	13.8	8.0	11.4
Unskilled Manual	12.5	22.6	8.2	21.2	7.3	17.6	4.1	16.0
Farm	39.3	3.8	45.0	8.6	53.5	24.7	62.0	41.3
Total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N		914		1383		669		589
Δ		35.5		37.1		28.8		20.9

Note: The totals may not sum to 100 due to rounding err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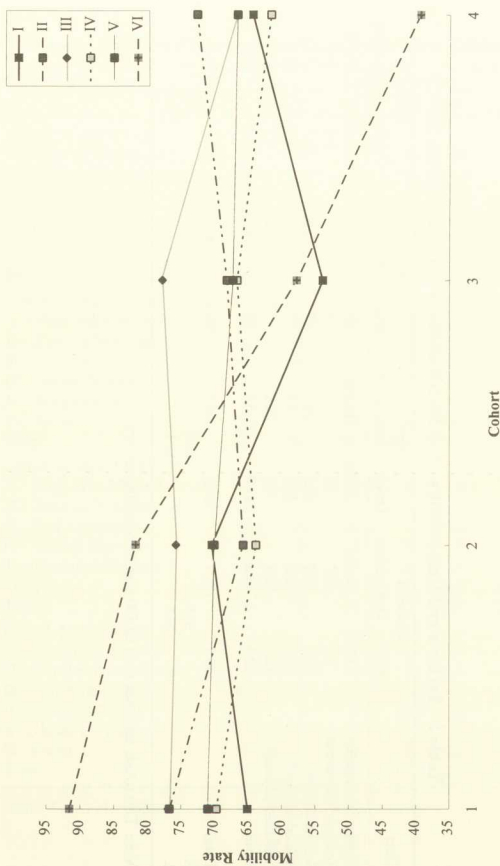


Figure 1 Mobility Rates by Origin and Cohort: Taiwan, 1990

Table 3 Immobility Rates by Origin and Cohort: Taiwan, 1990

<i>Cohort</i>	<i>Class</i>						Total
	I	II	III	IV	V	VI	
Cohort 1	34.9	23.3	23.1	30.3	29.0	8.4	20.7
Cohort 2	29.6	34.3	24.3	36.2	30.0	18.3	24.6
Cohort 3	46.1	31.8	22.2	33.3	32.7	42.2	38.4
Cohort 4	35.6	27.3	33.3	38.3	33.3	61.6	51.4

in the range of 60%-80% mobility rates in the oldest cohort. In cohort 3, the self-employed class became highly mobile, while class I (higher nonmanual) became almost immobile. After that period, the five non-farm classes again cluster together in the range of 60%-80% mobility rates. This trend indicates the strong effec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i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during the formative years of cohort 2 and cohort 3.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n Social Mobility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formed Taiwan's occupational structure in a few decades.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the impact of this process was clearly instrumental in the reduction of the farming population and the increase of industrial workers. A society of immobility has become a highly mobile one. But are these changes a result of weak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tatus/class, or an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ew division of labor, or both?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e rest of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social mobility with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structural mobility, then focuse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of social class.

The concepts of structural mobility and circulation mobility have long been important in the studies of social mobility (Rogoff 1953; Kahl 1957; Yasuda 1964; Hutchinson 1958;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 Hope 1982). Structural mobility is caus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occupational opportunities; while circulation mobility represents symmetric exchanges between pairs of social classes. Many authors have noticed that the marginal differences of mobility tables might have been the driving forces for the patterns of social mobility, either forced mobility or not (Hauser et al. 1975; Grusky and Hauser 1984). However, the debate on how to identify and measure the effects of these two types of mobility continued until Sobel and his associates (Sobel 1983; Sobel, Hout, and Duncan 1985) proposed a new framework for dealing with this question. Sobel, Hout and Duncan (1985) proposed that, to separate structural mobility from circulation mobility in a social mobility table, an acceptable fit of the model of Quasi-Symmetry (QS) to the mobility table in question must be obtained. Quasi-Symmetry model is a model in which all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origin and destination are symmetrical along the main diagonals (Bishop, Fienberg, and Holland 1975; Hout 1983). Without the fit, these two kinds of mobility cannot be separated, because some mobility cannot be explained by these two concepts.

Table 4 shows that social mobility of the four cohorts all obtain an appropriate fit of the Quasi-Symmetry model according to the conventional criterion ($P > .05$). Because quasi-symmetry holds for each table, the effects of structural mobility can be uniquely separat-

**Table 4 Parameter Estimates of Structural Mobility
Applied to 4 Cohorts Tables: Taiwan, 1990**

<i>Quasi-Symmetry Model</i>				
<i>Cohort</i>	<i>df</i>	<i>L</i> ²	<i>P</i>	<i>BIC</i>
Cohort 1	10	12.89	.230	-55.29
Cohort 2	10	17.25	.069	-55.07
Cohort 3	10	14.09	.169	-50.97
Cohort 4	10	8.65	.566	-55.13

ed from those of exchange mobility (Sobel et al. 1985). Therefore, we can proceed to analyze the multi-way mobility tables, in this study, mobility tables by cohort.

The Quasi-Symmetry model can be extended to analyze multi-way mobility tables (Bishop et al. 1975; Sobel 1988). The Conditional Quasi-Symmetry model (CQS) incorporates a third variable such as cohort. The most general model of Conditional Quasi-Symmetry is that QS holds in each layer. The CQS predicts the observed cell counts (F_{ijk}) in multi-way tables of origin and destination, by cohort, as:

$$F_{ijk} = \mu_k \beta_{ik} \beta_{jk} \alpha_{jk} \delta_{ijk}$$

where, in each cohort (k),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pply: $\delta_{ij} = \delta_{ji}$; $\prod_j \alpha_j = 1$ for all k ; and $\beta_i = \beta_j$, and $\delta_{ij} = 1$, for $i = j$. For a two-way table, Sobel, Hout and Duncan (1985) showed that the α_j parameters, representing the proportional shift between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measure structural mobility. The products of the β_i , β_j , and δ_{ij} parameters measure exchange mobility. Specifically, the beta coefficients ($\beta_j \beta_i$) represent the chances of individuals entering specific classes, given their origins; and the delta coefficients (δ_{ij}) measure the symmetric exchange between pairs of classes.

The CQS model provides focus on heterogeneity and homogeneity among cohorts. By adding or relaxing the equality constraints of the CQS model, the sources of the differences of mobility patterns among cohorts become apparent. Table 5 presents the goodness-of-fit results of Conditional Quasi-Symmetry models to the four cohorts' tables.⁸ Model 1 applies the equality constraints of alpha, beta, and delta coefficients on the data. In other words, the model hypothesizes that the patterns of structural and circulation mobility in the four

8 Models in this paper are fitted by GLIM (Payne 1987; Aitkin 1989; NAG 1993). Part of the analysis is done using CDAS (Eliason 1990).

cohorts are homogeneou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patterns will differ because the effect of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in either content or degree, are not the same. This model does not fit the tables. It indicates that the mobility patterns in the four cohorts are not the same. Taking Model 1 as the baseline model, we can relax the constraints to incorporate the differences among cohorts. Model 2 relaxes beta coefficients, allowing them to vary by cohort, but constrains alpha and delta values to be equal. This model hypothesizes that the chances of entering specific classes are the same for the four cohorts. This model provides a much better fit to the tables, and the improvement over Model 1 is significant ($\Delta L^2=370.06$; $df=15$; $P=.000$). It suggests that structural mobility patterns are different across cohorts. Model 3 relaxes the alpha coefficients, while maintaining the beta and delta values as equal across cohorts. Compared with Model 1, the reduction of L^2 is also significant ($\Delta L^2=486.35$; $df=15$; $P=.000$). In addition to log-likelihood ratios, the *BIC* statistics of both Model 2 and Model 3 show that they have a better fit than Model 1, suggesting that alpha as well as beta values vary by cohort. Model 4 tests the interaction of delta values with cohorts. Unlike Model 2 and Model 3, the *BIC* statistic of Model 4 does not improve over that of Model 1, which shows that exchange values are less likely to be similar in the four cohorts. So far, Model 3 appears to be the best model. Therefore, Model 3 is taken as the new baseline model. Model 5 relaxes the constraint of beta in Model 3. As shown in Contrast 3, the improvement over Model 3 is not substantial. Although the *P* value shows that the model fits the data very well, the *BIC* statistic is actually worse than that of Model 3. The next model, Model 6, allows alpha and delta values to vary. However, even at the expense of 45 degrees of freedom, it does not fit better than Model 3 and the improvement is not significant ($\Delta L^2=60.14$; $df=45$; $P=.065$). This result clearly indicates that delta values are similar in the four cohorts. Model 7 is

the general Conditional Quasi-Symmetry model, which is actually a combination of fitting each table with the Quasi-Symmetry model separately. In other words, this model imposes no homogeneity constraint at all, allowing alpha, beta, and delta effects to vary by cohort. The sum of degrees of freedom and log-likelihood ratios of the four cohorts in Table 4 equal that of Model 7 ($L^2=52.88$; $df=40$). Using more than 100 parameters, this model fits well in terms of P values (.083); but it is clearly not a parsimonious model as indicated by a rather large BIC value (-274.2). Compared with Model 3, the extra parameters do not pay off ($\Delta L^2=84.09$; $df=60$; $P=.022$). Therefore, the hypothesis that there is no general pattern of structural mobility in the four cohorts, as posited by Model 7, should be rejected.

The above analysis shows that departures from Model 3 are unacceptable.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we can conclude that Model 3 in Table 5 is the preferred model because of its parsimony and goodness of fit. This model assumes that both of beta and delta coefficients are constant across cohorts, while alpha coefficients vary by cohort. The parameter estimates from Model 3 are reported in Table 6. The alpha coefficients (α_j) measure proportional shifts to the origin distribution, that is, the overall tendency of structural mobility. Because α_j is larger than one, demonstrating an excess of respondents of other origins entering the class, the results clearly show that the structural mobility redistributes the work force away from the farm class and allocates it into other classes, especially the routine nonmanual class (Class II). In each cohort, structural mobility pushes farmers' offspring into other classes. Note that α_j for Class II is the largest in each cohort. Structural mobility favors Class II, consisting of white-collar positions and showing a trend of expansion. In the first cohort, as many as 7 times more individuals move into Class II than expected as the result of structural mobility. The volume of structural mobility for self-employed, skilled manual and

Table 5 Goodness-of-Fit Results of Conditional Quasi-Symmetry Models Applied to 4 Cohort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Tables: Taiwan, 1990

Model Description	<i>df</i>	L^2	<i>P</i>	<i>BIC</i>
<i>Models</i>				
(1) Quasi-symmetric model --- equal alpha, beta, and delta	115	623.32	.000	-316.9
(2) Quasi-symmetric model --- equal alpha and delta	100	253.26	.000	-564.4
(3) Quasi-symmetric model --- equal beta and delta	100	136.97	.008	-680.7
(4) Quasi-symmetric model --- equal alpha and beta	70	341.26	.000	-231.1
(5) Quasi-symmetric model --- equal delta	85	103.97	.079	-591.0
(6) Quasi-symmetric model --- equal beta	55	76.83	.028	-372.9
(7) Quasi-symmetric model	40	52.88	.083	-274.2
<i>Contrast</i>				
(1) Model 1 vs. Model 2	15	370.06	.000	
(2) Model 1 vs. Model 3	15	486.35	.000	
(3) Model 3 vs. Model 5	15	33.00	.005	
(4) Model 3 vs. Model 6	45	60.14	.065	
(5) Model 3 vs. Model 7	60	84.09	.022	

Note: N = 3555.

Table 6 Parameter Estimates from Conditional Quasi-Symmetric Model
(with Equal Beta and Delta Effects) Applied to 4 Cohorts Mobility Tables

<i>Selected Effects</i>	I	II	III	IV	V	VI
<i>Beta Coefficient</i> (β_j)	5.842	1.262	5.198	4.335	3.196	45.093
<i>Delta Coefficient</i> (δ_{ij})						
I High Non-Manual	1	.717	.639	.281	.382	.097
II Routine Non-Manual		1	.803	.421	.541	.105
III Self-Employed			1	.475	.598	.178
IV Skilled Manual				1	.642	.249
V Unskilled Manual					1	.295
VI Farm						1
<i>Alpha Coefficient</i> (α_j)						
Cohort 1	1.293	7.261	1.406	2.019	2.457	.015
Cohort 2	1.216	6.701	1.154	1.636	2.087	.031
Cohort 3	1.266*	4.971	.950	1.116	1.707	.088
Cohort 4	1.267	2.540*	.932	1.078	1.804*	.171

Note: * indicates the parameter is not significant.

unskilled manual workers (Classes III, IV, and V) increases steadily across the cohorts. In addition, the volume of structural mobility for the professionals (Class I), consisting of mostly prestigious and highly paid positions, is 1.2 times more than expected. There is almost no change in the four cohorts.

Table 7 also reports the delta coefficient for each pair of classes. In the Sobel, Hout and Duncan (1985) framework, as discussed above, a small coefficient indicates strong association and little exchange mobility; while a large coefficient means weak association and substantial exchange mobility. Although exchange mobility is the product of the β_i , β_j , and δ_{ij} for (i, j) pair of classes, the sizes of the beta coefficients are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odds of mobility reported by the delta coefficients. The delta coefficients in Table 6 show a pattern much like that of the crossing effects model (see e.g. Pöntinen 1982; Goodman 1984), that is, exchange mobility diminishes as the distance between classes grows. Little exchange between the farm class and other classes takes place, and the rate becomes smaller as the gap between them becomes larger. It is fair to say that, without structural mobility, the sons/daughters of farmers have less of a chance than members of other classes of moving out of their parents' classes. The substantial exchange among Class I (professionals) and Class II (routine nonmanual workers), and, to a lesser extent, also Class III (self-employers), indicates a relatively closed system in the higher classes. However, because Class III does not consist exclusively of high-paid occupations, and because the mobility between Class I and III is substantial, support is not shown for the closure thesis (Goldthorpe 1980:43-44), which argues that higher classes are off-limits to members of lower classes.

Structural mobility between classes can be measured with alpha ratios (α_j/α_i). Alpha ratios less than one (unity) indicate excessive downward mobility, while ratios larger than one represent excessive upward structural mobility. Perhaps the most spectacular feature of

Table 7 Alpha Ratios (α_j/α_i) from Parameter Estimates of CQS with Equal Beta and Delta Values (Model 3)

<i>Class</i>	I	II	III	IV	V
<i>Cohort 1: Age 20-29</i>					
II	.178				
III	.919	5.163			
IV	.640	3.595	.696		
V	.526	2.956	.572	.822	
VI	84.640	475.535	92.097	132.259	160.887
<i>Cohort 2: Age 30-39</i>					
II	.181				
III	1.054	5.807			
IV	.744	4.097	.705		
V	.583	3.212	.553	.784	
VI	39.038	215.110	37.041	52.505	66.979
<i>Cohort 3: Age 40-49</i>					
II	.255				
III	1.332	5.230			
IV	1.134	4.454	.852		
V	.741	2.911	.557	.654	
VI	14.418	56.629	10.827	12.714	19.450
<i>Cohort 4: Age 50-64</i>					
II	.499				
III	1.360	2.727			
IV	1.175	2.357	.864		
V	.702	1.408	.516	.497	
VI	7.388	14.820	5.434	6.287	10.523

Note: I : High Non-Manual; II: Routine Non-Manual; III: Self-Employed; IV: Skilled Manual; V: Unskilled Manual; VI: Farm.

the structural mobility in the four cohorts is the upward shift from the farm class to the five nonfarm classes. Intercohort comparisons show a trend of increase in structural mobility of sons/daughters from farm families to the higher classes. The movement from the farm class to the routine nonmanual class (Class II) is significant, as the ratios grow from 14.820 to 475.535. Depending on the cohort, a son/daughter of farmers is in the range of 15 to 476 times more likely to become a routine nonmanual worker than a child of a routine nonmanual worker is to become a farmer. Similar trends also exist in pairs from the farm class and each of the other five classes. Even though the ratio of Class VI to Class I is the smallest (7.388-84.640), it shows again that the door to the upper classes is quite open to the children of farmers. In contrast,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working class does not benefit from structural mobility to Class I but rather to Class II. Overall, structural mobility does not favor nonfarm class mobility, with the exception of Class II. The increasing openness of Class II may be due to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from a manufacturing to a service industry in Taiwan. Evidently, structural mobil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fining the mobility regime in Taiwan.

Model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enerations

The above sections have elaborated the structural effects on temporal change of social mobility. The next step is to articul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ather and son/daughter across cohorts. The association models used in this paper, with the father's class (i) and son's or daughter's class (j), where the k subscripts indicate the cross-cohort effects, can be presented as:

$$F_{ijk} = \tau_i \tau_j \tau_k \tau_{ik} \tau_{jk} \delta_{jk} \exp(\phi_k \mu_{ik} \nu_{jk})$$

where τ_i and τ_j are the marginal effects of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and δ_j parameters estimate the main diagonals, that is, the degree of class-inheritance. ϕ_k measure the general association parameter for

each cohort; and μ_i and ν_j are the scores of row and column effects. Some normalization is needed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se effects. In this case, the restrictions of $\sum \mu_i = \sum \nu_j = 0$ and $\sum \mu_i^2 = \sum \nu_j^2 = 1$ are used. In the model, some parameters can be dropped or added to estimate the tables, and cross-cohort constraints can be imposed to test the cohort effect and/or the change patterns. The parameter ϕ measure the overall association between rows and columns, and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degree that destination depends on origin (Duncan 1979). Among these effects, the parameters (ϕ_k) are the focus of the analysis because higher association means higher dependency of origin on destination.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change of association across cohorts, the row and column effects are restrained to be equal across cohorts. Depending on the specific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models, the log-multiplicative models are capable of testing cross-cohort as well as intra-cohort variance and invariance. In most cases, a powerful one-degree-of-freedom test can be used to fi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horts (Yamaguchi 1987; Goodman 1984).

The baseline model, Model 1 in Table 8, for the mobility tables is the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Model, which specifies no relation between respondent's and his/her father's class, that is, origin and destination are independent across cohorts. As expected, this model does not fit the data. The second model hypothesizes that the tendency of class inheritance is not only the same for each class but also identical in each cohort. Even though this model is not significant, it fits much better than Model 1. Note that the *BIC* statistic becomes negative (-272.416). For two nested models such as Model 1 and Model 2, the improvement in Model 2 can be assessed using the differences in fit (indicated by the log-likelihood chi-square) and degrees of freedom. Using just one more degree of freedom than Model 1, the improvement over Model 1 ($\Delta L^2 = 486.21$; $df = 1$; $P = .000$) is quite dramatic and significant under the null hypotheses of a chi-square distribution (Bishop et al. 1975). The result indicates

Table 8 Goodness-of-Fit Results of Models Applied to 4 Cohort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Tables: Taiwan, 1990

Model Description	<i>df</i>	L^2	<i>P</i>	<i>BIC</i>
(1)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100	1023.23	.000	205.6
(2)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with diagonal effect	99	537.02	.000	-272.4
(3)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with diagonals	94	325.12	.000	-443.4
(4) Conditional quasi-independence	76	302.66	.000	-318.7
(5) Homogeneous uniform association with diagonals	93	142.69	.000	-617.7
(6) Heterogeneous uniform association with diagonals	90	135.71	.001	-600.1
(7) Homogeneous row-effects with diagonals	89	120.47	.015	-607.2
(8) Homogeneous column-effects with diagonals	89	112.49	.047	-614.2
(9) Equal RC effect model with diagonals ($\phi_k = \phi$)	89	106.33	.102	-621.3
(10) Equal RC effect model with diagonals	86	102.91	.103	-600.2
(11) RC effect model with diagonals	82	92.63	.198	-577.8

Note: Models with diagonals indicate that a set of diagonals effects is used to fit the tables; while quasi indicates diagonals in each table are fitted exactly. $N = 3555$.

strong class inheritance in each cohort. The third model explores the homogeneity of class inheritance. Model 3 drops the restriction of homogeneity of class inheritance. The fit is better than Model 2, and the reduction of L^2 over Model 2 ($\Delta L^2=211.90$; $df=5$; $P=.000$) is significant. It provides evidence that inheritance patterns are different among classes. The next model (Model 4) relaxes the restriction of homogeneity of class inheritance across cohorts. However, at the expense of 18 more degrees of freedom than Model 3, Model 4 does not perform better than Model 2 ($\Delta L^2=22.46$; $df=18$; $P=.212$). Therefor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class inheritances are different in each class but the patterns are, to a great extent, identical across cohorts. The Homogeneous Uniform Association Model (with diagonals), Model 5, is Model 3 plus a single coefficient of association. This model assumes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rigin and destination in the four cohorts is the same; on the other, that the distances between adjacent classes are equal (Duncan 1979,

Goodman 1984). This model improves the fit significantly over Model 3 ($\Delta L^2=182.43$; $df=1$; $P=.000$), registering a strong association between origin and destination. Relaxing the restriction of intercohort homogeneity, as done in Model 6, does not provide a better fit on the basis of *BIC* statistics. Instead of fitt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ows and columns, Model 7 and Model 8 fit the outflow patterns and inflow patterns, respectively. Both of them obtain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ver Model 3, but the *BIC*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y are not better than Model 5, which is also more parsimonious. Even though these models have provi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data, they do not fit the tables. Therefore, the search for a best-fitted model continues.

Finally, Row and Column models (with diagonals) are used to fit the tables.⁹ Because RC models are invariant to the ordering of rows and columns, they reduce the risk of misspecification of ordering, as often occurs in other association models (see Tsay 1996 for further discussion). The first RC model, Model 9, restricts the homogeneity of row and column scores ($\mu_i = \nu_j$) and posits an equal association effect (ϕ) for the four cohorts. The goodness of fit of Model 9 is the best of the models. There i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show that association is the same across cohorts, and that row and column scores are also the same. For further proof, the next two RC models (Model 10 and Model 11) relax the homogeneity constraints of row and column scores and allow association effects to vary across cohorts,

9 The fitting procedure for Goodman's row and column model (model II) may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In addition to fitting the main and marginal effects using the conventional method, the iteration procedure, first chooses, for example, a set of 5 numbers (A), randomly, to fit the Taiwanese data for the Equal RC effects. The first iteration produces 5 parameter estimates (B). The next iteration uses $(A+B)/2$ to fit the RC effects. The iteration procedure continues until no further improvement in fit is obtained. Then, after normalization of the estimates, 5 parameter estimates and one association coefficient are produced. Along with other marginal effects, the association coefficient interacts with cohorts (groups) and fits the tables to produce the cohort association coefficients.

respectively. As indicated by higher *BIC* statistics, neither of the model fit better than Model 9. In addition, the improvements over Model 9 ($\Delta L^2=3.42$; $df=3$; $P=.331$ and $\Delta L^2=13.70$; $df=7$; $P=.057$) are not significant, either. Therefore, we see once again that Model 9 proves to be the preferred model for Taiwan's 4-cohort class mobility tables.

As a model that consists of all significant effects, without the extraneous ones, Model 9 fits better and is more parsimonious than other models. As reported in Table 9, the ordering of row and column scores ($\mu_i=\nu_j$) basically follows the traditional hierarchy of white-collar workers, blue-collar workers and farmers. However, the positions of Class II and Class V are both pushed one step upward from their expected positions in the traditional image. This is certainly related to the special feature of Taiwan's social mobility regime, manifested in the spectacular and massive movement from the farm class into other nonfarm classes. In particular, as shown in the above analysis, structural mobility favors movement into Class II and, to a lesser degree, into Class V (see Table 7). The equal row and column effects actually cluster these six classes into three groups: Class I-III, Class IV-V, and Class VI. The gap between Class I-III and Class IV-V is the biggest (.490), indicating a salient boundary between blue- and white-collar workers. The existence of this gap resembles the findings in other national studies (Blau and Duncan 1967; Giddens 1973;

Table 9 Parameter Estimates from Equal Row and Column Effect Model Applied to 4 Cohorts Mobility Tables

<i>Selected Effects</i>	1	2	3	4	5	6
<i>Association Effect</i> (ϕ)	2.096					
<i>RC Effect</i> ($\mu_i=\nu_j$)	-.420	-.513	-.207	.283	.241	.615
<i>Diagonal Effect</i> (δ_i)	.671	-.127	.265	.665	.274	1.85
	(.114)	(.202)	(.115)	(.122)	(.135)	(.191)

Note: Numbers in parentheses are standard errors.

Goldthorpe 1980). In addition to this nonmanual-manual distinction, the special position of farming is also confirmed in the analysis. The small gap between the farm class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dicates a more permeable boundary between them. The parameters, $\mu_i = \nu_j$, order class hierarchy with two anomalies: switching positions between Class IV and Class V; and between Class I and Class II. The narrow gap between Class IV (skilled manual) and Class V (unskilled manual) may be due to easy exchange between two classes. It also suggests that production skills are easy to obtain in the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that are characteristic of Taiwan's economy. The easy access to Class II, due to the expansion of positions in the lower nonmanual sector, may favor mobility into Class II.¹⁰

The diagonal effects, representing class inheritance, indicate that farmers have the highest rate of class inheritance. Table 9 shows that the likelihood for a son/daughter to inherit his/her father's class is 6.36 times ($e^{1.85} = 6.36$) greater than that is predicted by an independence model. This degree of class inheritance is followed in Class I and Class IV. The higher than expected immobility rate for Class IV suggests a working class is beginning to reproduce itself.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not produced second-generation workers until recently. The boundary of the working class cannot be maintained if the number of second-generation workers is relatively small. An interesting picture emerges from this complicated and hybrid RC model. The association (ϕ) between origin and destination does not change substantially across cohorts, despite the strong structural mobility in effect, as shown by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es in the above sections.

10 Further studies can apply either Breiger (1981) or Goodman (1981)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reversed positions are caused by the homogeneity of mobility between two classes, especially between Class IV and Class V.

Summary and Conclusion

This paper uses both Conditional Quasi-Symmetry models and association models to estimate the trend of social mobility patterns in Taiwan. In contrast to the prediction of liberal industrialism and in support of recent findings (e.g.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of long-term mobility studies, the results provide no compelling evidence that supports a trend of increasing social fluidity after decades of full-scale industrialization. Furthermor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markets forces massive mobility of sons and daughters of farmers from their origins, bu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does not diminish substantially in the four cohorts. Absolute mobility rates depict Taiwan as a highly mobile society; but relative mobility—controlling for the structural changes, shows a const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origin and destination.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class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may have been falsely shown to be too dynamic to maintain, and that the change pattern in a mobility regime is a consistent rather than an eruptive one. In terms of the relative hierarchy of social class, the overall picture of social mobility regime portray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nonmanual and manual classes with the special position of the farm class.

Researchers of social mobility have come to different conclusions about patterns of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izing societies. Some argue that industrialization increases social mobility, while others see no such change. Taiwan's case supports, and may reconcile, both views. By way of structural mobility, a massive shift from farming into nonfarm classes dominates the mobility regime. The trend shows a rising proportion of workers with farm origins moving into every nonfarm class, especially into the routine nonmanual class. However, even with the fast and renow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past decades, in Taiwan, the underlying association between class origin and class destination remains unchanged. Con-

troversies in the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long-term change of social mobility may arise because different indicators are used to measure the social mobility. Taiwan's case is another example. Absolute mobility rates increased during the last decades, but relative rates of social mobility did not change substantially. Taiwan's mobility regime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expanding nonfarm occupational positions and persistent pattern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Social structure implies persistent pattern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patterns show that the Taiwanese life cycle exhibiting massive structural mobility into not just the working class, but into many other classes. The crucial change in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took place with the simultaneous expans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multi-level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This new need for manpower brought individuals from the farm to these burgeoning classes. Excluding this exodus from the farm class, Taiwan's channels of social mobility appear to be very rigid,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spect.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is special feature of Taiwan's social mobility regime, future study might have to focus on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farmers. Why do farmers provide so many candidates for positions in higher classes? One should compare the constant outflow from the farm class with the relative immobility of the lower nonfarm classes.

References

- Agresti, Alan
1984 *Analysis of Ordinal Categorical Data*. New York: Wiley.
1990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New York: Wiley.
- Aitkin, Murray
1989 *Statistical Modelling in GLIM*. Oxford: Clarendon.
- Bishop, Yvonne M. M., Stephen E. Fienberg, and Paul M. Holland
1975 *Discrete Multivariate Analysis: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Blau, Peter M. and Otis Dudley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 Breiger, Ronald L.
1981 The Social Class Structure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578-611.
- Carroll, Glenn R. and Elaine Mosakowski
1987 The Career Dynamics of Self-Employmen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2:570-89.
- Chiu, Hei-Yuan, ed.
1991 *Report on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Clogg, Clifford C.
1982a Using Association Models in Sociological Research: Some Exampl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114-34.
1982b Some Models for the Analysis of Association in Multiway Cross-Classification Having Ordered Categor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7:803-15.
- Duncan, Otis D.
1979 How Destination Depends on Origin in the Occupational Mobility Tabl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793-803.
- Eliason, Scott R.
1990 The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System: Version 3.50 User's Manual. Iowa City, I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Iow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Erikson, Robert and John H. Goldthorpe
1992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Erikson, Robert., John H. Goldthorpe, and L. Portocarero
1979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Three Western Countries: England, France and Swede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0:415-441.

- Featherman, David L. and Robert M. Hauser
1977 *The Process of Stratification: Trends and Analyses*. NY: Academic Press.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Featherman, David L., F. Lancaster Jones and Robert M. Hauser
1975 Assumptions of Mobilit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329-60.
- Ganzeboom, Harry B.G., Ruud Luijkx, and Donald J. Treiman
1989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8:3-84.
- Ganzeboom, Harry B.G. and Donald J. Treiman
1992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Measures of Occupational Statu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C 28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n Trento, Italy, May 1992.
- Giddens, Anthony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 Goldthorpe, John H.
1985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6:549-73.
- Goldthorpe, John H., with C. Llewellyn and C. Payne
1987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Second Edition.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 Goldthorpe, John H., Clive Payne
1986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79-1983. *Sociology*, 20:1-24.
- Goodman, Leo A.
1972 Some Multiplicative Models for the Analysis of Cross-Classified Data, in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Berkeley Symposium on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L. LeCam et al. eds, pp. 649-69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Simple Models for the Analysis of Association in Cross-Classification Having Ordered Categor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4:537-52.
1981 Association Models and Canonical Correlation in the Analysis of Cross-Classifications Having Ordered Categor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6:320-34.
1984 *The Analysis of Cross-Classified Data Having Ordered Catego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usky, David B. and Robert M. Hauser
1984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Revisited: Models of Convergence and

- Divergence in 16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19-38.
- Hauser, Robert M.
- 1979 Some Exploratory Methods for Modeling Mobility Tables and Other Cross-Classified Data, 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80*, K.F. Schuessler. pp. 413-58.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1984 Vertical Class Mobility in England, France, and Sweden, *Acta Sociologica* 27:87-110.
- Hauser, Robert M., John N. Koffel, Harry P. Travis and Peter J. Dickinson
- 1975 Temporal Change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Evidence for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279-97.
- Hope, Keith
- 1982 Vertical and Non-Vertical Class Mobility in Three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99-113.
- Hout, Michael
- 1983 *Mobility Tabl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1984 Status, Autonomy, and Training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1379-1409.
- 1989 *Following in Father's Footsteps: Social Mobility in Irelan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ut, Michael and Robert M. Hauser
- 1992 Symmetry and Hierarchy in Social Mobility: A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ASMIN Model of Class Mobilit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8:239-66.
- Hsieh, Yeu-Sheng and Shu-Yi Yu
- 1990 The Class Structure of Occupation Mobility in Taiwan,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14:31-63.
- Hutchinson, Bertram
- 1958 Structural and Exchange Mobility in the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s to Brazil, *Population Studies* 12:111-20.
- Hsiao, Hsin-Huang Michael, Wei-Yuan Cheng, and Hou-Sheng Chan, eds.
- 1989 *Taiwan: A Newly Industrialized State*. Taipei, Taiw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1968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Revised Edition.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Kahl, Joseph A.
- 1957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Kerr, Clark
- 1983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

- sity Press.
- Kerr, Clark, John T. Dunlop, F. H. Harbison, and C. A. Meyers
1973 [1960]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noke, David and P. J. Burke
1980 *Log-Linear Model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Lipset, Seymour Martin and Reinhard Bendix
1956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umerical Algorithms Group (NAG)
1993 *The GLIM System Release 4 Manu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yne, Clive D.
1987 *The GLIM System Reference 3.77 Manual*. Downers Grove, IL: National Algorithms Group Inc.
- Pöntinen, Seppo
1982 Models and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A Comparison of Some Log-Linear Models of a Social Mobility Matrix, *Quality and Quantity*, 16: 91-107.
- Rogoff, Natalie
1953 *Recent Trends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Sheu, Jia-You
1989 The Class Structure in Taiwan and Its Changes, in *Taiwan: A Newly Industrialized State*, Hsin-Huang M. Hsiao, Wei-Yuan Cheng and Hou-Sheng Chan, eds., pp. 117-150. Taipe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1990 Class Mobility in Taiwan and Some Comparis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14:1-30. (in Chinese)
- 1994 Classification, Specifications and Estimation of Class Structure: A Comparative Empirical Study of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lass Structure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Jia-You Sheu, ed. pp. 21-72. Taipei: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in Chinese)
- Smith, Herbert L., and Maurice A. Garnier
1987 Scaling via Models for the Analysis of Association: Social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Careers in France, 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87*, Clifford C. Clogg, ed., pp. 205-45.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Snipp, C. Matthew
1985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Social Class: Insight from Men's Career

- Mob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475-93.
- So, Alvin and H.H. Michael Hsiao
- 1994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 Some Tentative Hypotheses. Paper presented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st Asian Middle Classes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December 19-21, Taipei, Taiwan.
- Sobel, Michael E.
- 1983 Structural Mobility, Circulation Mobility, and the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A Conceptual Mismat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721-27.
- 1988 Some Models for the Multiway Contingency Table with a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Among Categories, 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88*, Clifford C. Clogg, ed., pp. 165-192.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Sobel, Michael E., Michael Hout, and Otis Dudley Duncan
- 1985 Exchange, Structure, and Symmetry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59-72.
- Treiman, Donald J.
- 1970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for the 1970s*, Edward O. Laumann, ed., pp. 207-34.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 197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sai, Shu-ling
- 1986a Gender and Social Mobility: the Case of Taiw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60:121-47. (in Chinese)
- 1986b Occupational Status Structure: Trend Analysis of Taiwan Area, in *Social and Culture Change in Taiwan*, Hei-Yuan Chiu and Ying-Hwa Chang, eds., pp. 299-351. Nankang,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in Chinese)
- 1988 Social Status Attainment: A Comparison among Aborigines, Fukinese-Hakkas, and Mainlanders, in *Taiwanese Society in Transition*, Kuo-Shu Yang and Hei-Yuan Chiu, eds., pp. 1-44. Nankang,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in Chinese)
- Tsay, Ruey-Ming
- 1996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Log-Linear Models" and "Log-Multiplicative Models": Examples of Social Mobility. Forthcoming i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s*, Yang Wen-Shan ed. Taipei, Taiwan: Sun Yat-Sen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in Chinese)

Weber, Max

- 1978 Status Groups and Classes, i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conomy and Societ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eds. pp. 302-30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ong, Raymond Sin-Kwok

- 1990 Understanding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560-73.
1992 Vertical and Nonvertical Effects in Class Mobility: Cross-National Vari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396-410.

Wright, Erik Olin

- 1978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5 *Classes*. London: Verso.

Wright, Erik Olin and Joachim Singelmann

- 1982 Proletarianization in the Changing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176-209.

Wright, Erik Olin and Bill Martin

- 1987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1960-198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1-29.

Wu, Naiteh

- 1994 Class Awareness and Class Identity, i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lass Structure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Jia-You Sheu ed., pp. 109-150. Taipei: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in Chinese)

Xie, Yu

- 1992 The Log-Multiplicative Layer Effect Model for Comparing Mobility Tabl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380-395.

Yamaguchi, Kazuo

- 1987 Model for Mobility Tables: Toward Parsimony and Subst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482-94.

Yasuda, Saburo.

- 1964 A Methodological Inquiry Into Social Mob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16-23.

台灣階級結構： 流動表與網絡表的分析*

孫清山** 黃毅志***

摘 要

根據本研究所作的百分比流出、流入表、網絡表分析，隨著台灣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與勞動工人擴充，農林漁牧獵人員縮減的快速職業結構變遷，所引發的結構性流動有礙於勞動工人階級之形成，而此職業結構變遷又反映出從農到工，再到服務業的快速產業結構變遷：由於農林漁牧獵人員縮減與勞動工人擴充，導致了大規模的從農到工的職業流動，勞動工人的家庭背景異質性很大，除了出身工人家庭之外，又有許多出身農家者，大多為第一代工人：在專技、管理、佐理人員擴充下，勞動工人又有許多向上流動成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的機會（不論是代內或代間流動），近年由於服務業之擴充，更提供了許多工作生涯上的代內向上流動而成爲買賣服務工作人員之機會；在此快速結構變遷下，勞動工人的家庭背景異質性很大，向上流動的機會又多，有礙於勞動工人階級之形成。

相對而言，最上層的專技、管理、佐理人員擴充，吸收了不少其

* 本文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NSC 83-0301-H029-004）的部份研究結果，特此致謝。同時感謝林佳瑩教授，三位匿名審查委員，以及陳志柔先生所提供的寶貴的修改意見，文中缺失，由作者自負。

**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 台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他家庭背景者，背景的異質性不利於階級之形成，然而他們在工作生涯上，一旦進了那裡就能守在那裡，在那裡廣結人際網絡，不論是友誼或婚姻，大都以同階層者為對象，而顯現出高度的階層（級）之封閉性，再加上工作生涯的穩定性，也就很類似 Goldthorpe (1980) 所分析的英國之服務階級，而有助於“士”階級之形成。至於買賣服務工作人員，不論是代內或代間流動，都有許多流動機會，特別是向上流動成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背景與網絡的階層異質性又都很大，很類似 Goldthorpe 所分析的英國之中間階級，可說是最開放的階層，大大不利於“商”階級之形成。

在以上根據百分比流出、流入表、網絡表探討階級形成之問題後，接著根據本研究的準對稱模型 (Quasi-Symmetry Model) 分析流動表、網絡表，剔除結構效應後，所呈顯之所謂的“相對機會或真正的階級（層）結構”作探討。在台灣地區，不論是職業流動或各職業間的親密網絡（友誼或婚姻）都呈顯出 Goodman (1984) 的 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Model 之全盤距離效應：階層間的層級距離越大，流動及交往，婚姻的相對機會越小；此全盤距離效應所不能呈顯的主要是表上對角線各格的高度不流動，以及同階層內交往，通婚的封閉性，這特別是農民之高度封閉性。

至於此“相對機會或真正的階級（層）結構”所涉及的階級界限之問題，綜合所有流動表，網絡表的相對機會之分析，很明顯地，同屬高階的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與買賣服務人員間流動或交往、通婚的相對機會均大於 1，不流動或同階層內交往，通婚之相對機會亦均大於 1；同屬低階的工農間之流動或交往、通婚相對機會均大於 1，不流動或同階層內交往，通婚之相對機會亦均大於 1；反之，上、下層間的相對機會均小於 1，很明顯地呈現出一個流動或網絡的界限，這通常稱為階級界限，位於工人與買賣服務人員之間，跨界限的相對機會小於 1，界限內的相對機會大於 1。

Class Structure in Taiwan: Analysis of Mobility Tables and Network Tables

Ching-Shan Sun and Yih-Jyh Hwang

Abstract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outflow, inflow and network tables,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obstacles to the formation of a labor class in Taiwan derive from the structural mobility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expansion of professionals, administrators, managers and manual worker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contraction of farmers and agricultural workers in the other. These changes in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reflect on the change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at had previously centered on the industrial sector rather than agriculture, and then rapidly shifted to the service sector as the mainstream. In this rapidly changing structure, the chance of manual workers of all social origins gaining entry into the expanding higher levels of the occupational and class structures has steadily increased. Moreover,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worker's origins has become an obstacle to the formation of a labor class.

Sales personnel, shop assistants and self-employed workers have been highly mobile, characterized either by intrageneration mobility or intergeneration mobility in working. Their chances of upward mobility through entry into higher-level occupations, such as professionals, administrators and managers, are high. In considering social origins and social networks, they form a heterogenous, open a group which has

become a hindrance to the formation of a businessmen's class.

The expansion of professionals, administrators and managers absorbs all the social origins, creating heterogeneity. This group's working lives are relatively stable, homogeneity steadily increases through establishment of personal networks by marriages and friendships within the same level. This facilitates the formation of the 'gentry' class.

In addition to the discussion of class formation in Taiwa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ve opportunity or the real class structure" based on the quasi-symmetry model to analyze the mobility and network tables. The result reveals that there appears to be the full-distance effect, by way of the 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model (Goodman, 1984), either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or the closeness network (friendship or marriage) between the occupations: the greater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stratum of the class, the smaller the relative opportunities for mobility, interaction and marriage. However, there is high closeness for farmers that are immobile in each diagonal cell of the mobility table, which limits their friendships and marriages to the same stratum.

台灣階級結構： 流動表與網絡表的分析

Blau and Duncan 二人在 1967 年出版的「美國職業結構」(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一書之後半部提出地位取得模式，引發了世界各國對地位取得研究之熱潮（許嘉猷，1982, 1986）。相對而言，此書前半對美國職業結構之探討，在當時，卻得不到相同的注意。Blau and Duncan (1967:23-24) 把職業結構視為由許多職業副團體間的關係所組成，這些職業團體，而非個人，構成了分析的單位，各單位間的關係可從人們在各單位間之流動看出來，職業流動表之分析乃成為 Blau and Duncan 探討美國職業結構之基礎。

本研究以各階級間的關係來分析台灣階級結構，這很類似 Blau and Duncan 以各職業間的關係分析職業結構，而所分析的關係除了各階級間的流動外，也包括了各階級成員間之社會網絡，並參考 Goldthorpe 在 1980 年出版的「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之分析架構，重點在於以階級結構變遷所引發的結構性社會流動，與相關聯的各階級間社會網絡，以及所引發的階級形成來探討階級結構。依 Goldthorpe，英國之所以有強大的工人階級，關鍵在於結構性的變遷，工人階級大多出身於工人家庭，英國工業化又來得較早，這些工人大多為好幾代之工人，其親朋好友也大多為工人，加上他們的工作生涯欠缺向上流動機會，終造成強大的工人階級。與 Goldthorpe 不同的是，本研究主要假設之一，卻是台灣工人流動之開放性，以及背景與網絡之異質性造成台灣工人階級之不形成。

至於本研究的階級分類架構，則主要依韋伯 (Weber, 1978) 的

階級概念，與台灣之特殊性，把有相同或類似的流動機會與市場條件、經濟利益及生活機會之職業，劃歸為同一階級，在此以各職業的教育與收入之水準做為市場條件，經濟利益及生活機會之指標；依此運作化，共得到四個階級，其層級由上而下分別是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買賣服務工作人員，勞動工人，農林漁牧獵人員。¹ 本研究以這些階級間的流動與網絡來探討階級結構，所作的流動表與網絡表分析，除了流出、流入表百分比交叉分析之外，並參考一些新的統計發展，如 Goodman (1984) 的 Association Model，以及 Sobel, Hout and Duncan (1985) 之準對稱模型 (Quasi-Symmetry Model) 來分析流動表，力求精確地掌握台灣階級結構；而所分析的資料主要是：在民國 81 年進行調查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三次階層組”全國性大樣本資料。

一、文獻檢討

社會流動與階級形成的關連性，一直是社會階層理論大師們所關心的焦點，馬克斯就曾指出：階級流動有礙於階級行動之發展。馬克斯在比較美國與歐陸的階級結構時指出：美國的階級結構雖已存在，但尚未固定 (fixed)，而各階級間流動頻繁；馬克斯認為透過階級流動，統治階級能將被統治階級出身的最優秀人才納入自己的陣營，而有穩固的、反革命的效果 (Goldthorpe, 1980:5)。Giddens (1973) 則指出：階級不流動提供了傳承共同生活經驗的基礎，以及經驗的同質性，這也意謂著勞動市場上類似的報酬，階級流動的封閉性促進了可

1 若依 Wright(1994:6-7)，韋伯派的理論所關心的是由“類似的活動機會或生活機會”所造成的階級形成，而此“類似的機會”之基礎並不一定是馬克斯派所關心的“生產關係”，而可用職業類別為基礎。至於本研究僅將職業分成四個階級，而不多加細分，主要的理由是：樣本仍不夠大(詳見隨後的研究發現)。

認同的階級之形成。Parkin (1979) 也指出流動所面臨的障礙導致階級形成。Dahrendorf (1959:22) 也認為頻繁的社會流動，造成團體內的團結 (solidarity) 無法產生，減弱階級間的衝突，個人之間的競爭會取代集體的階級間之衝突。Lenski (1966) 亦指出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是階級敵對的來源。

綜合上述各家的觀點，階級流動妨礙了階級經驗之同質性及階級意識、階級敵對行動之形成。至於鉅視結構與階級流動，階級形成之關聯性，馬克斯更進一步預言：隨著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普羅化過程，有越來越多比率的就業者淪為工人，而工人向上流動成小資產及資產階級的機會微乎其微，而有助於階級意識及階級行動之形成 (Goldthorpe, 1980:4-9)。不過若依 Wright 的觀點：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小資產階級一直都維持著相當的比率 (Steinmetz and Wright, 1989)，工人變成小資產階級的向上流動一直相當頻繁，這有助於自由企業的合理化 (E. O. Wright, 1979:232-233)。

在以上分析中，不論是馬克斯或 Wright 均以鉅視結構面的工人或小資產階級比率，來解釋階級流動、階級形成的狀況。Blau (1977) 則以階層結構中不同階層者的分佈比率來解釋各階層間、階層內的交往網絡，各階層間的社會流動，與各階層間的整合或集體對抗。他的主要論點是：分佈的異質性 (Heterogeneity) 越大，則各階層間的網絡越密，社會流動也就越大，因而有助於各階層間的整合；反之，分佈的異質性越小，則各階層內的網絡越密，各階層間的網絡越疏，社會流動也就越小，將強化內團體關係，容易形成各階層間的集體對抗 (類似馬派所說的階級形成)，而不利於各階層間的整合。Lin (1986) 又進一步以階層結構中不同階層者的分佈來解釋各階層間，階層內的交往網絡，與各階層間的社會流動。社會階層理論對於鉅視結構與社會流動，社會網絡，階級形成的關連性之探討，有著持續的發展。

根據以上理論說明了社會流動、社會網絡與階級形成的關聯性之

後，接著檢討相關的經驗研究。這些經驗研究通常都預設著：階級（層）流動或網絡結構，及其所涉及的流動或交往障礙（即階級界限）關連到階級形成，而必須以流動表與網絡表來分析階級結構。Wright and Cho (1992) 的研究就指出了：對階級結構的分析不能侷限於探討人們在階級位置之分佈，畢竟人們不僅僅是填入位置而已，而必須分析各階級間的流動，親密的社會互動，如婚姻、友誼以及流動、互動所涉及的階級界限問題。又依 Giddens (1981) 以及 Parkin (1979)，階級界限所帶來的機會之封閉有助於階級之形成，此即 Giddens 所謂的階級結構化 (Class Structuration)。

既然流動的結構與其所涉及的階級界限，關連到階級形成的重大問題，流動表之研究，也逐漸變成了重要的研究主題。Blau and Duncan 二人的「美國職業結構」一書之前半部曾用流動表來分析美國職業結構中的階級界限。Blau and Duncan (1967:23-24) 所說的職業結構指的是許多職業副團體間的關係之整體，對於職業結構的分析乃以職業團體為分析單位：各職業團體間的關係可從人們在各職業間的流動看出來，職業流動表的分析也就成為 Blau and Duncan 探討美國職業結構之基礎。根據他們的分析，美國職業結構有兩大階級界限將職業結構由上而下分成三大階級：白領、藍領、和農民階級，各階級間的向下流動受到了限制。

自 Blau and Duncan 以來，對流動表之統計分析，主要有兩種方法，分別顯現出兩種流動的結構（參見 Goldthorpe, 1980）：

(1)絕對流動，即觀察流動之分析：這可從受訪者的原先階層（如父親職業，初職），與現階層（如現職）的百分比交叉表進行分析。列百分比即為流出表，可比較各不同背景者之現階層分布所顯現的流動機會與機會不平等性；行百分比即為流入表，可分析各現階層者的背景之分布。

(2)相對流動，即隱性流動之分析：分解上述雙變項交叉表上，變

項間關連性的兩種成分：1. 結構（邊際次數）效應，2. “真正”的關連性，“真正”的影響，此即“真正”的流動模態（Mobility pattern），“真正”的流動結構，這可用交叉表上各格的流動比來顯示，此亦即所謂的相對流動或隱性流動，通常認為這才能代表“真正的”封閉性或機會不平等性。

社會流動表的研究，最困難、爭議最多的是流動比之測量。流動表的分析向來都是以流動比之測量，來探討流動結構及相關的階級界限，通常認為一個好的流動比之測量必須要能剔除行列邊際次數不同之結構效應，以看出“真正”的流動（或不動）的傾向，“真正”的流動結構（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Blau and Duncan (1967) 曾以早期發展的 Rogoff 之流動比做流動表分析，發現美國職業結構有兩大階級界限，將職業結構由上而下分成三大階級，各階級間的向下流動受到了限制。然而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 曾指出 Rogoff 流動比之缺失，並依 Goodman 的對數線性模型發展出新的流動比之測量，卻發現美國職業結構並沒存在著 Blau and Duncan 所謂的兩個向下流動受到限制之階級界限。到了 Sobel (1983) 卻又指出 Goodman, Hauser 等人的對數線性模型無法剔除邊際次數不同的結構效應（結構流動），而看出真正的流動或不動之傾向，這也可稱為循環流動（circulation mobility）或交換流動（exchange mobility）。

流動比之測量一直爭議不休，不過到了 Sobel, Hout, Duncan (1985) 提出了新的分析方法，只要流動表符合準對稱（quasi-symmetry）的條件，就能夠分別測出代表循環流動之流動比以及結構流動之效應；從此以後，Sobel 等人的方法在近年的流動表分析中被廣泛地採用（Hout, 1988; Hauser and Grusky, 1988; Guest, Landale, and Mccann, 1989; Landale and Guest, 1990; Bearman and Deane, 1992; Chen, Tsai, and Tu, 1992）。不過他們的方法也受到一些限制：必須符合準對稱的條件，而且模型上參數太多，不夠簡潔

(Guest, Landale, Mccann, 1989:364; Bearman and Deane, 1992: 43), 亦不易作有意義的詮釋, 而有待於後續研究之突破。

至於網絡表之分析, 若依 Hout (1983:80) 的建議, 仍然可用流動表之方法進行分析。Wright and Cho (1992) 就曾用美國、加拿大、瑞典、及挪威的資料, 以對數線性模型作網絡表之分析, 探討跨階級的友誼網絡所顯現的階級界限之可滲透 (permeability)。

固然以上眾多的流動表與網絡表之分析, 往往都預設著: 流動結構與網絡結構及其所涉及的階級界限, 關連到階級形成的重大問題, 而必須作流動表與網絡表之分析, 然而這些研究都沒有根據資料, 分析流動結構與網絡結構及其所涉及的階級界限對階級形成的影響。Goldthorpe (1980) 的研究, 則可謂是探討從鉅視結構變遷, 社會流動(或不流動), 到親密網絡之建立, 進而促成階級形成的整個因果過程之里程碑。

Goldthorpe (1980:29) 特別強調: 固然用前述複雜的流動比作分析所得到的相對流動, 較能代表“真正的”封閉性, 而且也會影響到絕對流動, 然而對階級形成有直接影響的卻是絕對流動(觀察流動), 而可用簡單的百分比流出, 流入表做分析。藉著流出表, 可比較各不同背景者之現階層分布, 所顯現的流動機會與機會不平等性, 流動機會越小, 機會不平等性越大, 越有助於階級形成; 藉著流入表, 可分析各背景之分布, 同質性越高, 越有助於階級形成。此外 Goldthorpe 亦根據各階級間交往的百分比網絡表, 來分析親密網絡與階級形成的關連性。²

2 至於 Sobel et al. (1985) 的模型固然可清楚地分解出絕對流動中的結構效應, 然而真正影響到階級形成的仍是百分比流出、流入表所呈現的絕對流動; 實在很難想像, 一般民衆如何清楚地認知此一複雜模型中的結構效應, 進而造成階級形成。

根據 Goldthorpe 所作的百分比流出、流入表與網絡表分析，在英國隨著擔任專技管理工作的高階服務階級擴充，與勞工階級縮減的階級結構變遷，所引發的結構性流動促進工人階級之形成。更詳細地說，由於工人階級人數縮減，因而從較高的服務階級及中間階級，如低層白領及小資本家，向下流動的機會就很小，工人階級的家庭背景大多為工人，而且由於工業革命在英國發生，英國工業化來得早，這些工人大都是好幾代之工人，這導致他們的親朋好友亦大多是工人；這些好幾代的工人在工作生涯中又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背景同質、網絡同質、加上工作生涯缺乏流動，乃造成了強大的工人階級之形成；這可從英國勞工運動蓬勃發展，工人對工黨之支持看出來。相對而言，服務階級逐漸擴充，吸收了不少出身工人家庭者，背景的異質性不利於階級之形成，然而他們一旦進了服務階級就能守在那裡，在服務階級內廣結人際網絡，加上工作生涯的穩定性，乃促進了服務階級之形成。至於中間階級由於代間及工作生涯流動都很頻繁，今日為中間階級明日可能就不是了，乃無法產生階級認同。

Goldthorpe (1987:302-326) 又根據英國、法國、瑞典、匈牙利——等九個國家的跨國比較研究發現，進一步指出：各國的相對流動可以說是相同的，不同的僅是各國屬於鉅視結構面的兩代階級分布不同，所導致的絕對流動之不同，而英國具有強大的工人階級等階級形成之特殊性，可歸因於特殊的歷史背景所造成的階級分布與絕對流動之特殊性，(如工業化來得早)，因而有許多好幾代之工人。

相對於英國強大的工人階級，台灣的工人階級（意識）顯得相當的微弱（謝國雄，1989，1992；陳玉璽，1992；瞿海源，1991），工會運動一直無法突破（方孝鼎，1991；陳玉璽，1992；夏林清，1989）。依 Goldthorpe(1980)，英國之所以有強大的工人階級之關鍵在於結構性的變遷，而英國工人階級形成的三個要素為：“大多為好幾代工人，親朋好友大多為工人，以及缺乏工作生涯流動機會”在台灣都沒具備，

這當為台灣工人階級微弱之重要原因，以下針對這三個要素一一而論：

1. 多為好幾代工人：在從農到工迅速變遷的台灣，工人的出身背景異質性很大，其中以農家佔最多（許嘉猷，1989, 1990；謝雨生和余淑誼，1990），大多為第一代工人。

2. 親朋好友多為工人：台灣的工人背景異質性大，很可能其網絡異質性也大（含許多農民），這可從熊瑞梅（1991）的台中都會樣本資料得到佐證。

3. 工作生涯缺乏流動機會：台灣製造業工人之工作生涯不但有許多變成製造業小頭家之流動機會（謝國雄，1989；熊瑞梅和黃毅志，1992），近年來由於服務業之擴大，又提供了許多變成服務業從事買賣服務工作的小頭家之機會（熊瑞梅和黃毅志，1992）。

由以上分析可提出有關台灣的特殊性假設：由於台灣的工業化來得較晚，而且服務業之擴充很快就發生，導致快速的職業、階級結構之變遷，在此鉅視結構變遷下，台灣的工人不但背景異質性很大，為工人階級的經驗很短，多為第一代工人；在工作生涯中又有許多機會向上流動，如變成服務業從事買賣服務工作的小頭家，加上代間、代內流動大帶來了網絡之異質性，乃造成台灣工人階級之薄弱。³

本研究依據上述 Goldthorpe 之分析架構，從鉅視結構面的台灣階級結構變遷來探討階級流動、社會網絡以及進一步的階級形成，並以此台灣的個案與 Goldthorpe 所分析的英國作比較，做為討論的基礎。然而在作階級分析時所依據的階級分類，卻不一定仍要遵循著他的分類，而必需參考台灣的特殊性，選擇適合台灣的分類。Weber

3 至於在台灣地區工人階級以外的其他階級形成問題，由於相關的研究作的較少，乃無法在資料分析前就提出很清楚的假設，而必須要在資料分析後再作解釋，這也是本研究較具探索性的一面；而這些事後的解釋，有的可能相當具有說服力，有的仍無法下定論。

(1978)對於階級所下的定義是：由於在物品或勞力市場上有著共同的條件，共同的財務收入之經濟利益，而有著共同的生活命運的一群人，而這命運可顯現在相同的流動機會及相同的生活機會之上。本研究乃在 Weber (1978) 的階級概念引導下，並參考隨後的資料分析所顯示的台灣特殊性，來選擇適合台灣的分類。

二、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在 Goldthorpe 的理論分析架構，與本研究所提的相關之台灣特殊性假設引導下，所運用的調查資料主要是：國科會資助的民國 81 年「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三次社會階層組」之間卷資料。

這項資料以 20~64 歲的台灣地區民眾為調查對象，不但得自於全國性大樣本，而且針對有關社會階層的問題作調查（瞿海源，1992）；不過由於本文所要探討的是在台灣社會裡所發生的社會流動過程，及相關的社會網絡與階級形成，而有許多樣本並不在台灣出生，（這主要是隨著中央政府來台的外省人），他們的社會流動過程並不在台灣發生，所以在本研究所有的分析中，也就剔除了這些不在台灣出生的樣本，而僅以「20~64 歲，在台灣出生的樣本」為分析對象。

至於階級形成之資料，這項問卷調查資料可能會有“量化資料所受到的限制”之問題，也就以既有質化研究之文獻蒐集為主，這已在前面的文獻檢討作過簡略的說明。而引發階級流動的“從農到工，再到服務業”產業結構之變遷的說明，亦以既有文獻之探討為依據。

(二)主要變項之運作化

(A)階級位置：依 Weber (1978)，謝雨生和余淑誼 (1990)，可從職業類別中劃分階級：(1)將有相同流動機會之職業劃歸同一社會階

級。(2)將基於市場上的共同條件(condition)，經濟利益，而有相同生活機會之職業劃歸同一階級。參考上述標準，本研究乃將有相同或類似的流動機會、與市場條件、經濟利益及生活機會之職業劃歸同為一類，此亦可稱為一個階級，在此以各職業的教育與收入水準做為市場條件、經濟利益及生活機會之指標。

(B)親密網絡組成：以配偶及最好的朋友之階級位置做指標。

(C)教育：以所受過的學校正式教育年數作測量。由於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社會階層資料的教育年數屬等級尺度（如小學畢業、國初中……），為了使之符合間距尺度，乃把各級教育程度轉換成教育年數。

(D)收入：以“個人每月工作收入”進行測量。這項測量嚴格而言屬於等級尺度，數值越大代表收入越高，相差一等月收入大約相差10000元。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各階級間的流動與網絡探討階級結構，必須做流動表與網絡表之分析；除了作流出、流入表百分比交叉分析之外，並參考一些新的統計發展，如 Goodman (1984) 的 Association Model 以及 Sobel, Hout, and Duncan (1985) 之準對稱模型來分析流動表。至於網絡表之分析，則依 Hout (1983:80) 的建議，仍以流動表之方法進行分析。本研究在完成流動表與網絡表之分析後，將進一步探討流動結構、網絡結構對階級形成的可能影響。

Sobel 等人 (1985) 之新方法能以準對稱模型 (Quasi-Symmetry Model) 有效地剔除結構效應，以流動表各格的流動比來呈顯“真正的流動結構”。本研究依循 Sobel et al. (1985) 的建議，以流動比符合對稱（即 Quasi-Symmetry，縮寫為 QS）條件的準對稱模型分析流動比。然而 Sobel et al. 的 QS 模型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參數太多，不夠簡潔 (Guest, Landale and Mccann, 1989:364; Bearman and Deane,

1992:43), 因而本研究乃建構一個參數較少, 又符合 QS 條件之模型; 依此模型各格流動比可用下列方程式表示:

$$\ln R_{ij} = B(u_i - u) (v_j - v) + d_{ij},$$

相同地, 各格期望次數可表示為:

$$\ln F_{ij} = \mu + \lambda x_i + \lambda y_j + B(u_i - u) (v_j - v) + d_{ij},$$

μ 為主效應, λx_i 為列效應, λy_j 為行效應。此即 Goodman (1984) 的 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Model 加上隨各格的特殊狀況而定的 d_{ij} (參 Marsden, 1988:63)。

在上述方程式中, U_i 可依流動表各列的類別 (如父親職業的類別), 根據某些標準 (如社經地位), 而給定一些數值; V_j 可根據各行的類別 (如本人現職的類別), 而給定一些數值。U、V 通常以各列、各行數值之平均數代入, 當 B 為正值時, 流動表上會呈現出“在所給定的行列數值相差很大之各格, 流動比很小; 在行列數值相近, 特別是兩者都很大或很小時, 流動比較大”之現象, 此即流動表分析上所常見的“遠離對角線各格的流動比很小, 長程流動的機會很小; 對角線上的流動比, 特別是左上角 (如上層白領)、與右下角 (如農民) 的流動比較大”之流動模態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 Sobel et al., 1985; Chen et al., 1992; Hauser and Grusky, 1988; Hout, 1983), 而能符合資料。各項職業均有不流動的傾向, 如從父職到初職, 或從初職到現職之不流動, 乃造成上述對角線上的流動比較大的現象, 長程流動必須越過較多障礙, 流動的機會也就顯得很小 (Hout, 1983)。

本研究曾根據許多標準, 如各項職業之平均教育年數、收入、職業社經地位、職業聲望以及職業之層級 (以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為 1, 買賣服務工作人員為 2, 勞動工人為 3, 農林漁牧獵人員為 4) ——, 就 U_i 、 V_j 給定許多數值, 分別進行流動表分析, 並從中選擇不但適合資

料，又具理論實質意義的模型，作為探討階級結構的根據。依本研究的分析結果：給定最簡單的職業層級所得到的發現，與根據其它標準給定數值的發現不但很一致，而且最能符合資料；在此給定職業層級的分析中，U、V 均等於 $2.5 = (1+2+3+4)/4$ ，各格之流動比請見表 1。表中各格流動比之計算，可用父職、初職均為勞動工人之格子作說明：

$$\ln R_{ij} = B (3-2.5) (3-2.5) = 0.25B, R_{ij} = e^{0.25B}$$

表 1: linear-by-linear model 之距離效應

		初 職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買賣服務 工作人員	勞動工人	農林漁牧 獵人員
父職	專技管理佐理人員	$e^{2.25B}$	$e^{.75B}$	$e^{-.75B}$	$e^{-2.25B}$
	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e^{.75B}$	$e^{.25B}$	$e^{-.25B}$	$e^{-.75B}$
	勞動工人	$e^{-.75B}$	$e^{-.25B}$	$e^{.25B}$	$e^{.75B}$
	農林漁牧獵人員	$e^{-2.25B}$	$e^{-.75B}$	$e^{.75B}$	$e^{2.25B}$

從表 1 可看出，在 B 為正值的一般情況下，流動表會呈現對角線上（不流動或流動距離為 0）各格流動比較大，越遠離對角線，流動距離越大，流動比越小的全盤距離效應；而在本研究給定職業等級為 1, 2, 3, 4 的情況下，此效應即為 Duncan (1979) 所說的 Uniform Effect (Goodman, 1984; Hout, 1983; Marsden, 1988)，並能符合 QS 之條件。在本研究所作過的大多數分析中，都發現此單一 B 值所顯現的距離效應除了在少數格子之外，大都相當能符合資料，不過往往在對角線上不動的傾向要比模型的預測更大，如買賣服務人員，勞動工人的不動傾向要比模型預測為大，若依模型預測，從這兩項職業流到別項

職業的流動機會，如 $e^{0.75B}$ ，會比不動的機會 ($e^{0.25B}$) 為大，並不能符合資料。因而本研究在分析資料時，除了以一個很簡潔的參數 B ，來代表全盤的距離效應外，並針對不合全盤距離效應的格格，這特別是對角線上格格，以一個代表格格特定情況的 D_{ij} 來顯現格格的特殊流動效應。

在本研究所作過的職業流動分析中，都發現代表全盤距離效應的 B 值都為顯著的正值 ($p > .05$)，而且都大致能呈顯出整個流動表之相對機會結構，僅需增添少數達到顯著的 D_{ij} 之特殊效應，就能使模型吻合整個資料。⁴ 為了使 D_{ij} 之效應符合 QS 之條件，又必須設定 $D_{ij} = D_{ji}$ ，然而在所有的分析中，此設定都能符合資料，因而這些符合資料的模型都可說是 QS 模型之一種特殊形式，然而比起 Sobel et al. (1985) 的模型參數較少，僅包含一個 B 及少數 D_{ij} ，⁵ 較簡潔而較容易作有意義的詮釋，可說是一種修改過的 QS 模型，以下仍簡稱 QS 模型。本研究除了作職業流動表的分析之外，在作各職業階層間的友誼與婚姻網絡表之分析時，亦以此 QS 模型進行。

4 本研究所作過的 QS 模型之分析，均以僅含一個 B 值的最簡單模型開始，然後再參考代表整個模型之適合度的卡方值 (L^2) 及格格適合度的殘差值，逐漸放鬆 D_{ij} ，特別是對角線上的參數，以建構不但簡潔，具有理論意義，且能符合資料之 QS 模型，所得到的最後模型之參數均在 Z 檢定或卡方檢定中達到顯著 ($P < .05$)。然而由於本文所涉及面向相當多，篇幅已經很長了，對於在尋找最佳模型的過程中，所曾建構的模型及其適合度，也就不再多作說明，而僅如上述，扼要地說明尋找最佳模型的依據，並在“研究發現中”詳細說明最後所找到的最佳模型。

5 如果有許多的 D_{ij} 參數都必須使用的話，本研究的統計模型就會比 Sobel et al. (1985) 的模型用到更多參數；在此 4×4 流動表中，Sobel et al. 的模型有 13 個參數，3 個自由度；而本研究的模型最多可用到 16 個待估參數。然而實際上在本研究所所有分析中，單是 B 就能適合大多數格子的資料，僅需再加上少數的 D_{ij} 就能適合整個表格；既然 D_{ij} 用得很少，本研究所有的模型所用到的參數也就都比 Sobel et al. 的模型少，而自由度最少也有 5，較容易做出有意義的詮釋。

三、研究發現與解釋

(一)階級位置之運作化：劃分職業於階級之分析

本研究依 Weber (1978) 的階級概念，而從職業中劃分階級：把有相同或類似的流動機會，與市場條件，經濟利益及生活機會之職業劃歸同為一類，亦可稱為一個階級；在此以各職業的教育與收入水準做為市場條件，經濟利益及生活機會之指標。在依據職業類別來分析階級結構之前，必須先依據各項職業的流動與生活機會，將各項職業劃分於各個階級，接著說明本節研究劃分職業於階級之經驗分析。

從表 2 可看到從父職到現職的流出表（列百分比）與流入表（行百分比）。從七大類職業邊際分佈可看到父職為專門技術人員、行政主管人員、服務工作人員的人數均少於 100 人，父職為監督佐理人員的人數亦不過 119 人，現職為行政主管人員與服務工作人員的人數也在 100 人左右，除了基於理論上的考量而要把職業併類而劃分階級之外，基於統計上的考量，亦有必要把職業併類：七大類職業分類各類職業邊際次數往往不是很大，在作流動表分析時，就很可能因抽樣誤差而導致推計推論之不確定性，因而必須作適當的併類以提高統計推論之精確性。

從表 2 又可看到父職為專門技術人員、行政主管人員、監督佐理人員三項白領工作者，本人現職均大都仍為這三項白領工作；而父職為其他職業者，本人現職為這三項白領工作的比率就低得多了；而且父職為這三項工作者，本人現職的分佈可說都是相當類似，三者有很類似的流動機會；進一步的父職到初職，以及初職到現職之流出表分析亦顯示：三者有類似的流動機會（表略）。從表 3 又可看到現職為這三項白領工作者的平均教育年數都很接近，而遠高於其他現職者，三者的收入與其他職業相較，也都偏高。不論是根據流動機會或教育、

表 2：七大類父職與現職流出、流入表 (p=.00)

			現 職							
			專門技術人員	行政主管人員	監督佐理人員	買賣工作人員	服務工作人員	勞動工人	農林漁牧人員	合計
父職	專門技術人員	列%	41.5	7.5	26.4	9.4	5.7	9.4		53(N)
		行%	14.7	4.7	5.9	2.3	2.7	1.1		3.6(%)
	行政主管人員	列%	17.6	19.1	27.9	20.6	1.5	11.8	1.5	68
		行%	8.0	15.3	8.1	6.5	.9	1.7	.5	4.6
	監督佐理人員	列%	21.0	9.2	29.4	17.6	5.0	14.3	3.4	119
		行%	16.7	12.9	14.8	9.7	5.4	3.7	1.9	8.1
	買賣工作人員	列%	8.2	5.4	25.0	28.8	6.0	23.4	3.3	184
		行%	10.0	11.8	19.5	24.4	9.8	9.3	2.8	12.5
	服務工作人員	列%	13.4	7.3	22.0	14.6	19.5	22.0	1.2	82
		行%	7.3	7.1	7.6	5.5	14.3	3.9	.5	5.6
	勞動工人	列%	8.2	3.9	19.3	14.1	9.8	42.3	2.3	305
		行%	16.7	14.1	25.0	19.8	26.8	28.0	3.3	20.7
	農林漁牧人員	列%	6.0	4.4	6.8	10.4	6.8	36.2	29.5	665
		行%	26.7	34.1	19.1	31.8	40.2	52.3	91.2	45.1
	合計	N	150	85	236	217	112	461	215	1476
		%	10.2	5.8	16.0	14.7	7.6	31.2	14.6	100.0

收入，這三項職業都相當接近，而具有同質性，把三者併成一類當能收簡化分類與進一步分析之功效，此類即為典型的白領工作者。

接著根據表 2 比較父職為買賣工作者與服務工作人員的現職分佈百分比，又可發現不但兩者間有相當的流動機會，兩者流至其他現職的百分比亦非常接近（與其他職業相較），兩者有很接近的流動機會；進一步的從父職到初職，以及從初職到現職之流出表分析亦顯示：三者有類似的流動機會（表略）。從表 3 又可看到現職為這兩項職業者的平均教育年數與收入都很接近。本研究乃把這兩類職業併成一類，此為典型的商業工作者，或所謂的“生意人”。

依上述理論與統計上的考量所作的併類之程序，本研究在作進一

表 3：七大類現職平均收入、教育年數比較分析

	收 入			教育年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數
全體	4.10	2.24	1618	9.60	4.49	1631
專門技術人員	5.24	2.12	171	14.24	3.01	172
行政主管人員	6.04	3.67	93	12.38	2.91	94
監督佐理人員	4.26	1.64	263	12.81	2.14	264
買賣工作人員	4.48	2.48	240	9.81	3.90	243
服務工作人員	4.11	2.70	122	8.68	3.83	124
勞動工人	3.77	1.50	500	8.07	3.68	503
農林漁牧人員	2.61	1.78	229	4.99	4.03	231
各類現職均數差異F檢定之P值	.00			.00		

步的流動表與網絡表之分析時，乃把職業分成四個階級：

1. 專技、管理、佐理人員，此為典型的白領工作者，有著很高的教育程度，相當於傳統中國所謂的“士”。
2. 買賣服務工作人員，這可說是典型的商業工作者，相當於傳統的“商”。⁶
3. 勞動工人，相當於傳統的“工”。
4. 農林漁牧獵人員，相當於傳統的“農”。

原七大類職業的類別中本來就有工、農兩類。這兩類有較大的樣本數，加上工、農的市場條件不同，在教育、收入，與流動機會上有相當的異質性，乃保留於進一步分析所依據的四分類中。這四大類現職的平均教育與收入，可參表 4，不論是教育或收入，均依序為士、商、工、農；四個階層（級）的高低，乃依序為士、商、工、農。

6 以受訪者現職細類作說明，買賣服務工作人員中有三分之二為買賣工作人員，很明顯地屬於“商”；其餘的服務工作人員中亦有三分之二以上為餐旅、理容、休閒服務——等很明顯地屬於“商”的工作人員。

表 4：四大類現職平均收入、教育年數比較分析

	收 入			教育年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數
全體	4.10	2.24	1618	9.60	4.49	1631
專技管理佐理人員	4.89	2.37	527	13.19	2.69	530
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4.36	2.56	362	9.42	3.91	367
勞動工人	3.77	1.50	500	8.06	3.68	503
農林漁牧獵人員	2.61	1.78	229	4.99	4.03	231
各類現職均數差異F檢定之P值	.00			.00		

(二)職業流動表之分析

本節根據上節所建構的四分類職業作職業流動表之分析，所分析的流動歷程，包括從父職到初職，初職到現職兩階段的流動歷程，與綜括這兩段歷程的父職到現職之流動歷程。

(A)父職與初職流動表之分析

從表 5 (A)的父職與初職流出表可看到：父為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者，本人有 56.4%初職亦為專技管理佐理人員，有很高的繼承率，即不流動之比率。父職為買賣服務工作人員者，本人初職繼承的比率則不高 (26.2%)，父職為農林漁牧獵人員者，本人初職繼承的比率亦不高 (31.7%)，父為勞動工人者，本人初職繼承的比率則高達 54.3%。再就父職到初職的代間流動而論，從買賣服務工作、勞動工人、農林漁牧獵人員到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的向上流動比率都不低，特別是從買賣服務工作流向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的比率高達 34%，比繼承的比率還高。不論父職為何，都以流向勞動工人的比率最高，流向農林漁牧獵人員的比率最低，從買賣服務工作人員、農林漁牧獵人員流向勞動工人的比率，都超過繼承的比率。

從表 5 (A)的邊際次數百分比又可看到，初職為勞動工人的百分比

表 5 (A): 父職與初職流出表 (列百分比)

		初 職				合計	
	列百分比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買賣服務 工作人員	勞動工 人	農林漁 牧人員	N	%
父職	專技管理佐理人員	56.4	15.8	27.1	.7	291	15.7
	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34.0	26.2	35.8	4.0	321	17.3
	勞動工人	26.8	16.9	54.3	2.1	385	20.7
	農林漁牧獵人員	13.9	9.4	44.9	31.7	861	46.3
	合計	N	496	276	790	296	1858
		%	26.7	14.9	42.5	15.9	

表 5 (B): 父職與初職流入表 (行百分比)

		初 職				合計	
	行百分比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買賣服務 工作人員	勞動工 人	農林漁 牧人員	N	%
父職	專技管理佐理人員	33.1	16.7	10.0	.7	291	15.7
	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22.0	30.4	14.6	4.4	321	17.3
	勞動工人	20.8	23.6	26.5	2.7	385	20.7
	農林漁牧獵人員	24.2	29.3	49.0	92.2	861	46.3
	合計	N	496	276	790	296	1858
		%	26.7	14.9	42.5	15.9	

(42.5%) 比父為勞動工人的百分比 (20.7%) 高得多, 初職為農林漁牧獵人員的比率 (15.9%) 則比父為農林漁牧獵的比率 (46.3%) 低得多, 這反映出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所帶來的職業結構變遷(孫清山, 1992), 這當為上述不論父職為何, 到初職的流動均以流向勞動工人的比率最高, 流向農林漁牧獵人員的比率最低之重要原因, 在隨

後進一步的流動比分析中，將剔除此結構變遷的效應，以探討流向勞動工人或農林漁牧獵人員的傾向。從表 5 (A)的邊際分佈又可看到，初職為買賣服務工作的百分比 (14.9%) 與父職為同職的百分比 (17.3%) 很接近，初職為最高階的專技管理佐理人員之百分比 (26.7%) 則比父為同職者百分比 (15.7%) 高得多，這可反映出近年服務業之蓬勃發展，與工業逐漸升級所導致的職業階層結構之升等 (孫清山, 1992)，而有助於結構性的流向專技管理佐理人員之向上流動，這當為上述“流向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的比率不低”之重要原因，至於剔除結構變遷的效應後，是否仍呈現如此的向上流動傾向，隨後將以流動比作分析。

再就表 5 (A)所呈現的整個職業機會不平等性作分析。父為農林漁牧獵工作人員，初職仍大都為層級較低的勞動工人與農林漁牧獵人員，為層級較高的專技管理佐理人員或買賣服務工作人員之比率不過 23.3%，父為勞動工人者此項比率亦不過 43.7%，父為買賣服務工作、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者，此項比率則分別高達 60.2%、72.2%；再就所有流動的途徑而言，最大的流動為從農到工的短程流動，佔整樣本 21% ($= 46.3\% \times 44.9\%$)；整個來說，仍反映出相當程度的機會不平等性，以及流動的封閉性。

接著依表 5 (B)的父職與初職的流入表作分析，探討擔任各初職者的家庭背景，即父職之組成。初職為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者的家庭背景相當歧異，其中父職亦為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的比率最高，亦不過佔 33.1%，父為勞動工人的比率最低為 20.8%，農家的比率則為 24.2%，背景之歧異性有礙於專技管理佐領 (士) 階級意識之形成。初職為買賣服務工作人員之家庭背景亦有很大歧異性，而有礙於階級形成。初職為勞動工人者父職集中於農林漁牧人員 (49%)，父亦為工人者僅佔 26.5%，半數有著從農到工的流動經驗，實不利於工人意識之形成。而初職為農林漁牧獵人員者中有 92.2% 父職亦為農林漁牧獵人員，絕大多數初職為農者，有兩代，甚至於好幾代為農的經驗，而有利於農民

意識之形成。

以上表 5 (A)、5 (B)的百分比流出、流入表分析，所反映的是觀察流動，雖與階級形成有直接的關連，然而卻不能剔除結構變遷的效應，以呈顯相對流動機會，或所謂的“真正流動結構”。表 5 (C)則以準對稱模型 (QS Model) 剔除結構效應，以流動表各格的流動比來呈顯所謂的“真正流動結構”。此 QS 模型來配合 (fit) 父職與初職流動表資料，所得到的最後模型，共用到了一個主效應，三個行效應，三個列效應，三個交互效應參數 (B 及 d_{22} , d_{44})，自由度為 6，卡方值 (L2) 為 12.56， $P=0.05$ ，在樣本不算小 ($N=1858$) 的情況下，此模型可說已有相當不錯的適合度，而且自由度大，參數少。可說是又簡潔，又合資料，為不錯之模型。據此模型可算出各格之流動比，請見表 5 (C)。

從表 5 (C)可看到：固然低層的工人或農民與上層的專技管理佐理、買賣服務工作人員之間雖有一些流動機會，然而流動比均小於 1，而且流動的距離越大，流動比越小，農與專技管理佐理間的距離最大，流動比也就最小，相對流動機會最小。

從表 5 (C)又可看到對角線上代表傳(繼)承的流動比均大於 1，其中於農民的傳承流動比最大，高達 (14.97)，工人的傳承流動比最低，僅 1.08，而僅比 1 略高。同是上層的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與買賣服務人員間的流動比，與同是下層的工農之間的流動比均大於 1，而有著很高的循環流動之傾向。

綜合整個表 5 (C)的相對流動之分析，很明顯地，同屬上層的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與買賣服務人員間的流動比均大於 1，傳承流動比亦均大於 1，同屬下層的工農間之流動比亦均大於 1，傳承流動比亦均大於 1；反之，上、下層間的流動比均小於 1，很明顯地呈現出一個流動的界限，這通常稱為階級界限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177-180)，位於工人與買賣服務人員之間，跨界限的相對流動機會 (流動比) 小於 1，界限內的流動機會大於 1。此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固然工人

表 5 (C): 父職與初職流動比

模型自由度 6 卡方值 12.56 P=.05 B=.31

		初 職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買賣服務 工作人員	勞動工人	農林漁牧獵 人員
父職	專技管理佐理人員	2.02	1.26	.79	.49
	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1.26	1.92 (1.08)(1.78)	.93	.79
	勞動工人	.79	.93	1.08	1.26
	農林漁牧獵人員	.49	.79	1.26	14.97 (2.02)(7.41)

說明：括弧外之數字為流動比，它可分解為(1)全盤距離效應(2)特殊效應，這分別是各格第一、二個括弧內之數字。沒括弧各格之流動比，僅含全盤距離效應，流動比即全盤距離效應。

與農民同在這個階級界限之下，彼此間有相當的循環流動，農民還是具有高度的傳承機會，流動比高達 14.97。

以上表 5 (C)的各格流動比大都可用 linear-by-linear 之距離效應來作全盤解釋，然而仍有些格子不能依此作解釋，則可歸於各格之特殊性效應，而有賴於特殊之解釋。依 QS Model,可把表 5 (C)具特殊效應的各格流動比分解為兩種效應：全盤的距離效應和特殊效應，分別見於表 5 (C)各格第一、二個括弧內之數字。至於沒出現括弧之各格不具特殊效應，各格之流動比，僅含全盤距離效應，流動比即全盤距離效應。

從表 5 (C)可看到距離效應可解釋大部份格子的流動比，距離越遠，相對流動機會越低，僅有買賣服務工作人員、農民的傳承流動比甚高，高於上述距離模型的預測值，這兩格傳承的特殊效應分別是 1.78 與 7.41，與一般性的距離效應 1.08、2.02 相乘，即得到表 5 (C)上這兩格之流動比 1.92 (=1.08×1.78) 和 14.97 (2.02×7.41)。買賣服務工作人員的特殊傳承效應，可歸諸於他們多數為小資本家或資本家 (表略)，

父親很容易將產業傳給子女；農民的高度特殊傳承效應，除了可歸因於他們多數為小資本家，父親可將產業傳給子女之外，農地取得不易（謝雨生和余淑誼，1990），限制了其它背景者之競爭亦是原因。表 5 (C) 上其他格流動比則無需藉特殊效應作解釋，流動比即全盤距離效應。

(B) 初職與現職流動表之分析

從表 6 (A) 流出表可看到各初職者的現職分布，擔任各初職者現職不動的比率都超過了 60%，與表 5 (A) 的父職，初職代間流動相較，表 6 (A) 的代內流動實具有較大的封閉性。一旦初職為最高層的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現職亦絕大多數能守在那裡（佔 80.4%），工作生涯之穩定性當有助於階級之形成；相對而言，初為買賣服務工作或工人的流動機會較大，這不利於階級形成；初為工人者仍有許多向上流動機會，14.2% 流向專技管理佐理人員，19.6% 流向買賣服務工作人員，若依熊瑞梅和黃毅志 (1992)，後者可歸因於都市的服務業的蓬勃發展，而給工人帶來向上流動機會。初為買賣服務工作者亦有許多向上流動而成專技管理佐理人員之機會（佔 24.8%）。

再就表 6 (B) 流入表作分析。現為專技管理佐理人員、工人、農民者初職大都與現職相同，具有很大的工作經歷之同質性，然而現為買賣服務工作者，初職就具很大的歧異性，初為買賣服務工作者僅佔 41.6%，初為勞動工人百分比則達 34.6%，初職的歧異性不利於階級形成。

接著以表 6 (C) 分析從初職到現職的相對流動機會，很清楚地可看到對角線上各格的流動比均遠大於 1，反映出很強的代內“不流動”之傾向，其中以農民的不流動傾向最大，流動比高達 39.8。從表 7 (C)，除了可看到不流動的傾向之外，還可看到流動的距離越大，流動比越小，相對流動機會越小的現象之外。整個來說，表 6 (C) 的代內流動比，亦和表 5 (C) 的父職與初職代間流動比一樣呈現相同的階級界限，位於工人與買賣服務工作人員之間，界限內的流動比均大於 1，跨界限的流

表 6 (A): 初職與現職流出表 (列百分比)

		現 職					合計	
	列百分比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買賣服務 工作人員	勞動工 人	農林漁 牧人員	N	%	
初職	專技管理佐理人員	80.4	13.2	5.1	1.3	454	28.3	
	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24.8	60.6	13.4	1.2	246	15.3	
	勞動工人	14.2	19.6	62.0	4.1	632	39.4	
	農林漁牧獵人員	2.2	9.1	17.2	71.5	274	17.1	
	合計	N	522	358	495	231	1606	
		%	32.5	22.3	30.8	14.4		100.0

表 6 (B): 初職與現職流入表 (行百分比)

		現 職					合計	
	行百分比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買賣服務 工作人員	勞動工 人	農林漁 牧人員	N	%	
初職	專技管理佐理人員	69.9	16.8	4.6	2.6	454	28.3	
	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11.7	41.6	6.7	1.3	246	15.3	
	勞動工人	17.2	34.6	79.2	11.3	632	39.4	
	農林漁牧獵人員	1.1	7.0	9.5	84.8	274	17.1	
	合計	N	522	358	495	231	1606	
		%	32.5	22.3	30.8	14.4		100.0

動比均小於 1, 界限內與界限間的流動比有很大的差異。在這個階級界限之下, 農民仍然具有高度的不流動機會, 流動比高達 39.8。

最後說明表 6 (C) 上各格的流動比之分解。可很清楚地看出對角線以外代表流動的各格流動比, 都可用全盤的距離效應作解釋。然而對角線上代表不動的各格之流動比大都太大, 無法以距離模型作充分解

釋，而必須借助於代表各格不動傾向的特殊效應作解釋。和父職與初職的流入表類似，買賣服務工作人員不流動的特殊效應，可歸諸於他們多數為小資本家或資本家(表略)，初職的產業可保持到現在，現職也就不變；農民的高度不流動的特殊效應，除了可歸因於他們多數為小資本家，初職的產業可保持到現在之外，農地取得不易限制了競爭亦是原因。專技管理佐理人員不流動的特殊效應，則可歸因於他們的高學歷使得他們一直能守在這項最高階層。

表 6 (C): 初職與現職流動比

模型自由度 6 卡方值 9.0 P=.17 B=.51

		現 職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買賣服務 工作人員	勞動工人	農林漁牧獵 人員
初職	專技管理佐理人員	9.32 (3.16) (2.95)	1.46	.69	.32
	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1.46	3.36 (1.14) (2.95)	.88	.69
	勞動工人	.69	.88	3.36	1.46
	農林漁牧獵人員	.32	.69	1.46	39.8 (3.16) (12.6)

說明：同表5(C)

(C)父職與現職流動表之分析

本節所探討的“父職到現職的流動歷程”，綜括了前兩節父職到初職，初職到現職之兩階段流動的歷程。

首先針對表 7 (A)父職與現職流出表做分析。從表 7 (A)可看到父為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者，本人現職繼承父業之比率高達 64.6%。父職為買賣服務工作人員者，本人現職繼承的比率則僅有 34.6%，父職為農林漁牧獵人員者，本人現職繼承的比率更是僅有 29.4%，父為勞動工

人者，本人現職繼承的比率則為 42.3%。接著說明從父職到現職的代間流動，從買賣服務工作、勞動工人、農林漁牧獵人員流向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的向上流動比率甚高，特別是從買賣服務工作流向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的比率高達 39.8%，比繼承的比率還要高。不論父職為何，大都以流向勞動工人的比率最高，流向農林漁牧獵人員的比率最低，從農林漁牧獵人員流向勞動工人的比率，超過傳承的比率。

根據表 7 (A) 的邊際次數百分比又可發現，現職為勞動工人的比率 (31.2%) 比父職為勞動工人的比率 (20.6%) 高得多，現職農林漁牧獵人員的比率 (14.6%) 則比父為農林漁牧獵的比率 (45.1%) 低得多，這反映出隨著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而來的職業結構變遷，這可解釋上述“不論父職為何，到現職的流動大都以流向勞動工人的比率最高，流向農林漁牧獵人員的比率最低”之現象，在隨後進一步的流動比分析中，將剔除此結構變遷的效應，以探討從各項職業流向勞動工人或農林漁牧獵人員的傾向。從表 7 (A) 的邊際分佈，又可看到現職為買賣服務工作的比率 (22.3%) 很接近父職為該職業的比率 (18.0%)，現職為最高階的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的比率 (31.9%) 則比父為這項職業的比率 (16.2%) 高得多，反映出職業階層結構之升等，這有助於流向專技管理佐理人員之向上流動，這當為上述“流向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的比率”甚高之重要原因，至於剔除職業結構變遷的效應後，是否還會呈現如此的流動傾向，隨後將以 QS 模型的流動比進行分析。

再就表 7 (A) 整體所顯現的職業機會不平等性作分析，父職為農林漁牧獵工作人員者，現職仍然集中於層級較低的勞動工人與農林漁牧獵人員，屬於層級較高的專技管理佐理人員或買賣服務工作人員之比率不過 34.4% 而已，父職為勞動工人者此項比率則為 55.4%，父職為買賣服務工作，以及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者，這項比率則高達 74.4% 與 85.4%；就所有流動的途徑而言，最大的流動來源是從農到工的短程

表 7 (A): 父職與現職流出表 (列百分比)

		現 職				合計(列)	
	列百分比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買賣服務 工作人員	勞動工 人	農林漁 牧人員	N	%
父職	專技管理佐理人員	64.6	20.8	12.5	2.1	240	16.2
	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39.8	34.6	22.9	2.6	266	18.0
	勞動工人	31.5	23.9	42.3	2.3	305	20.6
	農林漁牧獵人員	17.1	17.3	36.2	29.4	666	45.1
	合計(行) N	471	330	461	215	1477	
	%	31.9	22.3	31.2	14.6		100.0

表 7 (B): 父職與現職流入表 (行百分比)

		現 職				合計(列)	
	行百分比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買賣服務 工作人員	勞動工 人	農林漁 牧人員	N	%
父職	專技管理佐理人員	32.9	15.2	6.5	2.3	240	16.2
	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22.5	27.9	13.2	3.3	266	18.0
	勞動工人	20.4	22.1	28.0	3.3	305	20.6
	農林漁牧獵人員	24.2	34.8	52.3	91.2	666	45.1
	合計(行) N	471	330	461	215	1477	
	%	31.9	22.3	31.2	14.6		100.0

向上流動，佔整體樣本的 16% ($=45.1\% \times 36.2\%$)；整個來說，仍顯示出相當的機會不平等性，以及流動的封閉性。

接著對表 7 (B) 父職與現職的流入表作分析，以探討各現職者的家庭背景組成。現職為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者的家庭背景具有相當的歧異性，父職同為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的比率最高，也不過佔了 32.9% 而已；

背景的歧異性有礙於專技管理佐理（士）階級意識之形成。現職為買賣服務工作人員者之家庭背景也有很大的歧異性，而有礙於階級形成。現職為勞動工人者父職集中於農林漁牧人員（52.3%），父亦為工人者僅佔 28.0%，半數有著從農到工的流動經驗，亦不利於工人意識之形成。現職為農林漁牧獵人員者，則有高達 91.2% 的比率父職亦為農林漁牧獵人員，絕大多數現職為農者，有兩代以上為農的經驗，這有利於農民意識之形成。

最後以 QS 模型來分析從父職到現職之流動，據此模型可算出各格之流動比，請見表 7 (C)。從表 7 (C)除了可看到流動的距離越大，流動比越小，相對流動機會越小的現象之外，還可看到對角線上代表傳承的流動比均大於 1，其中於農民的傳承流動比最大，高達 10.5，工人的傳承流動比最低，僅 1.44，而比 1 高出不多。同是上層的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與買賣服務人員間的流動比，與同是下層的工農之間的流動比均大於 1，而有著很高的循環流動之傾向。

表 7 (C)：父職與現職流動比

模型自由度 5 卡方值 8.6 P=.13 B=.36

		現 職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買賣服務 工作人員	勞動工人	農林漁牧獵 人員
父職	專技管理佐理人員	2.24	1.31	.77	.45
	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1.31	1.78 (1.09) (1.63)	.92	.77
	勞動工人	.77	.92	1.44 (1.09) (1.32)	1.31
	農林漁牧獵人員	.45	.77	1.31	10.5 (2.24) (4.68)

說明：同表 5 (C)

綜合整個表 7 (C)的相對流動之分析，很明顯地又呈現出一個流動的階級界限，位於工人與買賣服務人員之間，跨界限的相對流動機會（流動比）小於 1，界限內的流動機會大於 1。

最後對各格的流動比之分解作說明。從表 7 (C)可看到距離效應可解釋大部份格子的流動比，距離越遠，相對流動機會越低，僅有買賣服務工作人員、工人、農民的傳承流動比甚高，高於上述距離模型的預測值，這三格傳承的特殊效應分別是 1.63, 1.32 與 4.68，農民仍然具有高度的不流動機會。此買賣服務工作人員與農民的傳承特殊效應，很類似父職到初職的傳承特殊效應，解釋當也很類似，而工人的傳承特殊效應雖達到顯著 ($p < .05$)，但不是很大，並沒有多大的實質意義。⁷

(三)各職業階層間的友誼、婚姻配對網絡表分析

在前兩節從社會流動探討台灣的階級結構及階級界限之後，本節進一步從各職業階層間的社會網絡，這包括友誼與婚姻兩項親密網絡，來探討階級結構及相關的階級界限。

(A)友誼網絡表之分析

本節分析各階層間的友誼網絡，所根據的是受訪者的現職及其最好的朋友現職之關連性，此關連性可從表 8 的網絡表顯現出來。

表 8 (A)顯現本人現職與最好的朋友之百分比交叉表的列百分比，這很類似流動表之流出表，可分析各現職者的最好朋友之現職百分組成。從表 8 (A)可看到現職為專技管理佐理人員、工人或農民者，其最好朋友絕大多數均為與本人同現職者(均超過三分之二)，這顯示出友

7 由於本研究採用了涵蓋眾多流動與網絡變項的 81 年度社會階層組資料，樣本還不夠大，若把樣本分成男女兩組，或依年齡分組作分析，就會因為各組樣本太小而使得流動表分析變得很困難。不過，本研究曾依性別及年齡分組分析，仍顯示各組的流動沒有很大的差別，並不會因分組而改變既有的結論。

誼網絡所具有的高度封閉性，現職為買賣服務工作者的最好朋友為同現職者的比率最低(50%)。至於各現職階層間的友誼，值得注意的是：買賣服務工作人員以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為好友的比率高達 31%；然而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固然現職為工人者，多半具有農家背景（見表 7 (B)），然而其最好朋友之現職僅 3.6%為農民，而不符合本研究“工人的親密網絡中含許多農民”之假設。

再就表 8 (B)本人現職與最好朋友現職的交叉表行百分比（類似流動表之流入表）作探討。很明顯地可看出，以專技管理佐理人員、工人、農民為最好朋友的受訪者中，本人絕大多數為同職者（都超過 70%），惟獨以買賣服務工作人員為最好朋友者中，本人同職者的比率還不到半數（44.1%），而有高比率的專技管理佐理人員（28%）與工人（21.1%）。

接著以 QS 模型，剔除前述百分比交叉表的結構（邊際）效應，來顯現出各現職者的友誼之相對機會，這可稱為“真正網絡結構”。從表 8 (C)可看到代表全盤距離效應的 B 值為.245，模型自由度為 5，卡方值 8.0， $P=0.16$ ，相當符合資料。代表全盤距離效應的 B 值為.245，階層距離越大，交往比越小，低層的工人或農民與上層的專技管理佐理、買賣服務工作人員之間的交往比均小於 1。

從表 8 (C)又可看到對角線上代表同階層友誼的交往比均大於 1，其中以農民的交往比最大，高達 258，買賣服務工作人員最低，僅 1.06，而僅比 1 略高。同樣是上層的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與買賣服務人員間的交往比，與同是下層的工農之間的交往比均大於 1，而有著很高的交往之傾向。

綜合整個表 8 (C)的交往比之分析，很明顯地又呈現出一個交往的界限，這通常稱為階級界限，位於工人與買賣服務人員之間，跨界限的相對交往機會（交往比）小於 1，界限內的交往機會大於 1。

以上表 8 (C)的格格交往比主要可用 linear-by-linear 之距離效應

來作全盤解釋，有些格則不能依此作解釋，則可歸於各格之特殊性效應，而有賴於特殊之解釋。依 QS Model，可把表 8 (C) 各格的交往比分解為兩種效應：全盤的距離效應，特殊效應，分別見於表 8 (C) 各格第一、二個括弧內之數字。至於不具特殊效應各格之交往比僅含全盤距離效應，交往比即全盤距離效應。

表 8 (A): 本人現職與最好的朋友現職關連網絡表 (列百分比)

		最好的朋友現職						
	列百分比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買賣服務 工作人員	勞動工 人	農林漁 牧人員	合計(列) N %		
本人 現職	專技管理佐理人員	76.3	18.3	4.5	.9	464	35.0	
	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31.0	50.0	12.7	6.3	268	20.2	
	勞動工人	13.0	16.3	67.2	3.6	393	29.6	
	農林漁牧獵人員	5.0	10.4	13.4	71.1	201	15.2	
	合計(行) N	498	304	346	178	1326		
	%	37.6	22.9	26.1	13.4	100.0		

表 8 (B): 本人現職與最好的朋友現職關連網絡表 (行百分比)

		最好的朋友現職						
	行百分比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買賣服務 工作人員	勞動工 人	農林漁 牧人員	合計(列) N %		
本人 現職	專技管理佐理人員	71.1	28.0	6.1	2.2	464	35.0	
	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16.7	44.1	9.8	9.6	268	20.2	
	勞動工人	10.2	21.1	76.3	7.9	393	29.6	
	農林漁牧獵人員	2.0	6.9	7.8	80.3	201	15.2	
	合計(行) N	498	304	346	178	1326		
	%	37.6	22.9	26.1	13.4	100.0		

表 8 (C): 本人現職與最好的朋友現職關連交往比

模型自由度5 卡方值8.0 P=.16 B=0.245

		最好的朋友現職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買賣服務 工作人員	勞動工人	農林漁牧獵 人員
本人 現職	專技管理佐理人員	11.8 (1.74) (6.77)	1.20	.83	.59
	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1.20	1.06	.57 (.94) (.61)	
	勞動工人	.83	.57 (0.94) (0.61)	7.2 (1.06) (6.77)	1.20
	農林漁牧獵人員	.59	.83	1.20	258 (1.74) (148)

說明：同表 5 (C)，不過 5 (C) 的是流動比，本表為交往比。

從表 8 (C) 可看到距離效應可解釋大部份格子的交往比，距離越遠，相對交往機會越低，僅有專技管理佐理人員、工人、農民的同階層內交往比，高於上述距離模型的預測值，這三格的特殊效應分別是 6.77，6.77 與 148，農民的交往仍然具有高度的封閉性；工人與買賣服務人員彼此之間的交往比甚低，低於上述距離模型的預測值，這兩格的特殊效應都是 .61。

(B) 婚姻配對網絡表之分析

本節分析各階層間的婚姻配對網絡，所根據的是受訪者的現職及其配偶現職之關連性，此關連性可從表 9 的網絡表顯現出來。

表 9 (A) 為本人現職與配偶現職之百分比交叉表的列百分比，可用來分析各現職者的配偶現職之百分組成。根據表 9 (A)，現職為專技管理佐理人員、工人或農民者，他們的配偶之現職大多數均與本人相同（均超過 57%），這與前述的友誼網絡一樣，仍顯示出婚姻配對網絡之高度封閉性；而現職為買賣服務工作者的配偶現職與本人相同的比率

表 9 (A): 本人現職與配偶現職關連網絡表 (列百分比)

		配 偶 現 職				合計(列)	
	列百分比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買賣服務 工作人員	勞動工 人	農林漁 牧人員	N	%
本人 現職	專技管理佐理人員	68.5	18.1	12.6	.8	238	31.2
	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31.1	32.5	30.5	6.0	151	19.8
	勞動工人	19.5	15.5	57.1	8.0	226	29.7
	農林漁牧獵人員	6.1	4.1	8.2	81.6	147	19.3
	合計(行) N	263	133	217	149	762	
	%	34.5	17.5	28.5	19.6		100.0

表 9 (B): 本人現職與配偶現職關連網絡表 (行百分比)

		配 偶 現 職				合計(列)	
	行百分比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買賣服務 工作人員	勞動工 人	農林漁 牧人員	N	%
本人 現職	專技管理佐理人員	62.0	32.3	13.8	1.3	238	31.2
	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17.9	36.8	21.2	6.0	151	19.8
	勞動工人	16.7	26.3	59.4	12.1	226	29.7
	農林漁牧獵人員	3.4	4.5	5.5	80.5	147	19.3
	合計(行) N	263	133	217	149	762	
	%	34.5	17.5	28.5	19.6		100.0

最低(32.5%)。至於各現職階層間的婚姻配對，值得注意的是：1、買賣服務工作人員的配偶為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的比率高達31%。2、雖然現職為工人者多半具有農家背景，然而他們的配偶之現職卻僅有8.0%為農民，而不符本研究“工人的親密網絡中含許多農民”之假設。

不論是就友誼或婚姻而言，工人的親密網絡都沒包含許多農民，

這除了可歸因於農民的教育程度特別低落(可參表 4)，年齡特別高(表略)，與其它階層有所區隔，而限制與其它階層建立網絡之外，農民多住在鄉間，在地理的分佈上較為孤離亦可能是原因。

再就表 9 (B)所顯示的本人現職與配偶現職的交叉表行百分比作探討。很明顯地可看出，以專技管理佐理人員、工人、農民為配偶的樣本中，本人大多數為同職者(都超過 59%)，祇有以買賣服務工作人員為配偶者中，本人為同職者還不到半數(36.8%)，而有高比率的專技管理佐理人員(32.3%)與工人(26.3%)。

最後以 QS 模型，剔除前述百分比交叉表的結構效應，而顯現各現職者婚姻配對之相對機會。從表 9 (C)可看到代表全盤距離效應的 B 值為 0.36，階層距離越大，婚姻配對比越小，很明顯地又呈現出一個配對的“階級界限”，位於工人與買賣服務人員之間，跨界限的相對配對機會(配對比)小於 1，界限內的配對機會大於 1。而在對角線上代表同階層婚姻配對的配對比均大於 1，其中農民的婚姻配對比最大，高達 46.6，買賣服務工作人員最低，僅 1.07，而僅比 1 略高。

表 9 (C)的各格配對比主要仍可用 linear-by-linear 之距離效應來作全盤解釋，有些格子不能依此作解釋，則可歸於各格之特殊性效應：專技管理佐理人員、工人、農民的同階層內配對比甚高，高於上述距離模型的預測值，這三格的特殊效應分別是 2.59, 2.37 與 25.9，農民的婚姻配對仍然具有高度的封閉性。⁸

綜合以上交往比與配對比所顯現的網絡結構，農民的教育程度偏低，年齡偏高，以及在地理上較為孤離，乃造成網絡之高度封閉。至於買賣服務工作人員的網絡之高度開放性，則可歸因於買賣服務工作

8 在對角線上流動比或配對比究竟要多大才算大，才算是具有高度封閉性，和 R^2 要多高才算高一樣，並沒有絕對的客觀認定標準，無論如何，農民的各項比值(簡單的說就是相對於開放狀態的機會)，最少也有 10.5，不論用什麼標準作認定，都可說具有高度封閉性。

表 9 (C): 本人現職與配偶現職關連配對比

模型自由度 5 卡方值 8.6 P=.13 B=.27

		配 偶 現 職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買賣服務 工作人員	勞動工人	農林漁牧獵 人員
本人 現職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4.66 (1.80) (2.59)	1.22	.82	.56
	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1.22	1.07	.93	.82
	勞動工人	.82	.93	2.54 (1.07) (2.37)	1.22
	農林漁牧 獵人員	.56	.82	1.22	46.60 (1.80) (25.9)

說明：同表 5 (C)，不過 5 (C) 的是流動比，本表為配對比。

人員，在工作上有很多機會與其他階層者接觸，從而建立階層間的網絡。⁹

四、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依 Weber (1978) 的階級概念與台灣之特殊性，在作流動表與網絡表之分析前，先根據常用的“專門技術人員行政主管人員、監督佐理人員、服務工作人員、買賣工作人員、勞動工人、農林漁牧獵人員”七大類職業分類中，各項職業的流動機會，與市場條件，經濟利益及生活機會(以平均教育年數與收入為指標)，把類似的職業併類，最後把職業分成四類，以作為流動表與網絡表分析之基礎，這四

9 如果能蒐集進一步的資料，如各職業階層民衆間的地理區隔，在工作上與其它階層者接觸的機會，則可參照 Hout (1988) 的研究，就本研究針對 QS 模型所作過的事後解釋，作進一步的嚴格量化檢證。

類職業分別是：

- 1、專技、管理、佐理人員，這是典型的白領工作者，其特色為“很高的教育程度”，相當於傳統中國所謂的“士”。
- 2、買賣服務工作人員，這是典型的商業工作者，相當於傳統的所謂的“商”。
- 3、勞動工人，這相當於傳統的“工”。
- 4、農林漁牧獵人員，相當於傳統的“農”。

以上四大類職業的平均教育或收入，均依序為士、商、工、農，四個階層（級）的高低，乃依序為士、商、工、農。

根據本研究所作的百分比流出、流入表、網絡表分析，隨著台灣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與勞動工人擴充，農林漁牧獵人員縮減的快速職業結構變遷，所引發的結構性流動有礙於勞動工人階級之形成；而此職業結構變遷又反映出從農到工，再到服務業的快速產業結構變遷：由於農林漁牧獵人員縮減與勞動工人擴充，導致了大規模的從農到工的職業流動，勞動工人的家庭背景異質性很大，除了出身工人家庭之外，又有許多出身農家者，大多為第一代工人；在專技、管理、佐理人員擴充下，勞動工人又有許多向上流動成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的機會（不論是代內或代間流動），近年由於服務業之擴充，更提供了許多工作生涯上的代內向上流動而成為買賣服務工作人員之機會；在此快速結構變遷下，勞動工人的家庭背景異質性很大，向上流動的機會又多，有礙於勞動工人階級之形成。

相對而言，最上層的專技、管理、佐理人員擴充，吸收了不少其他家庭背景者，背景的異質性不利於階級之形成，然而他們在工作生涯上，一旦進了那裡就能守在那裡，在那裡內廣結人際網絡，不論是友誼或婚姻，大都以同階層者為對象，而顯現出高度的階層（級）之封閉性，再加上工作生涯的穩定性，也就很類似 Goldthorpe (1980) 所分析的英國之服務階級，而有助於“士”階級之形成。至於買賣服

務工作人員，不論是代內或代間流動，都有許多流動機會，特別是向上流動成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背景與網絡的階層異質性又都很大，很類似 Goldthorpe 所分析的英國之中間階級，可說是最開放的階層，大大不利於“裔”階級之形成。

再就農林漁牧獵人員而言，由於農林漁牧獵人員大幅縮減與專技、管理、佐理人員，勞動工人擴充，導致了大規模的從農到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與勞動工人的代間向上流動，很可能出身農家的優秀及叛逆者大都已流出，剩下來的多無“對立”的觀念，這不利於農民階級之形成（許嘉猷，1990:17）；然而，隨著農林漁牧獵人員大幅縮減與農地取得不易（謝雨生與余淑誼，1990），從其他的階層流動成農民的機會就很小，而農民絕大多數出身於農家，很可能大都是好幾代之農民，他們的好友，配偶亦絕大多數是農民，這些好幾代的工人在工作生涯中又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背景同質、網絡同質，加上工作生涯缺乏流動，實很類似 Goldthorpe 所分析的英國工人，而有利於農民階級之形成，這很可能與一九八〇年代末期的台灣農民運動之發展（蕭新煌，1990）有所關連。不過若依許嘉猷（1990:18-19），台灣的小自耕農之保守心態，卻又有沖淡農民階級意識的作用。

在以上根據百分比流出、流入表、網絡表探討階級形成之問題後，接著根據本研究的準對稱模型（Quasi-Symmetry Model）分析流動表、網絡表，剔除結構效應後，所呈顯之所謂的“相對機會或真正的階級（層）結構”作探討。在台灣地區，不論是職業流動或各職業間的親密網絡（友誼或婚姻）都呈顯出 Goodman（1984）的 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Model 之全盤距離效應：階層間的層級距離越大，流動及交往，婚姻的相對機會越小；此全盤距離效應所不能呈顯的主要是表上對角線各格的高度不流動，以及同階層內交往、通婚的封閉性，這特別是農民之高度封閉性。

至於此“相對機會或真正的階級（層）結構”所涉及的階級界限

之問題，綜合所有流動表、網絡表的相對機會之分析，很明顯地，同屬高階的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與買賣服務人員間流動或交往、通婚的相對機會均大於 1，不流動或同階層內交往、通婚之相對機會亦均大於 1；同屬低階的工農間之流動或交往、通婚相對機會均大於 1，不流動或同階層內交往、通婚之相對機會亦均大於 1；反之，上、下層間的相對機會均小於 1，很明顯地呈現出一個流動或網絡的界限，這通常稱為階級界限，位於工人與買賣服務人員之間，跨界限的相對機會小於 1，界限內的相對機會大於 1。

在上述所有的流動表、網絡表所顯示的“階級界限”中，又以從初職到現職的流動界限，最難跨越，這可歸因於：

1. 台灣的勞力市場重視學歷，以工、農為初職者教育程度較低（表略），由於學歷不足，也就難以跨越階級界限，而以教育程度普遍較高，較重學歷的專技管理佐理或買賣服務工作（特別是前者）為現職。

2. 以工、農為初職者在工作經驗或訓練上所得到的特殊技能，即特殊人力資本，不容易轉換成專技管理佐理或買賣服務工作所須要的特殊技能（依 Stier and Grusky, 1990）。

參考書目

方孝鼎

- 1991 工會運動與工廠政權之轉型，東海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孫清山

- 1992 社會資源、文化資本與地位取得過程之變遷，國科會研究計劃。

許嘉猷

- 1982 “出身與成就：台灣地區的實證研究”，陳昭南、江玉龍、陳寬政主編，社會科學整合論文集。頁 265-299，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1986 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台北：三民書局。

- 1989 “台灣代間社會流動初探：流動表之分析”，伊慶春、朱瑞玲主編，台灣社會現象的分析，頁 517-599，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1990 “台灣的階級流動及其與美國的一些比較，” 中國社會學刊十四期，頁 1-30。

夏林清

- 1989 “一個自主工會抗爭歷程的案例調查報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二期。

陳玉璽

- 1992 台灣的依附型發展，台北：人間出版社。

熊瑞梅

- 1991 社會資源與社會流動、居住流動，國科會研究計劃。

熊瑞梅和黃毅志

- 1992 “社會資源與小資本階級” 中國社會學刊，第十六期，頁 107-138。

蕭新煌

- 1990 “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台灣的農民運動：事實與解釋”，中研院民族所集刊，第七十期，頁 67-94。

謝雨生和余淑誼

- 1990 “台灣的社會階級結構及其流動” 中國社會學刊，第十四期：頁 31-63。

謝國雄

- 1989 “黑手變頭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2): 11-54。

- 1992 “立業基及其活化——台灣小企業創業及立業過程之研究”，企業組織、社會關係與文化慣行：華人社會的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

瞿海源

- 1991 “階級與階級意識” 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 (八十年二月定期調查報告)。頁 25-35, 台北: 中研院中山人文社科所。
- 1992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計畫: 第二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Bearman, P.S. and G. Deane

- 1992 “The Structure of Opportunity: Middle-Class Mobility in Englan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1):30-66.

Blau, P.M.

- 1977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Blau, P.M. and O.D. Duncan

-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Chen, Kuan-Jeng, Yung-Mei Tsai, and Edward Jow-Ching Tu

- 1992 “Structural Mobility in Post War Taiwan.” Unpublished.

Dahrendorf, R.

- 1959 *Class and Class-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uncan, O. D.

- 1979 “How Destination Depends on Origin in the Occupational Mobility Tabl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4):793-803.

Featherman, David L. and Robert M. Hauser

-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iddens, A.

-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New York: Harper & Row.

Goldthorpe, J.H., Catriona Llewellyn, and Clive Payne

- 1980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irst edition. (1987) Second edition.

Goodman, L.A.

- 1984 *The Analysis of Cross-Classified Data Having Ordered Catego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uest, A.M., N.S. Landale, and J.C. Mccann

- 1989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United States,” *Social Forces* 68(2):351-378.

Hout, M.

- 1983 *Mobility Tables*, Sage University Papers 31.
- 1988 "More Universalism, Less Structural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6):1358-1400.
- Landale, N.S. and A.M. Guest
- 1990 "Generation, Ethnicity and Occupational Opportunity in Late 19th Century America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280-296.
- Lenski, Gerhard E.
- 1966 *Power and Privilege*, New York: McGraw-Hill.
- Lin, Nan
- 1986 "Social Resources and Social Mobility: A Structural Theory of Status Attainment," chapter in Ronald L. Breiger, ed.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sden, P.V.
- 1988 "Homogeneity in Confiding Relations," *Social Network* 10:57-76.
- Parkin, F.
-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New York: Columbia.
- Sobel, M.E.
- 1983 "Structural Mobility, Circulation Mobility and the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A Conceptual Mismat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721-727.
- Sobel, M.E., M. Hout and O.D. Duncan
- 1985 "Exchange, Structure and Symmetry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59-372.
- Steinmetz, George and E. O. Wright
- 1989 "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Petty Bourgeoisie: Changing Patterns of Self-Employment in the Postwar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5):973-1018.
- Stier and Grusky
- 1990 "A Overlapping Persistence Model of Career Mob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736-756.
- Weber, Max
-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right, E.O.
- 1979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New York: Aca-

demic Press.

- 1994 "The Middle Class in Marxist and Weberian Class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st Asian Middle Class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Wright, E.O. and D. Cho

- 1992 "The Relative Permeability of Class Boundaries to Cross-Class Friend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85-102.

Persistence and Erosion of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apit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Taiwan*

Nan Lin**

Abstract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fers refined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As the survival, indeed, the ability of organizations to thrive is seen as dependent, to a significant extent, on their performance of rituals and rules consistent with those prevailing in society, mobility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individuals mobilize technical,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skills and offer such skills to recruiting organizations. Critical in this analysis is how individuals mobilize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and turn them into cultural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capital. These forms of capital complement human capital in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attaining better positions and returns in the hierarchies of societal inequality.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presumably dominant institutions in Taiwan: (1) the Nationalist Party (the KMT), and (2) the clan groups (i.e., the minnan, hakka, and dalu groups). Using the 1992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Questionnaire #1), I designed a series of analyses which show that the dominance

* An earlier version wa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Academia Sinica, Taiwan, June, 1995. The work was in part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I am grateful to three anonymous reviewers whose comments were very helpful and constructive.

** Duke University

of these two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social mobility is more a myth than a reality. Once the center of control for the agricultural-nonagricultural division, clan identification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becoming a KMT member, gaining authority positions, or getting better wages. The KMT's slight coupling with authority positions several decades ago has completely disappeared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Instead, the career route of mobility through the commerce sector and self-employment has emerged as a potentially powerful institution providing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the more traditional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al authority and supervision) route for economic gains. The most disturbing finding is that whil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n the acquisition of human capital (education) may be waning, it is strong, persistent, and pervasive for acquiring institutional capital (becoming KMT members, gaining supervisory positions, and having decision-making power) and earning economic returns. Recent gains i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renas have had little impact on this bias. Forceful social and policy actions may be required to uproot this powerfully embedded cultural and social institution.

制度資本與文化資本的消長： 台灣社會階層化和社會流動的分析

林 南

摘 要

文化與制度分析有助於對社會階層化和流動更深入的瞭解。社會組織的存在和運作，有賴於其是否能與當前社會被接受及尊奉的文化、制度規則、和儀式結合一致。與此同時，社會組織也會尋求通曉且有能力執行這些規則與儀式的人才。因此，從社會流動的角度來看，就應探討哪些人能取得這些文化與制度資源，並從而將這些資源轉換成制度資本與文化資本。制度和文化資本，配合人力資本，將更有助於理解社會階層中的地位取得和報酬模式。本文基本預設過去台灣四十年來的主導制度為，(1)國民黨體制，和(2)族群(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以1992年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為資料分析來源，發現當控制農民與非農民的身份差異之後，族群對教育、國民黨員身份、職權、和工資等的影響並不顯著。國民黨員身份在數十年前多少與權威位置有所結合，但其影響已淡化消逝。同時商業部門和自雇身份卻成為事業流動過程的具潛力的主要機制，是更傳統的機構組織（組織權威和督導地位）之外的富於活力的途徑。值得注意的發現是女性被歧視的情形持續不變。近年來台灣經濟、社會、政治的巨變，並未對女性在各種制度資本的取得與報酬不平等有所改善，似乎必須仰賴強有力的社會與政策行動才能改變這個根深蒂固的社會文化制度。

Persistence and Erosion of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apit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Taiwan

The prevailing "western" model of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s nicely captured in the work of Blau and Duncan (1967) in which socioeconomic attainment is perceived as a return to investment of one's ascribed and achieved resources. The major indicator of achieved resource is education and the ascribed resources are usually reflected in parental statuses.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shown that, relatively speaking, achieved resource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ascribed statuses, thus suggesting that the social mobility process, as reflected in the attainment process, is a functional model, in that the best qualified candidates are recruited and rewarded by society. Further extension of this theory was developed by Treiman (1970) who postulated that as a society becomes more industrialized or developed, its functional fit in the attainment process should also increase. That is, industri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demands furth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differential recruitment and return for better trained workers, thus increasing the strength of link, say,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es and weakening the inheritance factor—the link between parental resources and achievement. For the past decade or so, the theory is further reinforced by the adoption by more and more sociologists doing work in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of the neo-classical labor economy theory. Consistent with the sociologists' 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 the human capital theory, as advocated by Schultz (1961) and Becker (1964/1993), argues that individual investment in technical

skills, competence and knowledge generates economic returns. Operationally, such competence and knowledge is largely reflected in education and on-the-job training. Theoretically, it is the functional theory as applied to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by sociologists Davis and Moore (1945), or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s the economists prefer to call it.

While the human capital theory continues to gather momentum in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research, other sociologists have questioned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model, by pointing out that the model as specified by Blau and Duncan is individualistic in characterization. It only singles ou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tor, withou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tructural context within which such actions take place or are constrained. Three directions have been offered to bring the structural elements back into the study.

In one direction, the "new structuralism" (Baron and Bielby 1980) proposes that segmentation in the economy, industry, organization and the firm imposes variations in the return of individual investment. In the typical model, a class structure is theorized in which the core segment, having advantages in the economies of scale, size, monopoly, and complexity of organization, offers an opportunity structure for the recruitment of more "qualified" candidates, for more on-the-job training, and for greater internal mobility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an internal labor market. The peripheral segment, on the other hand, lacks such resources and internal labor market and becomes the destination of the disadvantaged subpopulations who are deprived of differential returns within the segment.

Another direction postulates that social networks and embedded resources may account significantly for mobility and attainment (Lin, 1982, 1995b; forthcoming). Certain individuals are more likely to access and use certain social connections and ties whose rich resources allow them to exert influence on the seekers' behalf to

attain better socioeconomic positions. Access to and use of such social resources are further hypothesized to be conditioned by the positional advantage of the connections (the strength of position hypothesis) or by the strength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eekers and their connections (the strength of tie hypothesis; see the original argument in Granovetter 1973). The social resources theory has to a large extent received empirical support in North American (Lin, Ensel and Vaughn 1981; Marsden and Hurlbert, 1988), Western Europe (De Graaf and Flap, 1988), and Asia (Sun and Hsung, 1988; Hsung and Hwang 1992B; Bian forthcoming).

A third direction, the focus of the present study, considers the influences o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behaviors of both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Both o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es concern "the rules of the game" in society and argue that these rules dictate at least in part how organizations adapt to these rules and recruit workers who know how to perform these rules and how individuals, likewise, learn these rules and invest in the acquisition of "capital" to advance careers in the organizations. In a series of papers I have explicated institutional capital (Lin 1994, 1995c) and applied this perspective to study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Lin 1994; Lin and Chen 1994; Lin, Yi, Chang and Tsai 1995). The next two sections recount the notions o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s and how they are used as capital.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Recently, scholars in several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e.g., anthropology,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have focused on the "rules of the game" in society. Two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rgue for their significance: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and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Bourdieu (1977, 1990; 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 has convincingly argued that reproduction of dominant values in society occupies a central concern for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where the

values (i.e., rules and practices) of the dominant or prevailing class are transmitted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ose who learn well (or "misrecognize" them as their own) are thus rewarded with better positions and pays in subsequent participation in the labor force. Culture, thus, represents the rules of the game set down by the dominant class to be transmitted and reproduced through various pedagogic means such as schooling. Cultural capital, then, is the individual investment of effort in the acquisition of symbols and credentials reflecting the dominant values in the society.

The institutional argument also focuses on the learning and use of the rules of the game (North 1990, p.3), but differs from the cultural capital argument in two important respects. First, it does not presuppose a class-initiated premise. How certain rules or institutions come into existence and assume dominant positions in a society take varied paths (Zucker 1988a; North 1990). They may result from wars, revolutions, rebellions, colonization, occupation, disasters, acts of charismatic and authoritarian leaders, dominant class interests, or post facto rationality. To a large extent, they may be the result of historical path dependence, rather than rational plans (see David, 1985 fo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QWERTY keyboard). These rules render favored values for actions and interactions in the forms of morality, faith, ideology, decency, or capability (of healing and performing).

Secondly,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focuses on how organizations adapt to these prevailing rules and rituals in society.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hypothesize that organizations belonging to an "organizational field" become institutionally isomorphic in that their forms and practices become homogenous because of increased sharing of interactions, information, and awareness of involvement in a common enterprise. Indeed,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institutions, as implemented in the legal system, the state, uncertain and imperfect markets, and as general social and cultural rules and rituals, not only

dictate how organizations act and react, but often whether or not they survive (Meyer and Rowan 1977; Collins 1979;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DiMaggio and Powell 1991; Scott and Meyer 1994).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has important consequences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Organizations, because of their striving for isomorphism with the prevailing institutions in the society, need to recruit and retain workers capable of performing tasks consistent with the expectations of such rules. Just as importantly, workers with acknowledged capability to perform such rules constitute institutional assets for the organization. Having workers of certain attributes or memberships to institutions valuable in the society (e.g., religious, political, ethnic, gender, or class) legitimizes and increases the status of the organization.

Institutions, then, are the regime or apparatus to implement the rules and practices, in 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 relative to the valued resources (see Sewell 1995 for a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tructure as rules and resources). Consistent with and parallel to the notions of human capital and cultural capital, institutional capital can be defined and understood as the individual investment of effort in the acquisition of operating roles, in the organizational setting, relative to the prevailing institutions.

Thus, both cultural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ism share the sam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social activities. Historically, they have been applied to different spheres of social life: cultural capital tends to be applied to schooling, training, appreciation of arts and music, and lifestyles (DiMaggio 1991), and institutionalism to organizations. The cultural-institutional theoretic correspondence and differential epistemological domains will be maintained in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in the context of mobility and work attainment, cultural capital is implicated in the investment in socially relevant values and practices, as through parental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or group or class identifications. Institution capi-

tal concerns the investment in such values and practices through organizational affilia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roles.¹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use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1992) data to illustrate the utility of this cultural-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o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Taiwan. The paper will use contemporary Taiwan as the societal context to describe (1) how education reflects investment of parental human resources and/or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and, thus, represents human capital and/or cultural capital, (2) how individuals further acquire institutional capital such as membership in the dominant party (KMT) and authority or power position in organizations, and (3) how these and other factors generate economic returns (wages). Furthermore, by examining trends for different age groups, it hopes to detect any effects of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taking place since the mid-1980s may have had on these processes.

The effort represents a limited analysis as it is constrained by the cross-sectional nature of the data, the restricted range of variables, and the still evolv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mitted in the analysis, for example, will be measures and analysis of social resources (for studies on social resource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ese societies, see Hsung and Sun 1988; Lin and Bian 1991; Hsung and Hwang 1992b; Hwang 1994; Bian 1994b; Bian 1995; Lin 1995a; Bain forthcoming). Nevertheless, it hopes to illustrate the utility of the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mobility. A parallel study on three

1 For a discussion on capital as investment of resources in a purposive action and on the various forms of capital (e.g., human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see Lin (forthcoming), and also T. Schultz (1961); Becker (1964/1993); Bourdieu (1980; 1986), Coleman (1990) and P. Schultz (1995). For a comparison of this "neo-capital" theory with the classical capital theory of Marx, see Lin (forthcoming).

major urban China cities (Beijing, Tianjin, and Shanghai) has also been conducted and reported elsewhere (Lin 1994).

Cultural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Capital in Taiwan

The question, then, is what constitutes as the major forms of cultural institutional capital in Taiwan. I argue that, until recently, they may have included: **KMT membership, authority or power positions, and clan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first two as institutional capital and the last one as cultural capital. The Nationalist Party (KMT) has been the dominant political regime since 1945, when Taiwan was reverted to the Chinese rul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ts dominance over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pheres in Taiwan was further reinforced whe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retreated to Taiwan in 1949, bringing with it the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machineries. The KMT dominance finally eased under Chiang Ching-Kuo's rule and began to erode significantly with the passing of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ise of opposition parties, especially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in the mid-1980s. Under the KMT regime, important milita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wer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Party and its members presumably held authority positions in these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Party membership reflected, therefore, acquisition and conviction in the dominant rules of the game, as dictated by the KMT. It was a critical institutional capital for career advances, especially in the public and government sector.

Consistent with this political regime, positions of authority in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were considered as institutional roles in that holders were expected to perform in line with the prevailing values and rules and execute decisions in reinforcing the regime. There is, therefore, an expected synergy between KMT apparatus and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through bureaucratic cadre. The co-coupling of these two institutions—party apparatus and organ-

izational control—should be central to preserve prevailing values and rules. Holders of these bureaucratic positions were, in turn, rewarded for such performances. It is in this sense, authority positions can be conceived as institutional capital, because they afforded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occupants to advance their careers and earn better economic returns.

Clan identification, being a member of the minnan (southern Fujian), dalu (the “mainlanders”, mainly those who arrived in Taiwan since 1945), or hakka (the “guest residents” from southern Guangdong and Fujian), represents 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demarcation. It not only distinguishes linguistic differences, but, more deeply, cultural and social affinities. These distinctions are reflected in religious practices, marriage patterns, and preferences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associations and networks. Having a particular clan identity guides rules,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used in individual, inter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In these senses, clan identification is clearly a cultural capital. The prevailing argument is that during the KMT regime, dalu was clearly favored over minnan and hakka as the dalu individuals, most of them retreated to Taiwan with the KMT in the late 1940s, presumably were more culturally and institutionally in step with the dominant values and rules.

In summary, for Taiwan and up to the mid-1980s, one major cultural capital was clan identification and two of the major institutional capital were KMT memb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authority.

Given these considerations, social mobility can be seen as a process by which individuals acquire various forms of capital which, in turn, generate better returns in the organizational and economic hierarchies of inequality. This process begins with the intergenerational proces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parents mobilize their human,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opportunity for their children to acquire better education. Thu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reflects investment in both human capital

and cultural capital, because of such parental resources. Note here that investment of both parental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is represented as cultural capital in education, following the earlier argument of the symbiotic nature o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case of Taiwan, then, the human capital theory would predict tha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s very much influenced by parental education and parental professional occupations.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arguments would predict tha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s very much influenced by parental clan identifications, their authority positions, and memberships in KMT (this last variable not available in the 1992 Survey). Tsai and Chiu (1993) found, for example, that the dalu residents had an advantage over the Taiwanese (minnan, hakka, and the native) in the likelihood of attaining middle-and high-school education. However, the clan effect disappeared for education beyond high-school. These analyses also found that father's occupation, father's education, and more urbanized residenc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ese findings, therefore,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argument of the mixed nature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reflecting effects of cultural (clan identification) and human capital (father's education), although no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s, unfortunately, do not provide analytic ways to tease out these two components (parental human resources and their cultural/institutional resources) in schooling or education, as both approaches claim that the schooling process (e.g., years of schooling and grades attained) and the credentials conferred are valid indicators of each. One possible approach to begin the sorting is to explore the extent to which educational attainment can be explained by parental resources. If the human capital argument is valid, the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hould in part reflect the investment of parental human resources such as thei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statuses.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cultural capital

argument is vali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hould reflect the investment of parental cultural or resources. If one could discern these resources and capital, it might then be possible at least to estimate the extent to which educational attainment represents investments of parental human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We shall make such an attempt in the study to be described below.

Education, along with parental resources, should then promote the opportunity to acquire additional capital. In Taiwan, the prediction is that these factors would affect the likelihood of becoming a KMT member (an institutional capital) and entering certain types of work organizations and occupations. Entering some of the organizations and occupations may be more influenced by human capital (e.g., becoming administrators or supervisors). Returns to these capital investments should be reflected in hierarchies of inequality, for occupations, decision-making power and economic rewards. Tsai (1988) showe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education there is little difference in occupational prestige between clan groups. From th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deliberated earlier, our expectation is, instead, that clan identification ought to be more closely linked to becoming KMT members and gaining authority positions—the two main institutional apparati. Thus, for this paper, we will focus on decision-making power and economic rewards.

Typically, decision-making power refers to participation to major decision-making embedded in occupational positions in an organization and, thus, to the control and use of valuable resources in the organization—a bureaucratic approach to power. In Taiwan, however, an alternative route to gaining power through bureaucratic channels may have emerged. The commerce sector offers the opportunity to gain status and wealth, and,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and self-employment, to gain power through autonomy. Sheu (1989) foun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age and gender, minnan and hakka residents were more likely than dalu residents in joining the mer-

chant class and petite bourgeois, while the dalu residents were relatively more likely to acquire managerial positions, especially in the public sector. Recent studies (Sheu 1994; Hwang 1994) also confirmed these differences. The linkage between clan identifica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versus entrepreneurial routes is not a firm conclusion, however. Hwang (1994) foun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father's class, and the respondents' age, birthplace (rural-urban) and education, the effect of clan identification on clan differentiation became insignificant. Nevertheless, the fact remains that bureaucratic and entrepreneuring, including self-employment (Hsieh 1989), routes may provide alternative channels for mobility in Taiwan and whether it is tied to cultural or institutional capital deserves further research attention.

Economic rewards, of course, promote the general well-being of the individual. Typically, they are tied to human capital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ositions. In Taiwan, Hsung and Hwang (1992a) found that petite bourgeois, through their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resources, also attained better economic returns. There is no clear evidence that clan identification has any significant impact, however.

These discussions outline the basic analytic plan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mobility in Taiwan as reflected in the 1992 Social Survey data. Such static projections need be further refined to reflect historical change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Taiwan, especially during the decade preceding 1992 survey.

Trends in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Since 1980s, because of the loosening grip of the KMT ove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pheres, would the "prevailing" values and rules also have eroded in influence? Can these erosions be detected in mobility patterns? If this is the case, we should uncover some trends in which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hould become less reflective, say,

of parental KMT membership, and more indicative of parental education. Likewise,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explore the trends regarding the effects of clan identification; for example, how KMT and clan identification might have eroded their effects on organizational authority and on economic returns.

Also relevant here is the demarcation of the public/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sectors.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is that perhaps due t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innan and hakka in the public sector, these clans, especially the minnan, have resorted to the private sector, especially the self-employment path (Sheu 1989), to generate economic gains. Through local, familial, and clan networks (Hsieh 1989), self-employment allows easier acquisition of resources, more flexible organization, cheaper and more informal labor practices, and freer exchanges in the market place, leading to greater autonomy and economic gains. Such autonomy should be reflected in decision-making power,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y might be excluded from authority positions in organizations. Thus, returns to authority and wage may evoke two quite different paths: through the public/government sector and authority positioning in that sector, and through the private and self-employment route and autonomy in gaining wealth. As the KMT erodes its hold on the public/government sector, would recent trends reflect the further significance of the self-employment route and decision-making power and the further decline of the public/government route and authority positions in organizations in wage returns? Furthermore, are the alternative routes dictated by clan identifications?

Two other major factors will also be accounted for in analysis. The agriculture versus non-agriculture contrast deserves some attention. As Taiwan moves from a largely agricultural society some five decades ago to one of the thriving non-agricultural economy of today, employment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might reflect disadvantages in human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capital.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historical reasons, those remaining in agriculture are largely minnan and hakka residents, who for generations have tilled the land. It is important to take into account this possible association and their respective effects (clan identification and agricultural sector) on wage returns.

Finally, gender will be examined as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in social mobility. Gender differentiation in mobility seems universal, transcending political economies. Yet, conceptually, it is unclear how each society implements this discrimination. Does it deprive females of the opportunity to acquire human capital, for example, better education? Or does it, instead, suppress their opportunities to acquire institutional capital; for example, acquiring party membership and authority positions? Or, does it use both strategies? We will attempt to assess gender effects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KMT membership, authority positions, decision-making role, and wage returns, and, hopefully, shed light on these issues.

Data, Measures and Model

Using the 1992 Social Change Survey, I designed a series of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parental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ccount for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2) What parental and individual factors account for becoming a KMT member? (3) What factors account for a higher supervision position in an organization? (4) What factors account for gaining decision-making power? And (5) What factors determine wage attainment? In the following, I will describe the formulation of each analysis and the specific measures devised and used. Only those who were employed at the time of the survey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maximally 1741 of the 2377 respondents in the sample).

1.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 ordinary least-squaring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with these independent variables:

(1) age

(2) sex (female)

(3) clan identification. For this variable, I first identified the clan identification (minnan, hakka, and dalu) for each parent and then constructed three dummy variables: father or mother being minnan, father or mother being hakka, and father and mother being dalu. In subsequent analysis, I eliminated hakka as a clan identification category, as it did not show much effects on all the major dependent variables examine.²

(4) father's characteristic. These include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Except father's education, all measures pertain to the father's job when the respondent was 15 years old.

(A) father's education

(B) father's industry: in agriculture/forestry, in manufacturing, in commerce, and in public service. Each is a dummy variable.

(C) father's occupational position: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or, and supervisor. Each is a dummy variable. The agricultural occupation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being in the agriculture/

² The correlations among the clan variables are (where f stands for father and m stands for mother):

	f or m-minnan	f or m-dalu	f-minnan	m-minnan	f-dalu
f or m-dalu	-.39				
f-minnan	.80	-.65			
m-minnan	.96	-.38	.76		
f-dalu	-.39	.99	-.66	-.37	
m-dalu	-.54	.67	-.42	-.53	.66

Since father or mother's clan identifications strongly correlate with either father's or mother's clan identification alone, the decision is to use father or mother's clan as the combined clan identifi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father or mother's minnan and father or mother's dalu identifications are negatively but only moderately correlated (-.39) due to a moderate percent of mixed marriages (especially between dalu fathers and minnan mothers); thus, both these variables are retained in the analysis.

forestry industry (zero-order correlation of .98) and not used in the analysis.³

(D) father's employment: for self or for others. Because the two variables were high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zero-order correlation of $-.75$), only self-employment was retained in the analyses.

(E) father's employment sector: in the public or in the private sector. Eliminated is the household sector.⁴

Mother's characteristics were also considered. However, they yielded similar, but somewhat weaker effects. Incorporating both father's and mother's characteristics resulted in multicollinearity and biased estimates. Thus, the decision was to use father's characteristics only. They should be conceived as indicators of parental rather than merely father's characteristics.

2. **Becoming a KMT member.** A maximum-likelihood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performed for KMT membership, a dummy variable, and included all the variables in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quation along with education. Odds ratios were estimated. When the odds ratio is greater than 1.00, it reflects a positive association; and when the odds ratio is less than 1.00, a negative association. Also consid-

3 Regression using father's agricultural occupation instead of father in the agriculture industry yields similar results as shown in Table 1, with the magnitude of coefficients of father in an agricultural occupation resembling those of father in the agriculture industry.

4 For the respondents themselves, the correlations among employed by self, employed by others (not shown), public sector (.63) and private sector (.60) are:

	Employed by self	employed by others	public sector
employed by others	-.75		
public sector	-.47	.63	
private sector	-.46	.60	-.22

These associations suggest that employment by self or others is essentially a dichotomy, so employment by others is eliminated from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other hand, job in public or private sector are somewhat negatively correlated ($-.22$), but not a dichotomy (the other choices include household work, for example). Thus, both of these variables are retained in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ered were the respondent's first-job characteristics as potential predictors of becoming a KMT member. However, since no information on when each respondent became a KMT member was available in the survey, the decision was to exclude the first-job characteristics and eliminate the risk of cause-effect confounding.

3. **Levels of supervision.** The measure was developed by combining two questions in the survey: (1) does your current job include supervising other? And (2) among those you supervised, are there those who supervise still others? The resulting variable has three values: (0) supervising no one, (1) supervising others who do not supervise still others, and (2) supervising others, some of whom supervise still others. It is a crude measure of authority in the organizational hierarchy, indicating merely one or two or levels of hierarchy. Also considered was number of workers supervised. It wa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levels of supervision (.49) and eliminated for its potential multicollinearity effect.

Included in the ordinary least-squaring regression equation were age, sex, clan identification, education, and relevant current-job characteristics, similar to those for father's in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KMT member equations. Father's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were not included, for two reasons. First, it woul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substantially and, thus, the chances of multicollinearity. Indeed, preliminary analyses showed substantial inheritance effect—inter-generational correspondence of father's and individual's first or current job and sector characteristics. Furthermor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s will be shown, to a large extent captured parental effects.

Also, for this analysis, the public sector, due to its high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49$), showed multicollinearity effect and biased estimate. It was eliminated from the final analysis. For the same reason, public service industry, for its high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rofessional position (.43) and high negative correla-

tion with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37$), was also eliminated from the equation. Added to this equation were KMT membership and tenure (number of years in the current work organization).

4. **Decision-making power.** This variable is a dummy variable ("In your organization, do you participate in major decision-making?"). It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upervision levels ($.52$), but the overlap is not overwhelming (R^2 being $.27$), implying that those who are not in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s still may make major decisions. It may reflect the power of those in the self-employment or private sector. The maximum-likelihood logistic regression estimation included all those variable in the supervision levels equation, plus the levels of supervision itself.

5. **Wage attainment.** This variable is a measure with the current monthly wage, with 10 interval categories (from none, to less than \$10,000 NT, to more than \$100,000 NT). Because of the sufficient number of categories and sufficiently smooth distributions (all categories contained 25 or fewer percent of the respondents), ordinary least-squaring regression was used, treating it as an interval variable. Also considered was other monthly income or combined income. They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t patterns and were not pursued in this paper. The equation contained all variables from the decision-making power equation, plus the decision-making power itself.

6. **Age group analysis.** For each of the above analyses, further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for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order to detect temporal trends. The respondents were grouped into: (1) 50-59 years of age, (2) 40-49 years of age, (3) 30-39 years of age, and (4) 20-29 years of age. Eliminated were over 60 years old because of the limited sample size ($N=59$). It is possible to devise groups of respondents according to the time period when each first entered into the labor force. To do so,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combine two questions ("In what year did you first enter the labor force?" and "In

what year did you enter the current work organization?"), since those whose current work organization was their first as well did not provide response to the first question. There were some questionable combinations and the decision was to use the actual age groups. There is obvious some distortion for representing the time periods in which the respondents first entered the labor force, because of variations in years of schooling. However, because broad ten-year categories are used and most analyses control for tenure (number of years working for the current organization), these estimates should give reasonable approximations to the broad periods in which they entered into the labor force.

Education as Human and Cultural Capital

Presented in Table 1 are regression results for education. The first column shows the partial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both metric and standardized) for the entire sample. This equation, containing 15 independent variables, explains 43 percent of the variance in education. Of the 15 independent variables, 11 coefficient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5$). Because of the substantial sample size, some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are rather small, though significant, and should receive less attention for their importance. As can be see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younger age, being male, parents not being minnan, father's education, father not in the agriculture industry, but in manufacturing or commerce, father being an administrator or supervisor, and father in the public sector and not in the private sector. Among these factors, the most important ones (with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greater than .10) include age, gender and father's education. If father's education is seen as human resources, the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clearly represents an investment of parental human resources. Interestingly, the other potential human resources variable (father being a professional) was not important. However, cultural resources (parents

Table 1. Attainment of Education # (for employed workers only)

Independent Variabl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Metric (Standardized)					Age 20-29
	Total Sample	Age 50-59	Age 40-49	Age 30-39	Age 20-29	
Age	-.05(-.35)***	-.04(-.10)	-.08(-.15)***	-.07(-.15)***	.01 (.02)	
Sex(female)	-.45(-.15)***	-.77(-.28)***	-.80(-.26)***	-.36(-.13)***	-.06(-.03)	
Clan (father or mother)						
-minnan	-.29(-.08)***	.08 (.02)	-.43(-.11)*	-.39(-.11)**	.00 (.00)	
-dalu	-.05 (.01)	-.69(-.11)	.11 (.02)	.17 (.04)	.17 (.07)	
Father's characteristic education						
industry	.35 (.30)***	.54 (.42)***	.42 (.30)***	.34 (.31)***	.20 (.26)***	
-agriculture	-.26(-.09)**	-.06(-.02)	-.50(-.16)*	-.23(-.08)	-.15(-.06)	
-manufacturing	.22 (.05)*	.66 (.11)	-.03(-.00)	.09 (.02)	.28 (.10)*	
-commerce	.26 (.06)*	.52 (.11)	-.01(-.00)	.18 (.04)	.32 (.12)*	
-public service	.10 (.02)	-.12(-.02)	.45 (.10)	-.01(-.00)	.05 (.02)	
occupational positions						
-professional	.11 (.01)	-.51 (0.04)	.00(-.00)	.14 (.02)	.19 (.05)	
-administrator	.51 (.07)***	.08 (.01)	.66 (.08)	.73 (.11)	.29 (.07)	
-supervisor	.39 (.04)*	1.40 (.14)**	.38 (.04)	.51 (.07)	-.01(-.00)	
employment						
-for self	-.01(-.00)	.28 (.10)	-.00(-.00)	-.10(-.03)	.01 (.00)	
sector						
-public	.26 (.07)*	.65 (.14)*	-.01(-.10)	.19 (.06)	.30 (.12)	
-private	-.27(-.07)**	-.23(-.06)	-.43(-.10)	-.24(-.07)	-.16(-.07)	
Constant	4.70	4.39	6.82	5.67	2.62	
R ²	.43	.41	.41	.30	.21	
N	1688	234	355	563	449	

Ordinary least squaring. Maximal possible observations=1747.

*p < .05

**p < .01

***p < .001

being minnan) and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father being administrator or supervisor, or in the public rather than the private sector) also show their effects. Whereas having a father in agriculture and being a female are considered as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then both resources exert effect on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at is, education represents investment of both human and cultural/institutional resources.

The interesting question that can be raised is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decompose the effects into the human resources, the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components. Unfortunately, this cannot be done with precision. Since education may represent investment of all forms of resources, then parents' own education also represents investment of their families' investment of human,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We can only make some rough estimations. For this purpose, we construct a reduced-form regression containing the three groups of relevant variables: (1) human resources: father's education and father being a professional, (2) cultural resources: clan variables (parents being minnan or dalu), and (3)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father being an administrator, supervisor, in the public, but not in the private sector). This representation, again, is incomplete, since each form of resources should include many other indicators. For example, parental human resources should contain othe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raining, skills, and knowledge; cultural resources should contain parental value preferences and life styles; and parental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might contain their political party affiliations. Nevertheless, it is useful to conduct the exercise with the available indicators to demonstrate how methodologically it is possible to tackle this important issue. Presented in Table 2 are results of this exercise.

Equation 1 contains all three forms of resources and show an R^2 of .29, which shall serve as the reference variance to be shared by the three forms of resources. Equations 2 and 3 are regressions contain-

Table 2. Decomposition of Effects of Parental Human,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 (for employed workers only)

Independent Variable	1	2	3	4	5
Regression Coefficient Metric (Standardized) Equation fo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uman Resources					
Father's education	.50 (.42)***	.61 (.51)***			
Father being a professional	.08 (.01)	-.00(-.00)			
Cultural Resources					
Father or mother being minnan	-.17(-.05)*		-.28(-.07)**		
Father or mother being dalu	.12 (.03)		.59 (.14)***	-.28(-.07)**	.89 (.21)***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Father being an administrator	.65 (.09)***		1.14 (.16)***		1.15 (.16)***
Father being a supervisor	.31 (.03)		.67 (.08)***		.54 (.06)**
Father in the public sector	.39 (.10)***		.89 (.23)***		1.10 (.29)***
Father in the private sector	-.10(-.02)		-.02(-.01)		-.01(-.00)
Constant	1.93		2.39	2.58	2.21
R ²	.29	.26	.16	.06	.13
Percent of variance in Equation 1 explained		.90	.55		
Percent of variance in Equation 1 explained adjusted		.62	.38		
(Overlapped variance equally shared)					
Percent of variance in Equation 3 explained				.38	.81
Percent of variance in Equation 3 explained adjusted				.32	.68
(Overlapped variance equally shared)					
Percent of variance in Equation 1 explained adjusted		.38		.12	.26

Ordinary least squaring. Number of observations = 1688.

* $p < .05$

** $p < .01$

*** $p < .001$

ing human resources versus cultural/institutional resources respectively. The R^2 's are .26 and .16 and the sum of the two (.42) is larger than that for Equation 1 (.29) indicating the overlap between the two sets of variables in explaining the variance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eir absolute percentages relative to the R^2 for Equation 1 are .90 (.26/.29) and .55 (.16/.29) respectively. If we make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overlapped portion of the explained variance is equally attributable to both forms of resources, then we could sum the two R^2 's (.26+.16=.42) as the reference variance. This results in the adjusted percentages attributable to human resources (Equation 2) and cultural/institutional resources (Equation 3) of .62 (.26/.42) and .38 (.16/.42).

We can further decompose the contributions of parent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to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quation 4 and 5 show the further decomposed R^2 's to be .06 and .13 if only these two forms of resources are considered individually. Their absolute percentages, using the R^2 from Equation 3 as the base, are .38 (.06/.16) and .81 (.13/.16). And, again assuming equal share of overlapped variances, their adjusted percentages of contributions are .32 [.06/ (.06+.13)] and .68 [.13/ (.06+.13)].

Finally, we can estimate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parental human resources, cultural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to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o be .62, .12 and .26. These analyses lead to the following tentative conclusion: **the portion of parental investment affecting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children reflects about 60 percent from their human resources (education), 25 percent from their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work organizational affiliations and positions), and about 10 percent from their cultural resources (clan identifications).** This conclusion is very rough and tentative because certain critical and probably challengeable assumptions are made: (1) that the measures available are reasonable and inclusive indicators of each form of resources, (2) that all other

factors have similar association with each form of resources, (3) that overlapped variances represent equal contributions, and (4) that causal sequences among these factors (e.g., whether parental cultural resources precede or follow human resources in their effects) are ignored. Nevertheless, this decomposition exercise clearly demonstrates the utility of this analysis in future research to tease out the relative representation of various forms of capital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or the time being, we may propose that, everything else being equal, **education represents about 60 percent of human capital, and 40 percent cultural capital** (if we combine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contributions on the assumption mentioned earlier that both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are in fact culturally based).⁵ It is the parental education that made the most difference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ollowed by their work sector (in the public sector) and organizational positions, and least from their clan identifications (being *dalū* rather than *minnan*).

There are, however, other factors which also contribute to educational attainment. Returning to Table 1, the first column identifies that being older, being a female and father in agriculture are detrimental to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e age effect to a large extent reflects the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for younger individuals afforded by advance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ver time. The agriculture effect also reflects structural opportunities as the society has experienced dramatic urbanization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Gender bias, on the other, may or may not be affected by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 many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continue to show

5 These estimates are somewhat comparable to the estimates obtained in a 1991 study of three urban centers (Beijing, Tianjin, and Shanghai) in China. The most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were parental education, father's authority position and mother's party membership. The range of possible human resources effect was estimated between 50 to 80 percent of the explained variance. Thus, the same rough estimate of two thirds to one third split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capital in education seems to hold.

such bias. Thus, parental human and cultural capital, gender (being male) along with father's being in work sectors offering better mobility opportunities enhances the opportunity fo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ave there been changes of these patterns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as Taiwan has experienced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Table 1 presents further analyses for four age groups (50-59, 40-49, 30-39, and 20-29) to assess if any such changes have alter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factor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Gender bia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deed seems to have eased over the decades, and has become insignificant for the youngest age groups (29 years of age or younger). Clan identification (parents being minnan) was detrimental for the middle two age groups (49-30), but was no longer a significant factor for the youngest age group. The detrimental effect of the father being in agriculture has also eased up, although the negative tendency has remained. Positive effects of the father being an administrator or supervisor, moderate to begin with, have also vanished. The father being in the public rather than the private sector has continued to have slight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dividual'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ese changes, mostly easing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effects, are in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persistent effect of father's education. Its strong effect has also eased somewhat for the youngest age group, but it remains the dominant parental factor. However, any bold conclusion that the human capital element in education have overwhelmed its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element is tempered somewhat by the finding that the father being in the manufacturing or commerce sector has emerged as a positive factor contributing to education of the youngest group. In summary, then, there are clear signs of the eas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effects, such as clan identification and authority positions of parents,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ver the four decades. The ris-

ing middle class associated with the 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e sectors has signaled possible new forceful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replacing any advantage that the public service sector might have provided two decades ago (see its positive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 of .10 for the 40-49 group). Thus, the probable conclusion is that over the four decades, traditional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forces (e.g., gender, clan identification, and authority positions of parents) are being replaced by emerging institutional forces (the recent middle class in the 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e sectors), complementing the parental human resources (education) as significant contributing factors to individual'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Becoming a KMT Member and Gaining Powerful Positions

Once education is acquired, the individual enters into the labor force. Along the way, the person may acquire institutional capital in the forms of political party affili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authority positions. This section examines the processes leading to the acquisition of these capital. Party affiliation is seen as a potential institutional capital, because in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ystems, party members hold the key to keep the regime in power. That is, party members are the operatives to enforce prevailing values and rules. Party membership is often a pre-requisite to occupying supervisory and authority positions in organizations, whose roles again are to enforce prevailing values and practices. These characteristics ultimate serve as capital as they generate rewards and returns for the individual. A recent study in urban China (Lin 1994b) illustrates this linkage between being a Communist Party member and gaining authority positions in work units and between Party membership and/or being in authority positions and wage returns.

Table 3 show findings for becoming a KMT member. The first column, for the total sample, shows that the likelihood of becoming a

KMT member is associated with human capital (education), cultural capital (dalu parentage), and biases associated with the shifting economy (the father not in agriculture) and gender (being male). Trend analysis (the next four columns in Tables 3) shows the persistent effect of education. Clan identification has no discernable patterns, although dalu parentage shows a slight positive effect. Changes in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effects are more dramatic. The father being an administrator or supervisor has clearly decreasing effects over the decades. By the latest age group, their effects have turned negative, though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n the other, there are indications that the father being in the agricultural, manufacturing or commerce sector has reverted its earlier negative effect (especially for the 30-39 group) into a positive effect for the youngest age group. Likewise, the father being a professional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ts effect for the individual becoming a KMT member. Gender bias (in favor of males) has also shown persistence. If anything, the trend suggests that this bias might have actually increased among the youngest group.

In combinat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a changing KMT. From its earlier days when it relied on recruitment or joining of individuals with dalu authority-positioned parentage, being male, and better educated, it has now shown recruitment or joining of better educated males from parents with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from the emerging economic sectors of 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e, and from the rural regions. These dramatic changes have all taken place within the past decade, coinciding with the passing of the Chiang Ching-Kuo Era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Li Teng-Hui era. Whether these changes represent active policies on the part of the KMT to recruit in these emerging and well-to-do sectors or merely reflect members of these sectors now showing more interest in joining KMT remains unclear. What is clear is that the coupling of KMT membership with dalu parentage as well as authority positions, modest to begin

Table 3. Likelihood of Becoming a KMT Member # (for employed workers only)

Independent Variable	Odds Ratio (Z value)				
	Total Sample	Age 50-59	Age 40-49	Age 30-39	Age 20-29
Age	1.02 (2.95)**	1.06 (0.69)	1.09 (1.42)	1.02 (0.45)	1.00 (-0.8)
Sex(female)	.39(-6.66)***	.27(-2.14)	.59(-1.41)	.51(-2.96)**	.22(-5.49)***
Clan					
-minnan	.85(-0.96)	2.82 (1.32)	.67(-0.86)	.98(-0.06)	.83(-0.56)
-dalu	1.81 (3.03)**	2.67 (0.78)	.70(-0.53)	1.51 (1.24)	1.29 (0.77)
Father's characteristic					
education	.94(-0.92)	.91(-0.40)	.82(-1.18)	.97(-0.25)	1.05 (0.42)
industry					
-agriculture	.62(-2.38)**	1.18 (0.24)	.72(-0.57)	.35(-3.14)**	1.12 (0.27)
-manufacturing	.73(-1.33)	1.6 (1.45)	.95(-0.06)	.41(-2.36)**	1.11 (0.24)
-commerce	.86(-0.60)	3.18 (1.39)	.50(-0.99)	.24(-3.03)**	1.93 (1.47)
-public service	1.21 (0.77)	.24(-1.04)	2.99 (1.54)	1.04 (0.10)	1.42 (0.80)
occupational position					
-professional	1.56 (1.33)	1.53 (0.24)	.84(-0.17)	.51 (1.08)	4.64 (2.97)**
-administrator	1.01 (0.03)	19.65 (2.18)*	.91(-0.13)	.68(-0.75)	.81(-0.36)
-supervisor	1.37 (0.88)	11.23 (1.49)	1.22 (0.24)	1.03 (0.06)	.78(-0.34)
employment					
-for self	.79(-1.11)	.80(-0.34)	.75(-0.59)	1.02 (0.05)	.56(-1.39)
sector					
-public	.73(-1.22)	2.08 (0.78)	.23(-1.97)	.83(-0.45)	.81(-0.39)
-private	.72(-1.36)	1.50 (0.53)	.15(-2.21)	.85(-0.42)	.71(-0.77)
Education	1.71 (9.78)***	2.11 (4.09)***	2.37 (6.46)***	1.53 (4.67)***	1.65 (3.52)***
Pseudo R ²	.16	.28	.28	.13	.16
N	1688	234	355	563	449

Maximum-likelihood logistic estimation. When the odds ratio is greater than 1.00, it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hen the odds ratio is less than 1.00, it i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 $p < .05$

** $p < .01$

*** $p < .001$

with, has largely disappeared. Younger members of KMT tend to come from agricultural, manufacturing, commerce, or professional families, also a reversal of earlier trends when these were in fact disadvantaged groups (especially for the 40-49 and 30-39 groups). Are these new membership patterns improve or erode KMT as an institutional capital in generating better or worse returns?

Next, the analysis turns to holding supervisory positions. The measure, levels of supervision, admittedly crudely constructed out of available survey questions, is intended to assess positions in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Table 4 presents the results. For the total sample, higher level of supervision is highly related to being male and better educated. As expected, it is correlated with being an administrator or supervisor. Clan identification plays little roles in affecting gaining supervisory positions. Nor being a KMT member makes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at being a KMT member has not been coupled with authority positions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suggest that the reputed authoritarian structure based on the KMT control in Taiwan is more a myth than a reality. It may be true that the KMT had control over some major enterprises and had dominated governmental offices, such organizations have remained only a portion of the numerous work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large and small. Being a party member has never been an insurance to gain hierarchical positions. Likewise, the proliferation of organizations and firms and the relative small presence of individuals with dalu parentage, in combination, have offered no visible advantage to the latter in gaining clear-cut authority positions.

This interpretation receives some support from the finding that levels of supervision is highly related to being self-employed. This finding is revealing. Recent literature has shown that turning from a laborer or worker into an entrepreneur (Hsieh 1989) is a mobility trend in Taiwan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hus, gaining author-

Table 4. Regression for Levels of Supervision # (for employed workers only)

Independent Variabl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Metric (Standardized)				
	Total Sample	Age 50-59	Age 40-49	Age 30-39	Age 20-29
Age	-.00(-.03)	-.01(.02)	.01(.03)	.00(.01)	.01(.06)
Sex(female)	-.14(-.10)***	-.09(-.06)	-.14(-.10)*	-.16(-.12)**	-.08(-.07)
Clan (father or mother)					
-minnan	-.07(-.05)	-.04(-.03)	-.14(-.08)	-.06(-.03)	-.05(-.03)
-dalu	.03(.02)	.21(.08)	-.14(-.06)	.11(.05)	.11(.07)
Education	.08(.17)***	.21(.43)***	.05(.11)	.07(.15)**	.03(.04)
Current - job's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agriculture	-.19(-.06)*	-.09(-.04)	-.12(-.04)	-.35(-.08)*	-.12(-.01)
-manufacturing	.09(.06)*	.30(.20)**	.07(.04)	.13(.10)*	-.02(-.01)
-commerce	.09(.05)*	.27(.16)*	.23(.12)*	.03(.02)	.05(.03)
occupational positions					
-professional	-.07(-.03)	-.39(-.15)*	.04(.02)	-.08(-.04)	-.08(-.04)
-administrator	.92(.34)***	.74(.30)***	1.07(.43)***	.87(.34)***	.67(.18)***
-supervisor	.54(.18)***	.92(.24)***	.77(.25)***	.57(.19)***	.29(.11)*
employment					
-for self	.16(.10)***	-.10(-.07)	.04(.03)	.29(.19)***	.26(.14)*
sector					
-private	.06(.05)	-.04(-.03)	.11(.07)	.04(.03)	.10(.04)
KMT Member	.09(.06)*	.07(.05)	.23(.13)*	.07(.05)	.06(.08)
Tenure	.01(.13)***	.01(.14)*	.01(.18)	.01(.09)	.01(.08)
Constant	.18	-.42	-.14	.10	-.19
R ²	.27	.52	.39	.31	.11
N	1442	151	297	515	420

Ordinary least-squaring regression. * $p < .05$ ** $p < .01$ *** $p < .001$

1. Service industry is eliminated from the analysis, because of its high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rofessional positions (.43) and high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37).

2. The public sector is eliminated from the analysis, because of its high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49).

ity may take one of two routes. One route i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al hierarchy, as reflected in the effects of being an administrator or supervisor. Another route is apparently through becoming self-employed and gaining autonomy.

To explore this interpretation further, we conduct analysis for the measure, participating in major decision-making in the organization. This variable, unlike levels of supervision, is more indicative of power (control and use of resources) than of hierarchical authority. If the self-employment route is intended to gain autonomy, then, it should be even more highly related to this variable. Table 5 confirms this speculation. For the total sample, the likelihood of having decision-making power is highly related to being self-employed, as well as being an administrator or levels of supervis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ng self-employed and having decision-making power have increased over the years, and especially apparently for the 30-39 year-old group. Being in the manufacturing or commerce sector is also significant, and again especially for the 30-39 age group. Clan identification or KMT membership offers no distinctive advantage or disadvantage, once these other factors have been accounted for.

We may also summarize the gender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institutional capital variables—becoming KMT members, gaining supervisory positions, and participating in major decision-making. In gener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emales persists in each, most prominent in the likelihood of becoming a KMT member. If any, the discrimination has increased in the past decade. The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being female and levels of supervision also persists, although it is more apparent in the middle two age groups (30-39 and 40-49). This is expected, since supervisory positions become more important and differentiated during these age periods. Finally, there is also a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being female and having decision-making power, and it persists across age groups,

Table 5. Likelihood of Having Decision-Making Power # (for employed worker only)

Independent Variable	Total Sample	Odds Ratio (Z value)			
		Age 50-59	Age 40-49	Age 30-39	Age 20-29
Age	.99 (-0.84)	.82(-1.71)	1.10 (1.23)	.90(-2.30)*	.99(-0.22)
Sex (female)	.74 (-1.90)*	.83(-0.29)	.57(-1.20)	.66(-1.59)	.75(-1.01)
Clan (father or mother)					
-minnan	1.03 (0.16)	2.03 (0.83)	1.03 (0.06)	1.07 (0.21)	.96(-0.12)
-dalu	.76 (-1.21)	1.42 (0.26)	.87(-0.19)	.79(-0.62)	.94(-0.18)
education	1.32 (3.72)***	1.57 (1.50)	1.27 (1.12)	1.30 (2.23)*	1.05 (0.27)
Current-job's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agriculture	.29 (-2.56)**	.42(-0.81)	.36(-1.00)		xx
-manufacturing	1.85 (3.15)**	1.19 (0.21)	1.77 (0.94)	2.72 (3.10)**	1.6 (0.70)
-commerce	2.50 (4.35)***	1.06 (0.07)	2.55 (1.56)	3.97 (3.82)***	1.44 (1.00)
occupational position					
-professional	1.45 (1.49)	.181 (0.51)	2.50 (1.25)	1.77 (1.35)	1.16 (0.32)
-administrator	9.85 (4.41)***	xxx	xxx	10.10 (3.21)***	xxx
-supervisor	1.40 (1.05)	.36(-0.68)	2.60 (0.99)	1.79 (1.07)	1.14 (0.24)
levels of supervision	4.71 (12.49)***	7.92 (3.32)***	13.41 (6.61)***	3.18 (5.66)***	4.63 (7.1)***
employment					
-for self	6.51 (7.8)***	16.09 (2.93)***	5.23 (2.63)**	7.80 (5.40)***	6.03 (3.54)***
sector					
-private	.97 (-0.15)	.86(-0.16)	.73(-0.52)	.83(-0.52)	1.30 (0.69)
KMT Member	.89 (-0.62)	1.29 (0.34)	.46(-1.28)	.78(-0.81)	1.09 (0.26)
Tenure	1.02 (1.43)	1.01 (0.43)	.96(-1.65)	1.01 (0.72)	1.02 (0.48)
Pseudo R ²	.34	.38	.43	.34	.21
N	1442	139	270	504	405

Maximum-likelihood logistic estimation. When the odds ratio is greater than 1.00, it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hen the odds ratio is less than 1.00, it i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xx Agriculture was omitted because none of those in agriculture indicated participation in major decision-making.

xxx Administrator was omitted because none of those not as administrators indicated participation in major decision-making.

* $p < .05$ ** $p < .01$ *** $p < .001$

even though not reaching significant levels. Thus, we may conclude that while gender effects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ave waned for the younger age group, reflecting an equaling trend for acquiring human capital, such effects remain strong and persistent for acquiring institutional capital.

Wage Attainment

Finally, we analyze the wage attainment. This is probably the least reliable measure among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examined in this paper.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question contained categorical responses, only 6.3 percent of the respondents claimed to have made 50,000 yuan or more per month in 1992 and less than one percent (.9) admitted making 100,000 yuan or more. Such data can only provide general pictures and rough estimates of any pattern of relationships. Table 6 shows the results of these exploratory analyses.

As can be seen, in column 1 of Table 6, wage attainment is affected by being a male, having higher education, not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t higher supervisory level, being self-employed, and having the decision-making power. Being a professional does not have an advantage. Nor does having minnan or dalu parentage. Nor does being a KMT member. It again confirms the two routes of social mobility: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al hierarchy or gaining autonomy by becoming self-employed. And it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myth concerning clan identification and KMT power. None of these ever showed any significant impacts on wage returns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Further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s

Of course, the analyses and conclusions depend on available data from the 1992 Survey. There were no direct measures on family connections (although some alternate measures may be devised). Lacking were measures of organizational assets or resources, or

Table 6. Wage Attainment # (for employed workers only)

Independent Variabl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Metric (standardized)				
	Total Sample	Age 50-59	Age 40-49	Age 30-39	Age 20-29
Age	.01 (.05)	.03 (.03)	-.04 (-.05)	.02 (.03)	.12 (.19)***
Sex(female)	-.82(-.19)***	-.94(-.16)*	-.88(-.17)***	-.92(-.22)***	-.61(-.19)***
Clan (father or mother)					
-minnan	.09 (.02)	-.30(-.04)	.27 (.05)	.26 (.05)	.11 (.03)
-dalu	.03 (.00)	-.76(-.07)	.41 (.05)	.35 (.06)	.03 (.01)
Education	.46 (.30)***	.55 (.28)**	.47 (.29)***	.43 (5.89)***	.19 (.11)*
Current-job's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agriculture	-1.44(-.13)***	-1.22(-.12)	-1.03(-.11)*	-1.57(-.11)**	-2.01(-.12)**
-manufacturing	-.21(-.04)	-.40(-.07)	.08 (.01)	-.24(-.06)	-.47(-.14)**
-commerce	.05 (.01)	-.10(-.01)	.22 (.03)	-.18(-.02)	.34 (.08)
occupational position					
-professional	.38 (.02)	.66 (.06)	.02 (.00)	.84 (.13)**	.17 (.04)
-administrator	.26 (.03)	.47 (.04)	.80 (.09)	-.17(-.02)	.02 (.00)
-supervisor	.10 (.01)	-1.76(-.11)	-.13(-.01)	.11 (.01)	.47 (.07)
levels of supervision	.52 (.16)***	.33 (.08)	.61 (.17)**	.55 (.17)***	.23 (.09)
employment					
-for self	.87 (.17)***	.44 (.08)	.77 (.14)*	.90 (.19)***	1.64 (.32)***
sector					
-private	.05 (.01)	.20 (.03)	-.06(-.01)	.07 (.02)	.44 (.13)**
decision-making power	.30 (.06)*	1.16 (.20)*	.16 (.03)	.33 (.08)	.03 (.01)
KMT Member	.01 (.00)	.46 (.07)	.64 (.11)	-.26(-.05)	.11 (.03)
Tenure	.01 (.05)	-.00(-.01)	.01 (.06)	.02 (.05)	.02 (.01)
Constant	3.29	2.48	5.50	3.04	.61
R ²	.33	.38	.39	.38	.29
N	1429	139	294	504	418

Ordinary least-squaring regressor.

xx Agriculture was omitted because none of those in agriculture indicated participation in major decision-making.

xxx Administrator was omitted because none of those not as administrators indicated participation in major decision-making.

* p < .05

** p < .01

*** p < .001

organizations' authority to exercise property rights. Effect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ere probably minimized because in 1992 it was still not fashionable to openly identify one's political ideologies (although I could have used the voting preferences available in the data set). However, some consistent patterns have emerged and certain inferences are in order.

Contrary to all the popular attention and concern about the dominance of KMT and clan identification in Taiwan,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hat they have played critical roles in the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patterns fo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fter other relevant variables are accounted for, KMT members have shown minimal edge in gaining authority positions, or economic returns. Clan identity, likewise, has not been a decisive factor in these processes. On the other hand, more critical are the rural-urban divide and gender inequality. These well-entrenched and powerful structural forces, exerting strong effects on differential acces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both human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capital. These capitals subsequently dictate socioeconomic returns.

Clearly we may applaud the easing o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influences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Both in terms of the amount of the influence from parental resources and specific parental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such as clan identification and authority positions, have shown decreasing contributions to individual's education. However, family background remains important. Of special interest is the emerging influence of families in the commerce sector. Children from these families are showing advantage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see Table 1). Individuals in the commerce sector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take the self-employment route to gain autonom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eing in the commerce sector and being self-employed is .28 and gets stronger as the individuals ag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variables for the 20-29, 30-39, 40-49, and 50-59 groups are: .11, .32, .33, and

.45 respectively). Self-employment offers an alternative route to organizational positions (i.e., supervisory positions) in gaining wage returns. Contrary to earlier findings by Sheu (1989), there are practically zero associations between clan identifications with either being in the commerce sector or becoming self-employed. And, there are only slight (in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self-employment or being in the commerce sector and KMT membership. Whether the commerce-self-employment will replace clan identification and KMT as the new powerful institution in Taiwan is too early to predict. But evidence does point toward that direction.

Nor has the 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run its course in Taiwan. The still increasing presence of opposition parties may ultimately re-fragment and realign clan identifications and set the stage for a transformed clan-based social institution. The 1992 Social Survey data does not allow any firm projections and the modest data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suggest such a realignment, while cannot be over-ruled, would be rather unlikely in the near future.

The persistence of gender bias is most alarming and disturbing. Gender effects seem to have waned in the last decade or two. In the study of urban China mentioned before, I did not find that gender was a significant factor fo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ither. I found that females were disadvantaged in gaining institutional capital such as becoming a Communist Party member or gaining authority positions. However, I also found some trends starting in the middle of 1980s when the effects of the institutions of gender, party, and high-ranking work units on wage return have begun to wane.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at least in the past ten to 15 years, there have been possible trends in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s on the mainland as far as such traditional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capital are concerned. In contrast, in Taiwan, females' disadvantage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dominant political party (e.g., KMT), in gaining organizational authority or decision-making power, and in gaining economic

returns continue unabated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Such disadvantage has not been subverted by recent educ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Taiwan. While males seem to have found the alternative route through commerce and self-employment to autonomy and wealth, such alternatives offer no evident better mobility outcomes for females. Therefore, one is forced to conclude that while gender discrimination for acquisition of human capital may be waning, it continues to be deeply rooted and embedded in culture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in Taiwan. Forceful social and policy actions may be required to overcome this major obstacle toward a society of truly equal opportunity.

References

- Baron, James N. and William T. Bielby.
1980 "Bringing the Firm Back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735-65.
- Becker, Gary S.
1964/1993 *Human Capita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ian, Yanjie.
1994 *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China: Getting a Job in a Web of Guanxi." In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edited by Barry Wellman. Boulder, CO: Westview.
Forthcoming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s, and Job Search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Blau, Peter M. and Otis Dudley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Y: John Wiley.
- Bourdieu, Pierre.
1972/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Le Capital Social: Notes Provisoires."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3:2-3.
1983/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Pp. 241-58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ohn G. Richards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1977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Culture*. Beverly Hills: Sage.
- Coleman, James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s, Randall.
1979 *The Credential Socie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David, Paul.
1985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332-37.
- Davis, Kingsley and Wilbert E. Moore.
1945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 242-49.
- De Graaf, Nan Dirk and Hendrik Derk Flap.
1988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Social Forces* 67(2):452-72.
- DiMaggio, Paul.
1991 "Social Structure, Institutions, and Cultural Goods: The Case of the

- United States." Pp. 133-55 in *Social Theory for a Changing Society*, edited by Pierre Bourdieu and James S. Coleman. Boulder: Westview.
- DiMaggio, Paul J. and Walter W. Powell.
-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147-60.
- DiMaggio, Paul J. and Walter W. Powell.
- 1991 "Introduction." Pp. 1-38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edited by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anovetter, Mark.
-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1360-80.
- Hsieh, Kuo-Hsiung.
- 1989 "Dark Hands Becoming Head Honcho: Class Mobility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Taiwan." *Taiw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2): 11-54.
- Hsung, Ray-May and Yih-Jyh Hwang.
- 1992a "Job Mobility in Taiwan: Job Search Methods and Contacts Status." The XII International Sunbelt Social Network Conference. San Diego, February.
- 1992b "Social Resources and Petite Bourgeoisie." *Chinese Sociological Journal* 16:107-38.
- Hwang, Yih-Jyh.
- 1994 "The Structural Mechanism in Between th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the Status Attainment Process: Education, Soci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Capital." Taichung, Taiwan: Tunghai University.
- Lin, Nan.
-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Pp. 131-45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edited by Peter V. Marsden and Nan Lin. Beverly Hills, CA: Sage.
- 1994 "Institutional Capital and Work Attainment." Durham, North Carolina.
- 1995a "Local Market Socialism: Local Corporatism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24:301-54.
- 1995b "Les Ressources Sociales: Une Theorie Du Capital Social." *Revue Francaise de Sociologie* XXXVI (4, October-December):685-704.
- 1995c "Institutions and Networks: The Infrastructure of Society." International Social Network Conference. London, July 6-10.

- Forthcoming *Social Resources and Social Action: A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 Nan and Yanjie Bian.
1991 "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3, November):657-88.
- Lin, Nan and Chih-jou Chen.
1994 "Local Initiatives in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Nature and Emergence of Local Market Socialism in Jiangsu."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Boston, March.
- Lin, Nan, Walter M. Ensel, and John C. Vaughn.
1981 "Social Resources and Strength of Ties: Structural Factors in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4, August):393-405.
- Lin, Nan, Chinchun Yi, Yinghwa Chang, and Yungmei Tsai.
1995 "Sociocultural Regime i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he Family Enterprise of Private Colleges in Taiwan." *Asiatische Studien/Etudes Asiatiques* (Switzerland) XLIX-1:173-195.
- Marsden, Peter V. and Jeanne S. Hurlbert.
1988 "Social Resources and Mobility Outcomes: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Social Forces* 66(4):1038-59.
- Meyer, John W. and Brian Rowan.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340-63.
-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ultz, T. Paul, ed.
1995 *Investment in Women's Human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chultz, Theodore W.
196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I(1, March):1-17.
- Scott, W. Richard and John W. Meyer.
1994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Organizations: Structural Complexity and Individualism*.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ewell, William H., Jr.
1992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1, July):1-29.
- Sheu, Jia-you.
1989 "The Class Structure in Taiwan and Its Changes." Pp. 117-50 in *Tai-*

wan: A Newly Industrialized State, edited by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Wei-Yuan Chan and Hou-Sheng Cheng. Taipei, Taiw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un, Chingshan and Ray-May Hsung.

1988 *Social Resources and Social Mobility*. Taichung, Taiwan: Tunghai University.

Tsai, Shu-Ling.

1988 "Social Status Attainment: Native, Minnan and Dalu comparisons." Pp. 1-44 in *Changing Taiwan Society*, edited by Kuo-Shu Yang and Hai-Yuan Chiu.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Tsai, Shu-Ling and Hei-Yuan Chiu.

1993 "Educaional Attainment in Taiwan: Comparisons of Ethnic Group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art 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2).

Treiman, Donald J.

1970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Pp. 207-34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for the 1970s*, edited by Edward O. Lauman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Zucker, Lynne G., ed.

1988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 Cambridge, MA: Ballinger Publishing Co.

台灣社會民衆對成就之歸因及 重分配政策之態度*

關秉寅** 黃毅志***

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是要了解台灣民眾如何解釋個人事業有成的原因，以及對政府介入資源重分配之態度等階層信念。不論是鉅觀或微觀的社會學理論都認為社會成員對於「誰該得到什麼及爲什麼」這一問題的答案會有相當高的共識，並進而支持社會不平等。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個人的成就常被歸因於個人之內在能力或努力。但是這些理論亦指出個人在社會階層中之地位及流動經驗會影響其階層信念。本研究根據理論及過去研究得到四個假設，然後以民國 81 年「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三次計畫」所搜集有關社會階層態度之資料來驗證這些假設。

因素分析之結果發現，事業有成的原因可歸爲內在，結構及教育等三類原因。對政府重分配政策之態度則可分成「保障貧困者之態度」與「限制大企業勢力之態度」等兩大類。資料顯示台灣大多數人同意

* 本文曾宣讀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第二次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國際研討會」，能完成本文，必須感謝研討會評論人鄭讚源教授，以及三位匿名評審委員的指正，特此致謝。

** 輔仁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 台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個人內在能力或努力，亦即內在歸因，為事業有成的原因，並贊成保障貧困者。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女性、教育程度高、以及一些有向上流動經驗者較強調內在歸因。一些有向下流動經驗者則較強調結構歸因。三種成就歸因與保障貧困者態度之關係均為正。工人亦較支持保障貧困者。較贊成限制大企業之勢力者包括教育程度較高者、白領工作者、工人、以及傾向結構歸因者。

Stratification Beliefs in Taiwan

Ping-Yin Kuan and Yih-Jyh Hwang

Abstract

Both macro-and micro-sociological approaches have indicated that members of a society have considerable consensus regarding "who should get what and why." This consensus forms the normative basis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the belief that attributes personal achievement to an individual's ability or effort legitimizes the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how people in Taiwan explained the causes of personal success. We also studie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The study put forwards four hypotheses pertaining to the degree of consensus about stratification beliefs and factors that might cause dissensus. We drew the data from the 1992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o test these hypotheses.

Facto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aiwan people attribute personal success mainly to three factors: innate explanation, structural explanation, and educational explanation. Attitudes about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formed two factors: protection of the poor and restriction of the power of big businesses. The data indicated that a great majority of people in Taiwan believe in the innate explanation, which attributes personal success to an individual's ability or effort. Most people also support governmental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poor.

The scores of five extracted factors were further examined through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omen, the more educated,

and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d with a certain type upward occupational mobility tend to agree more with the innate explanation of personal success.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d with some type of downward mobility tend to give the structural explanation. All three explanations of personal success had positive impacts on attitudes of protecting the poor. Laborers are also more supportive of measures protecting the poor. The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also showed that the more educated people, white-collar workers, labors, or those who emphasize the structural explanation of personal success are more supportive of policies limiting the power of big businesses.

台灣社會民衆對成就之歸因及 重分配政策之態度

一、前言

人類社會從古至今，不分中外，最常看到的一個社會現象是社會的不平等 (Lanski, 1984)。所謂社會不平等就是社會成員擁有相當不同程度之重要的社會資源如權力、財富和地位等。這種不平等的秩序常常能長期且穩定的延續下去，而成爲一社會階層體系 (Kerbo, 1991: 11-12)。這階層體系之維持最終可能是靠武力，但最有效的方式則是使一般人相信此種不平等的秩序是正當的、公平的；也就是說，不平等會被一般人認爲是應該的，而不是不公平的。當不平等被社會成員視爲當然時，即使外人視爲極端不平等之制度，如印度之種姓制度，也都能被成員接受而長期穩定的維持下去，不受到站在階層系統底部之成員的挑戰 (Moore, 1978)。因此，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任何一個解釋社會階層秩序的理論，必然要包含一探討此秩序正當化過程之理論，以解釋爲何成員會接受重要資源分配不平等之待遇 (Dalla Fave, 1986:476)。

探討階層秩序正當性之理論雖已見於馬克斯、韋伯、或涂爾幹等早期社會學大師之理論中 (Rytina, 1986)，但真正較有系統之發展卻是在最近廿多年 (如 Habermas, 1973; Della Fave, 1980, 1986; Stolte, 1983, 1986; Lanski, 1984; Kluegel and Smith, 1986)。除了理論之發展外，歐美學者亦在社會不平等之正當性或公平性方面做了

不少實證性研究，特別是在收入不平等方面之研究（如 Alves and Rossi, 1978; Robinson and Bell, 1978; Form and Hanson, 1985; Shepelak and Alwin, 1986; Kelly and Evans, 1993）。這些有關社會不平等正當化過程之理論和研究都可概括到「階層信念」（beliefs about stratification）此一範疇。所謂「信念」基本上包括了如價值觀、知覺、及態度等社會心理學之概念。階層信念之研究重點即在了了解一般人對「誰該得到什麼與為什麼」（who gets what and why）之態度及看法（Kluegel and Smith, 1981:30）。本研究重點之即在了了解一般人如何解釋「為什麼」，亦即在了探討一般人認為個人為何能夠在社會上有成就，得到較多之重要資源。

由於一個人的階層信念會影響到他對在此不平等體系中所站之位置的評價，從而影響到他與社會整合或疏離之程度，而且可能更進一步影響到他改變此種秩序的意願。因此，社會成員所持有之階層信念對其他態度或其社會行動所產生之影響亦在階層信念研究之範圍內。本研究之另一重點即在了了解一般人所持之階層信念是否會影響到他們對於改變社會不平等秩序的看法。

具體言之，本研究主要是回答下列問題：

1. 台灣社會中，一般人認為一個人事業有成的原因為何？
2. 站在社會經濟結構上不同位置者，對於個人有成就之原因是否有不同的看法？
3. 個人實際之社會流動的經驗是否會影響到其對個人能夠有成就之歸因？
4. 對成就歸因的解釋及流動之經驗是否會影響到個人對重要社會資源再分配政策或做法之態度？

雖然階層信念之研究極為重要，並在國外已有相當之成就，但在台灣仍屬起步之階段。一些有關階層信念及社會不平等正當化之理論，雖已在歐美社會驗證過，但這些理論是否能同樣應用於台灣社會則仍

有待更多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將可部分彌補台灣社會學界在此方面研究之不足。研究之結果並可與其他社會之研究結果做比較，進而檢證目前有關階層信念之理論。此外，本研究所發現一般人認為事業有成需要的條件，可與目前研究台灣社會地位取得的研究中所發現的實際需要的條件做比較。這種比較可以看出一般人對於地位取得過程的認知，是否和客觀的情況一致，是否有如衝突學派所稱的「虛假意識」存在。

二、文獻探討

(一)從鉅觀角度看社會不平等正當性之形成

爲什麼權力、財富、及地位等重要社會資源之不平等分配能長期穩定的維持下去？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社會學各源自不同傳統之理論都認為一個重要的關鍵是社會階層體系大多數的成員能夠接受此種不平等分配之正當性 (Della Fave, 1980)。激進衝突學派之祖師爺馬克思及恩格斯即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之統治階級不僅控制經濟權力，更因而控制著文化思想生產之工具，進而創造出適合資本家利益之意識型態，使資本主義體系得以延續下去，直到無產階級組織起來，並有合乎自己利益之意識型態而推翻此體系爲止 (Marx and Engels, 1947)。權力衝突學派如 Weber (1978) 或菁英衝突學派如 Mosca (1939) 雖然不像激進衝突學派一般認為社會不平等將有終結之日，但也同樣的認為菁英或統治階級之權力必須是被受統治者認為有正當性，才能維持下去。Mosca 並且認為菁英會企圖將其權力建立在抽象之道德及法律基礎上，並散播政治宣傳來強調統治階級成員之優點，使統治階級之優勢地位合理化。

和衝突學派非常不同之功能學派是從不同之觀點來強調社會階層體系之正當性的過程。功能學派代表者 Parsons 即認為社會成員對於

哪些職業角色是重要的，有相當之共識。而當那些站在重要角色位置者成功地扮演其角色時，社會會給予較多之重要社會資源做為報酬。因此對 Parsons 而言，重要資源不平等分配的正當性是建立在社會成員共有之內化規範上，而且這種價值規範會透過社會化及社會控制之機制做世代間之延續 (1951, 1953)。

上述不同的理論觀點可說是從鉅觀角度來看社會不平等之結構因得到主流意識型態或價值觀之支持而正當化。從歷史的觀點來看，社會中支持不平等秩序之意識型態會因時代及社會之型態而不同 (Bendix, 1956; Dumont, 1970; Sampson, 1975)。資本主義社會所強調的是依貢獻給予報酬，以及市場競爭原則；其主流價值觀即為強調開放競爭、機會均等，以及個人努力等。以資本主義社會之代表——美國為例，過去之研究即發現大多數美國人相信在其社會中得到成功之機會是開放且很多的，因而大多數人也相信個人在社會階層中之地位應歸諸於個人之努力、能力及特質，而非一些社會結構性因素（亦即非個人所能控制之因素）(Huber and Form, 1973; Kluegel and Smith, 1986)。

(二)從微觀角度看社會不平等正當性之形成

Della Fave (1980, 1986) 根據上述鉅觀理論之見解，進一步由社會心理學之角度來看社會不平等得到正當性之過程。Della Fave 結合了 Mead (1934) 自我觀念形成過程之理論及 Bem (1967) 自我認知 (self-perception) 之理論。他認為個人在解釋自己之行爲時，是依照一外在客觀之觀察者的觀點來看，這外在客觀之觀察者在 Mead 而言，即是概化他人 (the generalized other)。因此由自我行爲解釋及自我觀念形成之過程來看，當一個人站在擁有優勢之社會地位時，因能利用較多之資源來呈現自我，給他人較好之印象 (Goffman, 1959)，並因而得到較高之評價。此種評價如和著重個人能力及特質之主流意

識型態一致，則此人從他人眼中看自己時，就會發展出較高之自我評價 (self-evaluation)，並認為自己之優勢地位乃是由於自己的能力或道德之表現等特質。反之，當個人是站在較劣勢之社會地位時，外在客觀者之負面評價會使個人發展出較低之自我評價。這種在社會階層中不同位置之成員所形成之不同的自我評價，會使成員相信其所在之階層地位是應得的，從而延續不平等之秩序。

由社會心理學微觀角度來看，除了自我觀念形成之過程會延續不平等之秩序外，Kluegel 及 Smith (1986) 認為人們在認知上會積極主動的尋求了解外在社會環境及自己在此環境中之位置。如個人要能有效地在環境中行動，會在認知上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環境及自己的行動，這種認知主控原則 (the principle of cognitive mastery) 不僅有利於個人在心理及情感上之調適，也會導致個人相信自己所得到之結果是個人應得的 (Kluegel and Smith, 1986:13-15)。

由上述文獻討論中可知，不論是從鉅觀或微觀之角度來看，一個社會在一定時間內，其社會階層體系之正當性會得到一主流意識型態或價值觀之支持；也就是說，社會成員對於「誰應該得到什麼及為什麼」這一問題的答案，會有相當高之共識。而這種共識是建立在相信個人之內在因素是社會不平等的來源。在台灣目前相當有限之相關實證研究中，也發現有此種共識的基礎。如瞿海源與蔡淑鈴 (1988) 在一項研究台灣大學生對社會公平的看法的調查中即發現，台灣的大學生基本上將貧窮歸因於個人因素如怠惰消極和潛能等原因，和美國人對貧窮之歸因相似。

(三) 影響接受社會不平等之正當性及程度的因素

雖然依照理論及過去實證研究顯示，在以市場經濟為導向之社會中，大多數成員會將個人能有成就之原因歸諸於個人因素，但這並非說所有的人都會接受這些解釋或接受之程度會完全相同。不論是以衝

突學派之鉅觀理論或是自我評價之微觀理論來看，站在社會階層劣勢地位的成員有可能發展出不同於主流意識型態或價值觀之看法。Marx 及 Engels (1959) 即認為在資本主義中被剝削之勞工階級在長期之勞資雙方對立過程中，終會了解只有推翻資本主義之經濟體系才會結束他們被剝削之狀況，並且會意識到平等及需要才是一個公平社會分配重要資源所應有之分配原則。

Della Fave (1986) 之自我評價理論則認為在階層中地位較低者雖對自己之成就或貢獻有較低之評價，但這不代表這些人有負面或較低之自尊 (self-esteem)。這些低地位者會一方面承認在高位者有較重要之貢獻及成就，但另一方面為維持其自尊，也會以他們在其他方面之能力或成就為其自尊的基礎。此外，低地位者也可能會發展出平等主義及反對競爭之觀念。Kluegel 及 Smith 則認為在自利 (self-interest) 和自尊心之驅動下，人們會將失敗或負面之成果歸諸於外在情境因素。換言之，個人在認知上可能會同時維持內在及外在結構兩種相互矛盾之歸因 (1986:17-18)。

在此對社會階層結構位置之影響的討論，自不只是指個人在市場經濟所形成的階級結構位置的影響而已，而是廣泛應用到各種社會階層之面向如性別、年齡和族群等。以 Kluegel 和 Smith (1986) 研究美國人之階層信念為例，他們發現女性對於出人頭地的機會之評估較男性為低，而且傾向於將個人在經濟上的成就歸因於結構性之因素。在探討性別與公平分配之關係的研究中，亦發現女性傾向於將其成功或表現歸因於外在因素，如運氣或工作較簡單等，而將失敗歸因於內在因素，如不夠努力或能力不足。而男性在此方面則相反 (見 Major and Deaux, 1982; Major, 1987)。

另一會影響到個人是否會同意內在歸因解釋的因素是社會流動之經驗。Marx 及 Engels (1959) 之所以認為勞工階級會形成符合其利益之階級意識，是因為隨著資本主義之發展，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成為

工人，而向上流動之機會愈來愈小。一些延續馬克思學說傳統之學者則指出社會流動會影響到階級之認同，造成團體內連結意識之減弱，致使個人與個人間的競爭取代了集體之階級衝突 (Dahrendorf, 1955; Giddens, 1973; Parkin, 1979; Goldthorpe, 1980)。在此社會流動的過程中，向上流動和擁有高地位一樣，都代表著成功；向下流動則代表著失敗。由此可推論，在社會階層體系中即使是地位較低者，若有向上流動之經驗，則會較支持個人成就是因個人能力或努力之內在歸因的解釋。反之，若有向下流動之經驗，則會傾向於外在結構歸因之解釋。

客觀社會階層之地位及對成就歸因之主觀信念會進一步影響個人對重分配政策的態度。由過去實證研究之結果可看出，在社會階層中地位較低者傾向於平等主義，並且會贊成政府再分配之政策 (Robinson and Bell, 1978; Kluegel and Smith, 1986; 亦見 Kuan, 1993)，此外，Shepelak (1987) 之研究亦發現個人對於其收入之水準的自我解釋與歸因，會影響到對其收入公平性之評估。依照這些研究以及上述之文獻來看，一般人對於貧富差距之評估，以及政府是否應提供工作和教育機會、保障處於劣勢者之生活等再分配政策，應會受到其在階層中地位、流動經驗以及成就歸因之解釋等因素的影響。

三、本研究之理論假設

綜合上述之文獻，本研究之第一個假設即為：

〈假設 1〉：台灣社會一般人會將個人事業成就的原因歸諸於個人能力、教育及努力之因素，並且有相當之共識。

但基於個人在社會階層結構位置的不同，仍會有不同的利益及形成自尊的機制，因而對成就之歸因亦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本研究做如下之假設：

〈假設 2〉：在社會階層結構中地位較低者，會傾向於將個人事業

有成就之原因歸諸於外在結構性因素。地位較高者，則傾向於內在歸因。

依上述所討論社會流動經驗對個人成就之歸因的可能有的影響，本研究做如下之假設：

〈假設 3〉：具有社會流動經驗者，視其流動之方向會影響到其對個人成就之解釋。具有向上流動經驗者，將較傾向於內在歸因的解釋；而有向下流動經驗者，則會傾向於外在結構性之解釋。

本研究之第四個主要假設為：

〈假設 4〉：在社會階層中地位較高、具向上流動經驗者、以及將成就歸因於個人者，會傾向於反對政府介入資源分配過程之作法；而在階層中地位較低、具向下流動經驗者、以及將成就歸因於外在結構因素者，則會傾向於贊成政府介入資源分配過程之作法。

綜合言之，本研究主要是在探討台灣社會成員如何解釋社會不平等此一社會事實，本研究之四個主要假設是認為在台灣社會大多數人都會將此不平等歸因於個人之能力或努力之結果，但隨其在社會階層地位上的差異，此種共識會有程度上之差異，並有不同之解釋產生。這些差異會進一步影響到他們對政府介入資源分配過程之態度。對於這四個假設，本研究是利用一全國性之樣本進行驗證。

四、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所分析的資料來自民國 81 年由瞿海源教授主持，行政院國科會資助的「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三次計畫」之調查資料。這項調查資料是一全國性的大樣本，所調查對象是 20 至 64 歲

的臺灣地區民衆。此調查中部份問題是針對受訪者之各種社會階層的面向作調查，並蒐集了許多有關階層信念的變項（瞿海源，1992）。

(二)變項測量

根據上述調查資料，本研究所要分析的依變項分爲「成就歸因」，以及對於資源再分配的「政策態度」等兩大類。

1. 成就歸因：本研究對受訪者的成就歸因之測量，乃依據他們對「一般人在社會上事業有成」之八項可能原因，如家庭背景，本人教育，才智…等之重要性的評估作測量，這些成就歸因變項的具體內容及其次數分佈，請參照表 5-1。在針對上述成就歸因變項作平均數及因素分析時，必須根據受訪者對各項可能原因所評估的重要性給定數值。凡是回答很不重要者之給分爲 1，不重要爲 2，無意見爲 3，重要爲 4，很重要爲 5。數值越高，代表受訪者認爲某項原因越重要。

2. 政策態度：受訪者在調查中對於七項有關再分配問題的「政策態度」作同意程度之判斷。這些有關政策態度之變項的具體內容及其次數分佈，請參照表 5-2。在針對政策態度變項作平均數及因素分析時，必須根據受訪者對於各項有關階層化再分配問題的看法，所顯現的政策態度給定數值。在本研究中凡答很不贊成者爲 1，不贊成爲 2，無意見爲 3，贊成爲 4，很贊成爲 5。數值越高，代表越贊成。

本研究試圖用來解釋「成就歸因」及「重分配政策態度」的變項包括與社會階層有關之個人特質及社會經濟地位。社會經濟地位之變項可分成源於功能論傳統之教育，職業，收入等變項，以及源於衝突論傳統之階級變項。各變項之測量如下：

1. 性別：在迴歸分析時當做虛擬變項，以男性爲 0，女性爲 1。
2. 籍貫：分爲本省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四類，在迴歸分析時當做虛擬變項。
3. 出生年次：依據受訪者回答的出生年次（民國）作測量，並以

此做為受訪者年齡之指標。

4. 父親職業：根據測量較細的 Trieman 三分位國際聲望量表作測量 (Trieman, 1977)。
5. 本人教育：參考台灣地區各級教育的修業年數，將原屬等級尺度的調查資料轉換成教育年數，使得教育之測量能符合迴歸分析所需之測量尺度。
6. 階級位置：參考 Wright 及 Perrone (1977) 的階級分類，以問卷上的四項指標代表受訪者的階級位置：這四項指標分別為：
 - (1) 是否為自己工作，這很類似 Wright 的是否擁有生產工具，用口語來說即是否為老闆；
 - (2) 是否有雇人，類似 Wright 的是否購買他人勞力；
 - (3) 是否管理其他員工，類似 Wright 的是否控制他人勞力；
 - (4) 是否為家裏工作。根據這四項指標，可把受訪者區分為五種客觀階級位置：
 - (1) 資本家：為自己工作且雇人；
 - (2) 小資本家：為自己工作但沒雇人；
 - (3) 經理：不為自己或家裏工作，且沒雇人，不過能管理其他員工；
 - (4) 工人：不為自己或家裏工作，且沒雇人，不能管理其他員工；
 - (5) 家屬工作者：為家裏工作。在做迴歸分析時，依此做四虛擬變項，以對階層信念作預測。有許多台灣民眾為家裏工作，即家屬工作者；他們的階級位置究竟如何？一直都沒看到國外的階級分析者對此做說明。在本文所做的分析中，乃把他們獨立成一項，藉此可分析他們的階層信念是否與其他階級者有所差別。
7. 收入：以民國 81 年社會變遷階層資料之「個人工作每月收入」進行測量。嚴格而言，這變項屬於等級尺度，數值越大代表收入越高。

8. 現職工作地：依「中華民國統計地區標準分類」(行政院主計處, 1983), 把現職工作地都市化程度分成八個等級, 都市化最低者給 1, 如蘭嶼; 都市化最高者給 8, 如台北市。
9. 初職、現職與職業流動 (或不流動) 的經驗: 爲了要根據受訪者的初職與現職來界定其具體的流動 (或不流動) 的經驗, 乃把初職及現職都分成(1)專技管理佐理人員, 或簡稱爲白領工作者; (2)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或簡稱爲商; (3)勞動工人, 或簡稱爲工; (4)農林漁牧獵人員, 或簡稱爲農; 這四大類職業的階層高低, 依序爲白領、商、工、農(參閱孫清山與黃毅志, 1994)。初職、現職都依此分成四類, 共可進一步區分出十六類($=4 \times 4$) 具體的流動經驗 (請參閱表 4-1)。在做迴歸分析時, 依此以初職爲工現職亦爲工的不流動工人爲比較基礎, 做十五個虛擬變項, 以對階層信念作預測。¹

(三)分析方法

先以百分比次數分佈顯現出台灣民衆在各項階層信念上的共識程

1 如果同時考慮了父親職業, 初職與現職, 以界定具體的流動經驗, 則將得到 64 類 ($=4 \times 4 \times 4$) 流動經驗。以此做迴歸分析, 則不但必須加入 63 個虛擬變項, 而且每一類的樣本數都變得很少, 因而增加統計推論的不確定性, 這使得分析變得很困難。因此在做分析時, 必須有所取捨, 只同時分析兩項職業, 如父職、初職, 或父職、現職, 或初職、現職間的流動經驗之影響。若依 Halaby and Sobel (1979) 之研究, 初職與現職間的代內工作生涯流動經驗, 對於一個人而言, 是很直接而實在的經驗, 其對個人之心理影響, 要大於代間的流動經驗之影響。因此本研究決定針對代內的流動經驗對階層信念之影響做進一步統計分析。對於本研究分析流動經驗之影響的複雜統計方法, 也許有人會提出質疑: 何不根據職業量表, 以「現職地位減初職地位」來代表流動的幅度, 如果用此方法則「現職地位減初職地位」與現職地位及初職地位, 會發生完全的多重共線問題, 無法認定這三個變項個別的影響, 除非能對若干參數作假定, 然而許多研究所作的假定都不是很合理, 因而對流動經驗之影響所作的估計也就很有問題 (Brody and McRae, 1987)。

表 4-1 職業流動經驗之分類

初職	現職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買賣服務 工作人員	勞動工人	農林漁牧 獵人員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初白領 現白領	初白領 現商	初白領 現工	初白領 現農
買賣，服務 工作人員	初商 現白領	初商 現商	初商 現工	初商 現農
勞動工人	初工 現白領	初工 現商	初工 現工	初工 現農
農林漁牧獵 人員	初農 現白領	初農 現商	初農 現工	初農 現農

度，接著再做雙變項平均數之比較分析，亦即將各個階層變項之不同類別在各項階層信念上之平均數的比較，來描述階層變項與各項階層信念間的關連。²

以上所做的雙變項平均數比較分析，並未控制其他變項，因此本研究再以迴歸分析控制其他變項，以分析各階層變項的淨影響。在迴

2 固然本研究的各項階層信念變項為等級尺度，以等級尺度的變項計算平均數不是沒有爭議性，然而若要比較不同階層者各項階層信念之不同，平均數比較比百分比交叉表較能簡化資料，而且所得到的研究發現，仍與本研究根據進一步較繁複的百分比交叉表的發現類似，平均數比較仍是不錯的描述統計。更何況以等級尺度變項做迴歸，以屬於等級尺度的階級認同為依變項做迴歸，如 Davis and Robinson (1988)，通常已被接受為可行的方法，而在計算迴歸係數之前，仍然必須先計算平均數；此外，以等級尺度的變項如態度測量算平均數的論文亦不在少數，如 Kluegel and Smith (1986) 與蔡明璋 (1991)，本研究乃計算各項階層信念的平均數作為參考之用。

歸分析中，由於涉及了眾多有關階層信念的依變項，因而在迴歸分析之前，乃透過因素分析以縮減依變項的個數。本研究先以主成份分析抽取因素(取 λ 值大於 1)，再以 Oblimin 進行斜交旋轉，然後用迴歸法 (regression method) 求得各因素的分數，以做為更抽象的概念之測量。迴歸分析是以這些概念的因素分數為依變項，以收簡化分析之效。本研究所做的因素分析，除了簡化迴歸分析之工作外，亦用來探索各個階層信念變項所隱含之抽象概念。由於台灣社會可能有其文化的特殊性，各個階層信念變項所測量的抽象概念究竟是什麼，並非根據國外的理論就能釐清，必須做過研究才能確定。因此，本研究並不純然是對既定之理論模式做測定驗證的工作，而是依過去之文獻建立初步的理論模式後，再依實證資料所得之分析結果，將初步模式做進一步的修正。

五、研究發現

(一)基本資料分析

本節首先根據表 5-1 的次數分佈百分比來分析台灣地區一般民衆對於兩大類階層信念「成就歸因」以及有關社會階層化再分配的「政策態度」的共識程度；接著再根據表 5-2 的平均數分析，來比較不同階層者在這兩大類階層信念上態度之異同。

從表 5-1 可看出絕大多數的台灣民衆在評估「一般人在社會上想要事業有成」的條件時，認定「有心努力」、「努力」、「本身的才智」以及「自己受了良好教育」為很重要或重要的條件。認為前三項條件很重要或重要的比率都超過 90%，認為第四項很重要或重要者也有 89%。這意味著台灣一般民衆在解釋個人事業有成時，訴諸於內在歸因，亦即將原因歸諸於個人能力與努力。因此，就此結果看來〈假設一〉得到有力的支持。

表 5-1 台灣地區民衆對各項成就歸因之次數分佈表

一般人在社會上想要事業有成，下面這些條件您認為是不是重要？有多重要？	很重要	重要	不重要	很不重要	無意見	合計	平均數	標準差
1. 出生在有錢人家有多重要？	18.1	32.8	38.8	2.6	5.8	100% (N=2333)	.26	1.22
2. 父母受過良好教育有多重要？	27.5	48.6	18.3	1.0	3.4	100 (N=2349)	3.84	1.06
3. 自己受了良好教育有多重要？	44.6	44.4	7.0	0.3	2.5	100 (N=2347)	4.28	0.84
4. 有心努力工作有多重要？	62.2	34.0	1.5	0.0	1.0	100 (N=2347)	4.59	0.60
5. 本身的才智有多重要？	39.7	51.0	4.7	0.1	2.9	100 (N=2340)	4.27	0.75
6. 努力有多重要？	63.4	33.4	1.2	0.0	0.8	100 (N=2349)	4.61	0.58
7. 命運有多重要？	18.3	39.0	30.3	3.3	7.4	100 (N=2334)	3.39	1.20
8. 貴人相助(有人提拔)有多重要？	30.5	51.0	12.2	1.2	3.9	100 (N=2347)	3.99	0.98

此外，台灣民衆在解釋個人成就時，不一定覺得外在的因素是重要的。如認為「出生在有錢人家」、「命運」很重要或重要的大約都只佔半數；亦有很高的比例認為不重要或很不重要。這顯示出人們對這兩項成就歸因之態度，有很大的歧異性。被視為較重要的外在因素，首推「貴人相助」，有 82.5% 的人認為很重要或重要；其次為「父母受過良好教育」，76.1% 的人認為很重要或重要。這反映出台灣民衆對社會網絡資源(Lin, 1986)，以及教育的重視，具有相當的共識。然而一般人對這兩項外在因素之共識程度，仍遠遠不及對前述四項與內在歸因有關之原因的共識。

依據過去文獻，上述之討論個人事業有成的原因分成內在及外在

表 5-2 台灣地區民衆對各項再分配政策態度之次數分佈表

您贊不贊成下列這些說法?	很贊成	贊成	不贊成	很不贊成	無意見	合計	平均數	標準差
1. 讓企業有好的利潤是改善社會大眾生活水準的最好辦法。	11.0	49.5	21.1	2.0	9.6	100%	3.50	1.03
						(N=2214)		
2. 大企業在目前台灣社會的「政治」勢力太大。	16.0	48.5	12.6	0.6	12.5	100	3.74	0.93
						(N=2144)		
3. 大企業在目前台灣社會的「經濟」勢力太大。	16.1	42.4	13.3	0.5	17.0	100	3.67	0.96
						(N=2121)		
4. 政府應提供窮人子弟更多進大學的機會。	41.6	47.1	5.3	0.3	3.5	100	4.27	0.79
						(N=2323)		
5. 政府應該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	40.4	51.7	3.2	0.1	2.5	100	4.32	0.69
						(N=2328)		
6. 政府應該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生活所需要的補助。	26.2	49.7	14.5	1.4	5.6	100	3.87	1.01
						(N=2317)		
7. 政府應該保障每個人最低的收入。	30.1	53.3	7.5	0.7	5.1	100	4.09	0.86
						(N=2299)		

兩大歸因,³ 但是依據實證資料做分析時,上述八項原因是否只隱含兩種歸因,必須再進一步依因素分析之結果才能判定。不同之社會或文化對於成就歸因可能有不同之分類。

依表 5-2 台灣民衆對於有關資源再分配的「政策態度」之分析來看,台灣民衆對於贊成「保障貧困者」的政策,也有相當的共識。贊成或很贊成「政府應提供窮人子弟更多進大學機會」、「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生活所需要的補助」、「保障每

3 一般社會心理學之文獻在討論歸因理論及實證研究的結果時,均指出一般人對於成功或失敗的歸因有兩個面向。一為內在/外在歸因之面向,另一則為暫時/穩定(temporary/stable)之面向。內在/外在之面向主要是與對個人表現之解釋有關。暫時/穩定之面向則主要是與對個人未來之表現的預測或期待的形成有關(Deaux and Wrightsman, 1984:98)。目前階層信念之研究較注重第一個面向之討論。這或許與這類研究較注重既有成就或失敗之解釋有關。

個人最低的收入」的比例都超過四分之三。然而對於企業界勢力的態度，就有相當的歧異性。贊成或很贊成大企業在目前台灣的「社會勢力太大」、「經濟勢力太大」的比例，都只有六成左右；答無意見的則超過一成。贊成或很贊成「讓企業有好的利潤是改善大眾生活水準的最好辦法」的也只有六成。

在根據表 5-1 及表 5-2 說明過台灣民眾對各項階層信念的共識性或歧異性之後，以下再以表 5-3 及表 5-4 所呈現之不同階層者在各項階層信念上的平均數之比較，來說明各階層變項與階層信念的關連，並以表 5-5 和表 5-6 的因素分析結果來釐清表 5-1 及表 5-2 所反映的是什麼。就表 5-3 及表 5-4 所分析之各階層變項與階層信念的關連性來看，不同階層者在各項階層信念上的差別並不是很大。當然，表 5-1 及表 5-2 已反映出台灣民眾對許多階層信念變項有相當的共識，各階層間自不可能會有太大差別；不過仍有一些類別在統計上達到顯著之差別 ($P < 0.05$)，而且這些差別可能具有實質的意義。以下主要針對達到顯著的差別作說明：

首先就性別而言，男性比女性強調「出生在有錢人家」對事業成就的重要性，而女性比較強調「命運」之重要性（見表 5-3）。此外，男性較贊成大企業「經濟」、「社會」的勢力太大之說法。女性則較贊成「讓企業有好的利潤」、「政府應提供失業補助」、「保障個人最低收入」（見表 5-4）。

再就籍貫而言，本省閩南、客家人較強調「出生在有錢人家」對事業成就的重要性。外省人及原住民則強調「努力」（見表 5-3）。本省閩南、客家人及原住民較贊成讓企業有好的利潤（見表 5-4）。

至於出生年次（可代表年齡階層）與階層信念的關連性是，出生年次愈晚者愈不強調「父母教育」、「自己教育」及「命運」對事業成就的重要性。57 至 60 年次的年輕人最不強調「出生在有錢人家」對事業成就之重要性；反之，出生年次愈晚，愈強調努力的重要性（見表

表 5-3 各各觀階層變項與階層信仰關連平均數分析

成就歸因	性別		籍貫				出生年次				教育			
	男	女	本省 閩南	本省 客家	外省	原住民	17~28 年	29~44 年	45~56 年	57~60 年	未受正 式教育	小學	中學	大專 以上
1. 出生在有錢人家有多重要?	3.31	3.20	3.29	3.28	3.01	3.15	3.24	3.25	3.31	3.03	3.42	3.21	3.21	3.36
	*			*				*				*		
2. 父母受過良好教育有多重要?	3.79	3.88	3.83	3.89	3.84	3.92	4.00	3.93	3.75	3.44	4.02	3.91	3.82	3.70
	*			P=.85				*				*		
3. 自己受了良好教育有多重要?	4.25	4.30	4.25	4.35	4.35	4.23	4.33	4.32	4.23	4.19	4.20	4.24	4.24	4.46
	P=.17			P=.20				*				*		
4. 有心努力工作有多重要?	4.59	4.59	4.59	4.56	4.64	4.76	4.55	4.57	4.61	4.66	4.51	4.51	4.61	4.70
	P=.97			P=.15				*				*		
5. 本身的才智有多重要?	4.29	4.26	4.27	4.26	4.28	5.00	4.23	4.26	4.31	4.25	4.15	4.18	4.33	4.34
	P=.42			P=.29				P=.20				*		
6. 努力有多重要?	4.62	4.59	4.60	4.57	4.69	4.84	4.59	4.56	4.64	4.72	4.51	4.53	4.65	4.67
	P=.24			*				*				*		
7. 命運有多重要?	3.30	3.48	3.41	3.41	3.33	3.08	3.62	3.35	3.33	3.33	3.79	3.48	3.30	3.28
	*			P=.66				*				*		
8. 貴人相助(有人提拔)有多重要?	3.96	4.00	4.00	4.02	3.89	4.23	3.94	4.00	4.01	3.91	3.96	4.02	3.97	3.98
	P=.30			P=.32				P=.42				P=.75		

註: * P<0.05

表 5-3(續) 各客觀階層變項與階層信仰關連平均數分析

成就歸因	職業						階級					
	專任 技理 管人 理員	農狩 林獵 漁人 牧員	勞 動工 人	一 萬 以 下	二 至 三 萬	三 至 五 萬	五 萬 以 上	資 本 家	小 資 本 家	經 理 人	工 作 者	
1. 出生在有錢人家有多重要?	3.33	3.24	3.22	3.35	3.25	3.35	3.28	3.25	3.24	3.35	3.24	3.33
2. 父母受過良好教育有多重要?	3.71	3.87	3.80	4.00	3.93	3.81	3.55	3.81	3.89	3.82	3.75	3.87
3. 自己受了良好教育有多重要?	4.44	4.20	4.22	4.26	4.25	4.38	4.21	4.24	4.23	4.54	4.29	4.14
4. 有心努力工作有多重要?	4.69	4.65	4.52	4.52	4.60	4.69	4.68	4.70	4.56	4.71	4.57	4.60
5. 本身的才智有多重要?	4.42	4.32	4.22	4.23	4.18	4.38	4.44	4.41	4.30	4.43	4.27	4.17
6. 努力有多重要?	4.70	4.67	4.57	4.60	4.55	4.61	4.70	4.66	4.62	4.71	4.60	4.70
7. 命運有多重要?	3.33	3.43	3.39	3.53	3.49	3.35	3.36	3.18	3.41	3.25	3.41	3.53
8. 貴人相助(有人提拔)有多重要?	4.00	4.02	4.03	3.94	3.94	3.98	4.05	4.03	3.93	4.03	4.01	4.01

註: * P<0.05

表5-4(續) 各客觀階層變項與階層信仰關連平均數分析

政策態度	職業				每月收入				階級				
	專佐 技理 管人 理員	買工 賣作 服人 務員	勞工 動工 人	農狩 林獵 漁人 牧員	一 萬 以 下	二 至 三 萬	三 至 五 萬	五 萬 以 上	資 本 家	資 本 家	小 資 本 家	經 理 人	工 人
1. 讓企業有好的利潤是改善社會大眾生活水準的最好辦法。	3.40	3.53	3.54	3.50	3.55	3.49	3.41	3.51	3.52	3.41	3.53	3.45	3.66
	P=.15				P=.23				P=.11				
2. 大企業在目前台灣社會的「政治」勢力太大。	3.93	3.69	3.70	3.68	3.61	3.73	3.91	3.88	3.79	3.78	3.92	3.73	3.53
	*				*				*				
3. 大企業在目前台灣社會的「經濟」勢力太大。	3.92	3.63	3.58	3.61	3.54	3.62	3.92	3.97	3.79	3.61	3.87	3.70	3.56
	*				*				*				
4. 政府應該提供窮人子弟更多進大學的機會。	4.17	4.24	4.33	4.36	4.34	4.28	4.21	4.06	4.14	4.35	4.17	4.24	4.28
	*				*				*				
5. 政府應該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 有工作。	4.29	4.29	4.36	4.36	4.35	4.32	4.28	4.21	4.22	4.36	4.28	4.31	4.35
	P=.20				P=.08				P=.27				
6. 政府應該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 生活所需要的補助。	3.84	3.85	3.89	3.91	3.93	3.87	3.77	3.77	3.61	3.80	3.73	3.94	3.88
	P=.76				*				*				
7. 政府應該保障每個人最低的收 入。	4.03	4.08	4.09	4.11	4.14	4.07	4.05	3.92	3.84	4.04	4.11	4.10	4.01
	P=.54				*				*				

註：* P<0.05

5-3)。此外，出生年次較晚者，較不贊成「讓企業有好的利潤」、「政府應提供窮人子弟更多進大學機會」、「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不過，出生年次較晚者，有越贊成大企業的「社會」、「經濟」的勢力太大之趨勢。整個來說，出生年次愈晚者，愈不贊成保障貧困者的政策；愈贊成「大企業勢力太大」的說法（見表 5-4），隨後的迴歸分析會對這個現象作進一步探討。

教育、職業及收入為代表社經地位的三項很重要的階層變項。由於三者彼此之間的高度相關，三者與各階層信念變項的關連也就很一致，只是教育與各階層信念的關連達到顯著的較多。整個來說，教育、職業及收入愈高者，愈強調「有心努力」「努力」「才智」「自己教育」對事業成就的重要性，愈不強調「命運」「父母教育」「出生在有錢人家」的重要性（見表 5-3）；他們也愈贊成「大企業勢力太大」說法，愈不贊成「保障貧困者」的政策（見表 5-4）。不過這三項社經地位和所有其他階層變項一樣，在強調「貴人相助」的重要性上並未達顯著之差異（表 5-4）。這反映出不論是那一社會階層，都一樣重視社會網絡資源。

最後，在階級與階層信念的關連性方面，各階級中，以資本家與經理最強調「有心努力」、「努力」、「才智」對事業成就的重要性。最不強調「命運」；而經理最強調「自己的教育」（見表 5-3）。特別有趣的是，資本家與經理不但最不贊成「保護貧困者」的政策，同時也偏向贊成「大企業勢力太大」的說法（見表 5-4）。

(二)因素分析

從表 5-5 可看到從台灣地區民衆對於事業成就的八項原因之評判中，可抽離出三個潛在因素。因素一反映在「有心努力」、「本身的才智」、「努力」之上，這可詮釋為「內在歸因」。因素二反映在「出生在有錢人家」、「命運」、「貴人相助」之上，可被詮釋為「結構歸因」。因

素三反映在「父母教育」、「自己教育」，可詮釋為「教育歸因」。不過此因素負荷均為負值，亦即因素分數越高，代表越不強調教育歸因。三個因素共解釋八個成就原因變項 62% 的變異量。

教育歸因這項因素之產生，應可從台灣社會之文化價值觀的觀點來理解。「書中自有黃金屋」或「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以及科舉考試制度之影響下，教育一向被認為是向上流動之重要途徑（見 Ho, 1962）。目前在台灣，這種價值觀則演變成升學主義及文憑主義（楊國樞，葉啓政，1984）。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文化傳承下，教育不只是作為促進向上流動的工具而已，教育程度或學歷本身即代表著很重要的社會地位。在同樣職業或收入的情況下，高學歷者的社會地位會被認為較高（章英華等人，1995）。因此教育在一般人心目中可看成是一種文化資本。由資料中分離出教育歸因此一因素，說明了一般人認為個人在文化資本上的擁有是事業有成之重要原因，而且這種資本是可以在代間繼承或傳承下去的。因此教育這種文化資本，一方面可看成是屬於個人內在之特質，另一方面也具有外在結構性，而成為一獨特影響成就的因素。教育對成就之重要性除了反映在價值觀

表 5-5 對各項成就歸因之因素分析 (Pattern Matrix)

	內在歸因	結構歸因	教育歸因
1. 出生在有錢人家有多重要?	-.18	.55	-.27
2. 父母受過良好教育有多重要?	-.05	.00	-.86
3. 自己受了良好教育有多重要?	.16	-.05	-.79
4. 有心努力工作有多重要?	.86	-.07	-.04
5. 本身的才智有多重要?	.51	.31	-.09
6. 努力有多重要?	.86	-.06	-.01
7. 命運有多重要?	-.03	.78	.07
8. 貴人相助(有人提拔)有多重要?	.14	.76	.09
解釋變異量	29%	19%	14%

上，也實際反映在台灣階層化的過程中(孫清山, 1994:131-142)。因此一般人會將教育視為一種特別重要之因素自有其文化社會之基礎。

在台灣地區民眾對於有關階層化再分配的七項政策態度的因素分析中，抽離出兩個因素(見表 5-6)。因素一主要反映在贊成政府應該「提供窮人子弟更多進大學機會」、「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提供失業者補助」、「保障個人最低收入」之項目上，這可詮釋為是「保障貧困者之態度」。因素二反映在認為大企業「社會」及「經濟」的勢力太大之上，此因素可被詮釋為一種「限制大企業勢力之態度」。兩個因素共可解釋七個政策態度變項 52% 的變異量。

(三)迴歸分析

從表 5-7 內在歸因之迴歸分析中可看到，教育程度愈高者愈傾向

表 5-6 對各項再分配政策態度因素分析 (Pattern Matrix)

	保障貧困者	限制大企業勢力
1. 讓企業有好的利潤是改善社會大眾生活水準的最好辦法。	.35	-.22
2. 大企業在目前台灣社會的「政治」勢力太大。	.06	.87
3. 大企業在目前台灣社會的「經濟」勢力太大。	.00	.88
4. 政府應提供窮人子弟更多進大學的機會。	.68	.11
5. 政府應該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	.71	.04
6. 政府應該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生活所需要的補助。	.68	.00
7. 政府應該保障每個人最低的收入。	.70	.03
解釋變異量	30%	22%

於內在歸因；而階層較低的工人則比資本家較不強調內在歸因，因此〈假設二〉得到了支持。在控制教育程度之變項後，先前表 5-2 雙變項之平均數比較分析所發現的「收入愈高，愈強調內在歸因」的現象消失了。收入對於內在歸因的影響未達顯著($P < 0.05$)，可見高收入者往往因其教育較高而強調內在歸因，亦即前所發現收入與內在歸因的關連是虛假的 (spurious)。

至於職業與內在歸因的關連，由於本研究要同時估計職業與職業流動對內在歸因的影響，以釐清兩者個別的影響，而使分析變得比較複雜。從內在歸因之迴歸分析結果來看，同樣是不流動者（當流動的影響已被控制），亦即初農現農、初商現商、初白領現白領，與初工現工者的內在歸因差異都未達顯著；而且四者對內在歸因的強調，從迴歸係數值看來都相當接近，並未呈現地位愈高，愈強調內在歸因的跡象。因此先前表 5-2「職業愈高，愈強調內在歸因」的發現可說是虛假的。就職業流動與內在歸因的關連來看，則有「向上流動者，較強調內在歸因」的現象。這可從初農現商、初工現白領的迴歸係數值達到顯著之結果看出來。各種有流動經驗者中，以向上流動距離最大的初農現白領者，最強調內在歸因($b = 0.96$)，然而卻未達顯著($P = 0.057$)。這可能是因初農現白領者的樣本太小($N = 4$)。但就整體的發現來說，是有「向上流動者較傾向於內在歸因」的現象，因此〈假設三〉基本上得到了支持。

最後在籍貫、性別與內在歸因的關連上，籍貫對內在歸因的影響未達顯著。先前依表 5-3 所看到「外省籍較傾向於內在歸因（強調努力）」的現象，可能是因為外省人的教育程度較高（孫清山，1992）。至於女性比男性強調內在歸因 ($P < 0.05$) 之原因，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至於內在歸因之迴歸分析模式所能解釋的變異量極小，決定值 (R^2) 僅 0.06。但此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先前表 5-1 次數分佈之分析，已顯示台灣地區民眾對於「內在歸因」有高的共識，自然 R^2 也就會很

低，這與 Kluegel and Smith (1986:91) 以及瞿海源和蔡淑鈴 (1988) 之研究發現很類似。因此，本研究迴歸分析所探討的焦點，也就擺在從普遍的共識中，找到可能造成些許歧異態度之基礎。如同前面對內在歸因之迴歸分析模式的探討，本研究所假設之歧異性的基礎主要是本人教育、階級、向上流動經驗與性別。本研究隨後對於許多各項具有普遍共識性的階層信念作進一步迴歸分析時，也是維持同樣的探討焦點。

各客觀階層變項對於結構歸因的淨影響，可從該迴歸模式分析的結果看出，僅有兩個向下流動變項：「初工現農」，「初商現工」的影響達到統計上顯著的差異。這顯示出向下流動者傾向於「結構歸因」，〈假設三〉又得到一些支持。然而在控制流動經驗後，所有的階層變項之影響都未達顯著，〈假設二〉所認為低地位會傾向於結構歸因的現象，並未得到支持。

從教育歸因之迴歸分析中可看出，影響力達到顯著的自變項，僅有出生年次，其標準化之迴歸係數值為 0.16。由於教育歸因的因素分數愈高，代表愈不傾向於教育歸因，因此出生得越晚，越不覺得高教育有助於事業成就。這個現象可能的解釋是，出生越晚的民眾，越知覺到目前的就業市場上，求職者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因而導致高學歷者並不容易找到好工作的情形。此外，台灣這幾年來快速之經濟發展，帶來了靠投機或土地增值即可一夜致富之印象，這使以往靠良好教育來做為向上流動之墊腳石的觀念面臨了挑戰。

根據〈假設四〉，成就歸因亦會影響有關階層化再分配的政策態度。因此表 5-8 所呈現之迴歸分析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化約模式 (the reduced model)，僅以個人客觀階層特質為自變項，第二階段則為完整模式 (the full model)，進一步加入了三項成就歸因之變項。亦即在完整模式中之假設是個人特質可以透過其對成就歸因的直接影響，來間接影響到個人對重分配政策之態度。

從化約模式中可看出：對於「保障貧困者」的政策態度之影響達到顯著水準的僅有性別。女性比男性較傾向於保障貧困者。就此保障貧困者的態度而言，所有其他階層流動變項之影響都未達顯著，因此〈假設四〉基本上得不到支持。完整模式在加入三個成就歸因變項後，性別的影響也跟著縮小而變得不顯著。由此可見女性保障貧困者的態度，可歸因於女性在成就歸因上之傾向。三項成就歸因中，結構歸因的影響為正值（迴歸係數值為 0.16），且達到顯著，因此〈假設四〉得到支持。工人比資本家支持保障貧困者的發現，使〈假設四〉又得到支持。初僑現白領的向上流動者比較不支持保障貧困者之結果，也支持〈假設四〉。此外，越傾向於內在歸因者，也越傾向於保障貧困者（ $P < 0.05$ ），此點則與〈假設四〉的預期正好相反。而越傾向於教育歸因者，也越傾向於保障貧困者（ $P < 0.05$ ）。前述女性保障貧困者的態度，則可歸因於女性較傾向於內在歸因（見表 5-2）。在加入三個成就歸因變項後，決定值 R^2 從 0.04 提高到 0.10。

在化約模式中也可看出男性較傾向於「限制大企業勢力」的態度，以及本人教育程度愈高者，愈傾向於「限制大企業勢力」的政策態度（ $P < 0.05$ ），這都與〈假設四〉的預期相反。這或可歸因於教育程度愈高者，愈能認識到「台灣大企業對於社會所可能帶來的問題」，因而愈傾向於限制大企業所能得到在非經濟領域的權力及影響力。此外，工作地都市化程度越高者，也越傾向於限制大企業的勢力。可能解釋是：大企業集中於都市，因此工作地都市化程度越高者，也越能認識到「大企業帶來的問題」。在控制教育等變項後，職業對於「限制大企業勢力」的態度之影響依然顯著。這可從「初白領現白領」者，比「初工現工」者較傾向於「限制大企業之勢力」（ $P < 0.05$ ）之結果看出來。此結果又與〈假設四〉之預期相反。其可能的原因是：白領工作者較集中於大企業，而且有較多機會了解大企業之運作，故較能認識到「大企業帶來的問題」。然而在控制教育、職業後，收入與出生年次對於「限制大

企業勢力」變得不顯著；可見先前表 5-2 所發現收入越高，越傾向於「限制大企業勢力」的關連性是虛假的。而出生年次越晚，越傾向於「限制大企業勢力」，則主要可歸因於出生越晚者，教育程度越高對「限制大企業勢力」的影響力。

在多加入了三個成就歸因之中介變項來分析「限制大企業勢力」之態度後，原化約模式中各自變項的迴歸係數都沒多少變化。由此可見原有的變項對「限制大企業勢力」之態度的影響，主要是直接的影響。然而結構歸因對於「限制大企業勢力」的影響為顯著的正值，亦即傾向結構歸因者，也傾向「限制大企業勢力」。因此〈假設四〉得到了支持。不過結構歸因對於「限制大企業勢力」的影響並不是很大（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07），使得向下流動透過對結構歸因的影響（見表 5-7），而產生之間接對「限制大企業勢力」的影響力，就變得很小而不顯著了（見表 5-8）。

六、結論與討論

就整個台灣地區民衆的成就歸因而言，絕大多數人強調「有心努力」、「本人才智」、「努力」等內在因素對事業成就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一般民衆對於事業成就的內在歸因有高度的共識。一般民衆對於事業成就也強調著「自己教育」、「父母教育」的重要性，亦即對於「教育歸因」也有相當的共識。相形之下，對於「出生在有錢人家」、「命運」之結構因素的重要性，則有相當的分歧性。在結構因素中，一般民衆對於「貴人相助」的重要性最具共識。至於一般民衆對於有關階層化再分配的政策態度，「保障貧困者」的政策得到普遍的贊成，而具相當的共識。

整體而言，台灣民衆的階層信念具有普遍的共識，這特別是強調事業有成就的「內在歸因」；但在普遍的共識下，仍有一些造成歧異性

表 5-7 成就歸因之迴歸分析

自變項 ¹	內在歸因	結構歸因	教育歸因
女性	b = .16* (.08) ²	.06 (.03)	-.09 (-.05)
出生年次	.01 (.06)	.00 (.00)	.015* (.16)
本省客家	-.06 (-.02)	.03 (.01)	-.12 (-.04)
外省	-.05 (-.02)	-.16 (-.05)	-.03 (-.01)
原住民	.58 (.05)	-.26 (-.02)	-.06 (-.01)
父親職業	.002 (.02)	.00 (.01)	-.00 (-.02)
本人教育	.03* (.12)	-.01 (-.05)	-.01 (-.05)
現工作地 (都市化程度)	.02 (.04)	-.02 (-.04)	.00 (.00)
收入	.01 (.02)	-.01 (-.01)	.02 (.04)
小資本家	-.06 (-.03)	-.07 (-.03)	.00 (.00)
經理	-.05 (-.02)	.04 (.01)	-.16 (-.06)
工人	-.24* (-.12)	.04 (.02)	.03 (.01)
家屬工作者	.04 (.01)	.00 (.00)	.02 (.04)
職業向上流動者			
初農現工	.15 (.02)	.14 (.02)	.18 (.03)
初農現商	.52* (.06)	.00 (.00)	.00 (.00)
初農現白領	.96 (.05)	-.51 (-.02)	-.25 (-.01)
初工現商	.04 (.01)	.09 (.02)	-.02 (.00)
初工現白領	.26* (.06)	.11 (.03)	.11 (.02)
初商現白領	.19 (.04)	.27 (.05)	.09 (.02)
職業不流動者			
初農現農	.19 (.06)	.05 (.01)	-.12 (-.04)
初商現商	.10 (.03)	.18 (.05)	.02 (.01)
初白領現白領	.12 (.05)	.06 (.03)	-.05 (-.02)
向下流動者			
初工現農	.00 (.00)	.64* (.08)	.19 (.02)
初商現農	-.65 (-.03)	.04 (.00)	-.56 (-.03)
初白領現農	-.27 (-.02)	-.24 (-.02)	-.27 (-.02)
初商現工	.08 (.01)	.46* (.06)	.07 (.01)
初白領現工	.31 (.04)	-.14 (-.02)	-.41 (-.05)
初白領現商	.17 (.03)	.08 (.01)	.03 (.01)
常數項	-.84*	.06	-.36
R ² (N)	.06 (1389)	0.023 (1389)	.04 (1389)

說明：* P < 0.05

1. 籍貫以本省閩南為0，現階級以資本家為0，流動或不流動以初工現工為0。

2. 括號內數字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表 5-8 重分配政策態度之迴歸分析

自變項 ¹	保障貧困者	限制大企業	保障貧困者	限制大企業
女性	b = .14* (.07) ²	-.20* (-.10)	.07 (.03)	-.22* (-.11)
出生年次	-.004 (-.05)	.002 (.02)	-.003 (-.04)	.003 (.03)
本省客家	.05 (.02)	-.02 (-.01)	.05 (.02)	.02 (.01)
外省	.03 (.01)	-.04 (-.01)	.06 (.02)	-.03 (-.01)
原住民	-.30 (-.03)	-.22 (-.02)	-.04 (-.03)	-.23 (-.02)
父親職業	.00 (-.01)	.00 (.01)	.00 (-.02)	.00 (.01)
本人教育	-.02 (-.06)	.03* (.14)	-.02 (-.08)	.03* (.14)
現工作地 (都市化程度)	-.01 (-.02)	.03* (.07)	-.01 (-.03)	.03* (.07)
收入	-.10 (-.02)	.00 (.00)	-.01 (-.02)	.00 (.00)
小資本家	.22 (.09)	-.08 (.03)	.22 (.09)	.70 (.03)
經理	.15 (.05)	-.12 (-.04)	.12 (.04)	-.14 (-.05)
工人	.21 (.10)	-.10 (-.05)	.23* (.11)	-.11 (-.06)
家屬工作者	.22 (.06)	-.06 (-.02)	.24 (.06)	-.07 (.02)
職業向上流動者				
初農現工	.01 (.00)	.23 (.03)	-.03 (.00)	.22 (.03)
初農現商	.04 (.00)	.03 (.00)	-.06 (-.01)	.01 (.00)
初農現白領	-.34 (-.02)	.34 (.02)	-.42 (-.02)	.34 (.02)
初工現商	-.09 (-.02)	.17 (.05)	-.12 (-.03)	-.17 (-.04)
初工現白領	-.16 (-.04)	.10 (.02)	-.22 (-.05)	.09 (.02)
初商現白領	-.25 (-.05)	.19 (.04)	-.32* (-.07)	.17 (.03)
職業不流動者				
初農現農	-.03 (-.01)	.14 (.04)	-.11 (-.03)	.12 (.04)
初商現商	-.05 (-.02)	-.12 (-.04)	-.13 (-.04)	-.14 (-.04)
初白領現白領	-.02 (-.01)	.27* (.12)	-.06 (-.03)	.26* (.11)
向下流動者				
初工現農	-.30 (-.04)	.08 (.01)	-.37 (-.04)	.04 (.00)
初商現農	-.22 (-.01)	.63 (.03)	-.20 (-.01)	.64 (.03)
初白領現農	-.08 (.00)	.55 (.03)	.06 (.00)	.61 (.03)
初商現工	.09 (.01)	.02 (.00)	.00 (.00)	-.02 (.00)
初白領現工	.32 (.04)	-.10 (-.01)	.15 (.02)	-.16 (-.02)
初白領現商	-.23 (-.05)	.12 (.02)	-.30 (-.06)	.08 (.02)
內在歸因			.20* (.20)	.05 (.05)
結構歸因			.16* (.17)	.07* (.07)
教育歸因			-.15* (-.15)	-.03 (-.03)
常數項	.14	-.37	.026	-.33
R ² (N)	.04 (1249)	.08 (1249)	.10 (1237)	.09 (1237)

說明：* P < 0.05

1. 籍貫以本省閩南爲0，現階級以資本家爲0，流動或不流動以初工現工爲0。
2. 括號內數字爲標準化迴歸係數。

的因素：

1. 女性較男性傾向於內在歸因，進而較男性傾向於「保障貧困者」的政策態度；男性則較具「限制大企業之勢力」的政策態度。
2. 本人教育程度較高者，較強調內在歸因，而傾向於「限制大企業之勢力」；高職業地位的白領工作者、目前工作地都市化程度較高者，也傾向於「限制大企業之勢力」。
3. 與資本家相較，工人階級較不傾向於內在歸因，較傾向於「保障貧困者」。
4. 向上流動者傾向於內在歸因，向下流動者較傾向於結構歸因。
5. 愈晚出生者，愈不傾向於教育歸因。
6. 傾向於內在歸因，也傾向於「保障貧困者」；傾向於結構歸因者，也傾向於「限制大企業之勢力」。

對於這些發現，在此提出三點我們認為未來需要進一步解釋及探討之方向。

第一，在本研究中所發現之性別與成就歸因及重分配政策態度之關係，與過去國外之相關研究所得之發現並不一致。若從性別階層化之角度來看，本研究會預期女性較傾向於結構因素，因為女性長期以來地位較低。本研究之結果與過去相關研究之發現不一致，到底是因文化不同，或是所問之問題不同，還是在理論上有待進一步修正之處，實需要做進一步之研究。

第二，限於資料及時間，目前之研究無法或尚未進一步研究其他和流動經驗有關之因素與階層信念之關係。研究者想要進一步知道的事包括(1)流動距離的遠近和個人階層信念之關係，(2)階級或階層間流動困難的程度和階層信念之關係，(3)行業、產業或不同類型之勞力市場間之流動，以及馬克思學說傳統所談之階級間流動和階層信念之關係。以上之問題都和進一步了解流動經驗與階層信念之關係有關。

最後要深入探討的是影響台灣民眾的「成就歸因」的因素，與眾

多在台灣地區探討地位取得研究中，實際上發現能影響事業成就之因素間的異同。眾多地位取得研究顯示：結構因素，如家庭背景、受教育、求職時的社會環境，對於個人的成就有很大的影響。例如，近年來因勞力密集的經濟發展並未創造足夠的專門技術性工作，但卻造成教育擴充，進而發生大量高學歷者，不再容易找到好工作的現象（瞿海源和蔡淑鈴，1992；黃毅志，1992；孫清山，1993；Tsai, Gates, and Chiu, 1994；薛承泰，1994）。這是外在結構因素的影響力。然而絕大多數民眾仍強調內在因素，如努力、才智、乃至於教育的重要性，而不瞭解結構性因素的力量。其實在不利的結構因素下，如近年來的高學歷者之就業市場緊縮，使得一個人再努力、再有才智、有再高的學歷，也不一定事業有成。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階級流動的過程中，實際上台灣地區在製造業裏黑手變頭家的可能性可說是很小（孫清山，1994:119），⁴ 然而許多製造業的受雇者仍存著「黑手變頭家」的願望，他們並沒體會到「黑手變頭家」所必須跨越的階級界限之困難性。在這種結構因素實際上很重要的情況下，台灣民眾卻仍一面倒地相信內在歸因。這種現象，除了是因為相信內在歸因，有利於心理與情感之調適之心理機制外（Kluegel and Smith, 1986:13-15），尚有社會上「有志者事竟成」的價值觀之傳播，以促進大家努力工作，或是以「黑手變頭家」之說法來安撫底層員工（謝國雄，1989:44-46）等社會化之機制。

一般而言，台灣民眾相當強調成就的內在歸因及教育歸因，但結構因素也非完全受到忽略。如出生年次較晚的年輕人，很可能較能體會到高等教育不一定帶來高成就，因此在成就歸因上較不強調教育的重

4 孫清山以「民國81年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社會階層組」之全國性大樣本資料作分析，發現初為黑手者，現為頭家之比率只有23%，而且其中僅有三分之一在製造業，其餘大多在服務業。

要性。這種體會或可歸因於年輕的求職者較能體驗到近年來在勞動市場上，高教育不一定高成就的現象。此外，台灣民眾更是對於「社會網絡資源（貴人相助）」的重要性有普遍的共識。這是與地位取得研究所發現的社會網絡資源之重要性（熊瑞梅和黃毅志，1992；孫清山和黃毅志，1994），較為一致。在台灣地區緊密的工具及人情網絡裏，一直講究社會關係的運用（陳介玄和高承恕，1991a, 1991b；熊瑞梅和黃毅志，1992），故民眾較能認清結構因素中「社會網絡資源」的重要性。

綜合以上討論可知：即使結構因素是影響地位取得的重要原因，向上流動有難以跨越的階層界限，一般民眾還是會相信內在歸因，相信社會是公平的、開放的，相信只要肯努力就會成功。因此結構因素之存在，並不一定會造成階級意識之形成，進而形成集體之行動。社會流動研究者，不論所做的是地位取得分析，或是用流動表來分析階級界限，都必須注意到，即使一個社會是非常不公平、不開放，民眾仍可能相信社會是公平的、開放的。用 Weber (1978:926-940) 的話來說，就是階級處境的因果關係若未透明 (transparency)，階級不一定會形成。因此，在階層信念研究之領域內，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就是在理論及實證研究上，進一步探索在何種情況下，相信內在歸因的共識程度會降低，並進而強調結構性因素之重要性，且形成以身份團體或階級利益為導向之意識及行動。

參考書目

孫清山

1992 社會資源、文化資本與地位取得過程之變遷，國科會研究計畫。

1994 台灣階級結構：社會流動、社會網絡與階級意識，國科會研究計畫。

孫清山、黃毅志

1994 社會資源、文化資本與職業取得，東海學報 35:127-150。

章英華、薛承泰、黃毅志

1995 教育分流與社會經濟地位，台北：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分流教育學術研討會。

黃毅志

1992 台灣地區教育對職業地位取得影響之變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74:125-162。

陳介玄、高承恕

1991a 台灣企業運作的社會秩序—人情與法律關係，東海學報 32:219-232。

1991b 論台灣中小企業之彈性化協力企業之組合結構，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小型專題研討會之三。

楊國樞、葉啓政

1984 升學主義下的教育問題，刊於台灣的社會問題，楊國樞、葉啓政主編，頁 357-384。台北：巨流。

蔡明璋

1992 青年學生的家庭背景與自我概念對主觀地位之影響，中國社會學刊 15:170-201。

熊瑞梅、黃毅志

1992 社會資源與小資本階級，中國社會學刊 16:107-138。

謝國雄

1989b 黑手變頭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2):11-54。

薛承泰

1994 影響學位取得的家庭因素：中美跨國比較之研究，台灣大學社會學刊 23:217-252。

瞿海源（編）

1992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第二期第三次調查計劃執行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瞿海源、蔡淑鈴

- 1988 台灣大學生對社會公平的看法,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66:105-131。
- 蔡淑鈴、瞿海源
1992 台灣教育階層化之變遷, 國家科學委員會彙刊: 人文及社會科學, 2 (1):98-118。
- Alves, Wayne M. and Peter H. Rossi
1978 Who Should Get What? Fairness Judgment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541-64.
- Bem, Daryl J.
1967 Self-Perception: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Phenomena, *Psychological Review* 74:183-200.
- Bendix, Reinhardt
1956 *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 Ideologies of Management in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Wiley.
- Brody, Charles. J. and James. A. McRae, Jr.
1987 Model for Estimating Effects of Origins, Destination, and Mobility, *Social Forces* 66:208-225.
- Dahrendorf, Ralf
1959 *Class and Class-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Nancy J. and Robert V. Robinson
1988 Class Identification of Men and Women in 1970s and 1980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s* 53:103-112.
- Della Fave, Richard L.
1980 The Meek Shall Not Inherit the Earth: Self-Evaluation and the Legitimacy of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 955-71.
1986 Toward an Explication of the Legitimation Process, *Social Forces* 65:476-500.
- Deaux, Kay and Lawrence S. Wrightsman
1984 *Social Psychology in the 80s*. Monterey, CA: Brooks/Cole.
- Dumont, Louis
1970 *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orm, William and Claudine Hanson
1985 The Consistency of Stratal Ideologies of Economic Justice,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4:239-69.

- Giddens, Anthony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Goffman, Erving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Doubleday.
- Goldthorpe, John H.
1987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 Habermas, Jurgen
1973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 Halaby Charles. N. and Micheal. E. Sobel
1979 Mobility Effects in the Workpla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2):385-416.
- Ho, Ping-ti
1962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uber, Joan and William H. Form
1973 *Income and Ideology: An Analysi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Formula*. New York: Free Press.
- Kelly, Jonathan and M. D. R. Evans
1993 The Legitimation of Inequality: Occupational Earnings in Nine N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75-125.
- Kerbo, Harold R.
1991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 New York: McGraw-Hill.
- Kluegel, James R. and Eliot R. Smith
1981 Beliefs About Stratific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7:29-56.
1986 *Beliefs About Inequalit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Kuan, Ping-Yin
1993 Fairness Judgments in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Unpublished).
- Lenski, Gerhard E.
1984 *Power and Privilege*.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Lin, Nan

- 1986 *Social Resources and Social Mobility: A Structural Theory of Status Attainment*, in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R. L. Breiger, ed., pp. 247-27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jor, Brenda and Kay Deaux

- 1982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Justice Behavior*, in *Equity and Justice in Social Behavior*, J. Greenberg and R. L. Cohen, ed., pp. 43-76,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Major, Brenda

- 1987 *Gender, Justice, and the Psychology of Entitlement*, in *Sex and Gender*, P. Shaven and C. Hendrick, ed., pp. 124-148, Newbury Park: Sage.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 1947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9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rx and Engels: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L. S. Feuer, ed., pp. 1-41, Garden City: Doubleday.

Mead, George H.

-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ore, Barrington, Jr.

- 1978 *Injustice: 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 White Plains: Sharpe.

Mosca, Gaetano

- 1939 *The Ruling Class*. New York: McGraw-Hill.

Parkin, Frank

-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London: Tavistock.

Parsons, Talcott

- 1951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3 *A Revised Analytical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lass, Status, and Power*, R. Bendix and S. M. Lipset, ed., pp. 386-440, New York: Free Press.

Robinson, Robert V. and Wendell Bell

- 1978 *Equality, Success, and Social Justice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125-43.

Rytina, Steve

- 1986 Sociology and Justice, in *Justice: View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R. L. Cohen ed., pp. 117-51. New York: Plenum.

Sampson, Edward E.

- 1975 On Justice as Equalit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1:45-64.

Shepelak, Norma J.

- 1987 The Role of Self-Explanations and Self-Evaluations in Legitimizing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495-503.

Shepelak, Norma J. and Duane F. Alwin

- 1986 Beliefs About Inequality and 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30-46.

Stolte, John F.

- 1983 The Legitimation of Structural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331-42.
1986 The Formation of Justice Norm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774-84.

Trieman, Donald J.

- 197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Tsai, Shu-Ling, Hill Gates, and Hei-Yuan Chiu

- 1994 Schooling Taiwan's Wome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Mid-20th Century,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7:243-263.

Weber, Max

-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 Roth and C.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right, Enik Olin and Luca Peronne.

- 1977 Marxist Class Categori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32-55.

社會階層、文化認同與音樂喜好*

瞿海源**

摘 要

本研究針對在台灣幾種音樂發展的歷史進行考察，進而以民眾對各種音樂的喜好程度從事分析，主要是試圖探討社會階層與文化認同等因素對音樂喜好的影響。大體上，本研究發現一些社會階層和文化認同的變項顯著地影響民眾對不同音樂的喜好程度，但也有其不同意義。

根據對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的問卷進行分析，發現女性比較不喜歡閩南語流行歌曲，而比較喜歡古典音樂、西洋流行歌曲和中國民謠，在國語、日語歌曲及台灣民謠方面則兩性並無明顯差異。在年齡方面，年齡愈大愈喜歡日本流行歌曲、中國民謠和台灣民謠，年紀愈小則喜歡國語流行歌曲和西洋流行歌曲，在閩南語和古曲音樂上則年齡並無顯著的影響。其次，在對文化態度上，愈認為台灣文化貧乏的民眾就愈不喜歡閩南語和國語流行歌曲，認同本土文化者則比較喜歡閩南語流行歌曲和台灣民謠。最後，藝術資財多的喜歡古曲音樂

* 本文所使用調查資料係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五次。該計畫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支持。本文在研討會後經三位評審提供衆多寶貴意見，對於初次撰寫此方面論文的我在修改論文方面有很大的幫助。對三位評審特此表示由衷的謝意。最後對我的研究助理翁慧娟小姐在此文發展和撰寫期間的協助致謝。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兼處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及西洋歌曲，而不喜歡閩南歌曲。音響設備的擁有除了對是否喜歡日本流行歌曲沒有影響外，都有助於增強對其他各類音樂的喜好。

根據對各類音樂歷史的探索和對抽樣調查所做有關民眾音樂喜好的分析，我們初步地掌握住流行文化的大趨勢，以及其和社會文化的變遷間的關係。這方面的研究雖為初創性，但由於和人們日常生活緊密關聯，應可再深入追究若干細部及更深層的現象及其社會意義。

Social Stratificati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Music Preferences in Taiwan

Hei-Yuan Chiu

Abstract

After conducting a survey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Taiwan's varieties of music, a series of statistical and sociological analyses was conducted using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datasets in order to detect the effect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on people's music preferences. In sum, stratification and identity factors affect people's music preference significantly, but with different social meaning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emale respondents like classical music, western popular songs, and Chinese folk songs more than men, while they like Minnan popular songs less. The older people prefer Japanese popular songs and Chinese and Taiwanese folk songs, while younger people like Chinese and western popular music. Those who claim a strong identity with Taiwanese culture like Minnan popular songs and Taiwanese folk songs, while those who identify with Chinese culture like Chinese folk songs, popular songs, and classical music. People with more music and other art resources prefer classical and western popular music. Owning an audio system reinforced people's preference of all kinds of music, except for Japanese popular music.

From various analyses, it is obvious that people like to listen to music in everyday life, with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playing significant roles in influencing individual music preferences. Further historical and explanatory elaborations are needed to understand this popular social phenomenon.

社會階層、文化認同與音樂喜好

在新加坡航空自漢城飛臺北的班機上，共有七個音樂頻道供旅客選聽。除了兩個古典音樂的頻道外，雖有幾種西洋歌曲，但是聽日本流行歌曲時，剛開始以為是西洋流行歌曲，節奏和旋律聽起來就是西洋味十足，仔細辨認歌詞才發現是日本歌。這種經驗和在東京旅館裡看電視上的歌唱表演很類似，連唱的人唱歌的姿態都和西洋歌星很相近。國語流行歌曲聽起來起初速度較慢，可是後來的節奏和整個樂隊的伴奏卻不但變快，而且也 and 西洋流行歌曲益形相似。在漢城大學教授會館的旅舍裡，收音機的三個音樂頻道，在任何時間打開，好像也只有西洋歌曲。不過有幾次細細辨認，卻又發現有些是韓語演唱的。

這兩年去歐洲幾趟，也都發現各地的流行歌曲不是直接來自美英兩地，就是已受到美英為主的流行音樂的濃重影響。尤其到號稱世界音樂之都的維也納的幾家唱片行去看的時候，發現重金屬之類的流行音樂是最熱門的。雖說原先流行於美國的音樂其實受到非洲很大的影響，中南美，特別是加勒比海區域對美國流行音樂的影響也不小 (Patterson 1994)，但是美英流行熱門音樂席捲了全球確實也是事實。於是，一個源自歐洲十六世紀以下的古典音樂傳統和一個在二十世紀蘊成於美英的流行音樂傳統，基本上共同主宰世界音樂的趨向。對兩者的接受程度，大體上與年齡有關。當下的流行歌曲，不論是各地本身的，還是自美英進口，多是年輕人所喜歡的。其實這在美英當地也是如此。

然而，儘管地方的流行音樂受了美英流行音樂的影響，但仍然保留了许多各社會本身的特徵，尤其是在語言上。各地的流行歌曲還是以當地語言做為歌詞，雖然也有些歌詞夾雜著英文。有時在音樂本身

方面也有自己文化的性格。於是，在源自西方的古典與流行音樂主導下，各社會深受影響，甚至直接成了西方音樂產品傾銷的市場，但地方色彩的流行音樂也還有其特色，並且是各母體社會中最流行而普遍的。對於這麼多不同的音樂，不同出身的人可能就有不同的喜好。也就是說人們有著不同的品味。這種品味的不同可能就蘊含著社會階層分化的性質 (Bourdieu, 1984; 朱元鴻, 1993)。這種音樂或文化品味的分化也是個人或家庭所擁有的文化資本有密切關聯 (DiMaggio, 1982; 黃毅志, 1994)。

在同一個社會裡，由於族群文化上乃至語言上的差異，在音樂上，特別是在流行歌曲上，也會有明顯的不同。這些不同的音樂之間由於相互的接觸，有時也會有相互同化的現象。Benski (1989) 在以色列的研究發現不同猶太族群間的音樂品味有整合性涵化的趨勢，但又有保存其族群參考架構的情形。在臺灣，音樂的種類很多，也有許多是與族群文化有關的。特別是在近幾年臺灣意識興起，我們應該可以從這個角度去探討臺灣音樂文化的問題。

在臺灣地區，從事社會階層與文化或生活風格的研究有許嘉猷 (1988)、朱元鴻 (1993) 和黃毅志 (1994)。其中朱元鴻在臺中的臺中市生活風格調查中，收集了極為詳盡的問卷調查資料，在理論指引下，這個研究及其後續研究應可對臺灣民眾的生活文化風格及其與社會階層化的關係有深入的了解。在朱元鴻的調查中，關於民眾對各種音樂的興趣與知識。就其因素分析的結果而論，第一個因素包括了對西洋現代管弦、打擊樂、爵士樂、搖滾樂、前衛音樂和西洋流行音樂。其中西洋現代管弦不知何所指，可能一般民眾也不知道這是什麼音樂，而把它當作西洋流行樂團。因此，似可將第一因素泛稱為西洋流行音樂。第二個因素則包括了國樂、古典音樂、地方民謠和宗教音樂，是較嚴肅的音樂的類別。第三個因素則包括了國語、台語、東洋流行歌曲，可說是本土的流行音樂。這個分析的發現與黃毅志根據社會變遷

第二期第三次調查及本文的發現都相類似。朱元鴻的分析後來的重點擺在群落分析，對不同音樂品味的群落做了一些初步的社會階層意義的探討。

一、各種音樂在臺灣的發展

古典音樂是歐洲自十六世紀開始發展出來的一種精緻藝術。長期以來一直是近代人類藝術的重要成就，全球各大都市的音樂廳多以演奏古典音樂為主，而音樂學院或音樂學系也都在教授古典音樂，然而在民眾間，古典音樂卻也多少有些曲高和寡，並不普遍流行。相對於所謂的流行音樂，古典音樂所吸引到的大眾顯然少了許多。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古典音樂卻開始有了日益興盛流行的趨勢。倫敦經濟人(Economist)在一九九四年一月號中，有一篇專文討論古典音樂唱片事業。在文章前有一段引文稱：

「對喜好古典音樂者來說，這是一個好得不得了的時候。在近年來，唱片的目錄戲劇化地擴張。從來沒有那麼多的音樂為那麼多人所擁有。這樣的情況會持久下去嗎？」

從一九八〇年到一九九二年，在五個最大的唱片市場（美國、英國、日本、法國和德國），產值自九十億美元增加到二百億。其中古典音樂也隨著增加。在美國從一九八〇年佔市場的3%，增加到一九九二年的4.4%。在一九九四年，平均每個月就有五百張新的古典音樂唱片發行。

在英國，連鎖的HMV唱片行，近來都在擴充古典音樂展售的空間，從二、三千平方英尺增加到五千平方英尺，並增加專人服務。在美國，紐約曼哈頓的淘兒唱片公司有兩萬兩千個曲目可供顧客選購，而在非都會區，淘兒在各地的分店也都有一萬以上的曲目。

爲什麼會有這個新的發展趨勢，經濟人的專文認爲是創新之聲

(the sound of innovation)、是廠商的供銷、是獨立小廠的投入等三方面因素所造成。所謂創新是指雷射唱片之發明與上市、古典音樂名家風靡演出、以及購買唱片者的年齡層的影響。質言之，雖然 LP 是現代唱片的一大突破，甚至還有許多玩家堅持 LP 的音響效果不是 CD 可以取代的，但是雷射唱片自一九八〇年上市以來，由於播放時間更長也更方便，也由於音響效果在進步科技的引進下日益完美，已經在全球各地取代了傳統唱片。在歐洲賣的僅是雷射唱片，其實在臺灣和世界各地也都是如此。播放雷射唱片不但簡易，更有許多方便聆賞的特殊功能，如快速選曲等，因而獲得消費大眾的喜愛。於是這種科技所帶動的創新對古典音樂的流行有很大的助益。

其次，在九〇年代，幾個演奏或演唱家因個人演藝才能傑出而在外貌和性格上又特別吸引人，因而帶動了風潮。最有名的莫過於帕華洛第，而留著龐克頭而對音樂又有奇特態度的小提琴家尼格·甘乃迪、長笛高手高威、艷麗的大提琴家哈諾伊。最近又有天才型的東方少女小提琴家張莎拉和陳美，也帶動了新的一波風潮。一九九〇年世界三大男高音，帕華洛第、卡拉斯和 Domingo，在羅馬聯合演唱的唱片在全球銷售了一千多萬張，去年又再發行一張，其業績可能再創新高。很奇特的是在一九九二年發行的波蘭現代作曲家古瑞茲基 (Gorecki) 第三號交響曲和一九九三年西班牙一個修道院的修士們演唱的世紀葛利果 (Canto Gregoriano) 都帶動了莫名的銷售熱潮。後者甚至還帶動幾家大唱片公司跟進製作類似的唱片。這兩部音樂作品一個沈鬱悲愴，一個則純樸聖潔，在二十世紀末如此流行論者多認為是人類精神需求的一種反映。

在主要的唱片市場，購買古典音樂唱片者的年齡層也產生了變化，一方面年輕人增加了，在另一方面主要購買者還是在三十歲以上。而經常購買者和偶爾購買者將市場分成兩半，在電視和電影乃至廣告中所採取的音樂甚至其片斷會帶動偶爾購買者搶購熱潮，古典音樂唱片

市場的繁榮在這兩種購買者支持下，不只穩定成長，更會突然掀起熱賣浪潮。

在廠商傾銷方面，國際上的大公司，如寶麗金集團下的笛卡、菲立浦、德機、EMI、Sony、華納兄弟、博德曼(BMG)等，製作新片成本高昂，近年來致力於舊版唱片再翻製成CD，減低成本而大力推銷，業績都相當不錯。而一些獨立的小廠不是經營有特色的產品就是錄製東歐等地版稅低而演奏水準高的音樂，其中的小巨人 Naxos 就以後一策略大舉占有市場，也帶動大公司前述翻製舊唱片的策略來因應。於是價格下降造成購買的有利條件。

以上對世界主要唱片市場的分析其實也可運用到臺灣的實際狀況。臺灣古典音樂唱片的價格又都低於國外許多市場，對古典音樂在臺灣的流行產生了更大的助力。此外，臺灣民眾對音響設備的喜愛，甚至熱中購置高價位的頂級音響(Hi-end)，也多少會增加古典音樂的流行。再加上，近年來有關古典音樂書籍和雜誌的出版也進入一個新的年代，諸如萬象、世界文物、音響論壇、音樂時代、大英百科、麥克等公司都出版了不少。

流行音樂是以最多可能的大眾喜歡(enjoyed by the largest possible audiences)為主要特徵。一般而言，流行音樂是一個產業全力投入產銷的產品，具有濃厚的商業本質。如果以這個方向來看待流行音樂，則依人數多寡而言，在臺灣稱得上流行音樂的應該是閩南語流行歌曲(有百分之八十六的表示喜歡)和國語流行歌曲(80%)。中國民謠(79%)和臺灣民謠(68%)也還算是大多數所喜歡的(都超過三分之二)。至於西洋和日本流行歌曲在臺灣流行得有限，比古典音樂還更少一些。

在臺灣最流行的是閩南語歌曲，這看起來是自然的現象，因為臺灣的居民當中閩南人本就是最大的族群。然而若考慮光復以來政府對方言採取壓制的政策，則閩南語歌曲如此流行就有其文化上的重大意

義了。若追溯閩南語流行歌曲的歷史，應該在一九三〇年代，即在外來西化日式音樂影響下，臺灣民間因應產生了新的通俗的音樂（許常惠，1991）。日本哥倫比亞公司在台設立分公司，幾經轉折，網羅江湖藝人模仿日本流行歌曲，試作新詞，開始流行。後來又在一九三四年左右為大量輸入自上海的國語片製作歌曲，經由哥倫比亞在台分公司製作唱片發行，帶動了新的臺灣流行歌的走向。到一九三五年，新的通俗歌曲作家組成了歌人懇親會，再加上陸續有七、八家唱片公司成立，帶動了臺語流行歌曲的盛行。在這個時期創作的流行歌曲，有些如雨夜花、望春風之類的至今還流行，不過許多人都把它們當作民謠了。

以美英為主的西洋流行音樂進入臺灣大約是一九五〇年代以後的事，實際上現代西洋流行音樂也在五〇年代興起而已（文瀚，1994）隨著好萊塢文化的輸入與美軍駐台，以及臺灣社會明顯的美國化趨勢，臺灣的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開始接受所謂的熱門音樂。大多數聽電台播送熱門音樂的節目，其中極少數自己組織樂團來演唱。到後來則從大量翻版唱片選購流行的熱門音樂。之後，就亦步亦趨跟著美英的流行走。到了披頭四崛起，以及美國六〇年代抗議風潮湧現，而民歌帶動的音樂發展也很快傳來臺灣。美英的流行音樂其實在這期間大約已成功地輸往世界各地，包括了歐洲古典音樂的心臟地帶，當然也隨戰後美國政治和文化勢力的擴張輸出到東方的國家來。這種西洋流行音樂，尤其是六〇年代帶有民歌風味的抗議性歌曲對臺灣在七〇年代中期的校園民歌運動有很大的影響。許多大學生抱著一個吉他唱起自己的歌曲來，實際上不論就樂器或是樂曲，都明顯受到西洋流行音樂的影響。西洋流行音樂與年輕人跳舞關係密切，可能除了抗議性歌曲外，歷來西洋流行音樂都是舞場的主要伴奏音樂。自七〇年代年輕人跳舞的場所愈來愈多，特別是到了八〇年代，地下舞廳及餐廳多得不得了，西洋流行音樂，如傑克遜、馬丹娜等天王巨星也都是以舞曲取

勝，甚至他們的勁舞是其音樂風靡所不可缺少的部分（文瀚，1994：151）。於是在臺灣的西洋流行音樂不僅和跳舞脫不了關係，更重要的是後來所謂的偶像，也都是能歌善舞，青少年即使自己不會跳或跳得沒那麼好，也都喜歡看唱跳俱佳的表演。

西洋流行音樂在六〇年代以後在全球流行，成爲世界性休閒生活乃至一般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甚至可說是優勢地壟斷的美英文化商品。古典音樂出版商 Ernest Roth 指出他的工作是使大眾喜歡作曲者所創造的音樂，而流行音樂出版商的工作則是使作曲者製造出大眾喜歡的音樂。一位流行音樂的出版商也說：「我的工作就是販賣娛樂」（Frith, 1993:173）。這是資本主義商品化的典型例子。更值得注意的是，唱片的製造和銷售乃被少數英美的大公司所掌控。EMI、Decca、Philips、與 Pye 四大公司就佔有排行榜前十名唱片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有時更高達百分之百。單是 EMI 和 Decca 兩個公司就經常佔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市場。這些大公司在九九〇年代更大舉兼併世界各地的唱片廠商，出版當地的流行音樂。對臺灣國語流行歌曲造成很不利的發展逆境（文瀚，1994）。

在創造出全球流行的趨勢過程裡，強勢的商品銷售與崇洋習洋的風潮，使得臺灣社會自六〇年代以來就西樂處處聞了。有趣的是，到底有多少臺灣人真的喜歡西洋流行音樂或聽得懂裡面的歌詞，或能體會這種音樂在西方社會裡的真正意義。或竟是一種流行的背景音樂。很多年前，到高雄做研究，晚上逛街路過幾家皮鞋店，都在播熱門音樂，聲音不少，都傳到外面來。當時我就懷疑誰聽得懂，甚至聽出來其中的歌詞呢？現在各種音樂台一天到晚在播西洋熱門音樂，情況會有所不同？

國語流行歌曲在臺灣的變遷很大，頗富社會意義。在一九三〇年代臺灣本地流行歌曲萌芽時，主要的幾支歌曲都是爲上海的電影配音。到了光復後，國語流行歌曲就長驅直入，又加上政府的語言和廣播政

策等，國語流行歌曲成爲休閒文化中的主流。早期的上海派、稍後的香港歌曲都在六〇年代以前主宰整個市場。其中黃梅調更使臺北市獲得「瘋人城」的封號，整個臺灣可以說浸泡在黃梅調裡兩三年。到六〇年代中期之後，又有一批新的歌星出現，唱些與情愛有關的新歌，當時又有歌廳行業的興起，也促成了新的流行。歌廳聽歌、一條龍吃餃子就成了當時的所謂小市民的生活。在電視綜藝節目的推展乃至爲歌星打歌的狀況下，這樣的流行音樂著實流行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直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後，校園民歌運動興起。

有論者認爲民歌運動造成了臺灣流行音樂人口結構的第二次激烈改變（譚石，1990）。這是一種混合了美式風味及鄉土情懷的音樂，年輕知識份子企圖以此取得流行音樂的主導地位。音樂除了清新外，也帶有一點點社會現實意義甚至批判性。然而，商業體系很快就致力以此開發年輕人口的龐大消費市場，成功地「幾乎將所有的大專青年（準知識份子）史無前例地納入更具制度性及系統性（相較於早期的西洋熱門音樂工業——以翻版唱片及電台爲主）之流行文化工業商品化的生產與再生產機制當中」（張南生，1990）「民歌運動做爲一種社會參與的企圖，不但沒有達到預期中的文化造山運動，反而淪陷落進資本深處，成爲資本再生產和累積的活源了」（譚石，1990）。這類音樂最後終於形成了新的流行的商品化的國語歌曲，也因而造成國語流行歌曲聽眾的年齡層轉到年輕人口。

國語流行歌曲到晚近的最後發展，除了持續八〇年代以一些民歌手轉化而成的流行歌星當紅、一些以個人歌藝在歌壇竄起的明星當道外，還有兩個特殊的現象。其一就是流行音樂流行人口年齡層的再下降，即少年偶像的推出和推銷，使中學生，尤其是國中生成了音樂銷售和引發狂熱的目標。唱片公司老闆會像英國的同行一樣地說「年輕人市場在突然之間冒出頭來，我們可在這上面賺不少錢」。在另一方面則顛覆性的新音樂的出現。這兩種音樂同時出現，而聽眾極不相同，

是很有意思的現象，值得進一步探究。其中顛覆性的臺灣新音樂中，有許多，甚至大部分是臺語歌曲。

關於台語流行歌曲，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以前，乃延續戰前的發展，沒有什麼變化。在往後二十年間，多採用日本歌曲的曲調，填上臺語歌詞。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一年，受民歌運動影響，早期的閩南語流行歌曲被當作臺灣民謠再度流行。最後，在八〇年代，描寫江湖中人、風塵女子及借酒澆愁的歌曲不斷出現。少數的知識份子也加入作詞的行列。在政治上「台語」成爲一種「抗議」的象徵，閩南語的政治抗議與反對運動歌曲出現。（張鈞維，1990:131）。

二、民衆對各種音樂喜歡程度的測量

本研究採用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五次有關文化與價值的調查問卷資料。在研究中，我們以受訪者對各類音樂的喜好程度作爲依變項。經過初步考量與分析，選取了性別、年齡、教育、收入、省籍、職業、行業、就寢時間、文化態度、生活滿意程度及家庭文化設備等做爲解釋變項。在初步分析中也曾將宗教信仰類別列入，但並無有意義的結果，所以在最後分析中予以剔除。原本以爲由於多少有著文化的淵源，信仰基督宗教的會比較喜歡古典與西方流行音樂。以目前的調查資料而言，並沒有證據來支持這類推測。

在所列出的變項中，關於背景變項，除行業與職業兩組變項外，都依原調查的測量方式進行研究，因此在此不予以特別說明。關於行業，我們在這裡是以一級、二級、三級行業來做測量，而職業也以三大類，即專門及主管、監督佐理買賣、和農林漁牧工人。至於就寢時間，則在分析時區分爲三個時段，即二十至二十二時，二十二時至二十四時，及零時至四時。在傅仰止持續的研究中，發現是否在夜間有活動，是區辨民衆多方面態度與行爲的良好指標。在音樂方面，由於

活動或聆賞習慣的問題，就寢時間的早晚應該會有影響，尤其在 KTV 相當流行時，歌唱和聆賞歌唱或音樂或許也有時段上的區隔。例如在深夜還有許多人在 KTV 唱流行歌曲，而也有一些人在晚上聆賞古典音樂。

至於其他幾組量表的測量分析，我們以因素分析為主要方法，來抽離出來有意義的重要因素。關於這方面的統計分析如下：

文化態度的測量：本研究所稱文化態度是指民眾對文化整體的看法與評估，主要內容包括對是否有文化優於別的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評價、對臺灣當前文化的評價、以及對臺灣文化主體性的看法。在建構測量的過程中，我們一共使用了與此主題有關的七個題目。經過斜交轉軸因素分析法，取得三個因素(見表一)。在第一個因素上因素荷

表一：文化態度的因素分析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荷量		
			文化貧乏	建構本土文化	認同中國文化
37 (2)臺灣經濟上很富裕，但文化上卻很貧乏	3.729	1.028	.820	.115	-.175
37 (4)臺灣社會太現實太功利	3.986	.989	.792	.203	-.010
37 (3)將臺語認定為國家語言之一	3.434	1.090	-.036	.807	.019
37 (5)臺灣應該建立自主的文化	3.884	.855	.293	.700	.013
37 (1)政府一向都很壓迫臺灣本土的文化	2.607	.982	.316	.478	-.406
36.您認為中國悠久的文化值得驕傲嗎?	0.690	1.111	-.202	-.039	.707
35.有些人相信有些文化比別的文化好...	2.589	.816	.074	.033	.681
解釋變異量 %			21.9	20.4	16.6

文化態度的因素相關矩陣

	文化貧乏	建構本土文化	認同中國文化
文化貧乏	1.00000		
建構本土文化	.21032	1.00000	
認同中國文化	-.13082	-.06294	1.00000

量超過 .40 的兩題是有關對臺灣社會文化的總體評價，即覺得臺灣社會文化貧乏，太現實功利，此一因素的解釋量為 21.9%。第二個因素則在強調建立本土文化，認為政府以往壓迫臺灣本土文化、應將臺語訂定為國語之一、以及建立自主的文化，這個因素的解釋量為 20.4%。第三個因素主要在相信有些文化比較好，而又認為中國文化值得驕傲，因素解釋量為 16.6%。三個因素總共的解釋量為 58.9%。由於是斜交轉軸，因素之間根據分析是有顯著相關的，其間認定文化貧乏與建立本土文化態度上有正向的相關，而這兩個因素又和強調中國文化優越性呈負相關。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大體上我們發現了臺灣民眾在文化評價上，可能受統獨之爭的影響，對臺灣本土文化和中國文化有著相反的評價。本研究認為這種情形應該會對不同音樂的喜好，至少在閩南語和國語流行歌曲的喜好上有所影響。

家庭文化設備的測量：在第二期第五次的調查中，我們在兩份問卷中都加了家庭文化設備的調查。其主要理由是在探討文化和宗教現象時，家庭文化設備的狀況由於對接觸文化產品而言是重要的憑藉，必然與不同音樂的品味和喜好有關。在這組題目中，被問及的文化設備項目有：音響、攝影機、繪畫、彫刻、攝影作品、鋼琴、祖先牌位、神像、古董、錄音帶、雷射唱片等等。從這些設備之有無及數量，根據因素分析，我們抽離出三個頗有意義的因素，分別是藝術資財、神像牌位、與音響設備（見表二）。在藝術資財這個因素上荷量超過 .40 的有攝影機、繪畫、彫刻、攝影作品及其複製品、鋼琴與古董，因素的解釋量為 16.7%。在神像牌位因素上，很清楚的就是這兩個項目聚合在一起，解釋量為 16%。最後在音響設備這個因素上，含有音響與唱片兩個項目，解釋量為 15.4%。

生活滿意程度的測量：在調查文化與價值時，二期五次的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將生活滿意程度納入。主要的理由是在調查文化與價值這些較深層的社會心理現象時，若能再從行為上或具體的生活上來

表二：家庭文化設備的因素分析 (n=1852)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荷量		
			藝術資財	神像牌位	音響設備
55 (1)音響	.67441	.46860	.24197	-.02394	.81896
55 (2)攝影機	.16253	.36893	.48767	-.11143	.24361
55 (3)繪畫、攝影 雕刻(塑)(眞品)	.19233	.39402	.54826	.09391	.19828
55 (4)繪畫、雕刻 (塑)(複製)	.25756	.43729	.63504	-.06423	.20552
55 (5)繪畫(未裱)	.13553	.34229	.63274	-.07590	.15995
55 (6)鋼琴	.16091	.36745	.51503	-.11308	.12413
55 (7)祖先牌位	.56048	.49633	-.09256	.86732	-.11249
55 (8)神像	.54212	.49822	.02039	.86776	-.06938
55 (9)古董	.07073	.25638	.58461	.15279	.00056
55 (10)錄音帶、 唱片、CD	.85583	.35126	.19878	-.13291	.82165
解釋變異量%			16.7	16	15.4

家庭文化設備的因素相關矩陣

	藝術資財	神像牌位	音響設備
藝術資財	1.00000		
神像牌位	-.02994	1.00000	
音響設備	.25265	-.11839	1.00000

探究文化與價值的影響就會更有意義。可是限於題數，行為的種類又太多，所以最後挑出生活滿意程度作為一種可能有意義的指標。生活滿意程度在臺灣和大陸，以及許多社會裡都是調查過的重要社會變項。這次調查中，我們選擇了婚姻生活、親子關係、工作狀況、財務狀況、休閒生活和文化活動幾項，以百分制方式測量。根據因素分析的結果，可抽出三個因素(見表三)。分別是休閒文化、婚姻親子、及工作財務。在休閒文化因素上主要包含了休閒生活、文化活動、和財務狀況。前

表三：生活滿意度的因素分析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荷量		
			休閒文化	婚姻親子	工作財務
43 (6)滿意程度：文化活動	54.50900	37.50980	.89407	.15882	-.14788
43 (5)滿意程度：休閒生活	64.94345	22.08356	.73457	.29965	-.56396
43 (1)滿意程度：婚姻生活	82.45524	14.56791	.19753	.86864	-.21529
43 (2)滿意程度：親子關係	84.61418	13.34131	.14584	.82821	-.36958
43 (3)滿意程度：工作狀況	77.68111	13.39752	.13951	.30751	-.88153
43 (4)滿意程度：財務狀況	68.88046	18.49457	.51824	.35927	-.76136

生活滿意度的因素相關矩陣

	休閒文化	婚姻親子	工作財務
休閒文化	1.00000		
婚姻親子	.21222	1.00000	
工作財務	-.29015	-.34263	1.00000

兩者被納入，顯示了現代社會中文化與休閒的緊密關係，而財務狀況被納進這個因素也頗有意義，可能顯現休閒與文化還是和財務有關，也透露了社會階層的影響。在第二個因素，婚姻親子方面，婚姻生活和親子關係緊連在一起是自然的現象，而值得注意的是工作與財務狀況兩項也有 .30 以上的荷量，約略顯示了對婚姻與親子關係是否滿意多少和工作與財務有關。也因此第二和第三兩個因素之間也有高達 .34 的相關。最後工作財務此一因素包括了工作和財務狀況及休閒生活，同時婚姻與親子關係也各有 .22 和 .37 的因素荷量。總之，一方面可以清理出三個有意義的因素，在另一方面則這三個因素之間卻也有相當關係存在。

音樂喜好的測量：做為研究分析的依變項，關於音樂喜好原來是一組測量對各種主要音樂喜好程度的量表。在扣緊本文相關的主題時，我們根據這些題目設計了幾個不同的指標。首先，我們運用因素分析的技術，將七類音樂喜好的程度凝聚成三個因素（見表四）。第一個因

表四：音樂喜好的因素分析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荷量		
			西洋古典	閩國日流行曲	民謠
42 (4)西洋流行歌曲	3.04489	1.05703	.82150	.26650	-.03475
42 (7)古典音樂	3.26986	1.08945	.74251	.07252	-.42075
42 (1)閩南語流行歌曲	3.97893	.83788	-.31381	.76307	-.23389
42 (2)國語流行歌曲	3.79579	.85593	.34052	.73510	-.12759
42 (3)日本流行歌曲	3.02432	1.06280	.16569	.60620	-.14795
42 (6)台灣民謠	3.79016	.84058	-.02319	.24403	-.88327
42 (5)中國民謠	3.55357	.94751	.31705	.16305	-.84536

音樂喜好的因素相關矩陣

	西洋古典	閩國日流行曲	民謠
西洋古典	1.00000		
閩國日流行曲	.10484	1.00000	
民謠	-.12775	-.19109	1.00000

素包括了西洋流行歌曲及古典音樂，這都是源自西方而流行於全球的音樂，也是本文在序論中一直強調的當今世界各地兩種不同時代產生而又同時流行的主流音樂，顯示了西方音樂文化對全球無遠弗屆的影響。第二個因素包含了閩南語、國語和日本流行歌曲。在臺灣，本來閩南語就是主要的語言，閩南語流行歌曲相當普遍，而國語流行歌曲在戰後也十分流行，兩者之間，不只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甚至也有相對同化的情形。日本流行歌曲則在日據開始就對臺灣流行歌曲產生影響，而在戰後甚至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臺語和國語歌曲很多都抄襲自日本歌曲。三者之間結合成一個因素是有其根由的。第三個因素是民謠，包括了中國民謠和臺灣民謠，有趣的是還包括了古典音樂。從這裡可以看出民謠有別於流行歌曲，而與較嚴肅的古典音樂有相關。

即使對某些類音樂喜好間有相關而結合成同一因素，但對各種單一的音樂的喜好也各自有各自的意義，也有不同的社會性的關聯。例

如，閩南語流行歌曲是閩南人主要的最接近的音樂，國語人口自然就比較疏遠些。西洋流行歌曲又和古典音樂有所不同。而臺灣民謠對臺灣人所帶動的感情和感受也和中國民謠有所差異。因此，在分析中，我們也以民眾對各別音樂的喜好做為依變項，分別加以統計分析，以期獲得更多更有意義的結果。

又由於自一九七〇年底以來，臺灣本土意識逐漸興起，在文化上在音樂上都受到本土化的影響。相對的，大陸族群則因聚居等隔離因素，對本土或來自大陸的音樂就又可能和本土意識有相互衝激情形。於是，在這個研究中，我們又設計三個指標來測度對閩南語和國語流行歌曲間的喜好差異，來探討與省籍和本土意識間的可能關聯。結果並沒有增加什麼有意義的證據，在本文中也將略出對這一試驗結果的討論。

三、臺灣音樂文化的整合與對立

音樂，尤其是流行歌曲，往往和社會有密切的關係，也和語言等日常文化結合在一起。在臺灣，閩南語流行歌曲的形成，如前所引述，在一九三〇年代就開其端。到光復後，國語流行歌曲成了主流，再加上語言政策和民間文化流傳的互動，使得閩南語和國語流行歌曲不但並存，更使得民眾對這兩種語言的流行歌曲都接受而不互斥。在過去近五十年的演變中，閩南語和國語歌曲也有相互同化的現象。至今，則由於國家語言政策的鬆動，國臺語同台或穿插演出的情形已相當普遍。不過，在近十多年來，臺灣意識的興起，乃至政治等領域本土化的趨向，對部分人而言，臺語有其情感、政治意識和象徵的意義，在音樂上也因應而有對立的情勢產生。

根據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五次調查，有關對各種音樂喜歡程度的分布，也可以看出一些有意思的現象。就對個別音樂

的喜好程度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喜歡閩南語流行歌曲的佔了百分之八十六的絕對多數，是排名第一的（見表五）。其次則是國語流行歌曲（百分之八十）。其餘的音樂類別受民眾喜愛的程度依序是臺灣民謠、中國民謠、古典音樂、西洋流行歌曲和日本流行歌曲。這樣的分布狀況顯示了國台語歌曲與民謠並存的現象，而西洋古典與流行以及日本流行音樂雖較不為大多數民眾所喜歡，但其對國台語歌曲的影響亦不可忽視。

如果我們將各種音樂做一些組合，就更能看出其中分分合合的狀況與意義。在表一中，我們又看到在做了不同組合後的分布狀況。首先，我們可以發現同時喜歡國語和閩南語流行歌曲的高達四分之三。這種情形大致說明是相合而不相斥的情勢。這個比例遠超過其他任何的組合，也可以顯示這兩種音樂同時真正流行的社會趨勢。

有幾種組合看起來另外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意思。例如，喜歡古典音樂和中國與臺灣民謠的約有百分之四十，這可能顯示了非流行而所謂的嚴肅的正統的音樂也有相當多的民眾會喜歡。若再考慮喜歡古典音樂的有百分之五十一，則臺灣音樂文化似有良好發展的空間。這在世界音樂文化的發展上也會有其意義。在西方兩三百年前發展出來被視為是精緻的而蘊藏豐富藝術和思想意義的古典音樂，在二十世紀末的臺灣愈來愈被接受。是臺灣文化本身的提升？國際化？還是另有其他重要的意義，很值得未來做進一步探討。

其次還有百分之十三的民眾喜歡所有的音樂。除開一些民眾接受訪問時都答喜歡而非代表其真正意思外，也可以顯示有相當比例的人把音樂當做是生活中的背景，聽什麼音樂都可以，也可以說他們根本就把音樂當作是一種看似存在而又不存在的聲音。或許也有一些人對各種音樂真的都很喜歡，也是行家，能欣賞各種音樂中最好的。不過這種人應該很少。相對的，有百分之三的人什麼音樂他都不喜歡。這個比例相當低，可顯示在現代人的生活中，音樂是必須品。尤其在音

表五：民衆對各種音樂喜歡程度之分布

	人數	百分比
喜歡閩南語流行歌曲	1584	85.5
喜歡國語流行歌曲	1490	80.4
喜歡日本流行歌曲	776	41.9
喜歡西洋流行歌曲	807	43.5
喜歡中國民謠	1261	68.1
喜歡臺灣民謠	1461	78.9
喜歡古典音樂	948	51.2
喜歡閩南語、國語流行歌曲	1375	74.9
喜歡閩南語、國語流行歌曲、中國與臺灣民謠	996	53.8
喜歡閩南語、國語和西洋流行歌曲	657	35.5
喜歡閩南語、國語、西洋和日本流行歌曲	359	19.4
喜歡所有的音樂	245	13.2
喜歡閩南語但不喜歡國語流行歌曲	197	10.6
喜歡國語但不喜歡閩南語流行歌曲	109	5.9
喜歡古典音樂和西洋流行歌曲	406	21.9
喜歡古典音樂和中國與臺灣民謠	758	40.9
只喜歡閩南語和國語流行歌曲	65	3.5
只喜歡閩南語流行歌曲	26	1.4
只喜歡國語流行歌曲	8	0.4
只喜歡日本流行歌曲	2	0.1
只喜歡西洋流行歌曲	1	0.1
只喜歡中國民謠	4	0.2
只喜歡臺灣民謠	1	0.1
只喜歡閩南語流行歌曲和臺灣民謠	47	2.5
只喜歡國語流行歌曲和中國民謠	7	0.4
只喜歡古典音樂	5	0.3
不喜歡所有音樂	53	2.9

樂再生機器愈來愈普遍也愈來愈精良方便的狀況下，音樂對人類不可或缺的意思就很值得推敲了。

關於由於臺灣意識的興起，是否在聆賞音樂行為上，只喜歡台語歌曲而不喜歡國語歌曲。結果我們發現這種民眾佔了百分之十一。不過仔細再分辨，則其中也有一些可能是不懂國語因而不喜歡國語歌曲的。但在目前的資料中我們無法進行分解。如果不考慮這樣進一步的分辨，則我們可以聲稱文化認同對音樂喜好會有一些影響，但並不太大。在後面的討論中，我們會利用其他的分析結果再來討論這個課題。至於只喜歡國語而不喜歡台語歌曲的，則更只有百分之六。

最後，只喜歡一種音樂的人數都非常少，其比例自 0.1% 到 1.4%，而只喜歡國台語流行歌曲的也只有 3.5%。這樣的結果大體上是反過來再來證實不同類別音樂之間並不互斥的社會文化情勢。總而言之，根據各種分布的狀況，我們大體上發現了在臺灣各種音樂之間有相容乃至相互同化的現象，但也有一些對立的狀況，只是相容是主要的現象，對立則是很少的。不過，在對立中如果文化認同的問題日漸嚴重的話，在流行音樂上對立就會加重。到目前為止，在某些政治場合，會有人要你不要講「北京話」，但還沒有人叫你不要唱「北京」歌。

四、社會階層、文化認同與音樂喜好

先就民眾對七種音樂喜好程度來進行分析，大體上我們發現了社會階層與文化認同的影響。其間由於文化認同對不同音樂的喜好有明顯的不同的影響，這和上節分析所指稱的相互融合的長期趨向有所不同。將這兩個發現合併來討論，應該是很有意義的。不過，我們首先還是就各類音樂喜好程度受諸種解釋變項的影響與否來進行討論。

關於閩南語流行歌曲

從表六的迴歸分析的結果來看，性別、教育、族群、就寢時間、是否為行政主管、文化態度、生活滿意程度以及家庭文化設備等等對個人喜歡閩南語的程度都有顯著的影響。就細部的個別解釋變項和對閩南語流行歌曲間的純淨影響而言，就有很多很豐富的意義。根據統計分析結果，男性比較喜歡閩南語流行歌曲，關於這一個發現一時還想不到什麼可予以解釋的理由。其次，教育年數對閩南語流行歌曲的喜歡程度，有負的顯著影響。受教育的年數愈多，就愈傾向於不喜歡閩南語流行歌曲。這種情形至少顯示了兩種不同而重要的意義。一是閩南語流行歌曲比較是一種流行而不是精緻的文化，教育程度高的文化品味比較高，比較喜歡較精緻的文化。在另一重意義上，則是顯露了政府長期不重視，甚至可說是歧視閩南語或本土文化，於是在教育過程中就直接間接予以加強，使得閩南語流行歌曲在長期以來受到輕視。

於是受教育愈多也就愈不喜歡閩南語及閩南語歌曲。就實際的政治與文化發展情勢而言，則在八〇年代以來的本土化動向，使得閩南語流行歌曲有創新甚至抗議的精神注入，而強調這種本土或臺灣主體性的則多為高教育程度者。以目前僅以教育年數來測度其對音樂喜好的影響時，以上所提出可能的幾個解釋並無法分解。不過，所幸，本研究又納入了文化態度的三個因素，對這方面的問題尚可提供進一步討論的依據。

依統計分析結果，認為臺灣文化貧乏和太現實功利的民眾會比較不喜歡閩南語流行歌曲，但重視臺灣本土文化的民眾則又比較喜歡閩南語流行歌曲。這兩個發現頗堪玩味，因為兩種文化態度對喜歡閩南語流行歌曲的程度有著不同甚至是有些矛盾的影響。在對文化態度進行因素分析時，我們曾指出指稱文化貧乏和希望建立本土文化兩個因素間成顯著的正相關，而在目前的迴歸分析中，卻發現兩者對臺語歌

曲的喜歡程度有相反而又顯著的影響。這或許顯示了當前本土文化在發展上的一些困境。在面對閩南語歌曲較低俗的情形時，認定臺灣文化貧乏的民眾就會降低對閩南語歌曲的喜歡程度。相對的，認定臺灣本土文化貧乏的人，又傾向於建構新的本土文化。在強調本土化的過程中，就得肯定臺灣傳統文化，包括音樂、藝術等等，也因此，認同本土文化就會比較喜歡閩南語流行歌曲。若推究現今閩南語歌曲的整體性格與素質以及其內涵，則兩種文化態度的相對影響就顯得複雜而微妙了。

族群的不同會形成對閩南語流行歌曲不一樣的喜歡程度，除了原住民和閩南人喜歡的程度相近外，客家人和外省人都比較不喜歡閩南語流行歌曲。閩南人比較喜歡閩南歌曲，而客家人和外省人卻比較不喜歡，固然有其自然而然的因素，例如語言乃至其意含，感情與意緒的切合，甚至長期習慣的曲調等等，但廣播電視節目的區隔也有相當的影響。不過，近年來則若干節目已有混合播演的情形，同時在作曲作詞和演唱方面也有明顯的交流和混合。如果在語言上多元融合現象更強一些，區隔就會減少。

工作財務上滿意程度愈高就有愈不喜歡閩南語流行歌曲的傾向，除了是身份的影響外，也有著生活型態上的意義。在職位方面，行政主管與專門技術人員比較不喜歡閩南語歌曲。這應該是身份使然，而工作財務滿意狀況可說也是身份因素的一部分。對於較高層的白領階級，如行政主管和專門技術人員，尤其是閩南籍的，對閩南語流行歌曲不是不喜歡，而是喜歡其中的一小部分，例如有民謠風的，或是很流行的，整體來看反倒顯得不是那麼喜歡了。

最後，家庭藝術資財愈多就愈不喜歡閩南語歌曲，相對的，家中有音響設備者卻比較喜歡。細察家庭藝術資財所包括的物件多是較精緻的藝術作品，則擁有者比例偏低（各項擁有者在百分之十四至二十六之間），而擁有音響與唱片的家庭，則比例高達百分之六十七及八十

六，可說十分普遍。兩相比較，擁有音響和唱片正有助於聆賞音樂，喜歡閩南語歌曲者就可能擁有較多的閩南語歌曲的唱片，而擁有繪畫、彫刻等藝術品則因精緻與通俗文化間的不相容而產生不喜歡閩南語歌曲的傾向。

關於國語流行歌曲

年紀愈輕愈喜歡國語流行歌曲以及受教育愈多也愈喜歡國語流行歌曲，這兩個背景變項如此這般的影響實在有很深刻的意思，尤其在相對其對閩南語歌曲喜歡程度的影響時。首先，可以看到教育對閩南語歌曲的顯著影響是負的，但在國語歌曲上卻是正的，兩者可說正好相反。這其中顯然大有文章。在語言的使用上、在歌曲本身的性格和素質上、在傳播媒體的播映上，閩南語和國語流行歌曲都有很不相同的情況，而這種相異的情況又和教育密切關係。在語言使用上，我們可以發現不只教育上是以國語為標準語言，同時在廣播電視上也以國語為主，國語流行歌曲因此而佔有較強的優勢，這是和教育有關的。值得注意的是，國語歌曲作者與演唱者又有相當數量是來自香港，其中早年的影響外，近年來什麼天王也是香港小孩，這些人甚至不像年紀大一點的港星還唱不必相送的廣東歌，都以國語演唱。其在青少年造成的轟動，也促成了其受歡迎與教育和年齡關係。在歌曲本身的性格和素質上，現在的國語歌曲經歷了校園民歌時代的衝擊，近年來青少年偶像的製造，都可能促成教育的影響。臺語歌曲雖因政治抗議或創新的做法而有了新的面貌，但與流行歌曲應屬不同範疇。至少就全台的抽樣調查而言，就可能無法顯現其在量方面的影響。最後，在傳播媒體上，在這幾年國台語歌曲播映有穿插出現的情形，但仍然以國語為主。

在國語流行歌曲發展的過程中，到目前形成愈年輕愈喜歡國語流行歌曲的現象也是饒富趣味的。在不同時期，國語流行歌曲就有不同

的面貌，如早期有所謂上海時期之稱，即流行以上海為主傳來的流行歌曲，後來又經歷香港影響的時代，包括黃梅調，再又經過受西洋音樂影響、校園民歌、廣東歌曲，新的一波創作歌曲，乃至青春偶像炮製等階段。其歌曲愈來愈年輕，愈來愈在年輕人中流行。其間受西洋搖滾樂及晚近流行趨勢的影響，也是全球現象之一，值得注意。老人喜歡老歌，年輕人喜歡新歌，其中老歌和新歌之間的差異不只是時間先後，還有重要的音樂本質改變的歷史在。

流行歌曲在許多時候都會被認為是通俗的，是不夠精緻的。不少知識份子就對流行音樂有相當的反感與批判。國語流行歌曲曾在五〇和六〇年代被稱為靡靡之音，雖經歷了七〇年代以來諸如民歌運動的變革，但流行歌曲仍舊未免除上述的批評。於是愈認為臺灣文化貧乏而功利的，就有愈不喜歡國語流行歌曲的傾向。這其中也可能蘊含了對過重的商業手法的反感。關於文化態度方面的影響，對建構本土文化有較強企圖的人，會比較不喜歡國語流行歌曲，但並不十分明顯。其中原由大約不難理解，即對臺灣本土文化重視，相對貶低中國文化是晚近的一種流行，但雖稱之為流行，就規模而言又不是流行，所以有影響而又不怎麼有影響了。倒是肯定中國文化的傾向愈重，則愈表示喜歡國語流行歌曲，不只顯現了兩者自然的相關聯，同時也有著與本土化相對乃至相反的作用。

最後，我們又發現，行業和職位及就寢時間有顯著的影響，而族群卻少有關係。大致上，農民不太喜歡國語流行歌曲，而高層的白領階級人士也比較不喜歡。這兩種情況在意義上不太一樣，農民因習慣和傳統而比較會因喜歡閩南語歌曲而不喜歡國語流行歌曲，相對的，高層白領則因歌曲俗氣而不喜歡，正如他們也不喜歡閩南語歌曲一樣。其次，國語流行歌曲在廣播電視上佔有強勢地位，長期持久的影響，使各個族群都接受了。值得注意的是，原住民比較喜歡國語和日本流行歌曲，而對閩南語流行歌曲的喜歡程度和閩南人接近，不像客家人

和外省人那樣不喜歡。這多少說明了做爲弱勢族群，對強勢文化的因應乃至涵化的情況。至於就寢晚的人，即晚上十點以後睡覺的，比較喜歡國語流行歌曲，這種情形和這些人喜歡閩南語歌曲的狀況相近，或許和休閒方式有關。晚上去 KTV 的民眾喜歡唱的是台語和國語歌曲。他們的喜好很可能顯示了臺灣主流流行音樂和夜間休閒生活的緊密關係。

關於日本流行歌曲

整體而言，各種變項的解釋意義不是很重要，也不很明顯。其中，年齡愈大愈喜歡日本流行歌曲，應是日據時代留下的影響，年紀大的許多都受過日本教育，不但懂歌曲的意義，也會有一種親切感。不喜歡日本流行歌曲的程度，依不同族群而言，外省人最不喜歡、其次爲閩南人，再來是客家人，而比較喜歡日本歌曲的則是原住民。在這裡，外省人因文化語言沒有與日本的親近性，甚至因抗日戰爭的後續影響，更有相當的反感，比本省人不喜歡日本流行歌曲是很可理解的。至於客家和閩南人之間的差異，就有待進一步去探究了。原住民比其他族群喜歡日本歌曲，或許是語言習慣使然，也可能有反抗其他族群支配而親近曾有緊密關係的日本文化。從原住民對西洋歌曲的喜歡程度與其他族群相似，我們也可獲得佐證。我們進一步又發現愈贊成建構本土文化者，愈喜歡日本流行歌曲，似乎顯示了某些主張建構臺灣本土文化者，多少會排斥中國文化，反而對日本文化有一份喜好或肯定。於是從是否喜歡日本流行歌曲，我們大體上可以看到日據五十年留下來的微妙的影響。

關於西洋流行歌曲

對西洋流行歌曲喜好程度的影響，主要來自個人的背景變項和家庭文化設備，所有有關文化態度、生活滿意程度各方面都沒有明顯的

表六：七種音樂喜好的迴歸分析 (N=1495)

	閩南語流行	國語流行	日本流行	西洋流行	中國民謠	台灣民謠	古典音樂
性別(女)	-.106***	-.024	-.022	.061*	.063*	.009	.128***
年齡	-.024	-.138***	.112***	-.189***	.173***	.174***	.004
教育年數	-.140***	.123***	.039	.216***	.174***	.069	.198***
收入	.023	-.032	-.033	-.003	.006	.012	.011
省籍							
原住民	-.001	.048*	.068**	.030	.027	.009	.034
本省客家人	-.099***	.025	.046	.004	.020	-.019	-.017
大陸各省市	-.115***	.002	-.190***	.047	.060*	-.062*	-.022
職業別							
專門行政主管	-.079**	-.065*	.009	.060*	-.030	.007	.009
監督佐理買賣	-.017	-.030	.039	.059*	.008	.025	-.023
行業別							
一級行業	-.005	-.111***	-.078**	.018	-.069*	-.021	-.031
二級行業	.025	-.024	-.024	-.032	.042	.021	-.016
就寢時間							
20-22點	.101	.104	.037	-.076	.031	.110	.047
22-24點	.130*	.155*	.100	-.013	.082	.099	.128*
0-4點	.137*	.162*	.113	-.006	.078	.133*	.101
文化態度							
文化貧乏	-.053	-.050	-.047	-.008	-.009	-.038	.013
建構本土文化	.085**	-.041	.057*	.003	-.033	.071*	-.037
認同中國文化	.042	.086***	.028	.012	.083**	.013	.048*
生活滿意度							
休閒文化	9.591E-05	.030	.054	.037	.062*	.035	.101***
婚姻親子	.042	.075**	.009	-.003	.069**	.089**	.048
工作財務	-.063*	-.003	.009	-.040	-.017	-.031	.016
家庭文化設備							
藝術資財	-.056*	-.026	-6.558E-04	.095***	.026	.034	.127***
神像牌位	.030	.018	.050	.019	-.006	-.006	-.039
音響設備	.070*	.079**	.012	.083***	.065	.064*	.044
R Square	.10066	.12877	.07354	.25596	.10016	.05562	.16562

註：P *** < .001 ** < .01 * < .05

影響。其中，教育程度的影響最大，顯示了西洋流行歌曲在語言與音樂上必須有一些英語能力和接受那種音樂風格的心態，其實這都與接受教育年數有密切關係。以美國為主的流行音樂成為二次大戰之後席捲全球象徵西化和現代化的重要通俗文化現象，在亦步亦趨以美國模式為發展典範時，對這種通俗文化的接受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在蘇聯開放後，美國搖滾樂和漢堡同時登陸，引起熱潮。在中國大陸，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創造的中國搖滾帶動了年輕而高教育程度者的流行。也因此白領階級又比藍領階級喜歡西洋流行歌曲。

西洋流行音樂向來是年輕人的重要流行文化，在歐美是如上，在臺灣及東方國家也都如此。近十年來，臺灣年輕消費人口快速成長，而消費能力也大為提升，西洋流行音樂界的重量級歌星與合唱團陸續來台演唱，常常造成轟動，這當然也是年輕人口形成一個極熱絡市場的緣故。在國語流行歌曲方面，經過校園民歌和青春偶像的塑造流行，喜好者有年輕化的傾向，而新近的年輕演唱所走的路線幾乎就和當前西洋流行音樂一樣，有些可以說是翻版。因此，喜歡這兩種音樂的應該是同一些年輕人，至少應有很高的重疊性。

聽西洋流行音樂一方面有些歌迷講求音響效果，而另有更多的年輕人則愈來愈同時擁有自己的小型音響或手提音響，甚至隨身聽，這對於頻繁接觸西洋音樂就有促成的作用。也因此，可看到家庭藝術資財與音響設備之擁有具有顯著的影響。這兩個有關文化資源的變項只在對西洋流行歌曲的喜好上同時發生促進的作用，對其他的音樂喜好的影響多只有一項有作用，甚至在閩南語流行歌曲上還是負向的。其間，可能顯現了西洋流行音樂還伴隨著藝術資財的收集，如海報、攝影、繪畫等。所以這代表著一種生活文化的風格，而不單是對音樂的喜好而已。

就複迴歸係數而言，在西洋流行歌曲喜好的分析上是最大的。R平方為 .256，比次高者古曲音樂的 .166 也高出許多。主要的原因在於喜

歡外國音樂的比例接近一半，變異量大，自變項的解釋量就可能大一些，在外國音樂中，民眾喜歡日本歌曲的有百分之四十二，喜歡西洋流行歌曲的為百分之四十四，喜歡古曲音樂的有百分之五十一。相對的，喜歡本國各類音樂的最少也有百分之六十八，而其他則在八成左右甚至高達百分之八十六。所以其變異量本來就小，可能被自變項解釋的量就不會大。換言之，絕大多數人都喜歡某一類音樂，民眾彼此之間的差異就不太重要了。當有一半人喜歡而另一半人不喜歡某一類音樂時，民眾在某些方面的差異就可能會有影響。然而依變項的變異量大，並不必然會使自變項的解釋量增加，這還必須要看自變項是否有解釋力。於是，我們一方面固然可以看到喜歡西洋流行歌曲和古曲音樂程度被解釋的量各有百分之二十六和百分之十七，比國語流行歌曲的百分之十三，和閩南語流行歌曲的百分之十，以及中國民謠的百分之十和臺灣民謠的百分之六都高出許多，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卻也看到日本流行歌曲的被解釋量卻也只有百分之七。這就表示，我們目前所設定的自變項頗能解釋西洋流行歌曲和古曲音樂為什麼為人喜歡和不喜歡了。這個分析結果的實質意義就在於年齡、教育、音響設備和藝術資財對喜歡西洋流行歌曲的影響。教育的影響在所有音樂中是最大的，似顯示現代教育基本上是西化的主要力量，這當然不只是教育程度愈高，英語能力愈好而已，而可能是整個生活風格和心態都受到西化極大的影響。年齡的解釋量也是所有音樂中最大的，再度顯示西洋流行音樂是年輕人生活和文化風格的主要特色。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在臺灣才如此，而是一個全球的趨勢。

關於民謠

我們在這裡把中國民謠和台灣民謠合在一起來探討，一方面是因為兩者都是民謠，性質比較接近，在另一方面，則可能因文化態度而有相對乃至相反的狀況，如一併討論，可以更突顯其意義。關於相類

似的部份，喜好民謠者多為年齡大和教育程度較高者，擁有音響者也比較喜歡民謠。從這樣的結果來看，民謠本是通俗的大眾的文化，但對現代人而言，卻又都是年代久遠的藝術，更具有精緻文化的特質。民謠之有別於流行歌曲，即在於人們認定其具有這種較高而持久的文化意義。當初，唱我們自己的歌的運動，就是以民歌運動自許，而提倡者則都是教育程度高的大學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對臺灣民謠的重視也是由知識份子所倡導，尤其是在政治社會反對運動興起時。比較喜歡民謠的民眾在婚姻親子關係上也較為滿意，大約也顯示了類似階層的效果。在其他生活面向上的滿意程度則與喜好民謠的情況少有關係，是否顯現重視家庭關係的影響還有待進一步推敲。

在臺灣意識建立的過程中，也以臺灣民謠為重要的文化象徵，雖然其中大多數都不是民謠而是日據時流行的創作曲，如雨夜花、望春風、望你早歸等，也有誤以日本歌為臺灣民謠的。但就日常的認知，這種錯誤都不重要，而在表現對民謠的看重，因為它比流行文化更有本土意義。也就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民謠和臺灣民謠受著不同文化態度因素的影響。對中國民謠而言，對中國文化的肯定有顯著的正向的影響，對臺灣民謠而言，建構本土文化的傾向愈強，也就愈喜歡臺灣民謠。在前面討論閩南語流行歌曲和國語流行歌曲時，我們也曾發現類似現象，即認同中國文化者比較喜歡國語流行歌曲，而主張建構臺灣本土文化者就比較喜歡閩南語流行歌曲。於是這種分離得相當清楚的效果，可以讓我們感受到當前臺灣的文化認同的現象和問題。

關於古典音樂

有人說古典音樂是歐洲當時的流行音樂，這是不對的說法，其實當時不是沒有流行音樂，而不是這種人類最精緻的古典音樂。佛洛伊德在分析馬勒的音樂和心理時，就曾指出馬勒有些作品有時會有通俗街頭音樂的殘餘。也有不少人提到古典音樂就會馬上回應說我不懂，

兩三百年前的流行音樂現代人都聽不懂，豈不是表示人類文化在退化？其實古典音樂是人類精緻文化最重要的資產。也就是如此，古典音樂果真是需要一些教育文化的薰陶才會讓人發生興趣的。在臺灣，在教會和日本教育體系下引進了西洋音樂，也就是西洋古典音樂。自此之後，教育乃是促成人們接觸和喜愛古典音樂的重要的制度性力量。但是由於重視讀譜唱歌，不重欣賞（朱元鴻，1993），教育促成喜愛古典音樂的作用也不是很大。到了大學，則更是間接的影響，因為除了極少數通識課程和音樂本科外，多沒有音樂的科目。所以教育有顯著的影響，但不是非常大。可是，要特別指出的是，即使不是非常大，但相對於教育對喜好其他音樂程度的影響卻又大出許多，僅略小於西洋流行歌曲。因此，我們還是可以很明確地看出古典音樂乃是一種重要的身份文化。於是也只有當人們在休閒和文化活動上，在婚姻親子關係上獲得較滿意生活時，就會傾向喜歡古典音樂。也只有在擁有較多的藝術資財時，就比較喜歡古典音樂。

對古典音樂喜好有影響的還有三個變項，但似乎不是不太好理解，就是其意義並不那麼重要。第一個是女性比較喜歡古典音樂，這個結果好像很可以接受，例如感覺上女孩學音樂的比較多，不論是在小時候或是在大學音樂科系裡都是如此。然而究竟一般而言，女性是否喜歡古典音樂或其他的藝術或生活風格以及其原因如何，就很不好解析。朱元鴻（1993:143）從人們對兒子和女兒教養方式的不同來解釋，指出教養方式使「男孩較傾向於科技知識的發展或因較被期待擔負生計而著重於生產技能的學習，而女孩則傾向於發展美術舞蹈或是文藝欣賞的性向」。在人文學科方面，女學生佔多數也是事實。不過我們可能還需要更直接的證據與解釋。至於就寢時間在晚上十點到十二點的人比較喜歡古典音樂，在所有這次調查的音樂種類當中，就寢時間只對國台語流行歌曲和臺灣民謠及古典音樂有顯著影響，對前三者我們在前面曾指出和 KTV 所代表的通俗文化可能有關，但對古典音樂的影響

可能就有不同的意義。一方面，只在晚間十時至十二時上床的比較喜歡古典音樂，半夜以後睡覺的倒又不是這樣，這是和國台語流行歌曲不同的。在另一方面，許多電台都喜歡在晚間十點以後播於古典音樂（廖玫玲，1994）。似乎古典音樂是一種夜間欣賞的音樂，但不是深夜乃至通宵的娛樂。有趣的是，在一九九五年臺北成立了一個專門播放古典音樂的電台，全天播放，頗受城市中產階級尤其是開車人士歡迎。最後，比較肯定中國文化者比較喜歡古典音樂，好像有那麼一點點保守的特徵，卻但又不十分明顯。對古典音樂的喜好是否有 Daniel Bell 所說的在文化上較持保守主義的意思，值得進一步探究。

關於三類音樂類別的綜合討論

根據因素分析，我們可析出三個有關音樂的喜好因素，即西洋流行與古典音樂、閩國日流行歌曲、及民謠。大體而言，這綜合性的分析結果與前述閩別分析時的發現差異並不明顯。值得提出來討論的有省籍和文化態度的影響。在省籍方面，比較喜歡西洋流行及古典音樂的，是外省人，其次是原住民，再次是客家人，最後是閩南人，實際深一層的涵義還有待推敲。閩南族群不喜歡西洋古典與流行音樂，這是否與臺灣意識興起有關，很值得進一步觀察。至於文化態度方面，主張建構本土文化者，比較不喜歡西洋古典和流行音樂，這在前面分析單一音樂喜好程度時並非如此，是由於因素分析法增進了測量的信度的緣故。這兩種西方不同時期產生而又同時流行於現代的音樂，無疑地是外來的，與臺灣文化有相當的疏離是可能的，也因此兩者之間存在著負的顯著的純淨相關。

至於國閩日流行音樂所形成的一個因素，所受到的各項解釋變項的影響則主要在於外省人總的來說，比較不喜歡西洋流行音樂以外的流行歌曲，原住民則除了不喜歡中國和臺灣民謠外，什麼都喜歡。這個發現到底原因何在，頗費思量，而一時也沒有答案。就寢時間較晚

表七：音樂喜好因素分數的迴歸分析 (N=1495)

	西洋古典樂	閩國日流行樂	民謠
性別(女)	.124***	-.079***	-.046
年齡	-.123***	-.063	-.215***
教育年數	.283***	.009	-.114**
收入	-.012	-.016	-.017
省籍			
原住民	.047*	.049*	-.016
本省客家人	.035	-.020	.014
大陸各省市	.054*	-.128***	.019
職業別			
專門行政主管	.046	-.058*	.018
監督佐理買賣	.022	6.075E-04	-.007
行業別			
一級行業	-.027	-.082**	.046
二級行業	-.035	-.014	-.037
就寢時間			
20-22點	-.042	.103	-.095
22-24點	.041	.166*	-.118
0-4點	.027	.181**	-.130*
文化態度			
文化貧乏	.010	-.071**	.022
建構本土文化	-.058*	.052	-.024
認同中國文化	.040	.068**	-.052*
生活滿意度			
休閒文化	.077**	.031	-.061*
婚姻親子	.015	.056*	-.091***
工作財務	.006	-.036	.023
家庭文化設備			
藝術資財	.121***	-.038	-.041
神像牌位	-.009	.049	.016
音響設備	.058*	.083**	-.065*
R Square	.31327	.08823	.07518

註：P *** < .001 ** < .01 * < .05

者，也多半比較喜歡國閩日流行歌曲，這讓人聯想到在 KTV 主要還是唱國語及閩南語流行歌曲，是否與這個結果有所關聯，尚無法有有力的證據和論述。在文化態度上面，三個因素都對國閩日語流行歌曲有顯著影響。認為臺灣文化貧乏的人多不喜歡流行音樂，這是嚴肅批評必然的結果。比較不易解讀的是對建構本土文化傾向者和肯定中國文化者卻都對國閩日語歌曲比較喜歡。這種發現表面上看來是矛盾的，也和前面的發現不太一致。可是目前還無法加以解讀。或許由於因素分析求同去異，反倒使得有微妙差異的國台語歌曲合在一起而模糊了文化態度的影響。最後，對於民謠喜好程度的影響，大體倒沒有什麼與前面分析相不一致的地方。只是要特別在這裡說明的是，表七中的迴歸係數符號要倒過來理解。因為，在因素分析過程中，這個因素的荷量全為負值，因此測量的方向和原先的不同。

五、討論與結論

在對民眾對各種音樂的喜好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有一些社會階層和文化認同的變項對民眾對不同音樂的喜好程度有著顯著，但也有不同意義的影響。這樣的發現值得在此做進一步結合性的分析。總的來說，女性比較不喜歡閩南語流行歌曲，而比較喜歡古典音樂、西洋流行歌曲和中國民謠，在國語、日語歌曲及臺灣民謠方面則兩性並無明顯差異。在年齡方面，年齡愈大愈喜歡日本流行歌曲、中國民謠和臺灣民謠，年紀愈小則喜歡國語流行歌曲和西洋流行歌曲，在閩南語和古典音樂上則年齡並無顯著的影響。其次，在對文化態度上，愈認為臺灣文化貧乏的民眾就愈不喜歡閩南語和國語流行歌曲，認同本土文化者則比較喜歡閩南語流行歌曲和臺灣民謠，認同中國文化者就比較喜歡國語流行歌曲和中國民謠及古典音樂。最後，藝術資財多的喜歡古典音樂及西洋歌曲，而不喜歡閩南語歌曲。音響設備的

擁有除了對是否喜歡日本流行歌曲沒有影響外，都有助於對其他各類音樂的喜好。

年齡的顯著影響看起來和流行趨勢有關，與年齡呈負相關的是國語及西洋流行歌曲。國語流行歌曲在臺灣依舊居於強勢，而目前所流行的都以青少年為訴求對象。西洋歌曲向來就是青少年文化的重要特徵。校園民歌運動以來的國語流行歌曲在根源上也和西洋流行音樂有深厚的關係。近年來，結合強勁舞蹈的青少年偶像當紅，更使有些國語流行歌曲和西洋歌曲之間的差異變得模糊起來。日本歌曲和中台民謠相對於強勢流行的音樂，不是年輕人所愛，而和年齡呈正相關。最後，最廣泛流行的閩南語在各年齡層受到喜愛的程度並無差異，或許顯示了閩南語流行歌曲新舊並存，而近年來又有不少新歌，如「愛拼就會贏」等，又多適合各個年齡層。至於在古典音樂方面，年齡不是重要因素，大約乃是在於教育發揮了重大影響的緣故。

雖然晚近有不少知識份子很喜歡抗議性很強的臺語歌曲，也有一些臺灣意識比較強的高教育程度者更喜歡臺語，但若就全臺灣的成年人口而言，教育程度愈高，喜歡閩南語流行歌曲的程度就愈低，而且這是所有自變項中解釋力最大的一個。於是就整體狀況而言，閩南語流行歌曲可能還未能提升到更吸引高教育程度者的地步。除了教育對喜好閩南語流行歌曲呈負向影響，以及對日本歌曲的喜好沒有影響外，教育對其他音樂的喜好都呈正向的影響。不過若推敲其中的意義，則似乎又各自不同。有些時候是因為那一類音樂比較精緻，民眾需要比較高教育水平才會欣賞，如古典音樂。也有的是一種某種教育程度以上才可能流行的文化，如西洋流行歌曲及部分的國語流行歌曲。也有一些就是需要由教育所培養出來的某些能力，如古典音樂和西洋流行歌曲。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對各種音樂的喜好，除了對日本流行歌曲外，在所有變項中影響都是最大的。文化態度，特別是文化認同，對不同音樂的喜好程度有著預期的影響。強調本土文化者比較喜歡本

土音樂，即閩南語流行歌曲和臺灣民謠，標準迴歸係數都為顯著的正值；而對國語流行歌曲和中國民謠就比較不喜歡，標準迴歸係數均為負值，但都不顯著。相對的，認同中國文化比較強的民眾就比較喜歡國語流行歌曲和中國民謠。有意思的是，本土文化認同強者也喜歡日本歌曲，而中國文化認同強的，卻又比較喜歡古典音樂。雖然相關不是很強，倒也耐人尋味。至於在態度上認為臺灣文化貧乏和太功利的民眾對閩南語和國語這兩種最流行的音樂有顯著的不喜歡的傾向。或許這兩種流行文化的庸俗性和商業化是引起這些人不豫的主要原因。

民眾對各類音樂的喜好一方面可以反映在錄音商品的銷售量上，在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唱片業行銷行動的影響。在唱片和錄音帶的進出口上，在一九八八年，共進口約十二萬九千多種，四百五十二萬多張。到了一九九四年，進口增加到十六萬六千多種，近七百萬張（行政院新聞局，1995）。六年之間種類數增加了兩成九，張數更增加了五成。加上國內本身內銷的唱片，在這方面的消費實際上就反應了民眾的音樂喜好。根據錄音製品的出版種類，我們約略可以進一步了解各類音樂在臺灣的市場。一九九〇年的統計顯示，國語歌曲佔了百分之二十九，居第一位，其次是西洋歌曲，佔百分之二十二，中西演奏曲和宗教類，各佔約百分之八，西洋古典歌曲佔百分之七，居第五位。兒童唱遊約百分之七弱，閩南語歌曲為百分之六，居第七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2）。由於西洋音樂進口的佔多數，在銷售量上應該更多。同時種類數和出版量也會有些出入。不過，總體而言，銷售量應該和種類數相當，即使有特別暢銷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出版種類數的排名和民眾的喜好程度的順序並不完全一致。其間，閩南語歌曲是最受民眾喜愛的，但在出版種類數目上卻落到第七位，可能顯示晚近對臺灣認同的增強，也可能種類數和銷售量之間的差距。相對的，西洋歌曲出版種類多，但在民眾喜好程度上卻退居第六，顯示喜好者有年齡和教育上的特點，就全部樣

本考量時，喜好程度就會偏低。最後，在古典音樂方面，雖然在世界市場上，佔所有唱片銷售量的一小部份，但在臺灣情況在近幾年似乎有些特別。很可能古典音樂和其他音樂唱片銷售量相差反而沒有西方社會那樣懸殊。於是在表示喜好程度上，即使排名第五，也有百分之五十的民眾表示喜歡，雖然表示喜歡的人不一定自己會去買唱片，但是喜歡卻也可以增強購買的動機。臺灣近幾年在古典音樂唱片出版和行銷上都相當活躍。幾家代理大唱片公司如笛卡／福茂，菲立普／寶麗金等不斷推出舊錄音的新系列唱片，也有其他公司出版古典音樂選粹，業績都不錯。這種愈來愈接受西洋古典音樂的現象值得進一步觀察和分析。在音樂錄音製品的生產和消費方面還有許多問題值得加以深入探討（吳委真，1994），但已超出本文的範圍，在此不再討論。

在本文中，我們設定古典音樂是比較精緻的文化，有些論者不以為然，甚至主張都市上階層精英或政府的文化政策促成古典音樂成為被肯定的高級文化。暫時不去爭論到底古典音樂是不是精緻或高級，值得在此提出的是，在二十世紀末臺灣社會裡各級音響設備之普及，特別是錄音機和雷射唱機之普遍為民眾所擁有，以及唱片和錄音帶之不斷擴大的發行人數，在教育同時擴充下，音樂，包括古典音樂，錄音製品成為人們私人可以擁有，甚至成為相當普遍的消費品。這樣所促成的音樂的流行，和由有學識和上層精英以及國家去推展促成交響樂團及古典音樂之發展是很不一樣的(DiMaggio, 1991)。音樂錄音商品可供大家極方便地消費和聆賞，再加上教育程度及各類傳播媒體的影響，所謂的精緻或高級音樂文化就日漸普及起來。相對的政府和學院派音樂界和少數社會上層精英努力支持的音樂演奏硬軟體卻不見得有所發展（郭曉玲、傅仰止，1996）。

本文限於是根據問卷資料所做的分析，無法對一些音樂與社會，尤其是流行音樂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做更深入的分析。例如，流行音樂本身就是極為資本主義化的消費商品，單價低、大量生產、強勢推銷、

市場取向等等。在資本主義主導下，音樂是廉價而又最賺錢的商品 (Longhu, 1995)。甚至論者從後現代主義就此進行論述 (Featherstone, 1991) 或從批判理論和社會主義立場來批判 (Attali, 1977)。本文暫時無意就此做進一步探討。校園民歌運動的成功及流行是商品化的結果，而民歌運動的消失與歌曲流行趨勢又都受商品化的左右。至於晚近青少年偶像的塑造與推銷更是花費鉅資而靠包裝的純商業行為 (文瀚, 1994)。對於流行音樂其他的重要社會特性，如其休閒的意義、與工作間的關係、乃至與不同時代間的關係 (Frith, 1993 [1978]) 在本文中都未能論及。不過，我們相信根據抽樣調查所做有關民眾音樂喜好的分析仍有其重要的意義，可以讓我們掌握住流行文化的大的趨勢以及其和社會文化變遷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如果在目前的基礎上，再去追究若干細部及更深層的現象，則此類研究對民眾生活風格或生活文化的了解，就會更有學術上的貢獻。就如朱元鴻的深入而廣泛地針對臺中市民眾生活風格的調查，如進一步擴展到全台，或臺北，並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則我們對這類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社會文化現象就更能有所掌握。有不少具理論意含的主題，若研究者具有洞察力又有妥善的設計，應可一步的調查而得到實質性的研究素材。

參考書目

- Attali, Jacques
 1977(1995) *Bruits: Essai sur L'economie Politique de la Musique*. Pres-
 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學。宋素鳳、
 翁桂堂中譯，臺北：時報文化。
- Bell, Daniel
 197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 Benski, Tova
 1989 Ethnicity and the shaping of musical taste patterns in an Israeli
 urban community, *Social Forces* 67(3):731-749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Maggio, Paul
 1982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189-201.
 1991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Boston: the cre-
 a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base for culture in America, in C.
 Mukerji and M. Schudson (eds.) *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Cultural Studies*, pp.374-397 Ber-
 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conomist
 1994 The classical music business, *The Economist*, December 25th
 1993—January 7th 1994:118-120.
- Featherstone, Mike
 1991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 Frith, Simon
 1978(1993) *The Sociology of Rock*. Constable & Co. 搖滾樂社會學。彭
 倩文中譯，臺北：萬象圖書。
- Longhu, Brian
 1995 *Popular Music and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atterson, Orlando
 1994 Ecumenical America: global culture and the American cosmos,
World Policy Journal 11:103-117.

Williams, Nicholas

- 1994 Songs of praise,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21 January 1994:32-33

文 瀚

- 1994 流行音樂啓示錄。臺北：萬象圖書。

朱元鴻

- 1993 臺中市生活風格研究(I)。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報告。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1992a 文化統計彙編。該會印行。

- 1992b 文化統計。該會印行。

行政院新聞局

- 1995 中華民國出版事業統計概覽。該局印行。

亦 威

- 1991 臺灣新音樂的顛覆和矛盾, 聯合文學 7(10):95-98。

吳委真

- 1994 抽絲剝繭談臺灣的流行唱片, CD 購買指南 20:62-85。

許常惠

- 1991 臺灣音樂史。臺北：全音樂譜出版社。

張南生

- 1991 民歌沒落了! ——從中國現代民歌看七〇年代臺灣知識分子與流行文化的關係, 聯合文學 7(10):112-114。

張鈞維

- 1991 流行歌謠詞曲作家大事記(初稿), 聯合月刊 7(10):130-151。

郭曉玲、傅仰止

- 1996 音樂會的藝術休閒功能與社會性: 比較兩場鋼琴獨奏會。手稿本。

黃毅志

- 1994 社經背景與地位取得過程之結構機制: 教育、社會資源及文化資本。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廖玫玲

- 1994 古典音樂廣播節目份量知多少, CD 購買指南 22:66-68。

譚 石

- 1991 臺灣流行音樂的歷史方案——一個初步的觀察, 聯合文學 7(10):72-80。

都市化、階層化與生活型態

章英華*

摘要

本文的目的在討論台灣社會的都市化對人們生活型態的影響，係以1992年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三期二次社會階層問卷為分析的基礎，取家外用餐場所、購衣場所以及喜好的音樂類型三組變項為生活型態的指標。我們假設，第一、由於台灣社會明顯的空間階層化，都市化對生活型態的影響會因控制了階層的因素之後而減弱，但在資源分布以及同興趣人口集結的影響下，都市化的效果仍然存在。第二、從資源分布來考慮，越是牽涉到直接前往特定場所的活動，都市化的影響效果越明顯；同時集中程度越高的場所受到都市化的影響也越高。第三、在現代社會生活型態是可以模仿的，而在都市地帶這種模仿的可能性越高，在接納了較高社會階層的某些生活型態之後，個人的社會階級的認同可能會偏向較高的階級，因此生活型態對主觀階級認同的影響，可以有著獨立於階層變項的意義。

根據我們的發現，應該可以肯定，都市化程度對生活型態的影響有其獨立於社會階層化的意義，而大都市以及部分生活型態對階級認同的影響也不是階層的效果，這都呼應了我們的假設。不過，低層級以及高層級的消費行為均共同展現了都市效果；而流行與興趣之間，我們的研究比較肯定了流行的效果；在主觀階級上，我們指出，都市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

化以及用餐和購衣行爲，都有其獨立於社會階層的影響效果。本研究的發現所反映的資源集中的效果，也建議我們，在未來的都市研究中，必須跳出「人際關係命題」，同時兼顧自然/藝術，傳統/變遷的命題。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這樣的觀察可能更爲重要。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Status on Life Style

Ying-Hwa Chang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deal with the rural-urban differences of life style in Taiwan.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1992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We pick up three set of indicators for life style: the types of locales where people go to have meals with friends and purchasing dresses, and the types of preferred music. Our hypotheses are: first,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life style is significant and controls socio-economic status variables. Second,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on activities in which people have to go to a specific location than activities at home. Third, people with low social economic status may also mimic consumers' behavior with middle or upper-class tastes, with more mimicking in urban settings. Accordingly, urban residents tend to identify with a middle or upper-class status.

Our findings confirm that urbanization does have an impact on life style while controlling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at some indicators of life styles and urbanization do influence people's class identification. Specifically, the finding that consumers' high and low-taste behavior are both more popular in urban settings indicates an obvious urbanization effect which is unrelated to the effect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Since our findings confirm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certain human activities and its impact on class identification, it is advised that studies other than those suggested b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should be conducted.

都市化、階層化與生活型態

一、前言

在都市社會學的初期發展時，便認定現代的都市發展對人類生活有著巨大的影響。但都市社會學的討論，從 Simmel (1957) 以至於 Wirth (1938) 的討論，將重點放在都市生活對居民的社區組織和社會心理的影響。於是，社區的失落、緊密社會網絡的消失以及都市居民的心理壓力與焦慮等，就成為最主要的研究課題 (Wellman 1979)。當一般的社會學研究將都市化程度視為當然的自變項之後，都市社會學研究者反而開始對傳承自 Simmel 和 Wirth 研究有所反省。一方面是對都市和鄉村對比的質疑，另一方面則是對研究課題的質疑。

對都市與鄉村間對比的質疑，在 1960 年代便提了出來。首先是人口組合論的說法 (Gans 1968)，基本上認為，都市對人類生活的影響，不是來自都市本身，而是因為都市的人口組成與鄉村不同，都市裡容納了不同階層、不同年齡、不同種族的人群，主要的差異是源自於這些人群的性質，當控制了這些人群特質之後，都市與鄉村的差異就不存在了。另一種是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對一個社會是全面的，鄉村的性質同樣會受到這種發展的影響，於是都市與鄉村之間的差異逐漸泯滅。而從新科技發展的似乎也得到同樣的推論，亦就是人們接受資訊的可能，已經排除了地理限制，而都市與鄉村的差異就不那麼重要了 (Fischer 1984; Saunders 1986; Dewey 1960)。

從資本主義以及資訊流通的批評，其實必須考慮到社會的發展階段，對已開發社會都市現象的討論，比較強調都市與鄉村對比的消失，

但對開發中國家的討論，則所謂「都市偏向 (urban-bias)」仍是相當重要的課題，極端的例子是，從鄉村出身的政治人物，當進入全國性的政治場域之後，在思考上已不再是鄉村本位，反而傾向於以都市為導向的思考 (Lipton 1977; 1984)。相對於組合論的討論，則有副文化理論 (subcultural theory) (Fischer 1976; 1984)。副文化論主張，都市與鄉村就算在人口組成上相類似，有相同興趣或性質的人群們比率相同，可是因為都市的規模，都市內同興趣或同性質的人比較可能組織起來，形成一種副文化。這種都市規模所導致的「關鍵多數 (critical mass)」的效果，在小都市或鄉村是不容易見到的。

以上從兩個角度對都市意義的肯定，都在解釋對象上與原來都市社會學探討的課題有所差異。從都市偏向的考慮，比較放在資源的分配上，由於都市政治人物在政治場域上的分量較重，或者在都市地帶的投資比較容易見到立即的效果，政府的投資大都集中在少數的主要都市，導致人們因居住地的差異，鄉村居民在文化資源上享用的機會較低，在成本上的負擔較重。從副文化論的討論，亦不強調社會連繫的消失，比較放在不同興趣人群集結運作的可能性。特別是那些在社會上比率甚低的擁有特殊癖好的人們，只在都市，甚至是大都市，才有與同好集結切磋的可能。從這兩種角度所衍生的研究對象，都反映著古典都市社會學研究在主題上的狹窄。其實人類歷史上對都市生活的看法，很早就有著不同的對立的看法，包括了自然／藝術，熟悉／陌生，社區／個人，以及傳統／變遷等，而古典都市社會學所延續的研究大都著重在熟悉與陌生以及社區與個人的兩組面相 (Fischer 1984; 伊慶春、章英華 1989)。

當我們擺在自然與藝術以及傳統與變遷這樣的對象時，對都市的看法就可能與另外的兩個面向所形成的不盡相同。都市雖然減少了人們接觸大自然的機會，但是都市卻是人們最容易接觸人類所創造事物的場所，而人類的發明，也是透過都市的中介而傳播到社會的各個角

落。以致於，雖然人們對都市從人際關係加以批判，但人口集中在都市的現象，卻無法完全倒轉。工業、商業、教育與文化等設施，集中在都市的情形，有時比人口的集中還更明顯。這就呼應著從資源（特別是經人類轉換過的資源）的角度觀察時，都市有其相對於鄉村的優越之處。在西方的郊區化過程就反映著，在反都市心態下，人們仍脫離不開都市，都市所提供的機會與設施，可能有所變化，但只是擴展到都會地帶，而非完全的脫離都市地帶（Hadden & Barten 1973；Jackson 1985）。就此我們就可以說，在人類事物仍顯現集中現象，而地理的距離又無法消除之時，人們對人造事物的接觸，是可能受到居住地性質的影響。如此，我們可以在社會關係網絡和心理壓力之外，探討都市與鄉村分化對人們生活的影響。

本文中，我們選取的是人們的生活型態。在1992年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社會階層問卷中，設計了一組有關生活型態的問項，我們採用購衣場所、聚餐場所以及音樂喜好的三組問項。購衣場所以及聚餐場所，都涉及人們的活動，這樣的行為因設施分佈的情形會影響到人們接觸的可能機會。有的場所，如觀光飯店或百貨公司，通常是以大都市為主要分布地帶，而像一般的服裝店或餐廳的分布則從大都市以至於小規模的市鎮都同樣存在著。以這樣的消費行為來討論，比較反映的是我們先前提到的從資源分布的狀況來討論都市與鄉村差異的觀點。至於音樂的喜好，可以透過各種的傳播媒體以及個人的家電設備而享受，比較不受場所的約束。不過，從副文化體系的觀點，我們卻可以推論說，不同音樂喜好者，在都市的場域裡與同好接觸的可能性較大，而彼此經相互傳染而增加興趣的可能性也越高。不過我們必須承認，由於音樂享受的個人性，並不直接牽涉與同好的直接交往，與副文化論所討論的現象還是稍有差距。

在臺灣的經驗研究，以都市化程度為自變項與社會心理以外的變項分析時，如機會結構、容忍態度以及非慣俗行為等，的確可以看到

相當一致且有意義的影響（章英華 1988；傅仰止、伊慶春 1994；傅仰止 1995）。從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推論說，都市化相應的是一種資源空間分布的差異。以臺灣一些與生活型態相關的活動或消費的設施而言，隨著都市化程度的提高而更形集中的情形是相當明顯的。傅仰止（1995）曾在討論都市居民的非慣俗傾向時，呈現了一些客觀的數據。譬如在美術活動相關團體與場所的分布上，核心都市擁有近六成的美術團體，近七成的美術館和博物館，近九成的畫廊與藝術中心。由於美術活動的小眾性質非常強，其所顯示的比較是一種極端的現象。不過在購衣和用餐場所上，大飯店和百貨公司的都市性格也是非常明顯的，在比較小的聚落和市鎮，根本就沒有這類型的消費場所。不過相應於資源空間分布上的差異，臺灣也呈現了社會階層明顯空間分化的現象，選擇性城鄉遷移的結果（廖正宏 1986），使得都市與鄉村人口有著社會階層上的差異。

我們就以本文將運用的問卷樣本的教育與行業組成來說明。在附表 1 中，我們將臺灣的院轄市、省轄市以及其他的鄉鎮市，區分成核心都市、一般都市和鄉鎮三類（分類的標準參見下一節有關都市化程度分類的說明）。大專程度者，占核心都市樣本的近三成，一般都市近二成，鄉鎮近一成；高中程度者，核心都市與一般都市都在三成左右，鄉鎮在二成上下；至於國中程度以下，則占鄉鎮樣本的七成，一般都市的五成，核心都市的四成。這當然不是有無之間的差別，但階層分化的情形極其明顯。至於行業組成，雖然臺灣的鄉村已不能視為完全的農業地帶，但是不同層級的都市在行業組成上也明顯不同。在鄉鎮，一級、二級和三級行業人口的比率大致是相等的，在一般都市，一級行業的比重微乎其微，但二、三級行業的比率大致相等，而核心都市的三級行業人口大約是二級行業人口的兩倍，一級行業人口幾乎等於零。我們前面曾提及，組合論就主張人口組成才是城鄉差異的最終來源，在以上所呈現臺灣社會中階層的空間差異之後，在討論都市化與

生活型態的關聯時，不能不同時考慮社會階層的因素。

其實社會學中有關生活型態的討論，主要是在社會階層化的研究中。韋伯所提出的地位團體 (status group) 以及韋伯倫 (Veblen) 有閒階級論中的炫耀性消費 (conspicuous consumption)，都是討論社會階層與生活型態的先驅(許嘉猷 1988; 朱元鴻 1993)。在社會階層化一般性論著中，階層所導致的生活型態上的差異，都是主要的章節之一 (Hodges 1968; Tumin 1985)。不過在地位取得與社會流動研究的風行下，生活型態的探討幾乎被視為當然而不特別深究的課題。到了1980年代，在幾部重要論著的影響下，社會階層化與文化資本的扣連就關聯到生活型態的變異了。在這樣的討論中，依舊認為個人的經濟位置會影響到個人的生活型態，但社會上的優勢生活型態在擁有了社會正當性之後，可以是一種異於經濟地位的階層區別因素，較低下的階層可能有其相應於經濟位置的生活型態，但是在競爭中會模仿較優勢的生活型態。不過這種模仿因為個人出身背景的差異，在生活型態的展現上仍有不同之處(Bourdieu 1984; 朱元鴻 1993)。臺灣社會學界少數幾篇討論生活型態的論文，都是從社會階層的角度出發(許嘉猷 1988; 朱元鴻 1993; 黃毅志 1994)，階層的效應大致上都在他們的研究中顯示出來。以我們將分析的購衣、用餐場所以及音樂喜好等，除了前面所說的分布上的差異之外，的確也蘊含著一種階層上的差異。譬如，最近有關夜市的研究就指出，在夜市的受訪者都很相當自然的以百貨公司為對比的對象，而百貨公司的高貴與夜市的平民化，是二者形象對比的特色之一(余舜德 1996:449-459)因此在探討都市化與生活型態的關聯時，同時考慮階層變項，是不可或缺的。

在都市化與階層化與生活型態的關聯上，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思考。首先，人口組合論的觀點認為，都市與鄉村之間的差異，主要是因為人口組成的差異所導致的。在前面，我們已明白指出，臺灣不同都市化層級的聚落在行業與教育組成上的差別。因此可以在控制了階

層的變項之後，觀察都市化與生活型態之間的關聯。其次，從模仿較優勢團體生活型態現象出發，我們可以觀察，是否都市提供了較多的模仿機會，而使得人們在模仿優勢階級生活型態的過程中，影響到個人的階級認同。主觀階級認同所界定的中等階級比率，往往都高於客觀指標所界定的。在臺灣的資料顯現同樣的情形，如以 1980 年代末期的資料，客觀界定的中等階級比率占樣本的二成左右，而主觀認定的則占了近四成(蕭新煌 1989:7)。這種主觀與客觀認定的差距，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人們在生活型態上對優勢階層的模仿。從如此的角度，我們可以討論都市化以及生活型態與社會階級認同的關聯。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擬定幾個簡單的命題，作為分析和討論的依據。第一、由於臺灣社會明顯的空間階層化，都市化對生活型態的影響會因控制了階層的因素之後而減弱，但在資源分布以及同興趣人口集結的影響下，都市化的效果仍然存在。第二、從資源分布來考慮，越是牽涉到直接前往特定場所的活動，都市化的影響效果越明顯；同時集中程度越高的場所受到都市化的影響也越高。第三、在現代社會生活型態是可以模仿的，而在都市地帶這種模仿的可能性越高，接納了較高社會階層的某些生活型態之後，個人的社會階級的認同可能會偏向較高的階級，因此生活型態對主觀階級認同的影響，可以有著獨立於階層變項的意義。就此，我們推論說，在控制了階層變項之後，都市化程度以及在生活型態上的某種偏好，會影響個人對社會階級的主觀認同。

二、研究的策略

(一)依變項：生活型態與階級認同

在生活型態的研究裡，觀察的依變項可以有幾種類型，如各種與家庭相關的消費品(許嘉猷 1988)、各種消費場所，更可以進一步追問

採用各種消費品或前往各種消費場所的動機(朱元鴻 1993)。在都市與鄉村消費型態的差異上，最容易看到資源集中的影響效果的，應該是消費場所的利用狀況，若能找出其背後的動機，當有助於探討的深度。但受限於資料，在 1992 年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問卷裡，我們只能選擇兩組場所的變項，購買衣服的場所、在外聚餐的場所。另外在特定的消費品上，我們是以喜好的音樂類別為指標。其中購買衣服以及在外聚餐，是要利用家以外的場所，可以說是比較可能受到這些場所分布狀況影響的；而喜好的音樂，一般可以透過各類型的傳播媒介，以及家內的設備便可以享用，應該較不受資源分佈狀況的限制。這樣的三組依變項，雖然還不能構成個人生活型態的全貌，但作為討論我們所提出的命題而言，應該可以提供相當的參考價值的。

(1)購買衣服場所的分類：在問卷中以複選題要求受訪者鉤選曾去購買衣服的地方。在 2377 個樣本中，其次數分配為，地攤 1520 (63.9%)，服裝店 1460 (61.4%)，裁縫店 364 (15.3%)，百貨公司 916 (38.5%)，專門店 391 (16.4%)，委託行 140 (5.9%)。我們以簡單的因素分析嘗試歸類時(見附表 2)，發現這六個場所，只構成一個因素，而其中百貨公司、專門店和委託行這三個比較是集中在都市的場所，呈現較高的負荷值，至於其他三場所則彼此間沒有什麼關聯。於是，我們先將百貨公司、精品店和委託行歸為一類，簡稱精品百貨，凡是過去一年在上述場所購買衣服的為 1，不曾的為 0。由於地攤和服裝店是分佈次數最高的場所，一個是有店面、比較正式的，一個是比較臨時性的非正式場所，按理應該分別處理。我們將地攤自成一類，在過去一年內曾在地攤購衣的為 1，不曾的為 0。而裁縫店與服裝店一樣，通常是有店面的，最大的差別是，前者量身製作，後者只售成衣。依日常的觀察，裁縫店在價位上有高有低，在臺灣社會逐漸傾向成衣購置的趨勢下，有一直衰退下的趨勢，再者去裁縫店購買的人數不大，因此我們將裁縫店視如服裝店，凡去年曾在這兩種店面購買衣服的為

1, 未曾的為 0。大體而言, 應該是由地攤、服裝店而精品百貨顯示越來越集中於大都市的情形。¹

(2) 出外聚餐場所的分類: 在問卷中, 共有九類用餐的地方, 其分配的次數為, 路邊攤 1607 (67.6%), 小吃店 1699 (71.5%), 中餐廳 1267 (53.5%), 西餐廳 888 (37.4%), 日本料理 590 (24.8%), 西式速食 839 (35.3%), 啤酒屋 471 (19.8%), 咖啡廳或茶藝館 532 (22.4%), 大飯店的餐廳 531 (22.3%)。這些場所中, 西式速食店, 經常是大人攜帶小孩前往的, 而咖啡廳和茶藝館則主要的功用不在用餐, 我們將之排除。其餘場所經因素分析之後 (見附表 2), 只呈現著兩組因素, 路邊攤和小吃店在同一因素中呈現高的負荷值, 而其他的聚餐場所則都在同一因素中呈現高的負荷量。我們先將路邊攤和小吃店歸成一類, 凡過去一年曾在這兩個場所聚餐的為 1, 不曾的為 0。至於大飯店的餐廳, 雖然與其他餐廳屬同一因素, 但是由於其特別集中在核心都市 (見附表 3), 於是我們將大飯店的餐廳自成一類, 過去一年曾在那裡聚餐的為 1, 不曾的為 0。其他的餐廳則全部合為一類, 過去一年曾在這些場所聚餐的為 1, 不曾的為 0。同樣的, 依小吃攤、餐廳、大飯店, 應該逐次呈現更集中大都市的情形。

(3) 喜好音樂的類別: 問卷中提出九種音樂, 請受訪者依很喜歡、喜歡、不喜歡、很不喜歡、無意見等五個點表示其喜好程度。若以表示喜歡以上的次數觀察, 各類別顯示受人喜好的程度如下: 國語歌曲 65.9%, 臺語歌曲 76.8%, 西洋歌曲 34.4%, 日本流行歌曲 32.9%, 古典音樂 42.9%, 國樂 26.2%, 平劇 13.9%, 歌仔戲 45.6%, 布袋戲

1 根據 1991 年工商普查的資料 (見附表 3), 我們將臺北、臺中、臺南和高雄四市合為一類, 基隆、新竹、嘉義為一類, 其他縣為一類, 觀察百貨公司、觀光飯店、成衣服裝店、餐廳和小吃店的分佈情形。核心都市在上述各場所都顯現較為集中的情形, 其中以觀光飯店的集中現象最高, 其次才是百貨公司, 而若將臺北市獨自為一類時, 臺北市的集中情形更強。

35.2%。根據因素分析（參見附表 2），古典音樂、平劇和國樂在因素一中呈現高的負荷值，台語、歌仔戲和布袋戲在因素二顯示高負荷值，西洋歌曲和國語歌曲在因素三顯示高的負荷值。至於日本流行歌曲，則在三個因素中的負荷量都低。為求分析上與購衣場所和聚餐場所較為一致，我們依據因素分析的結果，在因素一中，只選古典音樂，喜歡為 1，無意見和不喜歡為 0；在因素二中，我們將歌仔戲和布袋戲合為鄉土戲曲，在其中任一表示喜歡者為 1，均表示無意見或不喜歡者為 0；在因素三中，我們以國語歌曲為一類，喜歡者為 1，其他選擇的為 0，西洋歌曲亦同。基本上，地方戲曲鄉土性濃，古典音樂與西洋歌曲比較受到外來的影響，而國語歌曲則是普遍較受接受的。

(4)主觀階級認同：在問卷中，將主觀階級認定分成六類，上層(0.6%)、中上層(7.9%)、中層(39.7%)、中下層(13.6%)、勞工(27.9%)以及下層階級(8.2%)。在我們的分析裡，最主要是要觀察向上認同的情形，而自認為中上、上層以及下層的比率都低，因此我們只分中層及以上，以及中下層及其以下兩個類別，前者為 1，後者為 0。

(二)自變項的操作化與分析策略

(1)都市化指標：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樣本，是以都市化程度作為分層抽樣的基準，將臺灣分成臺北市、高雄市、省轄市、以及依都市化程度由高而低分成五級的鄉鎮市。依我們過去的經驗，可以將這八類地區再粗分成三類：核心都市(包括臺北市、臺中市和高雄市)、一般都市(包括臺中以外的其他省轄市和省一級的鄉鎮市)，其他的聚落則合併稱鄉鎮。我們在相當多的分析中肯定了這個分類方式的區別力(章英華 1994; 傅仰止、伊慶春 1994)。在分析中，是以鄉鎮為對照類屬。為觀察個人過去的居住經歷對生活型態的影響，我們以十五歲以前最常居住的地方來反映，只區分核心都市與其他地區兩個類別。

(2)階層化的指標：一般用來呈現階層化的指標，包括了職業、教

育與收入，本文只採用了職業與教育。在收入方面，一方面因為家庭主婦與無業者缺乏個人收入的資料，而全家收入的資料因為受訪者非家計負責人，也可能沒法子提供較貼近現實的數字，因此我們捨棄收入這個變項。教育程度是每個人都有的，我們是以受教育年數來操作，最低是 0 年，最高是 18 年。職業方面，我們採用職業聲望(以 Trieman 的聲望分數為基準)，但家庭主婦會缺乏這樣的資料，我們以其配偶的聲望來替代。此外，我們同時使用行業這個變項，包括，無業(含家庭主婦)、一級行業、二級行業和三級行業，在生活型態的分析中，以一級行業為對照類屬，不出現在統計模式中，在階級認同的分析中，則以二級行業為對照類屬。行業別的資料，主要是當作控制變項，特別是區分無業者以及農與非農樣本。為了觀察家庭傳承的影響，我們選擇了父親的教育程度、職業聲望以及幼年(十五歲以前)的居住地，前二者與個人的教育和職業聲望一樣，都是連續變項，後者只分是否居住在核心都市，是則為 1，否為 0。

(3)控制變項：臺灣這四十年來的快速變遷，使我們必須注意到，一些階層與都市化的差異，可能只是不同世代之間的差異而已。另外雖然男女在教育程度上顯現逐漸接近的趨勢，但男女之間的差異，特別在日常消費行為上，是值得重視的。譬如家庭的購買行為，很多是由女性所掌控的，而女性在外出的行為上似乎也不像男性那麼自由。因此在消費行為上的差異很可能是受到性別的影響。基於以上的考慮，我們控制了出生年和性別這兩個變項。

(4)分析方法：我們是以購衣場所、聚餐場所、音樂喜好類型以及主觀階級認同為依變項，並且相應的指標轉換成 1 與 0 的二分類屬。基於如此的變項性質，我們採邏輯迴歸分析。由於要檢視都市化與階層化影響生活型態與階級認同上的相對分量，在生活型態的分析上，我們是先觀察教育、職業以及都市化程度對生活的個別影響，再以教育變項為主，依次放入性別、出生年、職業、都市化程度、以及父親

教育、父親職業以及幼年居住地等變項。至於階級認同，我們則是以職業變項的影響作為觀察的起點，再逐步放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都市化程度以及生活型態的變項。

三、研究發現

(一)購衣場所的分析

依我們所得到的分配次數，地攤可以說是最普遍的購衣場所，從階層化和都市化考慮而進行的統計分析結果，呈現在表 1。首先，教育年、職業以及都市化都影響了購衣行為（模型 I、II、III），教育程度越高，越不傾向於向地攤購買，職業聲望高者、無職業者以及核心都市的居民比較傾向於在地攤購買衣服。當我們逐次加入其他變項之後，發現控制了性別與年齡之後，教育年、職業聲望和都市化程度都有其獨立的影響，但是上一輩的教育與職業以及幼年的居住情況則未達統計的顯著水準（見模型 IV、V、VI、VII）。因此我們可以就模型 VI 的係數作為討論的基礎。男女在地攤購衣行為上並無差異，但是出生年與地攤購衣行為成正比，意味著年紀輕者越可能在地攤購買衣服；教育年和職業聲望都與之成反比，反映著社會階層高者在地攤購買的可能性較低。至於都市化程度在控制了教育與職業等變項之後，核心都市與一般都市的係數從負值轉為正值，而統計的顯著水準是一般都市才達到顯著水準，這與只看都市化程度的個別影響時，幾乎完全不同。這樣的變化意味著，核心都市居民在地攤購買衣物傾向較弱的原因，在於他們人口組成中的高比率的高教育程度與高職業聲望者，當控制了教育程度與職業聲望之後，核心都市居民與鄉鎮居民在地攤購物頻率上的差異就消失了，而一般都市反而從與鄉鎮無差異轉成正的關聯，意味的是，在教育程度與職業聲望相似時一般都市居民相對於鄉鎮居民，在地攤購買衣服的傾向較強。由於核心都市與一般都市都

表 1 服裝購置場所的邏輯迴歸分析

自變項	I	II	III	IV	V	VI	VII
性別				.136	.048	.020	.014
出生年				.016***	.014**	.015**	.016**
教育年	-.135***			-.155***	-.114***	-.120***	-.109***
職業聲望		-.035***			-.020***	-.020***	-.022***
無業家管		.537**			.342	.234	.289
二級行業		.244			.260	.136	.122
三級行業		-.241			-.074	-.206	-.193
核心都市			-.273*			.230	.267
一般都市			-.018			.370***	.385**
父教育							-.013
父聲望							-.002
幼都市							-.084
常數項	1.849	1.909	.642	1.145	1.666	1.663	1.689
loglike	-1457	-1340	-1550	-1448	-1308	-1302	-1159
pr*r	.059	.058	.002	.065	.078	.082	.084
樣本數	2370	2171	2377	2370	2164	2164	1933
性別				.431***	.445***	.475***	.448***
出生年				.029***	.030***	.029***	.026***
教育年	.063***			.032**	.020	.027	.033
職業聲望		.010**			.008	.009*	.010*
無業家管		.419*			-.076	.030	.063
二級行業		.230			-.141	-.032	-.048
三級行業		.228			-.167	-.033	-.034
核心都市			-.157			-.372**	-.471**
一般都市			-.094			-.276*	-.322**
父教育							.011
父聲望							-.006
幼都市							.094
常數項	.137	.090	.766	-1.410	-1.544	-1.570	-1.348
loglike	-1487	-1359	-1511	-1448	-1308	-1304	-1162
pr*r	.015	.008	.001	.040	.042	.045	.043
樣本數	2370	2171	2377	2370	2164	2164	1933
性別				.261**	.286**	.251*	.198
出生年				.004	.008	.010*	.013*
教育年	.192***			.192***	.149***	.141***	.117***
職業聲望		.036***			.017***	.016***	.014**
無業家管		.207			.061	-.071	-.152
二級行業		.601**			.336	.204	.171
三級行業		.864***			.390	.226	.196
核心都市			1.011***			.476***	.388**
一般都市			.634			.290	.201
父教育							.015
父聲望							.012**
常數項	-2.001	-2.184	-2.001	-2.584	-3.340	-3.331	-3.375
loglike	-1445	-1388	-1588	-1440	-1302	-1296	-1155
pr*r	.113	.072	.028	.116	.127	.131	.133
樣本數	2370	2171	2377	2370	2164	2164	1933

*** $P \leq .001$ ** $P \leq .01$ * $P \leq .05$

以下各表符號之意義皆同

顯示正的係數，我們或可推論說，階層相似的都市居民比鄉鎮居民更傾向於在地攤購衣，這種傾向在一般都市最強。

關於到服裝店的購衣情形，當只是以教育、職業與都市化程度三組變項個別分析時，教育年數、聲望以及無業家管三者都達統計顯著水準，都市化程度則否。顯示的是，教育程度越高，職業聲望越高，往服裝店購衣的可能性越高。但是在我們逐步加入其他變項之後，關係有了變化。由於在模型 VII 中，父親教育年數、聲望以及幼年居住地三個變項都未達統計水準，因此我們可以只從模型 IV、V、VI 來觀察，教育的影響在加入性別、年齡時尚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但是在加入了職業和都市化變項之後，其影響效果便消失了。最後的結果反而是年齡、性別、職業聲望和都市化程度顯示顯著的影響：女性、年輕的以及職業聲望較高的受訪者，顯示較強的前往服裝店購買衣服的行爲，但是都市化程度越高者，越不傾向於在服裝店購買衣服。這樣的情形，和往攤販購衣的行爲，正好相反。地攤因屬於非正式的衣服銷售單位，一般而言，在層級上應該低於服裝店，因此與職業聲望和教育年數之間呈現相反的關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都市居民比起鄉鎮居民，較傾向於在地攤而非服裝店購買衣服，則似乎是與預期正恰相反。另外，從模型 I 和模型 IV 的 Pseudo R Square 的變化，我們看到性別與年齡所能解釋的比重大於教育年數，在模型 V 和模型 VI 顯示的職業和都市化程度的所能解釋的比重，似乎亦遠不及性別和年齡。

精品百貨與地攤和服裝店相較，應該是較高級的購衣場所。在個別單組變項上，都顯示教育程度、職業層級以及都市化程度與到精品百貨購買衣服在統計上的顯著關係（模型 I、II、III），由於係數都是正值，意味著教育程度、職業層級以及都市化程度越高，在精品百貨購衣的可能性越大。在逐步加入自變項之後，至模型 VI，教育年數、職業聲望以及都市化程度都顯示對前往精品百貨購物行爲的獨立影響效果。在加入父親教育與職業聲望以及幼年居住都市的變項之後，則

都市化程度的影響消失了，但幼年居住都市的係數未達統計水準。當我們去除了幼年居住地變項之後，則顯示核心都市的影響，因此在模型 VII 中，我們以去掉幼年居住地之後的分析為討論的基礎。所顯示的是，年輕、教育程度、個人與父親職業聲望高、以及核心都市的居民，在精品百貨購置衣物的傾向較強。

以上三類場所的分析，教育與職業聲望對在服裝店和精品百貨購衣傾向的影響都是正向的，對在地攤購買則是負向的，這是相當合乎一般所預期的。但是都市化程度的影響，則對在地攤、在精品百貨購買的傾向的影響都是正向的，而對在服裝店購買則呈現負向的效果。換言之，都市居民對最高層次和最低層次的出售衣物的場所的接觸頻率，都高於鄉鎮居民，對介於其中的服裝店則接觸頻率低。這很可能反映著大家所眼熟的一種都市現象，即正式的以及非正式的商業場所都在都市，甚至大都市都同時蓬勃發展。鄉鎮居民相對而言，則一旦要購買衣服，就是在他們所能接觸的相當普及的服裝店，而都市居民到服裝店的可能性，則因為日常可及的百貨公司以及地攤的吸引，便相對的減低了。

(二)聚餐場所的分析

以餐會場所為依變項的統計分析，呈現在表 2。攤販小吃、餐廳以及大飯店的餐廳，一般也會認為是由低而高的層級，消費金額平均而言也是越是後者越高的情形。在路攤和小吃店用餐的傾向，依模型 I、II、III 的結果，教育年數越多者越高、都市化程度越高者越高，以及二級和三級行業從業人員較高。至於各自變項共同考慮之後，我們發現，加入職業聲望和行業類屬之後，Pseudo R Square 反而降低，而依序在後的兩個模型的解釋力仍不及只以性別、出生年和教育年數組成的模型 IV。因此，我們在模型中取消職業和行業的變項。在新的變項組合之間，模型 VII 中增加的幾個變項未達統計顯著水準，而亦未增

表 2 聚餐場所的邏輯迴歸分析

自變項	I	II	III	IV	V	VI	VII
性別				-.546***	-.636***	-.582***	-.596***
出生年				.068***	.068***	.070***	.068***
教育年	.145***			.042**	.047**	.033*	.022
職業聲望		.007			-.008		
無業家管		.301			.316		
二級行業		.742***			.151		
三級行業		.687***			.161		
路攤小吃							
核心都市			.597***			.396**	.227
一般都市			.252*			.072	.066
父教育							.020
幼都市							.383
常數項	.267	.734	1.224	-.640	-.383	-.672	-.575
loglike	-1078	-1005	-1151	-1005	-892	-1002	-959
pr*r	.068	.016	.008	.132	.124	.135	.135
樣本數	2370	2171	2377	2370	2164	2164	2291
性別				.251*	.290*	.265*	.227
出生年				.010*	.014*	.015**	.011
教育年	.249***			.240***	.198***	.193***	.160***
職業聲望		.054***			.030***	.029***	.025***
無業家管		-.164			-.379	-.478*	-.542*
二級行業		.169			-.228	-.321	-.330
三級行業		.630***			-.007	-.129	-.178
餐廳							
核心都市			1.032***			.343*	.115
一般都市			.682***			.228	.165
父教育							.045**
父聲望							.015**
幼都市							.279
常數項	-1.694	-1.806	-.024	-2.394	-3.258	-3.252	-3.176
loglike	-1298	-1005	-1151	-1292	-1140	-1137	-1010
pr*r	.180	.110	.030	.184	.206	.208	.209
樣本數	2370	2171	2377	2370	2164	2164	1933
性別				.210	.242	.193	.139
出生年				.004	.006	.008	.008
教育年	.220***			.228***	.163***	.151***	.123***
職業聲望		.047***			.027***	.025***	.024***
無業家管		-.064			-.128	-.316	-.368
二級行業		.320			.087	-.103	-.179
三級行業		.791*			.320	.082	.007
大飯店							
核心都市			1.375***			.832***	.526***
一般都市			.543***			.191	.067
父教育							.019
父聲望							.015***
幼都市							.424*
常數項	-3.488	-3.605	-1.839	-3.734	-4.803	-4.755	-4.821
loglike	-1108	-1055	-1205	-1107	-997	-979	-868
pr*r	.120	.095	.046	.121	.142	.157	.174
樣本數	2370	2171	2377	2370	2164	2164	1933

加 Pseudo R Square 的數值，因此我們只以模型 IV 和 VI 結果來討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性別和年齡在這裡的影響。若從 Pseudo R Square 的變化來看，其影響的分量與教育年數幾乎不相上下。再者，在出生年、性別和教育年數控制後，一般都市的影響力消失了，意味著一般都市與鄉鎮的差異，主要是因為教育人口組成上差別所致，不過，核心都市在控制了其他變項之後，會是顯示較強的在攤販用餐的傾向。第三，教育年數的影響在控制了其他變項之後一直還是正值的，教育程度越高者在路攤用餐的可能性反而較高。這種關聯並不合常理，可能是因為教育程度高者在外用餐的機會多所導致的結果，稍後將進一步分析並討論。

對在餐廳聚餐，教育程度、職業層級以及都市化程度都顯示正向的影響，教育程度越高，職業聲望越高，如此的傾向愈強；三級行業從事者的傾向較高；核心都市的傾向高於一般都市，再高於鄉鎮。在與其他的變項共同放在統計分析時，教育年數與職業聲望的影響效果都非常穩定，而都市化程度中，一般都市的影響消失，當我們再放進父親教育年數、職業聲望以及個人幼年成長地之後，核心都市的影響亦消失。我們在去掉幼年成長地之後，核心都市的係數仍未達統計水準，因此，核心都市的影響，是因為父親教育與職業聲望加入分析才消失的。就此結果而言，去餐廳聚餐的傾向，主要是受到社會階層影響，同時隔代的階層影響仍然存在。相對於路攤小吃，除了都市程度的影響消失外，當教育與年齡和出生年擺在一個模型，後二變項所增加的 Pseudo R Square 就相當小了。

至於在大飯店用餐，在教育、職業與都市化程度三組變項中個別所呈現的結果，與在餐廳用餐，頗為相似（模型 I、II、III）。教育程度越高，職業聲望越高，在大飯店聚餐的傾向越強；三級行業從業者在大飯店用餐較為頻繁；核心都市與一般都市的如此傾向，亦高於鄉鎮。當幾個變項放在一起在統計模式中分析時，教育年數和職業聲望的

影響一直都明顯呈現，而都市化程度的影響，則只是核心都市的影響未因控制其他變項而消失，這樣的影響在控制了父親教育年數和職業聲望以及個人幼年居住地之後，依舊維持著。顯然，在大飯店用餐比起在一般餐廳用餐，除了階層影響之外，也是大都市的現象，這種核心都市的影響也可以從 Pseudo R Square 上增加的數值觀察出來，明顯大於在路攤小吃和一般餐廳的同類模型中增加的情形。此外，我們看到父親聲望和幼年居住地在模型 VII 中的係數達到統計水準，也可以說存在著社會階層和居住地上的隔代效果。

整體考慮在三種不同場所用餐傾向的影響因素之後，我們首先看到都市化程度的影響與購行為上所呈現的影響不盡相同。在服裝店購買衣物的傾向與都市化程度是一種反向的關係，不過在餐廳用餐則呈現的比較是沒有關聯的情形。另外在都市化程度影響上主要的差異是在核心都市其他兩類居住地之間，而在服裝購置方面則是都市與鄉鎮之間。不過，換個角度來看，由於都市化程度在餐廳用餐上的區別力，不如在路攤小吃，更不如在大飯店，因此我們仍可以推論都市化程度與對高層次與低層次消費場所都呈現正向關係，而相對而言，對中間層次的消費場所則缺乏明顯的正向關係。至於從階層化方面的觀察，最特出的是教育和職業聲望與在路攤小吃、在餐廳和在大飯店用餐三者，都呈現正向關係。合併來看，反映的似乎不是階層的差異導致人們在不同餐廳用餐的傾向，反而是階層較高者在外用餐的可能性較高而已。我們在此換一種分析方式來看階層與都市化對用餐場所的影響模式。

我們將去這三類場所用餐的情形交叉之後再行分成四類，完全不在三類場所用餐者，只在路攤和小吃店用餐者，在餐廳和路攤小吃都可能用餐者以及會到大飯店用餐者（但也可能在小吃或餐廳用餐者）。用這四類進行多元邏輯迴歸分析，以都市化程度區別力較弱的在餐廳用餐為基礎類別，形成三個一組新的依變項，不用餐者／餐廳用餐、

路攤小吃／餐廳用餐、大飯店／餐廳用餐，用這三個一組的變項，目的在觀察，相對在餐廳用餐者，在其他場所用餐者有何特質。分析的結果呈現在表3。

在不外出用餐與餐廳二者之間，不外出用餐者，相對而言，教育程度低，都市化程度亦低，不過在都市化程度中，是一般都市的居民外出用餐的傾向強。至於路攤小吃相對於餐廳用餐，在模式III中顯示與都市化程度成反比，但在模式VI中只是與教育程度成反比，而都市化程度則未呈現統計顯著水準。這意味著都市與鄉鎮居民，只要是教育程度相同，在路攤小吃用餐的傾向和在餐廳用餐的傾向相似。至於大飯店相對於餐廳，顯示的是，高教育、高職業聲望者在大飯店餐廳用餐的傾向較強，而核心都市才顯示與鄉鎮的差異，亦即核心都市居民前往大飯店用餐的傾向高一般都市與鄉鎮的居民。在都市化上的變異，更支持前面分析的結果，即用餐場所的城鄉差異在大飯店這一層級才顯現，主要是大都市現象。不過在階層部分，顯示著教育程度與不在外用餐的關聯，越是高階層者在外用餐的可能越高。另外用餐場所的階層差異亦展現出來，相對於在餐廳用餐，教育程度高者在小吃攤的傾向較低，教育程度與職業聲望高者在大飯店用餐的傾向較強。

(三)音樂喜好類別的分析

對地方戲的喜好，教育年數、職業聲望、三級行業從業者以及都市化程度，個別的都與之呈反向的關係（見表4中的模型I、II、III）。在放入各個變項的統計模型中性別和出生年有著相當穩定的關聯，女性與年輕者較不喜歡本土地方戲曲。階層變項亦在各模型中都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呈現的是教育程度較高者以及三級行業從業者對地方戲曲的喜好較弱。至於都市化程度，則在控制了年齡、性別與階層的變項之後，仍顯示核心都市以及一般都市的居民較鄉鎮居民不那麼喜歡地方戲曲，但是在加入了父親的階層變項和幼年居住地之後，則影

表3 聚餐場所的多元邏輯迴歸分析

自變項	I	II	III	IV	V	VI	VII
性別				.350*	.484*	.508**	.621**
年齡				-.063***	-.062***	-.063***	-.057***
教育年	-.297***			-.198***	-.192***	-.186***	-.151***
職業聲望		-.038***			-.009	-.008	-.000
無業家管		-.194			-.188	-.060	-.129
二級行業		-.618*			.080	.202	.043
三級行業		-.706**			.091	.242	.096
核心都市			-.717***			-.288	.003
一般都市			-.713***			-.417*	-.467*
父教育							-.044
父聲望							-.019*
幼都市							-.354
常數項	1.064	.635	-.753	2.103	2.135	2.149	2.018
性別				-.406***	-.476***	-.467***	-.462**
年齡				.006	.002	.002	.005
教育年	-.177***			-.196***	-.164***	-.163***	-.138***
職業聲望		-.046***			-.028***	-.028	-.024***
無業家管		.152			.420	.459	.584*
二級行業		-.040			-.191	.227	.271
三級行業		-.491*			-.035	.008	.101
核心都市			-.597***			-.016	.047
一般都市			-.590***			-.144	-.845
父教育							-.042*
父聲望							-.009
幼都市							-.041
常數項	1.106	1.411	-.070	1.627	2.511	2.528	2.426
性別				.133	.175	.130	.079
年齡				-.010	-.002	.001	.002
教育年	.135***			.148***	.095***	.083***	.063**
職業聲望		.030***			.021***	.019***	.020***
無業家管		-.202			-.168	-.331	-.353
二級行業		.057			.027	-.136	-.218
三級行業		.405			.229	.020	-.048
核心都市			1.054			.793***	.527***
一般都市			.225			.106	.002
父教育							.008
父聲望							.012*
幼都市							.030*
常數項	-2.055	-2.051	-.961	-1.937	-2.787	-2.727	-2.878
loglike	-2758	-2632	-3035	-2708	-2417	-2397	-2119
pr*r	.112	.070	.026	.128	.143	.150	.156
樣本數	2370	2171	2377	2370	2164	2164	1933

表 4 音樂喜好的邏輯迴歸分析

自變項	I	II	III	IV	V	VI	VII
性別				-.275**	-.303**	-.281**	-.243*
出生年				.018***	.018***	.016***	.016**
教育年	-.084***			-.114***	-.083***	-.078***	-.046**
職業聲望		-.017***			-.007	-.006	-.006
無業家管		-.222			-.201	-.114	-.229
二級行業		-.284			-.334	-.243	-.296
三級行業		-.665***			-.560**	-.449*	-.532**
地方							
核心都市			-.663***			-.312*	-.097
一般都市			-.435***			-.220*	-.168
戲							
父教育							-.054***
父聲望							.003
幼都市							-.371*
常數項	.962	1.259	.523	.920	1.331	1.321	1.184
loglike	-1590	-1456	-1615	-1578	-1432	-1429	-1269
pr*r	.025	.026	.013	.032	.040	.041	.046
樣本數	2370	2171	2377	2370	2164	2164	1933
性別				.285**	.238*	.196	.200
出生年				.044***	.045***	.047***	.048***
教育年	.182***			.128***	.104***	.095***	.075***
職業聲望		.017***			-.000	-.002	-.000
無業家管		.966***			.682***	.523*	.499*
二級行業		1.240***			.787***	.625***	.579**
三級行業		1.476***			.943***	.751***	.727***
國語							
核心都市			.976***			.503***	.502**
一般都市			.689***			.442***	.428***
歌							
父教育							.018
父聲望							.003
幼都市							-.182
常數項	-.896	-1.054	.192	-2.636	-3.112	-3.110	-3.116
loglike	-1359	-1298	-1484	-1304	-1166	-1158	-1037
pr*r	.108	.061	.028	.144	.154	.160	.152
樣本數	2370	2171	2377	2370	2164	2164	1933
性別				.200	.276*	.221	.187
出生年				.053***	.058***	.061***	.066***
教育年	.292***			.249***	.203***	.193***	.166***
職業聲望		.032***			.010*	.009	.008
無業家管		.411			.012	-.183	-.359
二級行業		.805***			.130	-.093	-.245
三級行業		1.505***			.698***	.456	.277
西洋歌							
核心都市			1.803***			.579***	.436**
一般都市			.785***			.534***	.489***
父教育							.004
父聲望							.018***
常數項	-3.556	-2.872	-1.230		-6.381	-6.423	-6.730
loglike	-1219	-1278	-1479	-1159	-1059	-1049	-933
pr*r	.200	.094	.033	.240	.246	.254	.258
樣本數	2370	2171	2377	2370	2164	2164	1933

性別				.524***	.520***	.524***	.562***
出生年				-.009*	-.006	-.006	-.010
教育年	.203***			.228***	.190***	.192***	.187***
職業聲望		.036***			.013**	.014**	.011*
無業家管		.477*			.285	.292	.325
二級行業		.498*			.276	.278	.291
古		1.017***			.515*	.529*	.574*
典			.632***			-.121	-.190
一般都市			.461***			.038	-.018
樂							.023
父教育							.007
父聲望							-.160
幼都市							-.160
常數項	-2.188	-2.338	-.613	-2.844	-3.478	-3.497	-3.556
loglike	-1421	-1374	-1603	-1405	-1273	-1273	-1128
pr*r	.122	.076	.012	.132	.141	.141	.149
樣本數	2370	2171	2377	2370	2164	2164	1933

響消失了，而幼年居住地仍顯示與地方戲曲的負向關係。在這裡，我們可以說自幼就居住在核心都市的人，對地方戲曲的喜好最弱。

對國語流行歌曲的喜好，教育、職業和都市化程度三者，都呈現正向的關聯（模型 I、II、III）。教育程度高、職業聲望高、非農從業者以及都市居民，都呈現對國語歌曲較強的喜好傾向。在同時考慮性別、年齡、階層化與都市化變項之後，模型 IV、V、VI 顯示，除了職業聲望之外，其他自變項都一直顯現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在加入父親的教育年數與職業聲望以及個人幼年居住地的變項後（模型 VII），上述的顯著水準依舊存在，結果是，年輕者、高教育程度者、非農行業者以及都市居民，都呈現對國語流行歌曲較強的喜好。在職業變項中，職業聲望的影響消失，而行業別影響仍在，或也可以說是種都市現象，因為二、三級行業的分佈是與都市的規模相互關聯的。

教育、職業與都市化程度三組變項，同樣個別的都與西洋音樂的喜好顯示正向的關係（模型 I、II、III）。在模型 IV、V、VI 中，逐次放入各個自變項之後，職業聲望和行業別變項的影響都消失了，最後呈現的是出生年、教育年數、都市化程度的影響。在加入了父親教育年和職業聲望以及個人幼年居住地變項後，核心都市的係數未達顯著

的統計水準，但幼年居住地也是一樣，於是我們去除幼年居住地再行統計分析，則核心都市與一般都市相對於鄉鎮，都呈現具統計意義的影響。最後的結果是，年齡輕者與高教育程度者顯示較強的對西洋歌曲的喜好。都市化程度上的變化，則是控制了教育和職業的變項之後，核心都市與一般都市的差距縮減，但都顯示相對於鄉鎮較強的喜好傾向。

至於古典音樂的喜好，教育、職業與都市化程度的三組變項依舊呈現顯著的統計效果，且都是正向的關係（模型 I、II、III）。在模型 IV、V、VI 依序放入各自變項之後，最明顯的改變是都市化程度的影響消失，而行業別的影響只呈現在三級行業。在模型 VII 加入了父親的教育年數與職業聲望之後，這三個變項的係數都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僅以前面的三個模型作為討論的依據。性別、教育年數、職業聲望以及三級行業都呈現正向關係。換言之，女性、教育程度高者、職業聲望高者以及三級行業從業者，對古典音樂的喜好都較強。都市化程度對古典音樂的喜好在控制了階層的變項之後，幾乎是完全消失了，模型 VI 和模型 V 的 Pseudo R Square 完全相同，則更意味著都市的影響是透過階層化而來的。

從我們選擇分析的四種音樂來說，階層化的變項與地方戲曲的喜好是反向的關係，而與國語流行歌曲、西洋流行歌曲以及古典音樂都呈現正向關聯。教育與三種樂曲的喜好都是正向關係；職業變項則呈現一些變異，在古典音樂上，是職業聲望以及三級行業的影響才具統計水準，西洋音樂的喜好與職業類別的關聯低，而國語流行歌曲是在農與非農之間的差別。似乎從階層方面的觀察，國語流行歌曲的喜好因階層而區分的效果較弱。至於都市化程度方面，則是流行取向較濃的國語與西洋歌曲的喜好，較因都市化程度而變化，非流行取向的地方戲曲則與個人的自幼生長的环境關聯強，至於一般變為比較是高品味的古典音樂，則主要是階層而不是都市化的效果。

(四)主觀階級認同的分析

最後我們想觀察的是，人們對自身階級的認同與其教育程度、職業層級、都市化程度以及生活型態等因素的關聯。職業的變項依一般的看法，和個人的階級認同是最為直接的，因此與生活型態的以教育為起點的討論不同，我們從職業的一組變項開始。在表 5 的模型 I、II、III 裡，我們首先看到職業、教育與都市化三組變項和主觀階級認同的影響都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職業聲望高者以及一級和三級行業的從業者比起二級行業的從業人員，都有著較易自認是中等階級的傾向，教育程度和都市化程度對階級認同亦顯示正向的關係。當在職業變項之外又加上性別和出生年，職業變項對階級認同的影響依舊顯著，但是原來三級行業的係數大於一級行業，但是在模型 IV 之內，變成一級行業的係數大於三級行業，這種差距當又再加入教育年數的變項時，更加擴大。這反映著，當性別、年齡與教育程度等條件相等時，一級行業的從業人員比二級和三級行業從業者，更傾向於自認為中等階級。

表 5 主觀階級認同的邏輯迴歸分析

自變項	I	II	III	IV	V	VI	VII
性別				.461***	.658***	.649***	.603***
出生年				.023***	-.000	.001	-.002
無業家管	.576***			.378*	.462**	.448**	.516***
一級行業	.524**			.822***	.841***	.882***	.862***
三級行業	.767***			.767***	.551***	.513***	.460***
職業聲望	.049***			.051***	.034***	.033***	.029***
教育年		.160***			.138***	.132***	.098***
核心都市			1.037***			.491***	.361*
一般都市			.309***			-.062	-.119
精品百貨							.370***
大飯店							.722***
古典樂							.104
西洋歌曲							.225
常數項	-2.388	-1.513	-.380	-.4.148	-4.049	-4.062	-3.738
loglike	-1342	-1474	-1569	-1314	-1270	-1260	-1227
pr*r	.089	.083	.027	.108	.135	.142	.164
樣本數	2126	2319	2326	2126	2119	2119	2119

再加入都市化變項之後，以上的差距更加擴大，而都市化程度所呈現的影響在與其他變項並列時，只出現在核心都市，意味著核心都市的居民更傾向認定自己是中等以上階級。

以上各客觀條件的影響確定之後，我們則加入生活型態的變項。特別是以在精品百貨購買衣服的傾向，在大飯店用餐的傾向以及喜好西洋音樂和古典音樂的情形，這些消費的場所與方式，可以說是層級較高者。當我們加入了教育年數，最明顯變化的是一般都市影響效果消失了。這樣的統計結果意味著，當教育與職業層級的影響效果控制之後，核心都市居民認同中等階層的傾向高於鄉鎮，而中小都市的影響便無關緊要了。最後，在我們加入四個生活型態的變項之後，階層化與都市化變項的影響，依舊維持原來的情形之外，到精品百貨購衣以及到大飯店用餐的傾向都與主觀階級認同呈現正向關聯，亦即是當性別、職業、教育以及都市化程度等條件相似時，到精品百貨購買衣服傾向以及到大飯店用餐傾向較強者，認同自己為中等以上階級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對古典音樂以及西洋音樂的喜好，則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後二變項未能顯示具統計意義的影響，是異於我們的假設的，但依據前二變項所呈現的關聯，我們多少可以推論說，偏向較高層級的消費行為的人們，在相似的階層與居住條件之下，對中等階級認同的可能性會增加。

四、討論與結論

以上的分析顯示，教育年數具有最穩定的影響效果，對每一個依變項，教育的個別影響幾乎都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同時以 Pseudo R Square 的情形來看，其解釋力是最強的。在控制了其他變項之後，教育的影響仍穩定維持著，與在地攤購衣、在路攤小吃店用餐以及地方戲曲的喜好呈反向關聯，而與其他的購衣、用餐行為和音樂喜好都是

正向關係。其中較不合理的是，在用餐的三種場所，都呈現正向關聯，不過在在以路攤小吃和在大飯店用餐與在一般餐廳用餐對比的分析中，教育程度顯示對路攤小吃的反向關係以及對大飯店的正向關聯。職業方面的變項，我們同時放了職業聲望與行業類別，行業類別的影響效果較參差，但職業聲望則在未控制其他變項時對所有的依變項都有其影響，在控制了教育之後，在部分變項，如在路攤用餐、對地方戲曲和對國語歌曲的喜好，影響效果消失了，對其他變項的影響方向與教育年數所呈現者相同。總之，社會階層變項與購衣、用餐傾向以及音樂喜好的關係，如一般所預期的：對非正式的場所，對鄉土戲曲的喜好較弱，對正式的、對層級高的場所的偏好較強，對流行音樂、西方音樂的偏好亦較強。

都市化程度對各依變項的個別影響效果，除了在服裝店購衣一項，幾乎都呈統計上顯著的關聯，從 Pseudo R Square 的變化來看，控制了階層變項之後，都市化程度的解釋力部分被階層變項所取代了，不過都市化程度仍有其獨立的影響效果；只是一般都市的效果比較容易消失，但是核心都市的效果大部分仍維持著。更有意義的是，都市化程度所產生的變異性較為曲折。首先在購衣場所上都市同時顯示較強的地攤、精品百貨傾向，而對服裝店反而呈現負向關係，是都市層級越高，在一般服裝店購衣的傾向相對的較弱。在用餐場所傾向上，三個依變項分別分析時，都市化程度的影響效果只在核心都市中顯現出來，一般都市與鄉鎮之間沒什麼差別。以一般餐廳為對照類屬的分析上，則都市化程度與路攤小吃的負向關聯，在控制了階層變項之後消失了，意味著都市居民與鄉鎮居民在同樣的階層背景時，在路攤或小吃店用餐與在一般餐廳用餐的傾向是相似的，不過核心都市居民在大飯店的用餐傾向相對於一般都市及鄉鎮居民，則較強。核心都市居民在精品百貨購衣以及在大飯店用餐的傾向強，是符合我們從資源接觸可能性的推論。但地攤與路攤的分布呢？在目前一些服務業非正式部

門的討論，大都放在都市的脈絡（陳小紅 1984；周鳳 1986；Smith 1985）。在附表 1 中，我們看到，像小吃店這樣的用餐場所，雖然集中大都市的情形較低；可是，相對於人口數，大都市的小吃店的集中程度仍然較強。換言之，非正式的服務與消費場所，也是一種都市現象，以致於較低層次與高消費的行為顯現同樣的都市效用。

音樂比較是可以居家享受，不必受到資源分布的限制。個別觀察，都市化程度對不同類別音樂的喜好都呈現具統計顯著水準的影響效果，不過在控制了階層變項之後，都市化對古典樂曲喜好的影響效果，為階層變項所消解。至於與地方戲曲的負向關聯，則不同於與國語以及西洋歌曲的正向關聯。相對於國語和西洋流行歌曲，古典音樂一般都被認為是比較小眾的嗜好，而從唱片銷售的網絡來說，都市地帶的唱片行在古典音樂的陳列上，應該是比較完整而多樣的，都市化對古典音樂的喜好是在階層化控制下而消失，這比較不符合副文化論的說法。國語與西洋流行歌曲的傳播，顯現的反而是一些大眾口味的東西，可以在都市中更強勢的傳播。在流行與小眾集結對都市研究的意義，仍有待更進一步的探討。

至於主觀階級認同的分析，都市化程度以及生活型態都顯示其影響效果，不過都市化程度的效果，只在核心都市，一般都市與鄉鎮間沒有差異，生活型態的效果只出現在購衣與用餐場所的偏好，而音樂喜好的類別則否。由於，精品百貨以及大飯店主要都集中於大都會，因此居住在核心都市對階級認同的影響，更是可以肯定。不過有關生活型態方面的影響，是值得稍加討論的。購衣和用餐場所的偏好與對西洋音樂的喜愛都受到都市化程度的影響，但對古典樂曲的喜好則否。我們在音樂喜好的討論中，認為流行是解釋西洋音樂與古典音樂差異的可能因素。就此我們也會認為，音樂的喜好與用餐和購衣場所的偏好一般，也會影響到個人的對階級的主觀認同。如果我們將顯著水準定在「.10」，則西洋歌曲的影響效果是可以接受的。但依「.05」的水

準，我們無法考慮。購衣與用餐場所的偏好與音樂喜好不同的是，前者的外顯性質更高於後者，因為前者必須前往特定地方，而後者可以是居家的較隱私的行為。但也可能是因為在問卷的回答上，購衣與用餐場所比較是客觀行為的指認，音樂的喜好則是一種主觀的評估，而主觀的評估比客觀的指認，信度可能較低。當然我們希望前一解釋可以成立，那樣對未來的進一步考慮生活型態與階級主觀認同的關聯才更有意義。

總結以上的討論，我們應該可以肯定，都市化程度對生活型態的影響有其獨立於社會階層化的意義，而大都市以及部分生活型態對階級認同的影響也不是階層的效果，這都呼應了我們在前言中的命題。不過，低層級以及高層級的消費行為均共同展現了都市效果；而流行與興趣之間，我們的研究比較肯定了流行的效果；在主觀階級上，我們指出，不同類型的行為影響效果上的差異。希望這樣的發現對日後的更進一步的研究，有其助益。本研究的發現所反映的資源集中的效果，也建議我們，在未來的都市研究中，必須跳出「人際關係命題」，同時兼顧自然／藝術，傳統／變遷的命題。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這樣的觀察可能更為重要。

附表 1 都市化與教育程度和行業組成

都市層級	教育程度				行業組成					
		國中	高中	大專	合計	無業	一級	二級	三級	合計
核心都市	N	202	173	155	530	128	2	130	271	531
	%	38.11	32.64	29.25		24.11	0.38	24.48	51.04	
一般都市	N	480	272	181	933	235	36	300	364	935
	%	51.45	29.15	19.40		25.13	3.85	32.09	38.93	
鄉鎮	N	621	198	88	907	214	212	261	224	911
	%	68.47	21.83	9.70		23.49	23.27	28.65	24.59	
合計		1303	643	424	2370	577	250	691	859	2377
		54.98	27.13	17.89		24.27	10.52	29.07	36.14	
卡方(4)=149.66					卡方(6)=307.9285					
P<.001					P<.001					

附表 2 聚餐場所、購衣場所及音樂喜好類型因素分析

購衣場所	因素		聚餐場所	因素		音樂喜好	因素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三
地攤	-.05	.18	路攤夜市	-.61	-.07	國語歌曲	.04	.04	.59
服裝店	.26	-.11	小吃店	-.63	-.03	西洋歌曲	.26	-.12	.48
裁縫店	.19	.14	中餐廳	-.27	.48	日本歌曲	.06	.22	.26
百貨公司	.42	-.08	西餐廳	-.25	.54	古典音樂	.50	-.10	.31
專門店	.50	.00	日本料理	-.12	.58	國樂	.63	.02	.08
委託行	.46	.09	啤酒炭烤	-.29	.34	平劇	.56	.19	-.05
			大飯店	-.13	.60	歌仔戲	.13	.55	-.16
						布袋戲	.08	.52	-.04
						臺語歌曲	-.25	.46	.25
平方和	.75	.08		1.02	1.38		1.57	.89	.76
解釋量%	12.42	0.11		14.57	19.77		17.47	9.93	8.39

*以 principal factor 因素法，經 promax 斜角轉軸。

附表3 臺灣地區服裝、飲食相關行業分布狀況，1991

		百貨 公司	觀光 飯店	成衣 服裝	餐館業	小吃店	人口 比率
臺北市	%	37.33	42.50	23.44	34.89	21.90	13.22
	Q	282	321	177	264	166	
四核心都市	%	58.06	72.05	43.96	50.48	44.47	27.13
	Q	214	266	162	186	164	
其他省轄市	%	3.20	4.17	8.26	5.05	7.49	4.59
	Q	70	91	180	110	163	
其他各縣	%	38.71	23.33	47.77	44.47	51.61	68.28
	Q	57	34	70	65	75	

* 四核心都市含臺北市，百分比為各類地區各種商業服務業場所單位數占全臺灣區總數的比重；Q為各地區各類場所單位占的百分比除以各地區占臺灣人口數的百分比再乘以100。

*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臺閩地區工需及服務業普查報告，第六卷及第十卷。

參考書目

- 中華民國八十年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
- 伊慶春、章英華
1989 都市意象：以台北市居民為例的探討，中國社會學刊 13:43-66。
- 朱元鴻
1993 臺中市生活風格研究，國科會專題計劃報告。
- 余舜德
1996 空間、論述與樂趣：夜市在臺灣社會的定位，見黃應貴編，空間、力與社會，頁 391-462。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周 鳳
1986 都市非正式部門發展之研究——以路邊洗車業為例，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論文。
- 章英華
1988 都市化與機會結構及人際關係態度，見瞿海源、楊國樞編，變遷中的臺灣社會，頁 189-194。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3 遷徙意願與理想居住地：從都市化、個人背景與居住環境評價的探討，見伊慶春編，臺灣民眾的社會意向，頁 65-90。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許嘉猷
1988 社會結構、生活風格與消費支出，中國社會學刊 12:33-52。
- 陳小紅
1984 開發中國家非正式部門之研究，政治大學學報 50:79-109。
- 傅仰止
1995 台灣都市居民的非慣俗傾向，台大社會學刊 25（編印中）
- 傅仰止、伊慶春
1984 容忍態度的結構肇因：都市背景、遷移經驗、異質聯繫，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6(2):257-301。
- 黃毅志
1994 社經背景與地位取得過程之結構機制：教育、社會資源及文化資本，東海大學博士論文。
- 廖正宏
1986 臺灣農業人力資源的變遷，見瞿海源、章英華編，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頁 179-208。臺北：中研院民族所。
- 蔡宏進

- 1986 臺灣的社區變遷，見瞿海源、章英華編，*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頁 275-297。臺北：中研院民族所。
- 蕭新煌編
- 1988 變遷中臺灣社會的中產階級。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Bourdieu, Pierre
- 1984 *Distin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ewey, Richard
- 1960 The Rural-Urban Continuum: Real But Relatively Unimporta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6:60-66.
- Fischer, Claude S.
- 1976 Toward a Subcultural Theory of Urban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6):1319-40.
- 1984 *The Urban Experience* (2nd ed.).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Gans, Herbert
- 1968 *Urbanism and Suburbanism as Ways of Life*, pp.95-118 in R.E. Paul (ed.), *Readings in Urban Sociology*. Oxford: Pergamon.
- Hadden, Jeffrey K. & Jesof J. Barton
- 1973 An Image that Will Never Die: Thoughts on the History of Anti-urban Ideology, pp.79-116, in Louis H. Masotli and Jeffrey K. Hadden, eds., *The Urbanization of Suburbs*. Beverly Hill: Sage Publications.
- Hodges, Harold M.
- 1968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in America*. Cambridge: Schenkman.
- Jackson, Kenneth J.
- 1985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pton, Michael
- 1977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 Lodon: Temple Smith.
- 1984 Urban Bias Revisite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3):139-66.
- Saunders, Peter
- 1986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Hutchinson.
- Simmel, George
- 1957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pp.635-636 in Paul K. Hatt &

albert J. Reiss (eds.), *Cities and Society: the Revised Reader in Urban Sociology*. N. Y.: the Free Press.

Smith, Carol

- 1985 Theories and Measures of Urban Primacy: A Critique, pp.87-117 in Timberlake, Michael (ed.), *Urbanization in World Economy*. Orlando, Florida: Academic.

Tumin, Melvin

- 1985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Forms and Functions of Inequali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Wellman, Barry

- 1979 The Community Question: The Intimate Networks of East Yor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1201-1231.

Wirth, Louis

-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July):3-24.

台灣地區民衆消費行爲傾向之形成： 傳媒使用、自我認同狀況、 與個人背景之影響

郭 貞*

摘 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臺灣地區民眾幾個重要的消費行爲傾向，例如，物質主義、衝動性購物、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和商品資訊搜尋。除了基本人口變項之外，作者並加入媒體使用頻次、和心理層面的變項作為主要的解釋因素，試圖建構一個因果結構模式來共同解釋這些消費行爲變項。作者運用線性結構關係 (LISREL) 共變量分析法做資料分析，並且測試模式建構的適當性，同時也評量假設中結構關係的顯著性。

本研究採入戶訪問調查法，受訪者為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年齡在二十歲至六十四歲居民。有效樣本數總計為 1946 人。從研究結果中發現：女性比男性展現出更多的商品資訊搜尋行爲和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卻比男性較少衝動性購買的傾向。年輕人比年長者具有更強的衝動購買傾向，和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教育程度高者不但善用印刷媒體搜尋資訊，其自我認同達成度高、自我渙散度低，這三個中介變項成了教育程度影響力延展的橋樑。全家收入的影響力較小，只對社

* 政治大學廣告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會表達性消費動機和印刷傳媒使用有輕微的加強效果之外，年齡和教育程度對於自我認同狀況和傳媒使用都有直接影響，並且透過這些中介變項對消費行為傾向產生間接影響。同時，自我認同狀況對於傳媒使用不但有直接影響力，還會透過傳媒去間接影響民眾的消費行為。這似乎暗示著人們在搜尋商品資訊時未必只是為了比價和省錢，也可以是學習各種商品和品牌的社會意義，企圖積極善用各種商品符號來幫助表達自我的特色，以及成功扮演各種社會角色，這增加了對國人消費行為的複雜性，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The Development of Consumer Orientations on Taiwan: The Impact of Media Use, Identity-formation Status, and Demographic Background

Cheng Kuo

Abstract

1946 residents on Taiwan were surveyed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four consumer orientations: perceptions of materialism, impulsive consumption, socially expressive motives for consumption, and product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 in a multivariate context.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and evaluated in which media use, the consumer's identity formation status, and background factors were utilized as major explanatory variables. Results from the analyses indicate that demographic variables, especially age and educational levels, have significant direct as well as indirect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umer orientations in question. The consumer's identity formation status was found to influence respondents' media use as well as their consumer orientations. Results from the analyses also suggest that consumers may engage in product information seeking for dual purposes: to hunt for good bargain prices and learn about the symbolic social meanings of various kinds of products and brands so as to exercise symbolic consumption.

臺灣地區民衆消費行爲傾向之形成： 傳媒使用、自我認同狀況、 與個人背景之影響

一、研究緣起

自 1950 年起臺灣已經逐漸發展成爲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到了 1990 年，臺灣的非黃金外匯存底高達 860 億美元，居世界各國之冠 (King, 1988; Montagu-Pollock, 1991; Wall Street Journal, 1992)。根據最新的資料顯示：到 1995 年的二月底臺灣的外匯存底高達 932 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日本。由於工商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經濟力的強盛而導致新臺幣升值，臺灣民衆的購買潛力急速上升，生活水平也跟著水漲船高。近年更動輒有「臺灣錢淹腳目」之謂，臺灣民衆自開放觀光旅遊後，不少人出國旅遊消費時，常常表現出瘋狂採購名牌精品、財大氣粗等令人側目的舉止，這種爲社會表達動機而購物的行爲，以及衝動性的購買行爲似乎與講求「節儉」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相衝突。

由於當前社會民生富裕的程度前所未有的，消費動機早已跨越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層次，變得更注重享樂、個人表現、社會表達等符號式的消費，因此民衆在其消費習性上可能會產生若干改變。其次，大眾傳媒科技進展一日千里，透過人造衛星的傳播，舉凡最新消費品、流行時尚等與購物相關的信息，在短期間即可快速傳達各地，蔚爲風潮。臺灣地區民衆與傳媒接觸頻繁者，自難免受其影響而逐漸改變某些消費習性。此外，廣告行銷人員努力拓展各種銷售通路，除了傳統

的零售、郵購之外，如今又新添了電子郵購目錄、有線電視的購物頻道、直銷等通路，使得消費者購物的方式更加多元化。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臺灣地區民衆幾個重要的消費行爲與習性，除了基本人口變項之外，作者將加入媒體使用頻次、和心理層面的變項作為主要的解釋因素，並試圖建構一個因果結構模式來共同解釋這些消費行爲變項。在以下的段落裡，作者將簡略介紹及討論本研究中所探討的消費行爲變項，同時，也會討論各解釋變項的定義、及其在本研究的因果結構模式中的意涵。

運用線性結構關係 (LISREL) 共變量分析法不但能測試模式建構的適當性，也可以評量假設中結構關係的顯著性。簡而言之，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1)自選擇的觀點解釋臺灣民衆消費習性之形成，以及此因果結構模式的適當性；(2)評量媒體接觸、自我概念狀態、和人口背景因素對消費習性的相對影響力；(3)試圖找尋以上三種解釋變項之間可能存在的結構關係。

二、學理背景及文獻回顧

(一)消費行爲傾向

作者先將本研究所探討四個與消費行爲有關的變項—物質主義傾向、衝動性購物、理性消費技巧、和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的概念定義和相關文獻，逐一做簡短介紹如後。

1. 物質主義傾向

Ward 和 Wackman, (1971, p.426) 在其消費者社會化的研究中將「物質主義傾向」界定為：個人特別強調以擁有金錢和財物來追求快樂與社會晉升之價值觀。換言之，一個有高度物質主義傾向者的人生目的是不斷追求物質滿足和財物之擁有，並且視財富的獲取為追求

人生幸福的唯一途徑。因此他們常以個人的消費和生活方式來評量他人和自己的「價值」(Rassuli & Hollander, 1986, p.5)。所謂「笑貧不笑娼」,和「金錢萬能論」是這類人的一個典型。這種類型的人有許多很在意別人對自己「財力」的評價,因為在他們的心中已經把「個人價值」和「財力」劃上等號,所以他們常喜歡充場面、擺闊氣,以財富驕人。

Richins & Dawson (1992) 整理過去許多學者們對物質主義傾向所做的研究,提出四個假設來區分高度物質主義傾向者的特徵:(1)具有高度物質主義傾向的人看重財物擁有和獲取,遠勝過與人的交往情分;(2)他們通常以自我為中心,自私自利,不願把好處和別人分享;(3)他們追求物質生活的複雜和奢華,不喜歡簡單樸素的生活方式;(4)雖然他們的物質生活已經相當豐富,但是仍舊貪欲無厭,常感到不滿足。物質主義傾向其實是一個涵蓋面甚廣的社會價值觀,並不僅只局限在消費行為的層面,作者選擇探討此構念主要是希望知道在台灣地區具有此種價值觀的人所佔的比例有多少,其在人口背景的分佈上的情形如何。若從一個社會變遷及長期追蹤研究的觀點來看,民眾中具有物質主義傾向者所佔的比例是否有任何增減變化,或者,民眾察覺到社會上的物質主義傾向是否瀰漫擴大,都具有相當重要的社會意義。

2. 衝動性購物

衝動性購物 (Compulsive buying) 是指消費者在購物的當時受到內在或心理上無法控制的趨動力 (driving force) 的主宰,而不由自主的做出一些不明智,甚至不理性的購買行為 (d'Astous, 1990; Rook, 1987)。Rook (1987) 認為衝動性購物與消費者為解決問題 (problem solving) 而啟動的理性決策過程不同,它屬於一種可能引發情緒衝突的享樂性情結,應當以享樂體驗的觀點來探討。Rook 指出五種衝動性購物者慣有的特徵:(1)立即採取行動,尤其看到商店裡的

打折和減價廣告時，常會產生立即購買的衝動；(2)強烈的趨動力使得當事人立刻放下手邊的事情不管；(3)當事人常伴隨有興奮、刺激、狂野、和過癮的感覺；(4)在評估商品時，商品的功能和實用性變得不重要；(5)立即購買的衝動難以抗拒，往往會使人不計後果，一意孤行。因此有學者認爲 (O'Guinn & Faber, 1989) 衝動性購物者所沈緬的是購買過程中的感情經驗，而非從購物中得到的實質利益和服務。

近年來有關衝動性購物的研究發現：衝動購物者的自尊心較低，物質主義傾向較強，愛幻想、沈湎於購物逛街的行爲而樂此不疲。但是他們在購買之後卻容易產生懊惱、後悔、和罪惡感，並且很憂慮自己的行爲會被別人批評爲愚蠢不智。Valence, d'Astous & Fortier (1988) 共同發展出一套衡量衝動性購物的量表應用在其研究中，他們發現：女性、年輕人、自尊心較低、非理性的信用卡使用人的衝動性購物傾向比較高。此外他們相信衝動性購物傾向可能在個人的青少年時期，透過社會學習 (觀察模仿) 和親身的消費經驗已經開始養成了。

3. 理性消費技巧

理性消費技巧 (Consumer skills) 是指消費者在購買和消費的決策過程中盡可能採取各種方法，例如，廣蒐商品資訊、貨比三家、討價還價、使用折價券、控制預算等來達到降低付出的成本，和增加報酬效益的理性行爲。換言之，此構念與衝動性購物相反，非常強調消費行爲中理性、功利實用，和經濟效益的層面。商品資訊搜尋是理性消費技巧的一個重要環節，但是個人對商品資訊所做的搜尋程度會受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和收入等因素的影響 (Urbany, Dickson & Wilkie, 1989)。消費者個人主觀上認定的資訊搜尋成本與回收之比例，也會影響搜尋的深度與廣度。由於臺灣地區有相當多民眾，仍然信守中國傳統價值中的「節儉是美德」的信念，因此理性消費行爲中的「廣蒐商品資訊」、「貨比三家」、「討價還價」應當在年長的民眾中

更普遍。

4. 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

消費動機往往引導個人在購買決策過程中，做商品和品牌選擇時究竟會傾向何種標準。例如，爲了功能和實用性而購買的商品，就會偏重比較商品的耐久與經濟性；爲了享樂和人前誇耀的動機而購買的商品或勞務，就以商品所附帶的社會訊息及符號意義爲首要考量。以往學者在研究消費者的購買動機時，大致上將其分成兩大類：「功能實用」和「社會表達」。社會表達性動機使得個人運用商品和其所代表的社會意義來幫助消費者表達自我概念，在人前塑造形象。這種屬於符碼式的消費 (symbolic consumption) 是消費者主動地運用商品所含的社會意義來傳達訊息 (Hirschman & Holbrook, 1981)。

(二)理論架構和解釋變項

本論文的理論架構主要是融合社會學習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符碼式消費行爲 (symbolic consumption)、與 Erikson 的自我認同理論 (identity formation theory) 三個學理觀點。另外再以基本人口背景變項來作爲整個整合理論模式中的前置變項 (antecedents)。換言之，作者除了以四個基本人口背景因素來做爲初步的自變項之外，還加入兩個媒體使用變項代表社會學習機制，以及自我認同狀況變項作爲心理層面的中介變項。主要之目的在建構一個整合多重理論的因果結構模式，並檢測這三類解釋變項各自和共同對各消費行爲傾向的相對影響力。同時，也希望檢測這三類學理變項之間，與各消費行爲變項彼此間，是否存在著顯著的相互關連性。

1. 社會學習論

社會學習論強調的是影響來源—通常指的是「社會化機構」

(socialization agents)對於學習者在價值傳遞、規範、知識、技巧和行爲等方面的教化影響。社會化機構可以是任何在社會化過程中的任何個人或組織，因為經常和學習者互動，或者對學習者來說是重要或特別的個人或團體，因此對學習者容易產生影響力。社會學習模式已經超越了簡單的S-R「刺激反應」的學習規則，加入了模倣(modeling)和觀察學習(vacarious learning)的概念。Bandura (1969)假定觀察的效果，一個學習模式可以包含幾乎所有的社會行爲。這被觀察倣效的行爲(即刺激)通常由角色楷模(role models)表現出來。社會學習的過程可約略分爲四步驟：首先，學習者先依照自己的心理需求和興趣對某個角色楷模的言語行爲產生了注意(attention)。接著，學習者就仔細觀察其言行，默記在心中或者在腦海裡演練(retention and mental rehearsal)。有時，學習者必須實際操練腦中記憶的行爲，否則不能真正學得完全。最後，學習者還得在特定的時地、或社會情境中評量：如果自己將觀察學來的行爲表現出來是否合宜，所期望的後果是正面的或是負面的。若是學習者期望表現此行爲會獲得讚許和支持，這個「對正面結果的期望」就是完成社會學習的「臨門一腳」。

除了家庭、同儕、和學校之外，大眾媒體也被發現是和社會化結果直接相關的。消費者社會化通常是以觀察學習的形式來進行，暴露於大眾媒體也能夠提供這樣的學習機會和經驗。Bandura (1971)認為，物質性的物體能夠得到社會意義，並且對於聽閱人產生意義，乃是因為得到了社會強化或允許。當使用或不使用某一產品所描繪的結果，若被受眾視爲真實時，他們可能會模倣這樣的消費行爲，並且購買產品。Moschis & Churchill (1978)指出：看電視和社會性消費動機成正相關，和經濟性消費動機成負相關。換言之，看電視似乎是鼓勵了社會表達爲目的的消費行爲。另一方面，閱讀報紙對於預測消費者事務的知識、消費者行動和經濟性消費動機來說，是有效的預測變

項。Moschis & Moore (1982) 所做的一個兩波的長期性研究顯示，當缺乏家庭內的消費事務溝通時，電視廣告會影響物質主義和傳統性別角色的發展。消費者社會化通常以觀察和二手經驗的學習形成。

2. 符碼式消費行為與自我概念

在消費者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產品具有符碼的特質，並且此產品的社會意義其重要性可能更甚於經濟性、功能性的商品特質。Solomon (1983) 指出，消費者常應用商品的符碼去定義社會真實，他們通常是依賴產品上所蘊含的社會資訊，去形成自我形象，並擴展到社會角色的表現上。產品的符碼能夠被視為是和角色期望有關的傳播形式之一，並且它可以用心理的（例如，動機）和社會的觀點來探究。Schenk 和 Holman (1980) 發現人們會在某些情境，運用商品去影響他們在別人面前的表現，然後他們從他人的評估中得到的回餽，使他們在那個時、地成為怎樣的人。既然人們對他們的印象，可能是來自於對他們所具有東西的評估（例如，指涉社會地位、職業、生活型態的產品），這樣一個反映的評估會顯著地對個人所有物的符碼特質所影響。例如，青少年男孩用「macho」產品（例如，香煙、啤酒等），衣服和男用古龍水去支持或粉碎男性自我概念的發展。「暴發戶」則會傾向於依賴外在的房子、奢華的車子、和衣服等的展現，去表達出他們的社會地位。

實證研究的發現也支持當個人缺乏能力去滿足角色期許時，會導致其高度依賴相關的物質符碼（Soloman, 1983; Soloman & Anand, 1985）。Wicklund et al. (1981) 就發現愈是沒有能力的學生和職員，愈是傾向於運用所有物的符碼展現（例如，戴勞力士手錶、名牌配件、鞋子等）來幫助他們符合期望中的社會角色之要求。一般而言，市場行銷人員為其商品做定位，好讓消費大眾易於區分其品牌的特性，他們大量運用廣告塑造品牌形象，賦予商品獨特的社會和符碼意義。例

如，勞力士手錶代表富裕多金，賓士牌轎車象徵事業成功和社會地位等。人們經常接觸這些廣告媒介訊息，便會受其影響而接受廣告中對商品所賦與的社會和符碼意義。

3. 艾利克森 (Erikson) 的自我認同形成理論

艾利克森 (Erikson) 提出一個「人生發展八階段」說來描述人類發展的八個不同階段。在個人發展的每個階段都有一個特別關懷的問題或焦點 (Erikson, 1963)。在每一個階段中，個人因為伴隨年齡而來的生涯目標轉換與環境變遷，會或多或少感受到心理壓力、焦慮、與不適應感。此時個人會突然覺得失去一個明確的、既有的自我，於是形成一種心理上的自我認同危機。認同乃是個人在社會體系的定位，認同問題有社會觀點與個人觀點兩種 (Goffman, 1963)。社會觀點是從廣義的社會體系，如：性別、宗教、職業、社會地位、種族團體等特性來區別人們活動的範圍與角色行爲的期望。個人觀點是人們以獨特的方式與風格表現各種角色，並與環境中其他人維持適當的關係。艾利克森指出個人認同 (identity) 的形成，是經由一段心理社會懸宕的過程發展而來。在這段時其中青少年被期望要去面對生活上、角色上的改變，最後還要對這些改變作出承諾，並建立清晰的自我認同。

雖然國內有學者認為自我認同形成理論不適用於東方人，因為東方人沒有明顯的「自我疆界」(楊中芳, 1991)，但是，作者與其他學者曾採用此理論預測國內青少年的「符碼式消費行爲」，發現具有相當程度的解釋力。例如，郭貞發現「自我認同達成」與「順服認同」的青少年比「認同渙散」(identity-diffusion)和「認同懸宕」(moratorium)者，更善於運用產品形象來表達和澄清自我形象 (Kuo, 1993)。換言之，若是自我認同達成者代表個人已建立了一個較穩定的自我概念，此時他便會善用商品符號來幫助自己表達心中期望自我概念。另外，青少年在媒體使用偏好上，也受到自我認同形成狀況的影響，自我認

同達成者比較偏好自報紙和電視獲取新聞性內容，比較少收看電視娛樂性節目（郭貞，1994）。另一個以大台北地區中學生為樣本的研究結果也同樣顯示：自我認同混淆或渙散者具有較強的衝動性購買傾向（Kuo & Tsai, 1994; 蔡美瑛, 1994）。雖然「自我認同」是屬於青少年時期的關心焦點，但是也可能有成年人，終其一生也未能達成「自我認同」，時時刻刻隨著別人的意見和觀點而改變對自己的看法。本研究將此理論應用在成年人的樣本，是希望藉此測試此理論適用性的廣度和外在效度。

4. 社會階層和人口基本變項

社會階層是指和個人分享共同的文化及相似生活型態的團體，社會階層的觀念對於了解和預測不同的消費現象是有用的。既然人們的行為大部分取決於代代相傳的許多文化因素，不同的社會階層因此在消費行為上，可能會有不同的價值、動機和影響力。大部分消費社會化研究對於社經地位變項相當重視，並且視它為主要的先前變項或解釋變項。Munson & Spivey (1981) 指出，就九個品牌和產品的嘗試來說，高社經地位者和低社經地位背景者之間，有很不相同的品牌使用的刻板印象。Warner (1960) 和 Martineau (1957) 也注意到社經地位會幫助定義人們想要花錢的事情的層級。兩個人在社會階層上分的愈遠，他們在使用、購買和了解產品上的差異也就愈大，特別是在價值表達產品上。這個結果反駁了 Bieda & Kassarian (1969) 所說的，因為暴露於大眾媒體，因社會階層差異而產生的產品偏好情況是不存在的。

文化中規範的性別角色傾向對於個體的消費行為也有些效果。大體上來說，購物被視為女性的領域：男性並不會希望成爲一位購物角色的模仿對象，也不會被同儕團體鼓勵爲「好而且聰明的消費者」（Karden, Darden, Howell, and Miller, 1981）。因此，對於男性來說，

購物比較不是個內化的角色，而結果是和女性惠顧行爲會有很大的差異。和消費者相關的性別角色模塑會被年輕人接受，並且提供他們「期望的社會化」的學習經驗。結果，女孩和男孩會有不同的商店惠顧行爲。

從這個觀點來看的話，社會階層是指和個人分享共同的文化及相似生活型態的團體，社會階層的觀念對於了解和預測不同的消費現象是有用的。既人人們的行爲大部分取決於代代相傳的許多文化因素，不同的社會階層因此在消費行爲上，可能會有不同的價值、動機和影響力。

三、研究方法

(一)抽樣方法

本研究採社會調查法，以面訪方式進行資料蒐集。本研究的母體定義為在臺灣地區具有國籍、設有戶籍，年齡在二十歲至六十四歲國民。但不包括設籍於琉球、綠島兩離島及所有山地鄉之居民；也不包括軍事單位、醫院、療養院、學校、職訓中心、宿舍、監獄等機構內之居民。有效樣本數為 1946 人。

本調查之抽樣設計採分層三段等機率抽樣法：第一階段抽出鄉鎮市區，第二階段自中選的鄉鎮市區抽出村里，第三階段自中選村里抽出人。各階段各單位的抽樣，採抽取率與單位大小成比例 (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s, PPS) 方式為之，使得每人的抽取率保持相等。

(二)樣本摘要描述

此樣本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每月全家收入之分佈情況如表一所示：

表一：樣本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全家收入分佈情況

總人數：1946	各組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性 別			
男性	939	48.3	48.3
女性	1007	51.7	100.0
教育程度			
小學肄業及以下	139	13.9	13.9
小學畢業	379	19.5	33.4
國(初)中職	311	16.0	49.4
高中	182	9.4	58.8
高職	352	18.1	76.9
五專	84	4.3	81.2
二、三專	140	7.2	88.4
大學	167	8.6	97.0
研究所	33	1.7	98.7
軍、警學校	26	1.4	100.0
年 齡			
20-29歲	559	28.7	28.7
30-39歲	591	30.4	59.1
40-49歲	406	20.9	80.0
50-59歲	291	14.9	94.9
60-63歲	97	5.0	99.9
未答	2	0.1	100.0
每月全家收入			
2萬元以下	125	6.4	6.5
2- 3萬元	175	9.0	15.4
3- 4萬元	232	11.9	27.3
4- 5萬元	263	13.5	40.9
5- 6萬元	233	12.0	52.8
6- 7萬元	153	7.9	60.7
7- 8萬元	132	6.8	67.5
8- 9萬元	89	4.6	72.0
9-10萬元	87	4.5	76.5
10-12萬元	127	6.5	83.0
12-15萬元	72	3.7	86.7
15-20萬元	50	2.6	89.3
20萬元以上	51	2.6	91.9
未答	157	8.1	100.0

(三)研究變項之測量

本研究所探討的消費行爲變項，其測量的指標有些是根據國外的研究採用的量表爲藍本，加以修改而成的，其中有幾個變項係採用多重指標。作者且把這些多指標變項的指標來源簡要敘述於後。

1. 物質主義傾向

本研究參考 Ward, Moschis 等美國學者，和台灣地區社會變遷研究中有關民衆的經濟價值觀研究中所用的量表後，選出幾個最適合的指標題項。但是在進行預訪時卻發現：如果用直接的方式問受訪人是否同意「金錢能買到幸福」，許多受訪人傾向於給社會期望答案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ses) 或是拒絕回答。因此作者只好將原題目加以修訂，改採用第三人稱投射性問句法要求受訪人大約估算一下：在當前的社會裡十個人當中有幾個人會同意以下的觀點：(1)金錢能買到幸福；(2)選擇配偶時對方的貧富是很重要的考慮；(3)人一生最大的希望是擁有很多錢；(4)送禮一定要貴重才夠誠意；(5)凡事要講究排場才有面子。當我們使用投射問法，受訪人的答案可能代表他個人的物質主義傾向，因爲每個人有可能將自己的觀點投射在別人身上，以爲別人與自己見解相似。但是，也可能受訪人的回答只是他個人對外在情況的感知而已。因此在解釋分析的結果時，我們姑且視之爲受訪人對現實社會中「物質主義」的察覺，而非受訪者個人的物質主義傾向。由這五個題項所組成的量表之信度 (Cronbach alpha) 爲 0.72。

2. 衝動性購物

Valence, d'Astous & Fortier (1988) 共同發展出的衡量衝動性購物量表是本研究所採用測量指標的依據。受限於問卷的長度，作者只選了三個最能代表「立即購買衝動」、「購買後懊惱」和「不計後果」

三個面向的指標。這三個指標分別是：(1)當手頭有一點錢時會忍不住花掉一部份甚至全部；(2)買東西後會有做錯事的感覺，怕別人說我笨或浪費；(3)即使只剩一點錢還會買些不急需的東西。這三個題項所組成的量表之信度係數值 (Cronbach alpha) 為 0.52。

3. 理性消費技巧

理性消費技巧大致上包括消費者在購買決策過程和執行的過程當中，所涉及的內部（如，記憶、以往經驗）和外部資訊搜尋（如，媒體、專家、和參考團體諮詢）活動，以及量入為出，記錄、控制預算成本等行為。本研究只集中在外部資訊搜尋活動。所選用的三個題項是：(1)買較貴重的東西時會貨比三家；(2)經常和家人或朋友交換購物經驗。由這兩個題項所組成的量表之信度 (Cronbach alpha) 為 0.43。

4. 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

本研究採用的測量指標原出於郭貞 (Kuo, 1993) 歷年來所做有關青少年消費動機之研究的量表。該量表無論用於測量台灣地區或美國的消費者都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問卷中實際使用的四個測量題項是：(1)所買的東西可以看出與眾不同、有個性；(2)所買的東西可以贏得別人的羨慕和讚美；(3)所買的東西是現在流行的；(4)所買的東西是名牌。這四個題項所組成的量表之信度 (Cronbach alpha) 為 0.78。

以上所介紹的四個消費行為傾向，在概念層面或許具有相當的關聯性，但是，若從操作化層面與實證資料來看，四個構念卻各自有獨立而明顯的區辨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衝動性購物傾向屬於享樂情結的消費傾向，具有高度衝動性購物傾向者可被視為一種病態的行為。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強調消費者善用商品符號來表達自我；理性消費行為技巧強調積極的資訊搜尋和明智抉擇。至於物質主義傾向，在本研究中是採用投射性問題，請受訪者依照自己的主觀認知估

計：在目前社會中有物質主義傾向的人所佔比例有多少。

5. 媒體使用—印刷媒體、電子媒體

關於印刷媒體的使用，本研究選擇報紙和雜誌爲印刷媒體的代表，並以下列兩個問題測量其使用頻次：(1)去年一年內，您大約多久看一次報紙；(2)去年一年內，您大約多久看一次雜誌。由這兩個題項所組成的量表之信度 (Cronbach alpha) 爲 0.74。

由於民衆使用電子媒體十分頻繁，超過八成五的民衆每天都看電視，因此改以每天收看的時間長短爲測量指標比較適宜。問卷中實際使用的兩個測量題項是：(1)您平均每天看電視看多久；(2)您平均每天看錄影帶看多久。由這兩個題項所組成的量表之信度 (Cronbach alpha) 爲 0.24。這兩個指標雖然信度很低，但是作者仍舊決定採用此二指標來反映個人自傳媒接觸娛樂性內容的多寡。換言之，作者以看電視和看錄影帶的時間長短來反映此一潛在構念，因爲從研究中可以發現：臺灣地區有超過七成四的民衆看電視最主要的目的是「娛樂」，只有一成九的人爲了「獲得資訊」。所以作者將看電視當作接觸娛樂性內容的主要管道之一，雖然若與看錄影帶相比，看電視的時間長短，並不如看錄影帶時間那麼能反映出個人接觸娛樂性內容的多寡，但是看電視仍舊是許多民衆獲取娛樂最重要的媒體，因此決定將其做爲主要的測量指標之一。

6. 自我認同形成狀況 (Identity formation status)

本研究參考 Adams 所設計發展的客觀量表 (OM-EIS) (Adams, et. al., 1979)，再考量臺灣民衆的特性後，重新修訂而成。在問卷中共有八個題項，經過驗證性因素分析後，作者篩選出以下五個題項：

(1)自我認同達成—「經過多年與人交往，我現在已知道什麼樣的人，才是我真正想交的朋友，」「經過仔細的考慮，我現在已知道什麼

樣的生活方式最適合我，」「我一向都很清楚自己的能力。」此組指標的信度係數為 0.55。

(2)自我認同渙散—「我對自己的看法常受別人的影響而改變，」「我這輩子很多重要的事都聽別人的安排。」此組指標的信度係數為 0.54。

四、研究假設

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發現，作者提出下列的研究假設：

(一)性別差異

假設 1a：基於男女的社會角色差異，一般而言，女性消費者比男性更在意別人對自己的觀感，感性重於理性，以精打細算，量入為出為己任。女性消費者會比男性具有以下特性：(1)較強的衝動性購買傾向；(2)較強的理性消費傾向；(3)較強的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

假設 1b：基於男女的社會角色差異，一般而言，男性消費者比女性平均教育程度高，而且身為一家之主者較多，因此在媒體使用和自我認同狀況上會有以下之差異：(1)男性比女性較常使用印刷媒體；(2)男性比女性較少使用電子媒體；(3)男性比女性較常有自我認同達成的情形；(4)男性比女性較少有自我認同懸宕的情形。

(二)年齡差異

假設 2a：一般而言，台灣地區民眾年齡愈長者愈世故，行事愈保守傳統，因此年齡差異會使年長者比年輕者具有如下之傾向：(1)較會察覺現實社會中的物質主義傾向；(2)較少衝動性購買傾向；(3)較少理性消費傾向；(4)較低的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

假設 2b: 一般而言, 台灣地區民眾年齡愈長者人格發展愈成熟穩定, 但平均教育程度較年輕人低, 因此年齡差異會使得年長者比年輕者在大眾傳媒的使用和自我認同狀況上有如下之傾向:
(1)年長者比年輕者較不常使用印刷媒體; (2)年長者比年輕者更常使用電子媒體; (3)年長者比年輕者較常有自我認同達成之情形; (4)年長者比年輕者較少有自我認同渙散之情形。

(三)教育程度差異

假設 3a: 教育可以啓迪民智, 使人增長見識, 注重個人品味, 易於接受新思潮, 具有較強的資訊蒐取和處理的能力; 因此教育程度較高者將會比教育程度低者更具有以下的消費行爲傾向:
(1)較少見衝動性購物的習性; (2)較強的理性消費傾向; (3)較強的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

假設 3b: 教育可以訓練個人獨立思考, 能在從各方面廣搜資訊, 綜觀百家言論後再決定自己的信仰與人生方向, 而且對自己的能力頗有自信, 因此教育程度較高者將會比教育程度低者在大眾傳媒的使用和自我認同狀況上有如下之傾向: (1)更常使用印刷媒體; (2)較不常使用電子媒體; (3)較常有自我認同達成之情形; (4)較少有自我認同渙散之情形。

(四)全家收入

假設 4a: 收入越豐厚使人在購物和消費時對財務和預算的顧慮越少, 不須爲省錢到處去比價, 有能力享受瘋狂採購的奢侈行爲; 愛在人前表現自己的富裕和財力; 因此家庭收入高者比收入低者會具有以下的消費習性: (1)較易感知現實社會中的物質主義傾向; (2)有較強的衝動性購買傾向; (3)有較低的理性消費傾向; (4)有較強的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

假設 4b：收入越豐厚者其平均教育程度多半比較高一些，而且能負擔得起較昂貴的休閒活動，因此收入高者比受入低者在大眾傳媒的使用上有如下之傾向：(1)更常使用印刷媒體；(2)較不常使用電子媒體。

(五)傳媒使用之影響

假設 5a：電子媒體，如電視與錄影帶，對收視者常具有社會教化功能，並能影響其價值觀和消費行為。經常使用電子媒體者較會顯現以下之特質：(1)較易感知現實社會中的物質主義傾向；(2)有較強的衝動性購買傾向；(3)具有較強的社會表達式消費動機。

假設 5b：印刷媒體能提供較多的商品資訊，積極搜尋商品資訊的理性消費者會經常使用印刷媒體，並會顯現以下之特質：(1)較易感知現實社會中的物質主義傾向；(2)具有較強的理性消費技巧，和(3)較少有衝動性購買傾向。

(六)自我認同狀況之影響

假設 6a：一般而言，自我認同達成狀況較佳者性格較穩當成熟，對自己的未來有信心和方向感，他們較會顯現以下之特質：(1)能敏銳察覺社會上存在的物質主義傾向；(2)較不會有衝動性購物的傾向；(3)會積極尋求商品資訊；(4)具有較強的社會表達式消費動機和注重符號式消費；(5)更常使用印刷媒體。

假設 6b：一般而言，自我認同渙散狀況較重者性格較游移不定，對未來欠缺方向感與自信心，他們較會顯現以下之特質：(1)不能敏銳察覺出社會上存在的物質主義傾向；(2)較常有衝動性購物的傾向；(3)購物時較不積極尋求商品資訊；(4)需借重商品物質來幫助自己扮演社會角色，所以購物時也會呈現社會表

達性消費動機。

(七)各消費行爲傾向間的關連性

假設 7: 具有高度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的人, 通常展現符號式的消費傾向, 他們一方面比較容易產生衝動性購買的行爲, 但是另一方面在購物時也會注意蒐尋商品資訊, 以期所購之商品最滿足其需求。

五、資料分析與結果呈現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民衆爲主要的研究對象, 作者的分析可分爲以下兩個步驟: (一)先用驗證性因素分析法, 從多重指標中篩選最適當者來代表各個消費行爲、媒體使用、和自我認同變項, (二)建構一個因果結構關係模式來測試基本人口變項、媒體使用、自我認同共同對消費行爲應變項之影響。

(一)因果結構關係模式描述

本研究採用線性結構關係 (LISREL) 共變量分析法來做驗證性因素分析和因果結構關係模式之檢測。經過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後, 總共篩選出 23 個衡量指標, 分屬於八個潛在構念 (latent constructs)——察覺物質主義 ($\eta 5$)、衝動性購物 ($\eta 6$)、理性消費技巧 ($\eta 7$)、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 ($\eta 8$)、印刷媒體使用頻次 ($\eta 1$)、電子媒體使用時間 ($\eta 2$)、自我認同達成 ($\eta 3$)、和自我認同渙散 ($\eta 4$)。這八個構念都是由多重指標測量的潛在變項。這些中選的衡量指標與潛在變項, 以及其各自的信度係數 (Cronbach alpha) 都已摘要敘述於前。

在使用線性結構關係共變量分析時, 一般都有幾個基本前提。第一, 各測量指標須呈現多重常態分配 (multi-normality)。第二, 殘差

[ζ] 與潛在的外衍變項 [ξ] 無相關。第三，內衍變項的測量殘差 [ϵ] 可以有彼此有相關，但是與外衍變項 [ξ]、內衍變項 [η]、以及結構方程式的殘差 [ζ] 不得有相關 (Joreskog & Sorbom, 1984)。本研究於資料分析時其輸入的矩陣是一個共變數矩陣 (covariance matrix)，並使用最大蓋率估測法 (maximum likelihood) 來評量整個模式。

作者選取了四個基本人口因素做為控制變項：性別 (ξ_1)、年齡 (ξ_2)、教育程度 (ξ_3)、每月平均全家的收入 (ξ_4)。它們在此模式中設定為前置因素 (antecedent factors)，因為這些基本背景因素極有可能影響上面所提到的消費行為和消費傾向。圖一展示了因果結構模式中主要解釋變項、前置變項和依變項之間的相互關係。(見圖一)

(二) 結果呈現

在許多評量模式適合度指標 (Goodness-of-fit indices) 中何者最好？學者們至今尚未達成共識，於是有學者主張：若要評量一個因果模式的優劣，必須盡量列出多種適合度指標，因為每一種都具有參考價值 (Bagozzi, 1988; Bollen, 1989)。LISREL 套裝軟體能自動列出十多種評量模式適合度的指標，作者僅選擇其中最常用的幾種條列於(表二)中。從(表二)所列出之各種模式適合度指標來看，研究者所建構的結構模式具有不錯的適合度。各項常用的適合度指標如 GFI, AGFI, NFI, NNFI, 和 CFI 的值都大於 0.90; CN (Critical N) 的值也大於 200。此外，四個主要的消費行為變項中的變異量已被解釋的部份分別是：覺察物質主義 .05, 衝動購物 .33, 資訊搜尋 .44, 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 .23。另外，印刷媒體使用頻次中將近 79% 的變異量被解釋了。但是，兩個心理層面的變項——自我認同達成 (.07) 與自我認同渙散 (.03) ——則只有小部份的變異量得到解釋。

在八個多指標潛在變項之中，除了「看電視的時間」的因素載荷

表二：結構模式適合度指標與解釋力

CHI-SQUARE: 714.72 d.f.=267 (P=0.0)
 CHI-SQUARE/d.f.=2.68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RMR)=0.17
 STANDARDIZED RMR=0.032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0.97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0.95
 NORMED FIT INDEX (NFI)=0.93
 NON-NORMED FIT INDEX (NNFI)=0.94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0.95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0.95
 CRITICAL N (CN)=712.47

內衍變項中被解釋之變異量

<u>印刷媒體</u>	<u>電子媒體</u>	<u>認同達成</u>	<u>認同渙散</u>
0.79	0.00	0.07	0.03
			社會表達性
<u>物質主義</u>	<u>衝動購物</u>	<u>資訊搜尋</u>	<u>消費動機</u>
0.05	0.33	0.44	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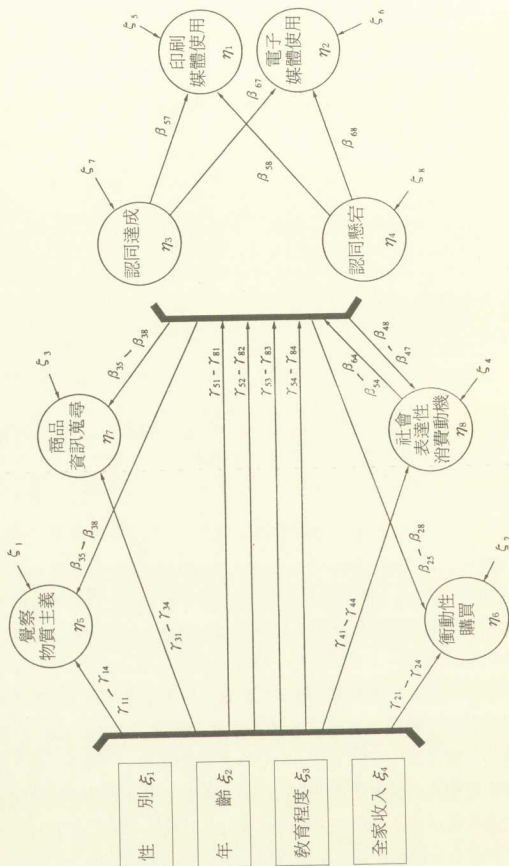
值偏低 (.23) 之外，其餘的各指標與潛在變項之間的因素載荷值都不錯，這顯示出其餘七個潛在變項的指標大都具有可接受的信度與效度。在本研究中「電子媒體使用時間」主要是用來反映個人自傳媒接觸娛樂性內容的多寡。作者以看電視和看錄影帶的時間長短來反映此一潛在構念，因為從研究中可以發現：臺灣地區有超過七成四的民眾看電視最主要的目的是「娛樂」，只有一成九的人為了「獲得資訊」。所以作者將看電視當作接觸娛樂性內容的主要管道之一，儘管如此，若與看錄影帶相比，後者更幾乎完全是純為娛樂而接觸的媒體，因此兩者的因素載荷值立時分出高下 (.23 vs .69)，看電視的時間並不如看錄影帶時間那麼能反映出個人接觸娛樂性內容的多寡。

大眾傳媒使用

認同形成狀況

消費行為

基本人口變項



圖一：台灣地區民眾消費行為因果結構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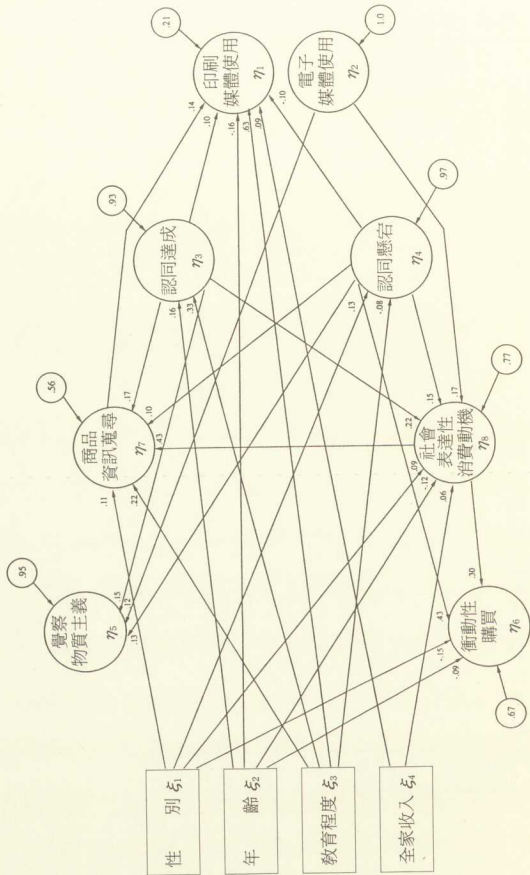
表三：模式參數估測值——測量指標（非標準化估測值）

	印刷媒體	電子媒體	認同達成	認同渙散
Y 1	1.00*			
Y 2	0.97			
Y 3		1.00*		
Y 4		1.57		
Y 5			1.00*	
Y 6			1.03	
Y 7			0.74	
Y 8				1.00*
Y 9				0.82

	物質主義	衝動購物	資訊搜尋	社會表達性 消費動機
Y 10	1.00*			
Y 11	0.92			
Y 12	0.92			
Y 13	1.06			
Y 14	1.00			
Y 15		1.00*		
Y 16		0.98		
Y 17		0.86		
Y 18			1.00*	
Y 19			1.42	
Y 20				1.00*
Y 21				0.98
Y 22				0.80
Y 23				0.74

註：所有之參數估測值均達 .05 顯著度，

*：此參數設定為 1 做參考指標。



圖二：結構模式估測結果

接下來，作者將檢視模式結構部份所涉及的各项假設是否獲得支持。

1. 性別差異

假設 1a 和 1b 涉及男女性別差異對消費行爲、傳媒使用、和自我認同狀況的影響。從表四的結果得知，假設 1a 大部分獲得驗證，而假設 1b 卻大部分未能獲得實證支持。雖然對社會上物質主義傾向瀰漫的程度的感知，男性和女性並無明顯差異，然而女性消費者比男性在購物時更常做商品資訊搜尋 ($\gamma = .11$) 而且也展現較強的社會表達性動機 ($\gamma = .09$)。值得注意的是，男性似乎比女性更容易出現衝動性購買的傾向 ($\gamma = -.15$)，這個發現與以前國外研究者的發現大異其趣，爲何臺灣地區男性比女性更具有衝動性購買的特質，這是否與傳統文化價值觀有關連？值得研究者做進一步的探索。由此可見，性別差異對消費傾向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在做市場區隔和制定行銷策略之時，絕不可忽略性別差異效應。

關於大眾傳媒的使用，臺灣地區男性與女性的差異並不顯著。換言之，在本次社會調查中並未發現男性比女性更常使用印刷媒體，比女性少看電視與錄影帶。至於性別差異對自我認同狀況的影響，作者發現女性比男性較常見自我認同渙散的現象 ($\gamma = .13$)；但是卻不見自我認同達成有顯著的性別差異效應。這個結果與假設 1b 的預測相符合，事實上，自我認同渙散的測量指標若仔細看來，似乎與「個人自信心」的構念十分相近，如果將女性較多自我認同渙散的現象視爲缺乏自信心的表徵，則與傳統男尊女卑的價值觀，以及男強女弱的性別角色社會化過程十分吻合。換言之，在傳統的社會化過程中，女子一直處於依附性的弱勢地位，因此她們「對自己的看法往往受到別人的影響而改變」，而且「有很多重要的事都是聽別人的安排」。

表四：模式參數估測值——結構因徑

BETA 矩陣				
	印刷媒體	電子媒體	認同達成	認同渙散
印刷媒體	——	——	0.43 (0.10)	-0.32 (-0.10)
電子媒體	——	——	n.s.	n.s.
認同達成	——	——	——	——
認同渙散	——	——	——	——
物質主義	n.s.	0.09 (0.12)	0.42 (0.15)	0.27 (0.13)
衝動購物	n.s.	n.s.	n.s.	0.36 (0.43)
資訊搜尋	——	——	0.18 (0.17)	0.08 (0.10)
消費動機	n.s.	0.10 (0.17)	0.44 (0.22)	0.22 (0.15)
	物質主義	衝動購物	資訊搜尋	社會表達性 消費動機
印刷媒體	——	——	0.62 (0.14)	——
電子媒體	——	——	n.s.	——
認同達成	——	——	——	——
認同渙散	——	——	——	——
物質主義	——	——	——	——
衝動購物	——	——	——	0.18 (0.30)
資訊搜尋	——	——	——	0.22 (0.43)
消費動機	——	——	——	——

(續前表)

GAMMA 矩陣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全家收入
印刷媒體	n.s.	-0.03 (-0.16)	1.03 (0.63)	0.05 (0.09)
電子媒體	n.s.	n.s.	n.s.	n.s.
認同達成	n.s.	0.01 (0.16)	0.12 (0.33)	—
認同渙散	0.18 (0.13)	n.s.	-0.04 (-0.08)	—
物質主義	n.s.	n.s.	—	n.s.
衝動購物	-0.18 (-0.15)	-0.01 (-0.09)	n.s.	n.s.
資訊搜尋	0.11 (0.11)	n.s.	0.08 (0.22)	n.s.
消費動機	0.19 (0.09)	-0.01 (-0.12)	n.s.	0.01 (0.06)

PSI 矩陣

	印刷媒體	電子媒體	認同達成	認同渙散
	0.21	1.00	0.93	0.97
	物質主義	衝動購物	資訊搜尋	社會表達性 消費動機
	0.95	0.67	0.56	0.77

註：標準化估測值在括號內，n.s. 表示此參數估測值未達 .05 顯著度。

—表示此參數設定為 0，未估測。

2. 年齡效應

假設 2a 和 2b 是關於年齡效應對消費行爲、傳媒使用、和自我認同狀況的影響。從表四的結果得知，假設 2a 和 2b 都只有部分獲得實證支持。對社會上物質主義傾向瀰漫的程度的感知程度，以及在購物前的資訊搜尋行爲，年長和年輕者並無明顯差異。但是，年輕人卻比年長者具有較強的衝動購買傾向 ($\gamma = -.09$)，和社會表達性的消費動機 ($\gamma = -.12$)。這種現象或許與近年來經濟繁榮、民生富裕有關，年輕人多半生長於安樂優渥的環境中，能負擔得起衝動購買的「奢侈」行徑。再者，年輕人注重個性化消費，同時也愛追逐流行，他們比年長者表現出更多社會表達性的消費動機是可以預見的。因此假設 2a 關於衝動性購買和消費動機的部份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

年輕人比年長者更常使用印刷媒體 ($\gamma = -.16$)，這與教育的普及很有關係。一般而言，年長者受教育機會較差，平均教育程度比較低，所以比較不常使用印刷媒體。至於年齡差異對自我認同狀況的影響，由表四中我們發現：年齡愈長完成自我認同達成的情況愈多，這個結果與假設 2b 的預測相符合。一般而言，年歲愈長的人對自己的人生目標會愈清楚，知道自己的能力 and 份量，也明瞭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和朋友是哪種類型的。反之，年齡愈輕者，可能心性志趣未定，依舊摸索和嘗試不同的人生目標和生活方式，所以較少見完成自我認同達成的情況。

3. 教育程度差異

假設 3a 和 3b 是關於教育程度對消費行爲、傳媒使用、和自我認同狀況的影響。從表四的結果得知，假設 3a 只有小部分獲得驗證；假設 3b 則是大部分獲得支持。教育程度只對商品資訊搜尋有顯著的影響 ($\gamma = .22$)，教育程度高者較常做商品比價、並與親友交換購物經驗，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具有較強的資訊處理能力，可以從商品資訊搜集

得到較大的效益。

關於印刷傳媒的使用，教育程度高低顯現了最強的效應($\gamma = .63$)，從因徑係數的值來看，教育程度高者使用印刷媒體的頻次明顯的比教育程度低者超出很多。這個明顯的教育程度效應與國內、國外的傳媒使用行爲研究所得結果完全一致。但是，電子媒體使用卻不受教育程度影響，無論知識水平高或低，大約有 85% 的民眾每天使用電子媒體的時間都在半小時以上。至於教育程度對自我認同狀況的影響，由表四的結果顯示出：受教育高的人較常見自我認同達成者($\gamma = .33$)，較少見自我認同渙散者($\gamma = -.08$)。這個結果與假設相符。這或許意味著教育程度高者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對自己的能力有信心，也能決定自己的人生目標與方向，所以比受教育低者更能完成自我認同達成。

4. 全家收入高低

假設 4a 和 4b 是關於全家收入對消費行爲、傳媒使用、和自我認同狀況的影響。假設 4a 和 4b 只有小部分獲得驗證；顯然全家收入並不是個有力的解釋因素。除了對消費動機和印刷媒體有提昇效果之外($\gamma = .06, .09$)，全家收入對其餘的消費行爲和傳媒使用都沒什麼影響。

5. 傳媒使用與社會學習

假設 5a 是關於電子媒體使用對消費行爲的影響，由分析結果發現：經常收看电视和錄影帶節目的人較能感知社會上物質主義的瀰漫($\gamma = .12$)；也呈現較多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gamma = .17$)。但是，他們並無較強的衝動性購買傾向。因此，本假設獲得部份驗證。

假設 5b 預測商品資訊蒐集者會經常使用印刷媒體來蒐集資訊，此項假設也獲得驗證($\gamma = .14$)。一般而言，經由電視和廣播所播出的廣告訊息比較短，也不適宜呈現複雜的商品資訊，如果想得到較多的商品資訊，印刷媒體的篇幅多能提供的內容比較豐富。因此，經常蒐

集商品資訊的消費者會較仰賴印刷媒體是可以預見的。

6. 自我認同狀況之影響

假設 6a 是關於自我認同達成對消費行為和傳媒使用的影響，由分析的結果顯示：此假設已獲得大部份驗證。自我認同達成者確實較能感知社會上物質主義的瀰漫 ($\gamma = .15$)；較積極尋求商品資訊 ($\gamma = .17$)；顯露較多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 ($\gamma = .22$)；較常使用印刷媒體 ($\gamma = .10$)。但是，對於衝動性購買，自我認同達成卻並無明顯效應。

假設 6b 是關於自我認同渙散對消費行為和傳媒使用的影響，由分析所得之結果看來，此假設只獲得部份驗證。與假設的預測符合部份為：自我認同渙散者顯露出較強的衝動性購買 ($\gamma = .43$)；和較多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 ($\gamma = .15$)；較少使用印刷媒體 ($\gamma = -.10$)。但是也有與預測相反的結果：自我認同渙散者感知較強的物質主義 ($\gamma = .13$)；和較積極尋求商品資訊 ($\gamma = .10$)。關於這個假設的檢驗結果，為何會與預測的方向不同，似乎值得仔細探究其背後所代表的意涵。

7. 消費行為之間的關聯性

具有較強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者一方面展現出較強的衝動性購買傾向 ($\gamma = .30$)，另一方面卻也經常蒐集商品資訊，顯露理性消費的一面 ($\gamma = .43$)。由此可見，具有社會性表達動機者雖然有時會出現非理性的衝動購買行為，同時又能透過各種管道廣搜商品資訊，增加自己對商品的符號意義之瞭解。因此假設 7 獲得驗證。

六、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之作者試著採用並整合多種學理觀點，企圖建立一個較具全瞻性 (holistic) 的因果結構模式來探究臺灣地區民眾消費習性之養

成。若比較代表「認同形成論」與「社會學習論」這兩個學理觀點的解釋變項的解釋力，似乎前者的解釋力比後者略勝一籌。但是，由於社會學習論中的參考團體並未納入本研究的模式，只以兩個非關內容 (content-free) 的「傳媒使用頻次」變項來代表社會學習機制，並不能充份表現社會學習的效力，若僅以現有模式所含的變項來做評估，並不恰當。

(一) 討論與解釋

1. 大眾傳媒的影響力

如果單就社會學習論中的兩個解釋變項——印刷媒體、電子媒體來看，兩者對消費行爲的影響各有千秋。使用電子媒體的時間愈長，愈會強化消費者的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也會加深其對社會上瀰漫追求金錢物質的印象。但是經常接觸印刷媒體卻並無類似的效應。消費者比較依賴印刷媒體作為搜尋商品資訊的重要管道，這個現象自然與媒體性質和內容有關，報紙與雜誌主要被視為提供資訊的來源，電視和錄影帶則為人們獲取休閒娛樂的管道。這個長久以來被觀察到的現象，於此研究中再度獲得驗證。

2. 自我認同狀況的影響力

若檢視自我認同論的兩個解釋變項——認同達成、認同渙散——與消費行爲的關係，我們發現前者對消費行爲的影響力，與假設中所預測的方向大致相符；後者卻呈現出與假設預測只有部份相符合，似乎需要提出來討論和再思考。換言之，據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具有認同達成特質的消費者顯現出較強的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在購買前經常積極搜尋商品資訊，對社會上瀰漫追求金錢物質的印象頗深刻；但是對衝動性購買傾向卻無影響。以上的研究結果與國內學者以

青少年為樣本的調查結果相似，這也再度顯示自我認同理論在預測我國消費行為傾向上，具有相當程度的外在效度。

相對於認同達成者，自我認同渙散傾向較強的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傾向卻與研究假設中的預期略有差異。原先的假設預期是：因為衝動購買者多半為心性未定、缺乏主見和自信低落的人，對事情的感覺不太敏銳，因此他們會具有較強的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和較強的衝動性購買傾向，在購買前較不會積極搜尋商品資訊，對於社會瀰漫追求金錢物質的感知也較淺。但是由 [表四] 所顯示的結果卻發現：認同渙散者雖然有較強的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和較強的衝動性購買傾向，但是他們卻與認同達成者一樣，在購買前經常積極搜尋商品資訊，對社會上瀰漫追求金錢物質的情形也有相當的感受。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發現是：大眾傳媒的使用與自我認同狀況之間有明顯的關聯，而且所得之結果與另一個針對國內青少年為主的調查結果相符合。換言之，認同達成者被發現較經常使用印刷媒體，認同渙散者卻較少使用印刷媒體。但是自我認同形成狀況對電子媒體的使用並無差異。如此看來，自我認同狀況對消費行為傾向不但有直接影響力，同時還會透過大眾傳媒的使用，間接影響民眾的消費行為。

根據 Erikson 的自我認同形成論，「認同達成」和「認同渙散」二者應當呈現明顯而高度負相關，可是從 [表五] 所列的內衍潛在變項相關係數，卻見此二構念只呈現微弱負相關 (-.02)。這或許是顯示了文化差異，西方文化注重個人獨特表現，中國文化講求團體和諧。一個凡事聽從別人安排、受別人影響改變自己主見的人，在西方可能被視為自我迷失、認同渙散，而得到的評價傾向負面；在中國社會裡雖然會被認為缺乏自信主見，但也可能被視為處世隨和、顧全大局，得到比較屬於中間偏正面的評價。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作者借用一個原屬於青少年心理發展理論的概念來預測成年人的消費行為，在設計題項時又為了順應臺灣地區民眾的特性，將原來 24 個題項的完整測量

表五：內衍與外衍潛在變項相關矩陣

內衍潛在變項								
	<u>印刷 媒體</u>	<u>電子 媒體</u>	<u>認同 達成</u>	<u>認同 渙散</u>	<u>物質 主義</u>	<u>衝動 購物</u>	<u>資訊 搜尋</u>	<u>消費 動機</u>
印刷媒體	1.00							
電子媒體	0.05	1.00						
認同達成	0.31	0.01	1.00					
認同渙散	-0.12	-0.04	-0.02	1.00				
物質主義	-0.01	0.11	0.13	0.13	1.00			
衝動購物	0.15	0.06	0.09	0.44	0.08	1.00		
資訊搜尋	0.49	0.03	0.34	0.16	0.05	0.26	1.00	
消費動機	0.38	0.16	0.28	0.13	0.06	0.38	0.58	1.00
外衍潛在變項								
	<u>性別</u>	<u>年齡</u>	<u>教育程度</u>	<u>全家收入</u>				
性別	1.00							
年齡	-0.02	1.00						
教育程度	-0.15	-0.59	1.00					
全家收入	-0.09	-0.25	0.42	1.00				

工具加以刪改。所以本研究使用的自我認同概念之測量量表不完整，所以影響到「認同達成」和「認同渙散」二個面向，並未呈現高度負相關性。

3. 基本人口變項之影響

就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全家收入四個基本人口變項對消費行爲的影響而言，以性別的直接影響力最明顯。除了對社會上追求金錢物質的風氣的感知並無顯著性別差異之外，女性比男性展現出更多的商品資訊搜尋和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卻比男性較少衝動性購買的傾向。前兩項結果相當符合傳統的婦女刻板印象，例如，購物愛計較價錢、購買和使用商品時很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可是關於衝動購

買傾向一項，本研究的發現卻與傳統的刻板印象以及國外的現象都不同。婦女向來被認為比男性缺乏自制力，容易出現衝動性購物的行為，這樣的刻板印象在以美國和臺灣地區的中學生和大專生樣本為對象的消費研究中，都獲得了印證。但是，唯獨本研究之結果卻正好相反。這或許是因為臺灣地區的成年婦女們必須持家，多半掌控經濟大權，因此比男性更有自制力，不常見衝動性購買的行為。在學的青少年們多半無家計負擔之考量，能夠比較遂意隨興的消費，因此顯現出傳統印象中女性在購物時比較缺乏自制力的現象。可見社會角色會影響消費行為。

年齡長幼是第二個重要的影響因素。由分析結果很明白顯示：年輕人比年長者具有更強的衝動購買傾向和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這似乎反映了一個「世代效應」，年輕的一代生於較富裕優渥的環境，可以經得起衝動購買、不計後果的奢侈；同時，民生經濟的富有助長符號式和社會表達性的消費。反觀生於早年較貧困時期的消費者，購買時會偏重商品的功利實用價值，強調商品要物美價廉和實惠；由於資源缺乏，衝動性購買行為自然較不常發生。

教育程度只對商品資訊搜尋的頻次有提昇作用，這反映出教育程度高者通常對自己的資訊處理能力和技巧比較有信心，所以在購買前比較積極從事商品資訊搜尋。雖然教育程度對於消費行為傾向的直接影響力不大，但是卻會經由傳媒使用和自我認同狀況，對消費行為傾向產生間接的影響。教育程度高低對印刷媒體的使用頻次的影響最大，這個結果印證了以往無數篇關於傳媒使用的研究報告中的發現。此外，教育程度高者較常見認同達成者，較少見認同渙散者，這個發現恰與作者的假設相合。換言之，教育程度愈高者似乎對自己的生涯規劃、人生目標等具有較堅定的信念與肯定。由此可見，教育程度高者不但善用印刷媒體搜尋資訊，其自我認同達成度高、自我渙散度低，這三個中介變項成了教育程度影響力延展的橋樑。相較之下，全家收入的

影響力就小多了，只對社會表達性消費動機和印刷傳媒使用有輕微的加強效果，但除此之外，收入並無太多的解釋力。這或許反映出，訂閱或購買報紙與雜誌花費比看電視多，收入高者經濟力較強，較易負擔得起這類花費。

年齡長幼在此處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由分析結果明白顯示：年長者比年輕人較少閱讀報紙和雜誌，但是卻有較多認同達成者。年長者平均受教育的年限比年輕人短，這點可以從 [表五] 中年齡與教育程度呈現明顯負相關 (-.59) 獲得支持，由於印刷媒體的使用頻次與教育程度有密切關聯，因此年長者比年輕人較少使用印刷媒體是可以預見的。同時，隨著年歲的增長，個人往往會逐漸脫離徬徨不定的時期，開始體認到最適合自己的人生方向，因此較常見認同達成者。

性別差異對大眾媒體使用頻次並無顯著的影響。以往認知中的婦女刻板印象總以為婦女偏愛娛樂性內容，只愛看電視與錄影帶，對印刷媒體較無興趣。這種婦女偏愛電子媒體、忽略印刷媒體的刻板印象卻在此研究中未能得到支持。細究其原因，大約與教育程度有關。從 [表五] 顯示的外衍變項相關係數可知：性別與教育程度有負相關 (-.15)，女性的平均教育程度比男性低，教育程度高低與媒體使用偏好的關係十分密切。因此以往許多研究中有女性輕印刷媒體，重電子媒體的發現只是一個假象。本研究作者將教育程度一併納入模式中做整體檢驗時，性別差異和傳媒使用之間的假性關係 (spurious relationship) 就消失無蹤了。但是在自我認同形成狀況上，性別差異依舊存在。女性比男性更易顯現出自我認同渙散者的特質。這個現象暗示著，相對而言，婦女在臺灣社會裡仍然屬於弱勢，缺乏自信和自己作主的能力，所以會經常「凡事聽別人安排」，「受別人影響改變對自己的看法」。

4. 消費行為傾向之相互關聯性

另外，作者原先預期衝動性購買和商品資訊搜尋應呈負相關，但是經分析後所得的結果卻是衝動性購買、資訊搜尋、與消費動機三者之間呈現很明顯的正相關 (.26, .38, .58)。同時，覺察物質主義也與以上三個消費行為變項有正相關 (.08, .05, .06)。這些令人感到意外的結果有可能是因為：一來、本研究以成年人為調查對象，成人的消費行為通常比青少年複雜。成人受訪者有身為家中掌理財政大權者和購買主要決策者，必須經常蒐集商品資訊、與交換購買經驗心得，以便量入為出將可運用的資源做最明智的支配。但是由於經濟大權在握，往往也容易出现衝動性購買的情形。二來、文化上的差異影響測量工具的適用性。注重符號式消費、以及商品的社會表達性特質，在臺灣當前的富足社會中是廣為社會大眾所接受的消費習性。一般人做商品資訊搜尋時可能同時具有功利實用性（如，比價、講求物美價廉）與符號表現性（如，學習商品及品牌的社會意義）兩種導向。換言之，人們在搜尋商品資訊時未必只是為了比價和省錢，其焦點也可以是學習各種商品和品牌的社會意義，企圖積極善用各種商品符號來幫助表達自我的特色，以及成功扮演各種社會角色。果真如此，本研究的結果雖然有部份未能覆證國外學者的研究發現，但是卻更增加對國人消費行為複雜性更深一層的瞭解。

(二) 結論

本研究作者試圖將不同領域的學理加以整合，建構一個較俱全瞻性的因果結構模式來解釋消費行為。這個過程好比把許多小塊拼圖湊起來，希望完成一片較大的圖像。在學理概念和測量工具的轉借上自然會遭遇一些困難，所得出的結果有些能覆證前人發現，但也有與假設預期不盡相同的結果。在科學驗證的歷程中，若有發現實證結果不符合學理假設時，我們通常採取兩種方式處理：(1)擴張及修改理論使

其涵蓋面增加，(2)改進和修訂測量工具的效度與信度，再重新選取不同的樣本作驗證。從本研究的結果來看，作者似乎需要同時採取兩種途徑。不但需要擴充並修正理論使其能涵蓋成年人的消費行爲；同時也要改進測量量表的效度與信度，發展出更敏感的測量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成功的提供了一個學理整合的例證，讓學者們領會不同學理之間具有重疊性與相互關聯性。我們發現某些基本人口因素會影響社會學習的歷程(例如，傳媒使用)，也會影響個人的自我認同形成狀況，認同形成狀況與傳媒使用之間也會相互作用，這三者形成一個體系(system)，姑且稱之爲「影響鏈」。民衆的消費行爲傾向則是以上一連串影響機制交互作用的最終結果。致力於學理整合之主要目的，即在於找尋並廣納有相關性的各家學說彼此之間的橋樑，並試圖描述這多重解釋變項相互影響的機制與流程，以及測試其對於結果應變項的共同和獨特的影響力。本研究只是一個開端，以後還有更長遠的路要走，有待研究者繼續付出其心力與努力。

參考書目

- 郭貞
1993 中美青少年消費行為之跨文化研究,《廣告學研究》第一集, 67-98 頁。
- 郭貞
1994 認同形成、家庭溝通型態以及青少年媒介使用: 一個整合模式,《新聞學研究》第 48 集, 99-121 頁。
- 楊中芳
1991 試論中國人的道德發展: 一個自我發展的觀點, 楊國樞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 臺北: 桂冠圖書。
- 蔡美瑛
1994 電視廣告、消費者自我與特定品牌偏好傾向之關聯,《廣告學研究》第四集, 125-155 頁。
- Adams, G.R., Shea, J., and Fitch, S.A.
1979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ego-identity statu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8:223-237.
- Bauer, R.A.
1964 The Obstinate Audience: The Influence Proces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Social Communic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May): 319-328.
- Belk, Russell W.
1978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visible consumption on impression formation. In Hunt, B.K. (ed.)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 5, pp.39-47.
1985 Materialism: Trait aspects of living in the material world,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2:265-280.
- Belk, Russell W., Bahn, K.D., and Mayer, R.N.
1982 Developmental recognition of consumption symbolism,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9:4-17.
- Bettman, James R.
1979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p.107-111.
- Bettman, James R. and Park C.W.
1980 Effects of prio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nd phase of the choice process on consumer decision process: A protocol analy-

- si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7:243-248.
- Bieda, John C. & Kassarian, H.W.
1969 An overview of market segmentation, in Bernard A. Morin (ed.), *Marketing in a Changing World*,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Chicago, p.250.
- Block, M.P. & Brezen, T.S.
1991 A profile of the new in-home shopper, in Rebecca Holman (ed.) *Proceedings of the 1991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dvertising*, New York: Rebecca H. Holman, D'Arcy Masius Benton & Bowels, Inc., pp.169-173.
- Chinoy, E.
1952 The tradition of opportunity and aspiration of automobil wor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7:453-459.
- Churchill, G.A. & Moschis, G.P.
1979 Television and interpersonal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learning.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6:23-35.
- Constantinople, A.
1969 An Eriksonian measure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 college studen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357-372.
- d'Astous, A., Maltais, J., & Roberge, C.
1990 Compulsive buying tendencies of adolescent consumer, in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17, pp.306-312.
- d'Astous, A. & Tremblay, S.
1989 The Compulsive Side of 'Normal' Consumers: An Empirical Study. *Marketing Thought and Practice in the 1990's*, 10, 657-669.
Direct marketing sales far outpace estimates, *Marketing News*, Nov. 23, 1984, p.1 & p.8.
- Duncan, Calvin P. & Olshavsky, R.W.
1982 External search: The role of consumer belief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32-43.
- Edwards, Paul I.
1986 Home shopping boom forecast in study, *Advertising Age*, December 15, 1986, p.88.
- Erikson, E.H.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2nd edition), New York: Norton.

- Fischer, E. & Arnold, S.J.
1990 More than a labor of love: gender roles and Christmas Gift Shopping,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7:333-343.
- Fournier, S. & Richins, M. L.
1991 Some theoretical and popular notions concerning materialism.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6:403-414.
- Gecas, V. & Seff, M.A.
1990 Families and Adolescents: A Review of the 1980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941-958.
- Goffman, E.
1963 *Stigm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Goldthorpe, J.H.
1969 *The Affluent Worker in the Class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ss, Beth B. & Ferree, M.M.
1987 *Analyzing Gender*,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 Hirschman, Elizabeth C.
1990 Secular immortality and the American ideology of affluenc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7:31-42.
- Huang, H.R.
1993 Is it hard to make a big step in "Finger-Tip" shopping? *Break Through*, Vol. 100, Nov. 64-69.
- John, D.R., Scott, C.A., & Bettman, J.R.
1986 Sampling data for covariation assessment: The effect of prior beliefs on search pattern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3:38-47.
- Kaye, L.
1990 Pains of Adolescenc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 25, pp.50-51.
- King, B.
1988 Taipei was right to open the door. *Euromoney*, April, pp.121-126.
- Kollat, David, T. & Willett, R.P.
1967 Customer impulse purchasing behavi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21-31.
- Kuo, Cheng
1989 An identity formation approach to teen-age consumers' socially

- expressive motives for consumption, in Schumann (ed.) *Proceedings for the Society for Consumer Psychology*, Knoxville, Tennesse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 1990a The acquisition of consumer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aipei's youth: An integrated model,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o. 42, 187-210.
- 1990b The acquisition of consumer skills and materialism: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40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Dublin, Ireland.
- 1992 Buying for name brand, social approval, or fashion: A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 paper presented to the 9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 for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ugust 4-8, 1992, Montreal, Canada.
- 1993 *How Adolescents Learn To Be Consumers: An Eclectic Approach*, Taipei: Taiwan Elite Press.
- Kuo, Cheng & Tsai, Mevis
- 1994 Investigating the compulsive buying behaviors among the Taiwanese youths: An integrated mode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 for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EJMC), in Atlanta, Georgia, August 9-13, 1994.
- Kramer, Hugh E.
- 1984 The valu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ts impact on value formation, in R.E. Pitts Jr. & A. G. Woodside (eds.) *Personal Values and Consumer Psychology*,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pp.239-251.
- Lee, D.
- 1991 Rebuilding a Tiger: Who'll Get the Lion's Share? *Business Week*, 25 March, pp.46-47.
- Loudon, D. L. & Bitta, A. J.
- 1993 *Consumer Behavior*, 4th (ed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p. 250.
- Marcia, J.E.
- 1966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ego-identity statu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51-558.

- McCandless, N.J., Lueptow, L.B., & McClendon, M.
1989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dolescent Sex-Typi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1:627-635
- McDonnell, P.
1988 Shop until you drop? *Forbes*, January, 11, p.40.
- Meyers-levy, J. & Maheswaran, D.
1991 Exploring Differences in Males' and Females' Processing Strategie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8:63-71.
- Montagu-Pollock, M.,
1991 All the Right Connections: Chinese Management Has Amazing Advantages over Modern Methods, *Asian Business*, Vol.27, No.1, pp.20-24.
- Moschis, G.P., Moore, R.L., & Stephens, T.J.
1977 Purchasing Patterns of Adolescent Consumers. *Journal of Retailing*, 53:17-26.
- Moschis, G.P.
1987 *Consumer Socialization: A Life-Cycle Perspective*,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Lexington Press.
- Moschis, G.P. & Churchill, G.A.
1978 Consumer socialization: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5:599-609.
1979 An analysis of adolescent consumers, *Journal of Marketing*, 43: 40.
- Moore, R.L. & Stephens, L.F.
1975 Some Communica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Adolescent Consumer Learning.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80-92.
- Moschis, G.P. & Moore, R. L.
1982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elevision Advertising Effect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9:279-286.
- O'Guinn, T.C. & Faber, R.J.
1989 Compulsive buying: A phenomenological explor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16(September), 14:7-156.
- Prisuta, R.H.
1979 The Adolescent and Television News: A Viewer Profile. *Journalism Quarterly*, 2:277-282.
- Putnam, Mandy

- 1988 *The Up Market, Columbus, Ohio: Management Horizons*, a Division of Price Waterhouse.
- Richins, M.L. & Dawson, S.
1992 A consumer values orientation for materialism and its measurement: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16, 147-156.
- Riesman, D. & Roseborough, H.
1955 Careers and Consumer Behavior. *Consumer Behavior* vol. 2: The Life Cycle and Consumer Behavior, L. Clark (e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s, Mary Lou
1984 Gender differences and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Needed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Thomas C. Kinnear (ed.)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11, Provo, Utah: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1984.
- Robinson, John P.
1988 Who's doing the housework? *American Demographics*, 10:24-28.
- Rook, Dennis, W.
1987 The buying impuls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4:191.
- Schuchardt, J., Danes, S., Swanson, J., & Westbrook, E. M.
1991 Financial Management Literacy for American Youth. The Proceedings of American Council on Consumer Interests, 37th Annual Conference, 277-278.
- Solomon, M.R., Anand
1983 The role of products as social stimuli: A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0:319-329.
1985 Ritual costumes and status transition,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12, Hirschman and Holbrook (eds.) 315-318.
The many faces of Eve, *Adweek's Marketing Week*, June 25, 1990, 44-49.
- Urbany, Joel E., Dickson, P.R., & Wilkie, W. L.
1989 Buyer uncertainty and information 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6:208-215.
- Valence, G., d'Astous, A., & Fortier, L.
1988 Compulsive Buying;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 11:419-433

Van Roo, M.

- 1989 Researching the Taiwan market: A very different consumer. *Marketing and Research Today*, 17:54-57.

Venkatesh, Alladi

- 1980 Changing roles of women: Life-style analysi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7:189-197.

Ward, S. and Wackman, D.

- 1971 Family and media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consumer learning.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4:415-427.

Wall Street Journal

- 1992 Currency trading table. October 16, p.10.

Whitebeck, L.b. & Gecas, V.

- 1988 Value Attributions and Value Transmiss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0:829-840.

Zeller, R.A. & Carmines, E.G.

- 1980 *Measure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Link Between Theory and Dat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3.

夜間活動人口的型態與特質*

傅仰止**

摘要

本文以夜間活動人口的特徵與行為態度為例，說明日常生活變項在社會研究中的價值。研究重點參考從文獻上歸納出來的夜貓子特點：非慣俗、反叛、沮喪；實證資料依據 1994 年的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問卷 I 與「都市意象」調查，以多種迴歸方法分析夜間活動人口的組合，並探究夜貓子的殊異觀念與心態。夜間作息變項以晚睡、晚歸、深夜工作三項作代表。分析結果顯示，晚睡者和晚歸者都傾向反對宿命觀、反對傳統家庭婚姻觀念，對既存的道德和社會規範也普遍抱持著反叛心態。這種非慣俗和反叛特色，雖然也經常表現在年輕人、都市居民、教育程度較高者身上，但是夜貓子的非慣俗和反叛傾向更偏重在形式

* 本文分析主要依據「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1994 年問卷 I 資料；該計劃由國科會補助（計劃編號 NSC83-0301-H-001-034-B1），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執行，瞿海源教授主持。部份資料取自另一項國科會計劃「都市意象、居住環境與居住選擇」在 1994 年的調查（編號 NSC83-0301-H-001-073），該計劃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執行，章英華教授主持，陳東升教授共同主持，伊慶春教授協同主持，筆者實際參與。部份依變項由變遷調查的「文化價值組」設計，經過楊國樞、文崇一、瞿海源、黃光國、張芷雲、朱瑞玲、葉光輝多位教授共同研擬討論，筆者參與研討；統計方法及表格經 William L. Parish、薛承泰、葉光輝三位教授指正。原稿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研討會宣讀，承評論人張芷雲教授及其他與會學者提出寶貴修正意見，修訂稿再經原評論人及本書另外兩位匿名審查人針對推論、題目、用詞作多項建議，均在此一併誌謝。文中觀點與缺失皆由作者自行負責。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

上：不論內容如何，幾乎一味反叛。再細加區分，發現晚睡者特別反對「善惡報應宿命觀」、對現實社會抱持批判立場、做人的原則著重在「做人做事獨立」、反對「捨自己志向來成全父母願望」，也不在乎「不遵守公共秩序」會對社會產生不良影響。晚歸者很注重「善於交友」的原則、明顯反對傳統家庭婚姻價值觀、道德觀念薄弱、日常生活中經常感受到莫大壓力。深夜工作者跟一般夜貓子又不盡相同，尤其注重「尊敬長輩」。如此從多面向來看夜貓子的觀念與心態，有效區辨出夜貓子群體內的異質成份。夜間作息變項能夠擴展有關日常生活的研究範疇，在分析各種行為態度時，也提供了新的探究角度。本文最後強調這種日常生活變項的重要性，舉例說明如何應用這些變項到其他研究課題，並針對概念、資料、研究方法上的問題提出檢討。

The 'Night Owls'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Yang-Chih Fu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art of the population that is active at night (the night owls) in addressing how daily life variables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The research begins with the literature that depicts the night owls as more unconventional, rebellious, and depressed. Data is drawn from the 1994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and the "Urban Image Survey". The night-active population is identified and distinguished by three criteria: those who stay up until or after midnight (stay-up), who usually go home after 10 P.M. (home-late), or who work late during the night (work-late).

Through various regression analyses, the paper shows that both the stay-up and the home-late types are more unconventional in attitudes and values, and more defiant to ward social norms. Such a tendency is similar to groups as youths, urbanites, and the highly educated, but the night owls are unique in that they are unconventional and rebellious regardless of the issue. Although the night owls as a whole are distinct from others, they are heterogeneous in certain aspects. In particular, the stay-up type tends to be more individualistic and more critical towards Taiwanese society. This type also resists fatalism, disapproves the practices that demand children to sacrifice themselves to meet their parents' wishes, and disregard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ocial disorder. In comparison, those who come home late value friendship more, place less stress on traditional values regarding family and marriage, display a weaker

moral sense, and feel more depressed from daily hassles. The findings that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clearly differentiate the night owls from others and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can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conventional and rebellious aspects of this population.

夜間活動人口的型態與特質

一、前言：日常生活變項與夜間作息

大型社會調查的內容豐富，涵蓋各式各樣主題，讓研究者得以從多重角度來透視社會百態。調查結果日積月累，長期下來成為解析社會變遷的有力依據；如果在不同社會進行類似調查，所得到的資料可以直接拿來對比分析，更是跨社會比較研究的寶庫。「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下簡稱「變遷調查」）已經進行兩期、前後十年的調查，所累積的資料包含政治、經濟、社會、心理、教育、傳播、心理衛生、文化、宗教等主題，成為研究台灣社會和國際比較研究的重要資料庫。

變遷調查在扮演這項重要角色之餘，到底能夠發揮多大的分析潛能？可以掌握多少社會脈動？揭示多少社會現象的肇因？這些問題，相信都是研究者的首要關懷所在。調查資料的應用分析，除了針對實質課題的內涵詳細探討外，通常還需藉由受訪者的個人資料和相關訊息，以便多方了解這些實質課題的背景。調查問卷中的「基本資料」主要是為了滿足這項需求而設。歷次變遷調查中最常見的基本資料，包括受訪者的性別、年生年次和地點、省籍族群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就業狀況、收入、宗教信仰、家庭組成等，都是瞭解一個人所需要的最根本訊息。

本文所要探討的，則是屬於這些基本資料之外，能夠展現個人日常生活中重要面向的作息變項。這些變項跟大部份「基本資料」一樣，不但本身能揭示社會現狀，對解析相關實質課題也有具體貢獻。換句話說，日常生活變項的主要功能有二。第一，從社會成員的日常生活

行爲或一般感受，可以具體展現出若干重要的社會現象，並且透過不同時空的比較，突顯時代或社會的特色。第二，社會成員的許多行爲態度和價值觀，多少反映在日常生活中的種種領域，或受到日常生活經驗的影響。這些行爲態度和價值觀，不但可以從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行業別這些基本特徵予以區辨，更能藉由日常生活中的其他變項，揭示出重要關聯，增進對若干社會現象的瞭解。

國外的大型社會調查當中，經常包含跟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變項。近年來台灣地區的問卷調查也開始出現類似變項，例如工作性質、健康情形、快樂程度、平常接觸的人群等。本文以變遷調查最近新增加的夜間作息變項爲例，說明透過對日常生活變項加以剖析，如何有助於瞭解台灣民眾的生活型態、如何揭示社會問題背後的潛在人口特徵、又如何對既有相關理論有所啓示。

對夜間作息深加探究，蘊涵鉅觀層次和微觀層次上的意義。從鉅觀面來看，夜間活動代表人類依賴人工照明設備，克服自然界限制，延伸其觸角的重要領域。這種基本的日常作息反映出社會生活的要素，提供瞭解社會變遷和比較不同社會的基礎。此外，「台灣民眾的夜間活動，反映出近幾十年來經濟發展的趨勢，也是休閒生活的一項重心。」要明確揭示台灣社會夜間活動的宏觀面，需要從基本的日常生活作息著手。再就微觀面而論，夜間活動人口以什麼樣的人爲主？夜間活動提供什麼殊異的互動情境？夜貓子在行爲態度、人格、價值觀方面有些什麼特色？所展現出來的生活型態又有何不同？這些主題是解析台灣夜生活人口組成的要素，也都得藉助實證資料來加以探索。

更具體地說，在大型社會調查中加入「夜間作息」這類變項，有其確切的目的。第一，藉由變項本身揭示台灣社會夜間活動的整體情況。如果能夠長期累積資料，則可以比較不同年代的趨勢，「從一般民眾的夜間作息掌握時代變遷與社會脈動；要是跟不同社會的相關調查相配合，更能作跨社會文化的比較研究。第二，從作息變項剖析夜間

活動人口的組成。前項目的在揭示整體趨勢，分析這群人口特質則在彰顯整體趨勢背後的組合要素。第三，驗證相關理論及假設，澄清夜間活動人口的觀念、心理狀況、行為態度、價值觀等。這項目的不同於前兩項，不但能夠提供社會問題的背景因素，更蘊涵理論驗證和發展的可能，進而突顯夜生活的特性。

本文以變遷調查 1994 年問卷 I 資料為主，輔以其他資料檔，分析夜間作息變項的部份實質貢獻。由於欠缺長期的實證資料，國外的大型社會調查也沒有包含類似變項，所以無法實際處理上述第一項目的。第二項目的在釐清夜間活動人口的組成，分析內容也比較單純。第三項目的涉及多項理論假設，是既有文獻所討論的重點所在，也最能充分運用變遷調查中的各項主題，所以將構成本文分析的主要內容。實際分析時並依照不同的夜間活動型態(例如晚睡、晚歸、深夜工作等)，探討夜間活動人口的非慣俗心態、反叛傾向、生活壓力三項特質。

二、夜間作息研究的理論與實證回顧

夜間作息是日常生活中必備的一環，幾乎跟每個社會成員都密切相關。常用的夜間作息變項，首推「就寢時間」。依就寢時間(連帶的也以起床時間和相關指標為標準)來區分，大致可以把人分為兩種：一種是早睡早起、上床後很快睡熟、起床後很快清醒、早上精神特別好的「晨雀」(early birds 或 diurnals 或 morning type)。另一種是晚睡晚起、較慢入睡、起床時容易覺得疲倦、一到晚上精神就來的「夜貓子」(night owls 或 nocturnals 或 evening type)。這項分類不但在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詳，也是生理心理學經常探討的一項主題。不過依據更精確的測量標準，除了將人依照日常作息分作上述的 M-type 和 E-type 之外，還可以區別出居中者(I-type) (Kerkhof 1985:84; Smith et al. 1989:735)。

根據臨床實驗結果，晨雀和夜貓子不但在生理反應上有明顯差異，兩者的人格特質也在一般人的認知裡形成不同的刻板印象。這種刻板印象清晰可辨。從日常作息所區分出來的這兩類類屬，對多數人來說在直覺上就相當熟悉，分類的標準有很高的效度，幾乎跟種族或性別上的類屬一樣單純，沒有多大爭議；而且不論跟比較普遍或者不常見的人格特徵，也都容易聯想在一起。因此，晨雀和夜貓子不僅是生理實驗中常見的對象，也是心理學探討社會類屬刻板印象的佳例(Locksley et al. 1982:27)。

根據主觀的刻板印象，這兩類生活作息迥異者各有明顯特質。可是這麼明顯的分類，卻不常在其他論述中出現，實證研究也很少探討兩者實際上有什麼差異。有關夜貓子的刻板印象在日常生活中並不陌生，可是實證基礎相當薄弱。在一本社會心理學的經典中，作者特別提到這項生活作息上的分類，作為說明在社會上刻板印象盛行，卻苦無實證資料驗證的佳例；他說：

世上有兩種人：「晚睡晚起的夜貓子」和「早睡早起的晨雀」。那一種人比較負責？比較具有非慣俗傾向？比較沮喪？比較能夠控制自我？當然沒有人知道，甚至根本沒有人去討論這些。可是多數人認為夜貓子比較傾向非慣俗，比較莫測高深，也比較具有反叛性格、容易沮喪；反之，多數人認為白天活動的晨雀比較負責、自制、可靠、健康(Brown 1986: 588)。

更精確的說，這些主觀刻板印象是在沒有其他訊息可資參考的情況下，參與心理學實驗的大學生對夜貓子和晨雀的看法(Locksley et al. 1982)。從這個例子可以大致看出，夜貓子的形象似乎以負面為主，而晨雀則以正面形象居多。這種意象，有其文化隱喻的背景。例如聖

經裡時常把夜貓子（貓頭鷹）跟烏鴉、兀鷹等陰險邪惡的禽類一概而論，用來描繪毀壞、蹂躪。相對的，最早起的一種晨雀(lark，雲雀或百靈鳥，在英文字義上也代表著愉悅、快樂、有趣等意思)則有相當正面的文化意涵(Bigler 1993:198-199)。不同隱喻中的文化意涵，反映了不同生活型態下迥異的形象。

上述實驗中的大學生雖然未必等同於社會大眾，但是刻板印象能夠盛行，本身就很可能反映出客觀事實的另一面，成為「自我兌現的預言」這種社會過程中重要的一環(Hamilton and Trolie 1986; Merton 1957)。例如依據這種預言的機制，本來沒有上述夜貓子特質的人，一旦被迫加入夜貓子行列後，可能會受到刻板印象影響，逐漸也變成具有非慣俗、反叛等特質。要解析社會現象，不只應該從盛行的刻板印象來看，還應該依據實證資料來直接加以探討。透過適當的研究設計，上述夜貓子的特色應該可以在實證基礎上作多方驗證。

近年文獻未必直接討論到生活作息所蘊涵在行為態度上的特色，可是對人類生活作息的變化，以及夜間環境的特質，都作了廣泛探討。在有關「時間」的研究範疇中，日常生活的作息是典型「日常時間」(everyday time)的應用，有別於「生命時間」(life time)(Alheit 1994)。日常時間應用最大的演變，發生在照明設備發明之後，人類活動大量往夜間延伸；延伸的觸角，宛如空間拓荒一樣，將夜間當作時間的新疆域不斷探索(Melbin 1978, 1987)。夜間活動跟許多新奇事物一樣，在大都市特別盛行。遠在十九世紀初，外來的旅客看到倫敦、巴黎這些大都市的夜生活，便嘖嘖為奇(Schivelbusch 1988:82, 142)。因此，大都市特別容易孕育「夜間副文化」，而夜間副文化中最重要特色，應該就是「非慣俗性」(unconventionality)。

非慣俗的行為態度，指跟一般社會慣俗不盡相符者，原意包括正負兩面，可是文獻上大多偏向負面論述，實證資料也多以「偏差行為」代表(參見 Fischer 1975; Tittle 1989)。人類可以脫離自然法則，發

明科技產品來克服夜間、寒暑的不便，可是現代社會的時序還是受到最基本的社會慣俗所制約。由於社會慣俗多半根深蒂固，許多社會成員視之為理所當然，以為這些慣俗是與生俱來的，不能改變。[〔]大多數人從小就在以日間活動為主軸的環境制度下成長，也多少跟隨這種模式，所以「到了深夜還在活動」等於打破了社會時序上的生活秩序，多少意涵著脫離原有規範，是一種不尋常的生活型態，也代表一項反慣俗或非慣俗的重要表現[〕]。因此，單單就形式來說，夜間活動不僅違背了自然規律，也脫離了社會慣俗（Zerubavel 1981:40-44; Melbin 1987:53）。

再從夜晚本身性質來看。夜間生活的結構通常比較鬆散，所以不但容許個人有較高的自主權，還允許種種幻想和神祕，當然也容易成為不法犯罪的溫床（Melbin 1987:38-39, 59; Johnson 1984:131）。換句話說，「夜間解除了一成不變的外在形式，模糊了真實與虛幻間的區別」（Schivelbusch 1988:138）。夜間活動者處在這種不尋常的環境裡，容易孕育出非慣俗的觀念或行為態度。以大公司的工作環境為例，夜間工作的性質讓低階工友在工作時充分享有自主權，也比較有自尊（Hood 1988）；醫院裡值大夜班的護士對自己的職責也比較能夠掌握（Zerubavel 1979）。

在結構不嚴謹的環境下，夜晚似乎成了不從眾者和其他邊緣群體的庇護所；對那些想要逃脫社會心理問題的人來說，也扮演著臨時的安全閥。或許正由於夜貓子常常暴露在非慣俗環境下，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人群和生活型態，所以能夠擴展視野，容忍不同事物。在夜間副文化當中，對奇風異俗不但加以忍受，甚至還當成常規，可以預期（Schivelbusch 1988:81; Melbin 1987:39, 59-60）。此外，如果說夜貓子比較容忍，也可能是因為他們覺得即使對有些事情看不慣，就算生氣、干涉也沒有用。這種經驗對大都市的警察來說，體會特別深刻（Johnson 1984:134-135）。

因此，從夜間環境的非慣俗特色來看，夜貓子的負面形象可能有所偏頗。這種偏頗近似大都市居民的非慣俗傾向：大都市環境賦予特殊的發展契機，使得正面和負面特質的發展都特別蓬勃，可是一般都強調都市環境的負面效應，而忽略其建設性的功能（Park 1915；傅仰止 1995）。對夜間社會的結構特質，與其像一般刻板印象那樣當成負面發展的源由，不如看作是一種產生強化作用的核心。這種結構和機會能夠讓好的更好，壞的更壞，例如作家在夜深人靜時更容易發揮創造力，罪犯在三更半夜也更容易犯科作案。

夜間環境的強化作用，從開車行爲的研究中得到有力佐證：對開車的人來說，夜間代表一種刺激的來源，很容易強化平常的傾向。平常一向小心的駕駛，夜晚開車時會倍加謹慎；平常莽撞的駕駛，到了深夜則開得更加魯莽（McKelvie and Schamer 1988:688-689）。這種強化的論點考慮到夜間活動人口的異質性；可是夜間活動本身通常牽涉到自我選擇的過程，所以夜貓子人口可能本來就有其共同特色。如果說夜間特殊的環境本身是個刺激的來源，那麼除了那些因為工作等因素，被迫加入夜貓子行列者之外，一般會利用夜間活動的人，都比較有冒險犯難的精神。這些愛冒險的夜貓子當中，通常需要更強烈的外來刺激，也容易疲倦；而注重交友的夜貓子夫妻，則能夠享受深夜，利用那段光陰，更容易跟朋友深談（Golant 1984:486；Cimbalo and Hughey 1986；Adams 1987:246）。夜貓子在觀念、心理狀況、行爲態度上所表現出來的特色，到底如何反映出這種強化效應？這類問題該是探索夜間生活作息效應的重點。

儘管夜貓子在部份民眾心目中有鮮明形象，文獻上對夜貓子性格也著墨甚多，實際情況到底如何，並沒有經過大規模有系統的探討，甚至連夜間人口的組成這種基本資料都很缺乏。根據國外零星的實證研究，夜間活動群體是有一些明顯的人口特徵，例如年輕、單身、教育程度高、失業者比較有可能成爲夜貓子。這些人的共同特徵是對自

己的生活作息享有自主權，能夠自己安排時間（Presser 1986; Golant 1984:486; Melbin 1987:65）。其中年齡的差異大概是最明顯的一項特徵。例如一項研究發現美國的多數高中生在半夜十二點半就寢，大學生平均則到凌晨兩點才睡。多數人年紀漸長後，通常會傾向早睡早起。但是實驗發現還是強調個人差異是最大因素。每個人的生理時鐘都不大一樣，有些人甚至生下來就有早睡或晚睡的傾向（Bigler 1993:199; Shaw 1994:88-89）。台灣地區的調查也發現教育程度或都市化程度愈高，則睡眠時間愈短，間接揭示高教育程度者和都市人晚睡的傾向（行政院主計處 1991:2）。

上述實證研究所涵蓋的對象通常都限於特殊群體，例如老年人（Golant 1984）和大學生等（Adams 1987; Cimbalo and Hughey 1986）。這些群體的樣本數小，同質性高。其他實證研究則採用民族誌方式或深度訪談法（Presser 1986; Hood 1988; Johnson 1984）。這些實證研究雖然各有啓發，卻無法據以對一般社會大眾作推論。即使在最有系統的研究中，所依據的也幾乎都是次級資料，對夜貓子的人口特徵一直無法直接驗證（Melbin 1978, 1987）。

本研究依據上述理論文獻，近年來在變遷調查和「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簡稱意向調查）等大型社會調查中設計相關題目，已經有初步發現。例如根據意向調查結果，「夜間活動人口明顯的以年輕、都市居民、教育程度高、從事工商業者為主。」夜貓子的談心對象偏向非親屬成員，在家庭觀念和性別角色態度上呈現非慣俗的傾向，對政治歧異份子和性偏差份子也都比較能夠容忍。這些行為態度因為夜間生活型態所產生的變異相當明顯。又例如「容忍異端」這種態度，明顯受到都市背景和異質聯繫的正面效應（傅仰止、伊慶春 1994）；但是夜間生活型態對容忍態度的正面效應，甚至要比都市效應來得明顯而一致（Fu 1994）。夜間生活型態所表現出來的這些正面效應，正好彌補了其他實證研究所沒有注意到的面向。

本文延續上述實證發現，以變遷調查資料為主要依據，探討夜間作息的人口組成，並驗證夜貓子的觀念與心態，以說明類似日常生活變項在社會調查中的重要性。實際分析的內容參照上述有關夜貓子的刻板印象：非慣俗心態、反叛傾向、沮喪、莫測高深(Locksley et al. 1982; Brown 1986:588)。除了最後一項性格特徵(莫測)，難以找到相關項目來測量之外，其他三項都可以在實證基礎上加以驗證。

三、資料與變項測量

本文所分析的資料主要取自變遷調查 1994 年問卷 I，輔以「都市意象、居住環境與居住選擇」計劃在 1994 年進行的調查(簡稱都市調查)。這兩項調查都是根據戶籍資料，分階段作機率抽樣訪問。變遷調查的範圍遍及全台灣，只排除山地鄉和離島(瞿海源主編 1994)，1994 年問卷 I 的有效樣本數為 1,853。「都市調查」的地區也是台灣各地，包括山地鄉，因為樣本數龐大(4,380)，在 1994 年間分兩次進行訪問。

夜間作息的運作定義標準不一，即使在透過層層設計的心理學實驗中，所使用的定義也相當籠統：「夜間人口」(night people)指選擇晚睡早起的人，「日間人口」(day people)則是那些喜歡早睡早起的人(Locksley et al. 1982:28)。因為該項實驗是在探討對這兩類人的刻板印象，所以用這麼模糊的定義還行得通，可是精確的統計分析就需要更確切的定義。

1. 夜間作息變項：晚睡、晚歸、深夜工作

所謂夜間作息，不只是指「晚睡」，還包括其他夜間活動，例如是不是固定在外面吃晚餐、固定晚歸、固定工作到深夜等(參閱 Fu 1994)。本文所分析的夜間作息變項，以晚睡和晚歸兩者為主。「晚睡」的樣本，指那些就寢時間在半夜十二點及以後到中午十二點之前的受

訪者：「晚歸」的樣本，則是那些「平均一個禮拜至少有一天到了晚上十點還在外面」者。這種晚睡的運作定義等於是「就寢時間在上午」，所依據的理由，主要是如此區分相當清楚，符合一般「到半夜還沒睡覺」的說法。以半夜十二點作為切割點，也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沒有在「一天」結束前睡覺，而拖到隔天才睡。

如此定義下的晚睡人口，除了採用標準容易區辨外，所佔比例也跟一般用來區分夜貓子的準繩相當接近。上述兩筆資料顯示，晚睡樣本分別佔 32.0% 和 30.4%，相當一致；晚歸比例略高，分別佔 43.2% 和 35.0%。而根據前述心理學實驗結果，刻板印象中代表日間活動人口特徵的比例較高，夜間人口特徵的比例較低。接受實驗者平均認為有 54.5% 的人具有前述四項「日間人口特質」，38.2% 的人具有「夜間人口特質」。換句話說，在一般刻板印象當中，社會成員中具有非慣俗、反叛、莫測、容易沮喪這些特質者，佔不到四成 (Locksley et al. 1982: 29)。另外依據行政院主計處 (1991:180) 的調查，台灣地區 15 歲以上人口當中，到了晚上十一點還沒睡覺者，約佔 30.7%，跟變遷調查的結果也相去不遠。

本文用晚睡和晚歸兩者來代表夜間作息，主要用意是這兩項變項代表著夜間活動兩個重要的面向。晚睡代表利用深夜在活動，晚歸則代表夜間活動的主要空間在家庭或日常住處之外。兩者雖有明顯相關 ($r = .34, p < .001$ ，變遷調查 1994 年問卷 I)，還是能夠區隔清楚。因此，這兩項變項能夠分開各別分析，也可以予以合併。單獨分析的目的在突顯不同面向的夜間作息效應，合併分析的用意則在顯示兩者間的互動效應。

本文另外考量晚睡和晚歸的原因，將屬於「為了工作而晚睡或晚歸者」單獨劃分為一群副樣本，成立另一虛擬變項，作為分析夜間生活型態時的控制變項，或者當作檢驗夜貓子人口異質性的變項。如此考量的主要理由，在於區辨夜間活動的性質，以免混淆那些「為了工

作」和「爲了休閒」而晚睡或晚歸者之間的差異。確切的分類依據，前者包括爲了「工作、做功課」和「做家事、照顧小孩或家人」兩項理由而晚睡者，以及爲了「上夜班、加班、工作」和「上課、補習班、研習班」而晚歸者。這些「深夜工作者」佔變遷調查 1994 年問卷 I 樣本中的 27.9%，跟「晚睡」變項間的相關係數達 .12，跟「晚歸」的相關爲 .19，兩者的顯著度都小於 .001（都市調查資料限於題目內容，無法建構出同樣的「深夜工作」變項）。

2. 主要依變項：非慣俗心態、反叛傾向、感受生活壓力

本文用三類依變項來驗證夜貓子的觀念與心態特徵。第一類依變項用來驗證「非慣俗態度」。所謂「非慣俗」的涵蓋範圍較廣，實際上也不容易有很明確的運作定義。本文選取用來代表非慣俗傾向的項目，大致符合「跟一般社會慣俗不符」或者「在比例上佔相對少數」等原則（傅仰止 1995）。這類依變項包括「反對善惡報應宿命觀」、「認爲社會現實功利、文化貧乏」；認爲比較有意義的人生不是「用心修養品德」，而是「儘量享受人生」或「努力追求成就」；比較願意做的不是「尊敬長輩」的那種人，而是「善於交友」或「做人做事獨立」的人。

第二類依變項的目的在驗證上述「反叛」傾向。這類變項大致又分爲兩種：一種以傳統的婚姻、家庭、尊親育兒觀念爲主，另一種以社會上的道德觀念作代表。前者的測量項目包括「爲了子女不該離婚」、「放棄自己志向以完成父母願望」，另外還包括對同性戀、分家產、送年老父母到安養機構的看法等。後者以若干違規或犯法事件爲代表，測量受訪者對這些事件的道德觀念強弱。這類依變項跟第一類近似，但是第一類依變項只限於非慣俗傾向，未必涉及道德判斷；第二類則牽涉到道德觀念，尤其是關於違規或犯法事件的判斷。

第三類依變項以日常生活壓力爲代表。由於現有資料中難以找到適當的項目來測量「沮喪」，所以藉著生活壓力變項作爲代表。生活壓

力大未必是沮喪的同義詞，可是兩者應該密切相關。本文分析的生活壓力類型包括：居住環境、人際交往、睡眠、工作、家人關係各方面的壓力。

3. 控制變項

分析各依變項如何因夜間作息而產生變異時，均一致控制下列變項。

(1) **人口特徵**：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等項。性別轉化為虛擬變項，以女性作為對照組，在表中列出男性效應。年齡以連續變項處理，但是在分析晚睡和晚歸人口特徵時，依十歲為一組分別列出各組的年齡效應，對照組是 50 歲到 65 歲的樣本，以便詳細區分不同年齡層的夜間作息趨勢。婚姻狀況也經轉化作虛擬變項，表中列出未婚者的效應，對照組是已婚和其他（其他包括離婚和喪偶，因為所佔比例加起來不到 5%，所以予以合併）。

(2) **社經地位**：包括教育程度、收入、從事行業三項。其中教育程度轉化為虛擬變項，以「小學及以下」作為對照組，分別列出國初中、高中職、大專各組的教育效應。收入以次序變項代表，從第 1 組到第 12 組，每組大約以一萬元作間距；高於第 12 組的因為所佔比例過小（合起來不到 3%），所以併入最高組。「從事行業」也轉為虛擬變項，分為初級（農林漁牧業）、次級（製造業等）、三級（服務業）等，另外將無業者、家管、學生等劃分為「其他」。分析時將「其他」作為對照組，以區辨出三類行業的效應。由於「其他」類的組合異質性較高，同時包括學生、退休、家管，所呈現出來的夜間作息很不一樣，難以確定在此對照下的行業效應代表什麼意義。比較能夠突顯行業效應的分類，應該排除「其他」類（沒有工作者），由初級到三級行業三者互相比較。不過如果排除其他類，樣本數將頓減四分之一左右，大幅削減分析潛能，所以仍舊分為四類來分析。

(3)城鄉背景：主要指現居地的都市化程度。本文依據一項都市化分類，將原有的八層都市化等級，重新合併為「鄉村」（對照組）、「市鎮」、「核心都市」三等。「核心都市」指台北、高雄、台中、台南四大都市，「市鎮」包括其他省轄市和原來八等級中的第四、五兩級，「鄉村」則包括都市化程度最低的三個等級（詳細分類依據及合併理由參閱李朝賢 1990；洪永泰 1992:3；傅仰止 1995）。

4. 分析方法

本文除了在分析夜間人口特質時採用變異數分析之外，在分析其他依變項時都按照變項的性質，以不同形式的迴歸分析進行。在分析二分的類別變項時（例如「晚睡與否」或「晚歸與否」這種虛擬變項），採邏輯迴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單一等級或次序變項時，採等級波比（ordered probit，或譯作「次序波比」）分析；分析多類別的變項，而變項間沒有等級關係時，用多類別邏輯（multinomial logistic，或譯作「多元」或「多變項」邏輯）分析。由於部分依變項取自態度量表或題組的因素分數，所以對這些依變項都採用複迴歸分析。主要依變項的原始題目或量表題組，都列在附表 1，並隨題目性質，附上各項目的因素負荷量。組成各依變項的項目之間，也都經過內部一致性的檢定（見附表中的 alpha 值）。

四、夜貓子人口的組成特徵

文獻上強調常在夜間活動的人口以年輕人、都市居民、高教育程度這些人明顯的居多；台灣地區的初步發現也相當符合這些特徵（Fu 1994）。變遷調查的結果如何呼應文獻上所提的部份實證發現，將是本節分析的重點。

表 1 依據前述方法，將晚睡和晚歸兩個變項交叉，把樣本重新劃

歸作三類型，再列出各類型的組成特徵。依表 1a 顯示，1994 年的變遷調查樣本中有 32.0% 在半夜或之後就寢(晚睡)，另外有 43.2% 的樣本每個禮拜中固定至少有一天晚上十點以後還在外面(晚歸)。晚睡的人裡面有三分之二左右同時也晚歸，而晚歸的人當中只有一半晚睡。因此，這兩項變項雖然有明顯相關，還是不能等同視之，而可以用來代表夜間作息的兩個重要面向。

如果將這兩個面向合併分析，則一方面可以保留不同的夜間作息意涵，一方面又能簡化分析過程。合併後的「夜間作息類型」包括三項：「不晚睡不晚歸」的樣本佔最大比例（就是表 1a 的左上格，佔樣本 46.5%），另一極端是「晚睡又晚歸」（表 1a 的右下格，佔樣本 21.8%），還有居中的「晚睡或晚歸」（就是「晚睡不晚歸」和「晚歸不晚睡」兩者之和，佔 31.7%）。

這三群副樣本的人口特徵有明顯差異。不論從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城鄉別、教育程度、從事行業、平均收入、職業聲望各項指標來看，組間差異的顯著度幾乎都小於 .001（表 1b、表 1c）。先從各項人口特徵來區辨，三類夜間作息型態間似乎井然有序。例如「不晚睡不晚歸」的樣本當中只有 36.4% 是男性，而「晚睡或晚歸」組的男性比例升高到 51.1%，到了「晚睡又晚歸」組，則有 63.0% 是男性。「不晚睡不晚歸」組平均 42.6 歲，「晚睡或晚歸」組平均 36.1 歲，而「晚睡又晚歸」的夜貓子確實最年輕（32.9 歲）。三組的婚姻狀況也相當符合這項趨勢，例如樣本中未婚者佔 18.2%，可是不晚睡又不晚歸的人裡面只有 7.8% 未婚，而晚睡又晚歸者當中未婚的比例高達三分之一。總之，夜間活動傾向愈強的，愈具有男性、年輕人、未婚這些特徵；反之，作息「正常」的一群，則以女性、年紀大、已婚者為主。

夜間作息也呈現出明顯的城鄉差異：都市化程度愈高，愈可能晚睡、晚歸；反之，則愈傾向早睡早歸。例如不晚睡也不晚歸的樣本當中，鄉村居民所佔比例達到 40.8%，比「晚睡又晚歸」組中的鄉村比

附表 1 組合依變項的因素分析摘要

a. 反對善惡報應宿命觀 (表 3)

原始問卷題目	助人	善惡報應 宿命觀	量力助人
人一定先照顧好自己才會助人	-0.13397	0.03701	0.86953
人應該處處為人著想	0.35517	0.18172	0.10269
做好事可以上天堂，壞事做多 會下地獄	-0.03955	0.78743	0.01197
有錢的人應該救濟貧窮的人	0.57711	0.21539	-0.05313
幫助別人是做人的本分	0.70348	0.12091	-0.09641
行善事的人，下一輩子可以過 好的生活	-0.01190	0.81742	-0.04871
每個人都應有起碼的生活保障	0.57967	-0.14139	0.36326
助人應該量力而行	0.44094	-0.11699	0.51135
一個人做壞事，就會受到上天 的處罰	0.00982	0.79829	0.02306
政府必須保障殘障者的工作機會	0.73078	-0.08225	0.00415
好心人會得好報	0.14106	0.67314	-0.02760
我們一定要幫助遭遇不幸的人	0.72473	0.07969	-0.08902
政府必須負起照顧生活貧困者 的責任	0.70760	-0.05441	-0.09988
人會倒楣都是因為他自己造成的	-0.11761	0.41760	0.27532
固有价值	2.00	2.06	.65
alpha 值	.7756	.7552	.3866
樣本數	1775		

註：主成份因素分析，經斜交轉軸。
資料來源：變遷調查 1994 年問卷 I。

b. 社會功利文化貧乏 (表 3)

原始問卷題目	本土文化	功利貧乏
政府一向都很壓迫台灣本土的文化	-0.41893	0.29431
台灣雖在經濟上很富裕，但在文化上卻很貧乏	0.18777	0.87145
將台語認定為國家語言之一	-0.89292	-0.19757
台灣社會太現實太功利	0.04668	0.80084
台灣應該建立自主的文化	-0.59696	0.26817
固有价值	.70	.40
alpha 值	.4628	.5543
樣本數	1716	

註：主成份因素分析，經斜交轉軸。

資料來源：變遷調查 1994 年問卷 I。

c. 傳統家庭婚姻價值觀 (表 5)

原始問卷題目	因素 1	因素 2
年老的父母需要有人長期照顧時，孩子可以 把父母送到安養機構	-0.21521	0.26589
嫁出去的女兒在分財產的時候，應該和兒 子分得一樣多	-0.41632	-0.05483
同性戀也是正常人	-0.45194	0.07472
女婿長期住在岳父母家，也是可以的	-0.49863	-0.01086
兒子結婚後，應該和父母同住	-0.05421	-0.37797
結婚後決定不生小孩，是可以接受的	-0.41722	0.17737
婦女結婚後，不論有沒有就業，晚上都應 該儘量留在家裡	0.07874	-0.29007
固有价值	.86	.34
alpha 值	.5629	.3352
樣本數	4357	

註：主因素分析，經斜交轉軸。

資料來源：都市調查，1994 年。

d. 道德觀念 (表 6)

原始問卷題目	一般道德	婚姻及性道德	公共道德
倒會	0.50110	0.08879	-0.04912
亂丟垃圾	0.67028	-0.06213	-0.15144
說謊	0.48691	0.21696	-0.01674
不照顧老弱殘障	0.40155	0.09211	-0.27493
外遇	0.18994	0.43894	-0.03722
工廠亂排廢水	0.23607	-0.03788	-0.55055
婚前性行爲	-0.01165	0.60971	0.01254
同性戀	-0.04985	0.39339	-0.27136
偷工減料	0.13956	0.09173	-0.54502
固有值	1.21	.79	.78
alpha 值	.7683	.6277	.7126
樣本數	1794		

註：主因素分析，經斜交轉軸。

資料來源：變遷調查 1994 年問卷 I。

e. 維護公共秩序的立場 (表 6)

原始問卷題目	對社會的影響	對個人的影響
亂倒垃圾	0.62362	0.67743
插隊	0.68155	0.73744
逃稅	0.68008	0.77645
擺地攤	0.62653	0.63496
地下工廠	0.68709	0.72543
固有值	2.18	2.54
alpha 值	.6617	.7537
樣本數	1811	1812

註：主成份因素分析。

資料來源：變遷調查 1994 年問卷 I。

f. 日常生活壓力 (表 7)

原始問卷題目	居住環境 壓力	人際交往 壓力	睡眠壓力	工作壓力	家人關係 壓力
上下班或上下學太趕	0.06466	0.02305	-0.03277	-0.50250	0.03900
與同事之間競爭激烈	0.01875	-0.05061	0.00920	-0.55036	-0.00602
與鄰居相處不易	0.08231	-0.33801	0.01702	-0.07287	-0.11646
教養小孩困難	-0.10564	-0.16398	0.01637	-0.02159	-0.38709
家人意見不合	-0.03920	-0.25606	-0.00845	-0.05445	-0.34577
需要和陌生人打交道	0.00915	-0.44408	0.01955	-0.02946	-0.03205
害怕碰到壞人	0.05397	-0.38197	-0.06386	-0.01738	0.00606
工作(家事)壓力太大	-0.03798	-0.00050	-0.13265	-0.38285	-0.16378
睡眠不足(睡不夠)	0.01202	0.02251	-0.65556	-0.09678	0.02997
失眠(睡不著)	-0.00999	-0.03380	-0.66278	0.06691	-0.01100
很難找到知心的朋友	0.12011	-0.31767	-0.06669	0.02452	-0.09643
沒有自己的房子	0.37075	0.11267	-0.03922	0.02572	-0.29078
房子太小	0.54444	0.12740	0.00366	0.02083	-0.22591
住的附近太擁擠	0.74459	-0.07653	0.03209	-0.03639	0.06802
環境複雜	0.63731	-0.17789	-0.03159	-0.02569	0.06381
固有价值	1.43	.72	.90	.80	.46
alpha 值	.7418	.5326	.7002	.6191	.4397
樣本數	4365				

註：主因素分析，經斜交轉軸。

資料來源：都市調查，1994年。

例多出一倍；而後者住在核心都市的比例(42.7%)，也幾乎是前者(早睡早歸)住核心都市比例的兩倍。雖然從都市化程度中等的「市鎮」看不出在夜間作息上有什麼明顯差異，這種差異則相當明顯的存在於鄉村和核心都市之間，清楚地顯示出台灣夜貓子人口的分佈，的確是隨著都市化程度而增加。這點發現，跟一般的觀察和次級資料所揭示的趨勢吻合：大都市的整個環境提供了夜間活動的空間、氣氛、壓力，因而吸引或孕育了夜貓子人口。

夜貓子不但具有男性、年輕、未婚、都市背景這些特徵，他們的平均社會經濟地位也明顯偏高。從表 1c 可以清楚歸納出這項趨勢。從教育程度來看，晚睡又晚歸的「典型」夜貓子當中有四分之三具有高

表1 夜間作息變項分佈與夜間活動人口特徵

a. 晚睡及晚歸變項交叉表

	不晚歸	晚歸	合計
不晚睡	856	394	1250
	46.5	21.4	67.9
晚 睡	189	400	589
	10.3	21.8	32.1
合 計 N	1045	794	1839
%	56.8	43.2	100.0

b. 夜間作息類型的人口特徵與城鄉背景 (單位：%)

作息類型	樣本數	%	男性	年齡(歲)	未婚	鄉村	市鎮	核心
不晚睡不晚歸	856	46.5	36.4	42.6	7.8	40.8	36.9	22.1
晚睡或晚歸	583	31.7	51.1	36.1	22.8	26.9	45.8	27.1
晚睡又晚歸	400	21.8	63.0	32.9	33.7	20.0	37.2	42.7
合計/平均	1839	100.0	46.9	38.4	18.2	31.9	39.8	28.2
F值	—	—	43.6	278.6	143.5	64.4	.78	53.4
p>F值	—	—	.000	.000	.000	.000	.376	.000

c. 夜間作息類型的社經地位 (單位：%)

作息類型	高中職 及以上	大專	一級 行業	次級 行業	三級 行業	收入 (z)	職業 聲望(分)
不晚睡不晚歸	41.0	16.7	13.0	26.3	35.6	-.242	40.9
晚睡或晚歸	63.6	29.0	4.6	31.5	47.5	.124	43.7
晚睡又晚歸	76.4	33.5	3.5	30.9	52.1	.330	44.4
合計/平均	55.9	24.3	8.3	29.0	43.0	.001	42.6
F值	169.3	50.7	40.3	3.88	35.1	105.8	20.2
p>F值	.000	.000	.000	.049	.000	.000	.000

資料來源：變遷調查 1994 年問卷 I。

中職以上教育程度，大專程度的也佔了三分之一，這些高教育程度的比例，幾乎都是「不晚睡不晚歸」組的兩倍。再看所從事的行業：雖然三類作息類型當中都是以第三級行業者居多，可是其間分佈比例還是相當不一樣。不晚睡也不晚歸的樣本當中，從事一級行業的比例幾乎是晚睡又晚歸者的四倍；而後者從事三級行業的比例（52.1%），則比早睡早歸者從事三級行業的比例（35.6%）高出甚多。最後，個人收入和職業聲望也隨著夜間活動的傾向而遞增。晚睡又晚歸者的平均收入最多，職業聲望也最高，而早睡早歸者收入最少，聲望最低；兩項指標的組間差異都達到 .000 的顯著度。

表 1 顯示出來的趨勢，是從單一變項來看夜間作息所得到的結果。如果將這些人口特徵、社經地位、城鄉背景各變項一併分析（也就是互相作為控制變項），則發現人口特徵和城鄉背景的效應還是十分顯著，而社經地位的效應則大幅減弱。表 2 先以晚睡、晚歸兩項變項各自作為依變項，在行 1 到行 4 分別以邏輯迴歸方法分析，然後再以綜合的夜間作息變項作為單一依變項，透過多元邏輯迴歸（行 5a 和 5b），分析夜間活動人口的組成背景。兩者分析結果都以勝算比（odds ratios）呈現出來。

不論是晚睡或晚歸，性別效應和年齡效應的顯著度都達到 .01。更確切的說，在其他個人特徵相當的情況下，男性晚睡的可能性和晚歸的可能性，都是女性的兩倍多。將兩項變項綜合之後，性別效應愈加突出：男性晚睡又晚歸的傾向，高達女性的 3.56 倍（行 5b）。再看年齡效應，相差幅度甚至比性別效應更驚人。跟五、六十歲的樣本比起來，四十多歲的不論晚睡或晚歸的可能性，都在三倍多，三十多歲的升高到四倍，二十多歲的則高達六、七倍。如果從綜合指標來看，則年齡的區辨力更強：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晚睡又晚歸」的可能性，是五、六十歲的 28.6 倍！這些差異，充分顯現出年齡對夜間作息的重大影響。

表2 夜間作息的背景因素分析

(表中所列為勝算比)

自變項	晚 睡 (邏輯迴歸分析)				晚 睡 或晚歸 又晚歸 (多元邏輯迴歸分析)	
	(1)	(2)	(3)	(4)	(5a)	(5b)
人口特徵						
男性	1.89**	2.15**	2.21**	2.22**	1.91**	3.56**
年齡組						
20-29	6.15**	6.26**	7.83**	7.72**	4.46**	28.63**
30-39	3.91**	4.02**	4.30**	4.03**	2.46**	12.15**
40-49	3.62**	3.71**	3.29**	3.16**	2.76**	8.70**
未婚	1.33	1.36	2.12**	2.19**	1.96**	2.42**
社經地位						
教育程度						
國初中	1.26	1.24	1.02	1.03	1.72**	.96
高中職	1.25	1.09	1.75**	1.69**	1.52*	1.47
大專	1.25	1.00	1.21	1.26	1.42	1.08
收入	1.04	1.08**	1.14**	1.11**	1.09**	1.16**
從事行業						
初級	—	.43*	—	1.04	.67	.58
次級	—	.49**	—	1.29	.93	.67
三級	—	.72	—	1.21	1.02	.84
城鄉背景						
市鎮	1.89**	1.86**	1.23	1.25	1.68**	1.90**
核心	3.01**	2.86**	1.57**	1.59**	1.52*	3.35**
樣本數	1796	1754	1810	1766	1760	
卡方值	248.7	254.0	427.0	422.6	520.0	
P>卡方值	.00	.00	.00	.00	.00	
擬R平方	.11	.12	.17	.17	.14	

* p<.05, ** p<.01.

註：(1)多元邏輯迴歸分析中依變項的對照組是「不晚睡不晚歸」組。

(2)各自變項的對照組分別是女性、50-65歲年齡組、已婚及其他、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無業及家管學生等、現居地為鄉村者。

資料來源：變遷調查 1994 年問卷 I。

除了性別效應和年齡效應之外，不同的夜間作息也明顯表現在城鄉背景上。在人口特徵和社經地位相當的人群中，住在市鎮和住在核心都市居民的晚睡傾向，分別是住在鄉村的兩倍和三倍左右(行 1、行 2, $p < .01$)。都市居民晚歸的傾向也比鄉村居民來得強，只是其間差異不像晚睡那麼突出。如果依照夜間作息的綜合變項來分析，城鄉背景的確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核心都市居民，傾向晚睡又晚歸的可能性更高，是鄉村居民的 3.35 倍(行 5b)。

社經地位所表現在夜間作息上的變異，就比較不那麼明顯而一致。假設其他個人特徵一樣，則收入愈高，愈可能晚睡、晚歸(大半都達到 .01 的顯著水準)。教育程度和從事行業的區別，經過控制其他變項後，則幾乎不再顯著。教育程度較高的，還是比較容易晚歸，可是這種教育效應不再是直線效應，而且對晚睡的傾向來說幾乎沒有什麼差別(跟未婚地位一樣，分辨得出晚歸的趨勢，可是看不出晚睡與否)。行業上的區別更不清楚，從事初級、次級、和三級行業者，甚至比無業和其他類更不可能晚睡。如果考慮到對生活作息的自主權，則有工作的人通常比較沒辦法太晚睡，應該是合理的。但是從事三級行業樣本的夜生活傾向不再明顯，也可以看得出來原有的行業效應受到其他特徵(尤其是都市效應)的影響，不再發生作用。換句話說，原來的行業效應很可能是虛假效應，在考慮了城鄉背景和人口特徵後，「行業別」對晚睡或晚歸所能產生的區別作用，不再能夠呼應表 1 的結果。

總之，夜貓子人口的組成有相當鮮明的特徵：年輕、男性、未婚、住核心都市或其他市鎮、收入較高等。這種夜貓子的組成特徵跟文獻所言大致相符，也近似先前的研究發現(Fu 1994)。釐清了夜貓子的基本特徵後，可以進一步探究這群人的態度、價值觀、心理狀況等。夜貓子是否表現出前述非慣俗、反叛、沮喪特質，正是相關理論文獻亟欲探究，卻苦無實證資料支持者。這些議題，將在下節詳細分析。

五、夜貓子的殊異觀念與心態

本節依據前述回顧，分三部份來檢驗夜貓子的殊異觀念與心態。第一部份從對善惡報應宿命觀、對社會功利文化貧乏的感受、以及人生觀和做人原則等項目，來探究夜貓子的非慣俗心態。第二部份以道德感和傳統的婚姻家庭價值觀為例，探討夜貓子的反叛傾向。第三部份拿日常生活中的壓力感受作例子，檢討夜貓子的心理狀況。採用這些例子，不是要涵蓋上述文獻中所論及的各種夜貓子性格和心態，而是在初步檢驗若干相關概念或假設，作為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基礎。

1. 非慣俗心態

非慣俗傾向的例子分為兩類：第一類包括「反宿命觀」和「社會文化批判」，第二類有關人生觀和做人原則。「反宿命觀」指不贊同民間傳統的「善惡報應」觀念。所謂善惡報應，是根據一項題組的因素分析結果所建構出來的因素分數。相關項目包括：「做好事可以上天堂，壞事做多會下地獄」、「行善事的人，下一輩子可以過好的生活」、「一個人做壞事，就會受到上天的處罰」、「好心人會得好報」、「人會倒楣都是因為他自己造成的」等（附表 1a）；因素分數經過調整為代表「反對」這種宿命觀；分數愈高，表示愈不贊同宿命觀。

表 3 的第 1 和第 2 行列出反對宿命觀的迴歸分析結果。第 1 行是從晚睡和晚歸兩項獨立的虛擬變項，分別來檢驗夜間作息對宿命觀的效應，第 2 行則是以綜合指標來測（對照組是「不晚睡不晚歸」者）。兩行的控制變項都同樣包括人口特徵、社經地位、城鄉背景等。「反宿命觀」的變異在兩項夜間作息指標上有不同反映：晚睡的人明顯反對宿命觀 ($p < .05$)，晚回家的人和早回家的人則沒有什麼不同。如果將兩項指標合併分析，則「晚睡又晚歸」的人是比「不晚睡也不晚歸」

表3 非慣俗傾向之一：反宿命觀和社會文化批判

(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自變項	反對善惡報應宿命觀		社會功利文化貧乏	
	(1)	(2)	(3)	(4)
夜間作息				
晚睡	.14*	—	.11*	—
晚歸	-.05	—	-.02	—
綜合指標				
晚睡或晚歸	—	-.02	—	.01
晚睡又晚歸	—	.10	—	.09
深夜工作	-.01	-.02	-.00	-.01
人口特徵				
男性	.11	.10	.10	.09
年齡	-.01*	-.01	-.00	-.00
未婚	.09	.08	.09	.08
社經地位				
教育程度				
國初中	.07	.09	.03	.04
高中職	.20**	.19**	.23**	.22**
大專	.36**	.36**	.47**	.47**
收入	-.00	-.00	.03**	.03**
從事行業				
初級	.14	.13	-.22*	-.23*
次級	.04	.03	-.07	-.08
三級	.00	-.00	-.06	-.07
城鄉背景				
市鎮	-.14*	-.14*	.09	.09
核心	-.04	-.03	.05	.06
常數	.02	.03	-.38	-.39
樣本數	1687	1693	1630	1636
F 值	5.74	5.58	9.64	9.48
p>F 值	.00	.00	.00	.00
調整後 R 平方	.04	.04	.07	.07

* p<.05, ** p<.01.

註：各自變項的對照組分別是「不晚睡不晚歸」、不為工作而晚睡或晚歸者、女性、已婚及其他、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無業及家管學生等、現居地為鄉村者。以下各表皆同。

資料來源：變遷調查 1994 年間卷 I。

的人更反對宿命觀，可是其間差異變得不顯著。上述「晚睡」對「反宿命觀」的效應，經過合併後大幅減弱，綜合的夜間作息變項並不是判斷反宿命觀的良好指標。

表3的第3和第4行是關於「社會文化批判」態度的背景分析。所謂「社會文化批判」也是從相關題組的因素分析所得到的綜合分數，實際項目主要是「台灣雖在經濟上很富裕，但在文化上卻很貧乏」和「台灣社會太現實太功利」(附表1b)，兩者都反映出一種對現實社會和文化抱著不滿、批判的態度。這項綜合分數愈高，代表不滿、批判的立場愈強。根據表3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晚睡」傾向的確能夠有效反映特殊的社會文化觀感 ($p < .05$, 行3)，「晚歸」則沒有顯著效應；如果將兩者予以綜合，則原有的個別效應減弱，不再顯著。換言之，在人口特徵、社經地位、城鄉背景這些因素都相當的情況下，「晚睡」的夜貓子明顯的不滿現實社會文化；但是這種觀感跟是不是固定晚回家(晚歸)並沒有什麼關聯，跟是不是常在深夜工作也幾乎無關。

從反宿命觀和特殊社會文化觀感所反映出來的非慣俗傾向，表現在晚睡樣本上，在晚歸樣本卻不明顯。這點發現一則揭示夜貓子人口有其異質成份，另外也說明了對夜間作息作探討時，必需兼顧不同面向，而不能單方面從就寢時間或「晚睡傾向」來著手。雖然從夜間作息變項來看這種非慣俗傾向有其限制，可是跟其他變項比起來，起碼從「晚睡」的作息特徵，已經能夠區別出比較明顯一致的傾向。在表3的眾多個人特徵當中，只有從教育程度一項可以清楚分辨非慣俗傾向(高中職和大專程度樣本明顯反對宿命觀，也不滿現實社會和文化)；從其他特徵像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收入、從事行業等，都看不出顯著而一致的非慣俗傾向，連向來具有強烈非慣俗傾向的都市居民，都看不出跟鄉鎮居民有明顯差異(參閱傅仰止1995)。相形之下，這類非慣俗傾向跟「晚睡」型態密切相關，值得特別留意。

第二類代表非慣俗傾向的例子包括人生觀和做人原則(或規範)

兩項。「人生觀」的實際項目是指「什麼是比較有意義的人生」，由受訪者自我評價，從「儘量享受人生」、「用心修養品德」、「努力追求成就」三項答案中選出最贊成的，以及最不贊成的。答案經過轉化，變成單選（最贊成的）形式來分析。由於多數樣本最贊成「用心修養品德」（佔56.2%），所以作為對照組，在表4中的左側分別列出儘量享受人生（佔樣本的12.7%）和「努力追求成就」（佔31.1%）兩項的勝算比。

「做人原則或規範」的測量題目也很直接：「您比較願意做那一種人」。答案包括「一個尊敬長輩的人」（佔樣本57.5%）、「一個善於交友的人」（12.8%）、「一個做人做事獨立的人」（29.7%）。表4右側以「尊敬長輩」作為對照組，分別列出其他兩項的勝算比（表4分析採用多元邏輯迴歸）。

單獨從晚睡變項或晚歸變項分析，不容易區辨「比較有意義的人生」有什麼明顯的變異；一旦綜合這兩項夜間作息變項，則發現那些「晚睡又晚歸」的夜貓子，比「不晚睡不晚歸」者容易把「努力追求成就」的人生看作比較有意義，而不是「用心修養品德」（勝算比等於1.41， $p < .05$ ，行2b）。晚睡又晚歸者當中，選擇「儘量享受人生」的可能性也大於修養品德（不顯著）。換句話說，對那些有晚睡或晚歸習慣的人來說，人生最重要的意義不在於修身養性，而偏向於享受人生或追求成就。

再看「比較願意做那一種人」，則夜間作息的效應更明顯。不管是晚睡或晚歸，夜貓子都比較不願意做個「尊敬長輩」的人。除了這點相同之外，兩項變項還是有不同效應：晚睡者比較在意「做人做事獨立」，勝算比是選「尊敬長輩」的1.30倍；晚歸的則明顯偏向「善於交友」，機率是選「尊敬長輩」的1.57倍。如果綜合晚睡和晚歸這兩項變項，則晚睡又晚歸的夜貓子最願意做個善於交友的人，或者希望做人做事獨立（不顯著），而不是尊敬長輩。因此，相對於多數人而言，夜

表 4 非慣俗傾向之二：人生觀與做人原則

(多元邏輯迴歸分析, 勝算比)

自變項	比較有意義的人生				比較願意做那一種人			
	儘量享受人生		努力追求成就		善於交友		做人做事獨立	
	(1a)	(2a)	(1b)	(2b)	(3a)	(4a)	(3b)	(4b)
夜間作息								
晚睡	1.11	—	1.18	—	1.09	—	1.30*	—
晚歸	1.06	—	1.16	—	1.57*	—	.92	—
綜合指標								
晚睡或晚歸	—	.92	—	1.12	—	1.30	—	.79
晚睡又晚歸	—	1.21	—	1.41*	—	1.77*	—	1.29
深夜工作	.96	.94	.87	.86	.48**	.48**	.78+	.78+
人口特徵								
男性	1.67**	1.66**	1.43**	1.43**	1.37+	1.36+	.69*	.68**
年齡	.96**	.96**	.97**	.97**	.98	.98	.98*	.98*
未婚	1.52+	1.52+	1.28	1.27	2.16**	2.19**	1.56*	1.53*
社經地位								
教育程度								
國初中	.53*	.54*	.61*	.62*	.71	.71	1.00	1.07
高中職	.72	.72	.61**	.61**	.85	.86	2.26**	2.27**
大專	.89	.89	.78	.78	1.29	1.30	4.95**	5.08**
收入	1.01	1.01	1.06*	1.06**	.99	.99	1.04+	1.04+
從事行業								
初級	.82	.82	1.38	1.37	.49+	.50+	.56+	.54+
次級	.62+	.63+	.97	.95	.52*	.54*	.57**	.55**
三級	.95	.95	.82	.81	.80	.81	.92	.90
城鄉背景								
市鎮	.89	.90	1.16	1.17	1.03	1.03	1.34+	1.38*
核心	.90	.90	.90	.90	1.41+	1.39	1.39*	1.41*
樣本數	—	—	1746	1752	—	—	1738	1744
卡方值	—	—	126.9	128.1	—	—	339.3	342.0
p>卡方值	—	—	.00	.00	—	—	.00	.00
擬 R 平方	—	—	.04	.04	—	—	.10	.10

比較組：(1)有意義的人生：「用心修養品德」；

(2)願意做那種人：「尊敬長輩」。

+ p<.10, * p<.05, ** p<.01.

資料來源：變遷調查 1994 年問卷 I。

貓子的人生觀和做人原則或規範都不同於一般慣俗，別具特色。

但是只從晚睡和晚歸來代表夜間作息，可能容易忽略掉其中特殊的群體，例如那些深夜工作、不是完全自願要當夜貓子的人。這群「趕夜工」的人，在其他觀念心態上或許跟一般晚睡或晚歸的人沒有多大差異，可是就「比較願意當那一種人」這點特徵來區分，深夜工作者跟一般夜貓子是相當不一樣。深夜工作者最願意遵從「尊敬長輩」這項規範，而不是「做人做事獨立」；他們選擇「善於交友」的勝算比，也只有「尊敬長輩」的一半不到 ($p < .01$, 行 3a、4a)。

因此，雖然一般而言夜貓子具有非慣俗傾向，但是那些深夜工作的人可能需要另外考慮。同樣是晚睡晚歸，有的人是自己選擇、有這種偏好，其他人則可能被迫的成份大，沒有什麼選擇。後者這類不是自己選擇生活型態的夜貓子，或許有必要跟其他夜貓子分開討論。這點區別，將是突顯夜貓子內部異質性的重要準繩。

2. 反叛傾向

夜貓子除了表現出非慣俗的觀感和立場之外，是不是也像前述刻板印象中所描繪的那樣，容易反叛既有的價值和規範體系？本節用來檢驗「反叛」傾向的變項分為兩類，一類是傳統的家庭婚姻價值觀，另一類是道德觀念和對公共秩序的觀點。上述「非慣俗」傾向是針對比較沒有行為約束力的社會慣俗而言，本節所謂「反叛」的對象，則偏重法理基礎較為牢固的文化傳統與社會規範。兩者間關聯密切，但是在本質上仍然有所區別 (Asike 1991:99; 傅仰止 1995)。

因此，「反叛」傾向可以說比「非慣俗」傾向更強烈。非慣俗的行為態度或生活型態未必涉及是非、對錯、道德這些準繩，但是反叛心態或行為則容易牽涉到傳統價值觀或道德層次。本節所分析的「傳統家庭婚姻價值觀」，包括「為了子女，無論如何不應該離婚」、「放棄個人的志向，達成父母的心願」，以及從七個態度量表問項建構成的兩項

因素。因素 1 的原始項目分別為「嫁出去的女兒在分財產的時候，應該和兒子分得一樣多」、「女婿長期住在岳父母家，也是可以的」、「兒子結婚後，應該和父母同住」、「結婚後決定不生小孩，是可以接受的」等；因素 2 的項目包括「年老的父母需要有人長期照顧時，孩子可以把父母送到安養機構」、「同性戀也是正常人」、「婦女結婚後，不論有沒有就業，晚上都應該盡量留在家裡」等(附表 1c)。經過因素分析後，每一問項的答案方向都依照「傳統價值觀」調整：分數愈高，代表愈遵守傳統價值觀；分數愈低，則代表反叛傾向愈強。

表 5 列出這些傳統價值觀的分析結果。「爲了子女不該離婚」和「捨己成全父母願望」兩項是以單題代表，結果以等級波比係數列出。第 3 到第 6 行的依變項是代表傳統家庭及婚姻觀念的兩項因素，用未標準化迴歸係數呈現。從晚睡和晚歸兩項變項分別來看，晚睡者很顯然的不贊成「不該離婚」和「捨己」的主張 ($p < .01$ ，行 1、2)，而晚歸的樣本則明顯的反對上述傳統家庭婚姻觀 ($p < .05$ ，行 3、5)。晚睡樣本反對「不該離婚」和「捨己」的傾向明顯，而在眾多控制變項當中，幾乎只有「年紀輕」和「教育程度高」這兩項產生同樣效應。由於這種反叛傾向不容易從其他人口特徵和社經地位來區辨，「晚睡」的夜貓子所呈現出來的一致效應更加突出。

晚睡者對「不該離婚」和「捨己」的反叛傾向，容易跟「晚歸」特徵互相抵消，所以在綜合指標上看不出夜間作息的效應(數據未列出)。反之，晚歸樣本對傳統家庭婚姻價值的反叛傾向，經過和晚睡特徵一併考慮後，明顯增強了綜合指標的效應：不論是「晚睡或睡歸」組或「晚睡又晚歸」組，都明顯的比「不晚睡不晚歸」組反對傳統的家庭婚姻觀念 ($p < .01$ ，行 4、6)。換言之，就有關家庭婚姻這類傳統價值觀來說，「晚睡」和「晚歸」分別展現出不同的反叛效應；而這兩項夜間作息變項經過合併後，容易抵消原有效應，也可以互相增強原來的效應。因此，爲了有效瞭解夜貓子的觀念和心態，不但必須從晚

表 5 傳統的家庭與婚姻價值觀

自變項	爲了子女 捨己成全 不該離婚 父母願望		傳統家庭及婚姻觀念			
	(等級波比係數)		因素 1	因素 2		
	(1)	(2)	(3)	(4)	(5)	(6)
夜間作息						
晚睡	-.16**	-.16**	-.03	—	-.03	—
晚歸	.03	.08	-.06*	—	-.05*	—
綜合指標						
晚睡或晚歸	—	—	—	-.07**	—	-.05**
晚睡又晚歸	—	—	—	-.09**	—	-.08**
深夜工作	.05	-.06	—	—	—	—
人口特徵						
男性	.12*	.00	.15**	.15**	.16**	.17**
年齡	.01*	.01*	.01**	.01**	.00**	.00**
未婚	-.24**	.01	-.17**	-.18**	-.01	-.02
社經地位						
教育程度						
國初中	-.01	-.08	-.08*	-.08*	-.07**	-.07**
高中職	-.22**	-.12	-.28**	-.29**	-.22**	-.22**
大專	-.32**	-.17*	-.57**	-.57**	-.42**	-.41**
收入	-.00	-.02	-.00	-.00	-.00	-.00
從事行業						
初級	.17	.02	.01	.01	-.02	-.02
次級	.16	.17	-.04	-.04	-.05	-.05*
三級	.10	.15	-.07*	-.06*	-.05	-.05
城鄉背景						
市鎮	.16*	.12	-.00	-.00	.02	.02
核心	-.02	-.06	-.12**	-.12**	-.08**	-.08**
常數	—	—	.08	.08	.02	.02
樣本數	1735	1722	3777	3830	3777	3830
卡方值/F 值	133.8	55.1	71.3	71.8	46.0	46.0
p>卡方值/F 值	.00	.00	.00	.00	.00	.00
擬/調整 R 平方	.02	.01	.21	.21	.14	.14

* p<.05, ** p<.01.

資料來源：(1)第 1 到第 2 行，變遷調查 1994 年間卷 I。

(2)第 3 到第 6 行，「都市意象、居住環境與居住選擇」研究計劃，1994 年調查。

睡和晚歸這兩個面向來分別探討，還要綜合不同面向，以檢驗彼此的互動效應是抵消還是增強。

測量反叛傾向的另一類依變項，以道德觀念和重視公共秩序的強度作代表。「道德觀念」包括三項綜合變項，分別代表對下列行為的評價：一般道德（例如倒會、亂丟垃圾、說謊、不照顧老弱殘障等）、婚姻及性道德（外遇、婚前性行為、同性戀等）、公共道德（指工廠亂排廢水和偷工減料）等（因素分析摘要詳見附表 1d）。這些細項原有的答案從「應該」到「非常不應該」，共分四組。經過因素分析後歸併成上述三項變項（由因素分數代表）。這三項變項的分數愈高，表示受訪者認為上述行為愈不應該，也就是道德感愈強；反之，分數愈低則道德觀念愈薄弱。

「重視公共秩序」的強度，由受訪者對下列五項不遵守公共秩序的例子（包括亂倒垃圾、插隊、逃稅、擺地攤、地下工廠等），依照「對社會的影響」和「對您個人的影響」兩種對象，判斷可能產生問題的嚴重性。答案從「非常嚴重」到「不嚴重」，共分四項。根據因素分析結果，歸成「對社會的影響」和「對個人的影響」兩個依變項。分數愈高，代表受訪者認為這種影響愈嚴重，也就是愈重視公共秩序的維護；分數愈低則表示愈不在乎這些不守公共秩序的違規或違法行為。

有關道德觀念強度的統計結果相當一致：晚睡者的道德觀念並沒有顯著傾向，可是晚歸者的道德感相對的顯得薄弱。不論是從一般道德、婚姻及性道德、或公共道德這幾大面向來看，晚歸者對倒會、外遇、偷工減料這些行為的看法，都沒有像其他人那樣表現出強烈的道德感（表 6，行 1 到行 3）。這麼一致的傾向，只有在性別一項上同時發現：男性在這三方面的道德感也比女性弱得多。換句話說，「道德觀念薄弱」這種傾向，不容易在性別之外的其他人口特徵、社經地位、城鄉背景上面分辨得出有什麼變異，但是可以從「是不是固定晚歸」這點作息特徵上，找到顯著的關聯。這點發現，再度說明夜間作息變

表6 道德觀念與維護公共秩序的立場

(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自變項	道德觀念強度			維護公共秩序的立場			
	一般 道德	婚姻及 性道德	公共 道德	不遵守公共秩序			
	(1)	(2)	(3)	對社會的影響	(5)	對個人的影響	(7)
夜間作息							
晚睡	.06	.00	.06	-.15**	—	-.07	—
晚歸	-.09 ⁺	-.10*	-.11*	.04	—	-.06	—
綜合指標							
晚睡或晚歸	—	—	—	—	.03	—	.01
晚睡又晚歸	—	—	—	—	-.12 ⁺	—	-.15*
深夜工作	.04	.08	.02	-.05	-.04	-.02	-.02
人口特徵							
男性	-.18**	-.21**	-.11*	-.11*	-.11 ⁺	-.11*	-.11*
年齡	.01*	.01**	.00	.01**	.01**	.01*	.01*
未婚	-.12 ⁺	-.03	-.07	.04	.05	-.10	-.11
社經地位							
教育程度							
國初中	.11 ⁺	.15*	.18**	.24**	.23**	.12	.11
高中職	.12*	.08	.15*	.23**	.24**	.08	.07
大專	.11	.05	.19**	.27**	.27**	.02	.02
收入	.01	.00	.01	.00	.00	-.01	-.01
從事行業							
初級	-.03	-.02	-.01	-.06	-.05	.12	.12
次級	.01	.00	.02	.13 ⁺	.14 ⁺	.20*	.19*
三級	.04	.01	.05	.19*	.19*	.22**	.22**
城鄉背景							
市鎮	-.01	.03	.02	.12*	.10 ⁺	.12*	.11 ⁺
核心	.01	-.04	.02	.05	.05	.01	.02
常數	-.25	-.21	-.16	-.60	-.62	-.36	-.37
樣本數	1698	1698	1698	1722	1728	1723	1729
F 值	2.9	4.1	2.1	3.61	3.57	3.22	3.38
p>F 值	.00	.00	.00	.00	.00	.00	.00
調整後 R 平方	.02	.03	.01	.02	.02	.02	.02

* p<.10, * p<.05, ** p<.01.

資料來源：變遷調查 1994 年問卷 I。

項有助於瞭解若干難以解釋的行為態度。

再從維護公共秩序的立場來看，晚睡者似乎容易漠視一些不遵守公共秩序對社會的不良影響。跟早睡的人比起來，晚睡的夜貓子明顯的認為這方面的影響並沒有那麼嚴重 ($p < .01$, 行 4)。至於這種違規或違法行為對個人的不良影響，晚睡或晚歸的人也傾向認為不嚴重，但是差異不顯著。如果以綜合指標來檢驗，則「晚睡又晚歸」者很清楚漠視這種不良影響 ($p < .05$, 行 7)。這種綜合指標的效應，也跟前述發現一樣，說明不同的夜間作息變項之間，可能產生互動效應，有助於揭示從單一變項所無法區辨的態度行為。

表 6 另外透露一項重要訊息。從前述種種夜貓子觀念和心態的分析中，發現夜間作息變項的作用，經常跟教育效應相當近似。例如晚睡者跟高教育程度者一樣，都明顯的反對宿命觀、對現實社會文化抱持批判立場、選擇當個做人做事獨立的人，也同樣都反對「爲了子女不該離婚」、「捨己成全父母」這些主張。而晚歸者也跟受過較高教育者一樣，清楚的反對傳統家庭婚姻價值觀，也都感受到較大的生活壓力（見下節）。

但是在道德感和維護公共秩序的立場上，夜間作息的效應卻和教育效應相反。尤其是教育程度跟道德感成正比，而晚歸者的道德觀念卻相當淡薄；高教育程度者也很在乎不守公共秩序對社會的不良影響，而晚睡者卻認為這些行為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換言之，教育程度高的人，很注重道德規範，可是晚睡晚歸的卻不大在意。因此，晚睡晚歸者的態度行為、生活型態、觀念心態等，似乎有其獨特的地方，而不能視同於一般非慣俗傾向的份子：年輕人、都市居民、高教育程度者等。如果說教育有助於正面的非慣俗或反叛傾向，晚睡晚歸的作息似乎跟正面負面的傾向都有密切關聯。高教育程度份子可能反對不合理的傳統與慣俗限制，可是還是保持著比較強烈的道德觀念，對維護公共秩序也持肯定的立場。反觀夜貓子，其非慣俗和反叛心態則似

乎是針對各種社會既成的事實而來。夜貓子所反對的，不只是不合理的傳統慣俗，還包括維繫社會運轉的道德秩序。這種非慣俗和反叛傾向，彷彿比較重於形式，而不是像教育程度的效應那樣依內容而異。這點特色，更加彰顯出夜貓子的特殊觀念和心態。

3. 生活壓力

由於從既有資料難以直接測試夜貓子是否普遍具有「沮喪」性格，本節另行從「都市調查」資料選取生活壓力變項來分析。生活壓力愈大，表示愈容易覺得沮喪。夜貓子的沮喪性格是否存在，嚴重程度如何，將從對生活壓力的主觀感受來推論。

受訪者對 15 項日常生活壓力來源作判斷，選項包括「經常會不舒服」、「偶而會不舒服」、「從不會不舒服」三項。覺得愈不舒服的，表示壓力愈大。這 15 項壓力來源，可以歸類作下列五大因素（詳見附表 1f 因素分析摘要）：

- ①居住環境壓力：沒有自己的房子、房子太小、住的附近太擁擠、環境複雜；
- ②人際交往壓力：與鄰居相處不易、需要和陌生人打交道、害怕碰到壞人、很難找到知心的朋友；
- ③睡眠壓力：睡眠不足、失眠（睡不著）；
- ④工作壓力：上下班或上下學太趕、同事競爭激烈、工作(家事)壓力太大；
- ⑤家人關係壓力：教養小孩困難、家人意見不合。

表 7 按照這五大類日常生活壓力的來源，列出晚睡和晚歸變項各自的效應。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出相當清楚的模式：晚睡者對居住環境和睡眠感受到明顯壓力，晚歸者的生活壓力則強烈表現在所有類別上，結果相當一致。如果綜合晚睡和晚歸這兩項變項再來看生活壓力，發現從綜合指標更能分辨出這些生活壓力的變異。不論是「晚睡或晚歸」

表7 日常生活壓力

(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自變項	居住環境 壓力	人際交往 壓力	睡眠 壓力	工作 壓力	家人關係 壓力
	(1)	(2)	(3)	(4)	(5)
夜間作息					
晚睡	.07*	-.01	.08*	.01	.04
晚歸	.09**	.14***	.16***	.16***	.11***
人口特徵					
男性	.01	-.23***	-.14***	-.18***	-.08**
年齡	-.00*	-.01***	-.00	-.01***	-.01***
未婚	-.02	-.05	-.01	-.01	-.12***
社經地位					
教育程度					
國初中	.05	-.00	-.10*	-.02	-.04
高中職	.06	.14***	-.00	.10**	-.00
大專	.16***	.25***	.07	.25***	.06
收入	-.00	-.00	-.01	.01	-.01
從事行業					
初級	-.06	-.01	.04	.08	.00
次級	.01	.02	.06	.16***	.05
三級	.06	.08*	.18***	.21***	.10**
城鄉背景					
市鎮	.23***	.16***	.15***	.14***	.14***
核心	.34***	.23***	.15***	.21***	.21***
常數	-.17	-.01	-.06	-.11	.17
樣本數	3780	3780	3780	3780	3780
F 值	15.9	28.2	14.4	31.7	15.6
p>F 值	.00	.00	.00	.00	.00
調整後 R 平方	.05	.09	.05	.10	.05

* p<.05, ** p<.01, *** p<.001.

資料來源：「都市意象、居住環境與居住選擇」研究計劃，1994年調查。

組或者「晚睡又晚歸」組，都相當明顯的比「不晚睡不晚歸」者感受到強烈的生活壓力（組間差異的顯著水準幾乎都達 .001，未列出）。

晚歸者的生活壓力強烈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的各個領域上，一方面呼應前述相關觀念和心態，另一方面突顯這種壓力無所不在，似乎又不是那些相關觀念和心態所能解釋。根據表 4 到表 6 所揭示的結果，晚歸者很明顯的寧願做個善於交友的人、不願接受傳統的家庭婚姻價值觀、是非道德觀念薄弱，這些特徵，應該合理的反映在人際交往、睡眠、家人關係這些壓力上。可是晚歸者的壓力除了作息和人際關係方面之外，也出現在工作領域和居住環境上。相對於晚睡者的生活壓力只限於睡眠和居住環境，晚歸者所感受到的日常生活壓力幾乎無所不在。從綜合指標來看，「晚睡或晚歸者」和「晚睡又晚歸者」的壓力也是源自日常生活中的各個領域，相當突出。

除了夜間作息變項，這種在日常生活中普遍感受到各種壓力的傾向，只有從受訪者居住地的都市化程度上分辨得出來。跟鄉村人比起來，市鎮居民和核心都市居民強烈感受到生活中各個領域上的壓力。這種都市生活所引起的壓力，反映出台灣都市的緊湊步調，也是都市社會學向來論述的一項重點 (Fischer 1984)。一般論述強調都市生活的壓力來源，本文所揭示的，則是在都市環境直接造成生活壓力之外，還透過都市人普遍晚睡晚歸的夜間作息趨勢，間接帶來多重領域的生活壓力。

反觀人口特徵和社經地位，則沒有任何一項普遍跟每一項生活壓力都相關。例如女性所受到的壓力很普遍，可是從居住環境壓力上還是分辨不出性別差異；年輕人所感受到的人際關係壓力和工作壓力也偏高，在睡眠方面則沒有明顯區別；教育程度較高和從事三級行業的樣本受到較大生活壓力，但是這種壓力也不是全面性的。因此，跟眾多個人特徵比起來，夜間作息是除了城鄉背景之外，唯一能夠有效區辨各種日常生活壓力的變項。日常生活中經常碰到的種種困擾和問題，

固然可以從通用的基本資料（像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行業等）分辨出部份背景，從夜間作息這種日常生活的基本變項，更能透露出一致的訊息。依據本節的主要發現，「晚歸」這項單一變項，和「晚睡又晚歸」這種綜合指標，都是最具區辨力的夜間作息代表。

六、結論

本文以夜間活動人口的特徵與行為態度為例，說明日常生活變項的分析價值。從日常生活變項著手，不但可以勾勒出社會整體的輪廓和脈動，也可能有效反映眾多行為態度背後的運作機制，揭示出若干意想不到的關聯。如果在不同年代或不同社會調查收集同樣的日常生活狀況，則一方面可以長期累積貫時性的資料來看社會變遷，另一方面也能據以從事跨社會文化的比較研究。

有關夜間作息的變異，從通行於社會的類型上看得出來，尤其是有人早睡早起，有人晚睡晚起。這種「晨雀」和「夜貓子」的區分，不但一般人耳熟能詳，民眾心中也普遍對這兩種類型存有刻板印象。刻板印象的盛行，反映出議題本身值得探究；而刻板印象跟實際狀況契合到什麼程度，便是探討的重點所在。社會上對夜貓子的刻板印象歷歷如繪，可是相關的研究貧乏，不能反映出這種社會現象的普遍與重要性，甚至連夜貓子的人口組成這種基本問題，都缺乏有系統的探討。

本文先行剖析夜間活動人口的組合，再探究夜貓子的殊異觀念與心態。研究架構參考文獻上所歸納出來的夜貓子特點：非慣俗、反叛、沮喪、莫測高深，其中除了最後一項特徵難從既有資料驗證外，其他三項都在文中予以詳細分析研討。分析重點雖然在突顯夜貓子的特性，也顧及群體內的異質性。因此，本文用來測試夜間作息的實際變項包括晚睡、晚歸、深夜工作三者，並以晚睡和晚歸兩變項作為反映夜間

作息的核心。如此將運作定義多樣化，既能突顯夜貓子的共同特色，也能揭示夜貓子觀念與心態的多重面向。

一般說來，晚睡者和晚歸者同樣都表現出明顯的非慣俗傾向，對道德和社會規範也持有反叛心態。這種非慣俗和反叛特色，雖然也經常表現在年輕人、都市居民、教育程度較高者身上，但是跟這些群體比起來，夜貓子的非慣俗和反叛傾向，似乎偏重在形式上，而不論內容如何。夜貓子不但反對善惡報應宿命觀、反對約束個人自主的「捨己成全父母」這類傳統家庭婚姻觀念，還漠視道德和社會規範。其他群體，例如教育程度較高者，也明顯的具有非慣俗和反叛傾向，可是這些群體還是相當遵從道德和社會規範，對公共秩序的維護也相當認同。換言之，其他群體的非慣俗和反叛傾向是依內容而定，而夜貓子非慣俗和反叛的對象則似乎不分什麼本質，幾乎是一味地反叛。

跟其他群體相較之下，夜貓子的觀念與心態清楚易辨。可是細加區分，夜貓子人口內部還是有不小變異。例如晚睡者反對「善惡報應宿命觀」、對現實社會抱持批判立場、做人的原則著重在「做人做事獨立」；他（她）們的反叛傾向表現在反對「捨自己志向來成全父母願望」這種態度，也不在乎「不遵守公共秩序」會導致社會什麼不良影響。晚歸者觀念和心態上的特徵則不盡相同。晚歸者所注重的做人原則是「善於交友」，也明顯反對傳統家庭婚姻價值觀；晚歸者的道德觀念薄弱，在日常生活的重要領域上經常感受到莫大壓力。這些區別，說明了起碼必須從晚睡和晚歸這兩個面向來有效探討夜間作息。「深夜工作者」身為晚睡或晚歸的一種類型，跟一般的夜貓子又不盡相同。例如晚睡者最偏好做個獨立的人，晚歸者最重視交友，深夜工作者則最注重「尊敬長輩」。如此從多面向來看夜貓子的觀念與心態，更能分辨出群體內的異質成份。

本研究初步驗證有關「晨雀」和「夜貓子」兩大類屬的刻板印象，研究結果對夜生活研究有其理論意涵，在實證基礎上也有助於瞭解一

般社會生活。夜間作息變項的解釋作用或許不如少數基本變項，例如從「晚睡與否」來分析反宿命觀和社會文化批判，所獲得的效力不如從教育程度來著手；可是對分析若干觀念心態有其重要貢獻，經常在常見的基本資料之外，發揮額外的解釋力量。若干「夜間作息」的效應，甚至凌駕一般的人口特徵之上。例如要解釋各種生活壓力的變異，除了城鄉背景之外，只能從夜間作息變項得到一致而顯著的效應。一般大型社會調查雖然未必是針對夜生活而設計，可是配合上各式各樣的主題，所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增列夜間作息變項，一方面能擴展探討跟夜生活相關的範疇，另一方面也在分析各種行為態度時，提供新的探究角度。

本文所探討的夜貓子觀念與心態，因為配合特定的研究架構與既有資料，只限於非慣俗傾向、反叛傾向、生活壓力三類。有關其他性格與心態（例如「莫測高深」的特性）仍需持續探究，在變項測量和運作定義方面也該更加改進。有關「非慣俗」的運作定義和有關「沮喪」的測量等，在本文中均配合既有的調查題材而進行，未必能真正貼切的反映出概念的核心。例如「反對善惡報應宿命觀」、「認為社會功利及文化貧乏」、「享受人生、追求成就」、「善於交友、做人做事獨立」這些項目是不是真的能代表「非慣俗傾向」的真義，仍然值得進一步檢討。

至於夜間作息跟相關觀念或心態之間的因果關係如何釐清，則是方法和資料上一項更大的難題。本文分析都是依據同時性的調查資料，難以區辨變項間的因果關係。夜間作息「行為」和上述觀念、心態、感受之間有無因果關聯？前因後果如何區辨？在既有實證基礎上也難以克服這類課題。例如從表 7 發現「晚歸者」明顯的感受到較大的種種生活壓力，這種關聯是代表著「因為晚歸而引起生活壓力」，還是「因為生活壓力大而晚歸」？其間的因果方向恐怕無法根據本文資料加以有效區辨。如何透過特殊研究設計來解決這道難題，將是值得努力的

一大方向。

本文在文獻回顧部份提到其他研究意義，以及造成夜貓子殊異觀念與心態的可能機制，也受限於資料性質或可用題材，無法顧及。這些限制都有待更廣泛的資料收集和設計來加以克服。例如前文提到夜間作息變項在宏觀分析上的貢獻、自我兌現的預言、夜貓子容異已是肇因於無力感、夜間情境對既有態度具有強化效應，這些可能造就夜貓子殊異觀念、心態、行為的機制到底如何運作，也都是未來研究的重要方向。

未來研究另外應該持續探討密切相關的其他議題，例如發掘夜貓子在政治傾向、社會參與、休閒活動、基本人格各方面有何特色，這些特色又如何呼應本文所探討的非慣俗與反叛傾向等。這些議題有一部份在變遷調查資料中已經有實證基礎來探討，部份亟需新的研究設計來擴充涵蓋。而擴充相關議題的最佳途徑，就是配合社會變遷這種大型社會調查的研究架構，以既有的基本資料為基礎，考慮增列夜間作息這種日常生活變項。如此落實到日常生活變項上來探測微視層次的個人行為態度，甚至鉅視層次上的社會現象，應該能更加提升大型社會調查的實質貢獻。

參考書目

行政院主計處

1991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時間運用調查報告，行政院主計處編印，台北。

李朝賢

1990 台灣地方經濟發展差異之研究。錄於台灣省政府經濟動員委員會主編，宏揚台灣經驗迎接二十一世紀，頁 55-74。

洪永泰

1992 民意調查的抽樣設計。研考雙月刊 16(1):22-32。

傅仰止

1995 都市人的非慣俗傾向。台大社會學刊 24:35-98。

傅仰止、伊慶春

1994 容忍態度的結構肇因：都市背景、遷移經驗、異質聯繫。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6(2):257-301。

瞿海源主編

1994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第二期第五次調查計劃執行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資助，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執行。

Adams, Bert N.

1987 "Early Birds' and 'Night Owl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Married Couples."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71(3):245-248.

Alheit, Peter

1994 "Everyday Time and Life Time: On the Problems of Healing Contradictory Experiences of Time." *Time and Society* 3(3):305-319.

Asike, Joseph I.

1991 "The City in Modern Nigeria: A Force in Rapid Social Change." Pp.97-112 in George F. McLean and John Kromkowske (eds.) *Urbanization and Values*. Washington D.C.: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Bigler, Pamela J.

1993 "Early Birds and Night Owls." Pp.198-199 in Mary A. Carskadon et al. (eds.) *Encyclopedia of Sleep and Dreaming*. New York: MacMillan Pub.

Brown, Roger

1986 *Social Psychology*. The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Cimbalo, Richard S. and Anne-Marie Hughey
1986 "Preferences and Behaviors of Morning and Night People: Self-Report." *Psychological Reports* 59:502.
- Fischer, Claude S.
1975 "Toward A Subcultural Theory of Urban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6):1319-1341.
1984(1976) *The Urban Experience*. 2nd ed. New York: HBJ, Inc.
- Fu, Yang-chih
1994 "Night-oriented Lifestyle and Urban Unconventionality: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Night People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8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Los Angeles, CA. August 5-9.
- Golant, Stephen M.
1984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Nighttime Activity of Old Persons in Their Community." *Journal of Gerontology* 39(4):485-491.
- Hamilton, David L. and Tina K. Troler
1986 "Stereotypes and Stereotyping: An Overview of the Cognitive Approach." Pp.127-163 in John F. Dovidio and Samuel L. Gaertner (eds.) *Prejudice, Discrimination, and Racism*.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Hood, Jane C.
1988 "From Night to Day: Tim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Custodial Wor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7(1):96-116.
- Johnson, Elmer H.
1984 "Night Patrol in Amsterdam's Warmoesstraat District." *Police Studies* 7(3):131-135.
- Kerkhof, Gerard A.
1985 "Inter-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Human Circadian System: A Review." *Biological Psychology* 20(2):83-112.
- Locksley, Anne, Christine Hepburn, and Vilma Ortiz
1982 "Social Stereotypes and Judgments of Individuals: An Instance of the Base-rate Fallac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8:23-42.
- McKelvie, Stuart J. and Linda A. Schamer
1988 "Effects of Night, Passengers, and Sex on Driver Behavior at Stop Sign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8(5):685-690.

Melbin, Murray

1978 "Night As Fronti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1):3-22.

1987 *Night As Frontier: Colonizing the World After Dark*.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Merton, Robert K.

1957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Pp.421-436 in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IL: Free Press.

Park, Robert E.

1915(1925)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Pp.1-46 reprinted in R.E. Park, E.W. Burgess, and R.D. McKenzie, *The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resser, Harriet B.

1986 "Shift Work among American Women and Child Car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8(August):551-563.

Schivelbusch, Wolfgang

1988 *Disenchanted Nigh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Li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 from German by Angela Davi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aw, Jenny

1994 "Punctuality and the Everyday Ethics of Time: Some Evidence from the Mass Observation Archive." *Time and Society* 3(1):79-97.

Smith, Carlla S., Christopher Reilly, and Karen Midkiff

1989 "Evaluation of Three Circadian Rhythm Questionnaires With Suggestions for an Improved Measure of Morningnes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4(5):728-738.

Tittle, Charles R.

1989 "Urbanness and Unconventional Behavior: A Partial Test of Claude Fischer's Subcultural Theory." *Criminology* 27(2):273-306.

Zerubavel, Eviatar

1979 *Patterns of Time in Hospital Life: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Hidden Rhythms: 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ial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簡介

(上冊)

蔡瑞明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主要的研究興趣包括社會流動與階層、組織社會學、網絡分析、對數線性模型等。主要的論文為美國工會的沒落、Who Marries Who?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Wives' and Husb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Class in Taiwan、對數線性模型與對數相乘模型的發展與運用：以社會流動的分析為例。目前的研究計畫主要是階級的分類與建構，組織內的生涯流動。

孫清山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專長為都市社會學、工業、職業社會學、社會組織、社會研究法、社會流動與階層。

黃毅志 台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專長為社會階層、社會網絡、教育社會學，主要著作有社經背景與地位取得過程之結構機制、社會流動，社會網絡與工人意識、台灣地區社會學研究的職業分類與測量問題之探討、台灣地區社會科學研究的收入測量問題之初步探討。

林南 (Nan Lin) 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網理論、社會階層化和流動、社會支持，以及當代中國社會轉型。著作包括社會研究法基礎、大眾傳播學、社會結構與社會網分析、社會支持、生活事故與心理健康、天安門的爭鬥——1989年社會運動的解析。學術論文散見於美歐及國內各社會學學刊。

關秉寅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兼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專

長於社會階層信念方面的研究，目前從事和社會控制方式有關的研究。在社會階層信念研究的主要著作包括 *Choosing Rul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誰的公平？誰的正義？從土地增值稅爭議談公平與權力的關係、薪資所得與公平規範之研究。

瞿海源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兼處主任。研究專長包括宗教社會學及社會階層等。近年來主持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等研究計畫。論文散見國內外著名期刊，合編有變遷中的台灣社會、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等書，專書包括社會心理學新論、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等。

章英華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研究專長為都市社會學、歷史社會學。有關都市與家庭的研究論文散見國內主要社會學刊物，合編有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台灣地區社會學論文摘要、兩岸三地社會學的發展與交流，並著有台灣都市的內部結構一書。

郭貞 政治大學廣告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專長與興趣包括消費行為、大眾傳媒與社會化、網路廣告效果與行銷策略、廣告從業人士之離職行為、與線性結構因果結構模式等。重要著作多為學報論文，散見於新聞學研究、廣告學研究、政大學報，並有英文專書 *How Adolescents Learn To Be Consumers: An Eclectic Approach*。

傅仰止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研究專長為都市社會心理、族群關係研究、社會網絡研究。主要著作有社會調查與研究（合編），以及多篇有關都市社會心理、族群關係等研究論文。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 / 張荳雲, 呂玉瑕, 王甫昌主編. --初版.
--臺北市：中研院社研所籌備處, 民86
冊； 公分.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專書；第1號)

ISBN 957-671-496-6 (上冊：精裝). --

ISBN 957-671-497-4 (上冊：平裝). --

ISBN 957-671-498-2 (下冊：精裝). --

ISBN 957-671-499-0 (下冊：平裝)

1. 社會變遷 — 台灣 — 論文, 講詞等 2. 社會 — 台灣 — 論文, 講詞等

540.9232

86004723

專書第一號

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 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上)

主 編：張荳雲、呂玉瑕、王甫昌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28號

印刷排版：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敦化南路1段294號11樓之5

初 版：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

定 價：精裝 300 元 · 平裝 250 元 (單冊)

ISBN 957-671-496-6 (上冊：精裝)

ISBN 957-671-497-4 (上冊：平裝)

The Preparatory Office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Series No.1

Taiwanese Society in 1990s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Symposium Series II
(part I)

Edited by

Ly-Yun Chang, Yu-Hsia Lu, Fu-Chang Wang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 May 1997

100827869

The Department Office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Series No. 1

Urbanization & Society in Taiwan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Symposium Series II
(part II)

Edited by

Li-Yun Chang, Yu-Hsia Lu, Fu-Chung Wang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May 1982



中華民國 捌拾 陸年 陸月 貳伍 日 繳

Taiwanese Society in 1990s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Symposium Series II (part 1)

Monograph Series No.1

Edited by Ly-Yun Chang, Yu-Hsia Lu, Fu-Chang Wang

ISBN 957-671-496-6



9 789576 714962